



瞿秋白选集

瞿秋白选集



白 欽 賢

明佳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
他生前，許多人忌憐他，或者
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
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
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獨立
立場，寧願向劍子手的屠刀火
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
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
意志和他在工作才保存下來

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
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
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
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
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
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目 录

《新青年》之新宣言(一九二三年五月)	1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九二三年三月)	9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23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44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 三日)	55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93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	113
中国革命史之新篇(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130
历史的工具——列宁(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	137
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一五四— 五一(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	140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	14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三月)	153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一九二五年 四月)	162

《热血日报》发刊辞(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171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173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九二五年八月).....	180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202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217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226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245
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259
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265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	267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281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289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	297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310

谁能领导革命(一九二七年二月)	320
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	331
关于“三大”党纲(一九二七年二月)	342
《湖南农民革命》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345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349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 十日)	356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自序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	370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372
国民革命完了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378
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十日)	381
悼张太雷同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388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九二八年一月 十日)	393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一九二八年四月)	40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413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417
纪念彭湃同志(一九二九年九月)	444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	
(一九三 年九月)	451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 五日).....	456
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日).....	482
大众文艺的问题(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	488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 七月).....	499
非政治主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520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524
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 一日).....	556
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九三三年八月)	564
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一九三四年三月二 十九日).....	568
中国能否抗日?(一九三四年六月)	571

《新青年》之新宣言^{*}

(一九二三年五月)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歌德之《浮士德》

《新青年》杂志 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

^{*} 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改为季刊出版，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瞿秋白任主编，并写了这个宣言。

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

自卖 ,真正的解放中国 ,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所以《新青年》的职志 ,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 ,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 ,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 ,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 ,于“革命”的观念 ,得有更切实的了解 ,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 ,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 ,不但对于宗法社会的思想进行剧激的争斗 ,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 ,必须力除种种障碍 :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 ,笼统的头脑 ,反对科学 ,迷信 ,固然是革命的障碍 ;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 ,琐屑的对付 ,谬解科学 ,“浪漫” ,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 ,《新青年》孤军独战 ,势不均力不敌 ,军阀的统治 ,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 ,如此之残酷 ,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 ,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 ,又内受军阀的摧残 ,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 ,所以困顿竭蹶 ,每月不能如期出世 ,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 ,必定尽力赞助 ;《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 ,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 ,务期不负他的重任 ,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 ,重行整顿一番 ,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

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的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当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象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

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细绎，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细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颠顶等于飞蛾投火

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最客观的。何况《新

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道《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注 释

《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办于上海，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迁北京出版，一九二一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一九二一年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次年六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四期后休刊，一九二五年四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次年七月停刊。

宗法社会 指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庶子分封制。宗法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到周朝逐渐完备。以后，地主阶级长期利用它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这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很不彻底，革命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

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由英、美、法、日操纵的巴黎和会将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青岛的特权让给日本的无理决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这个运动迅速发展全国各地。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天津、南京、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大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六月十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二十八日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

乌托邦，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意即“乌有之乡”，后成为“空想”的同意语。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指五四时期宣传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人。

张、曹、吴、孙，即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孙中山。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一九二三年三月)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设使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署名屈维它。

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的青年妇女，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 Nyokching Tsur 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一九一九年版，第五十一页。）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裡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

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

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

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拷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¹⁾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家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欧初发展时正是封建制度的劲敌,然侵略国外弱小民族之际,却往往辅助此等民族内部的封建制度,其实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凡是所谓强国,因其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要求,可

以进而为种种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阴谋，务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适宜他的剥削政策，所以维持殖民地内能代其统治权的各派各阶级的势力，直至完全克服臣属此等弱小民族为止。中国的地位尤其可危，因有所谓“国际均势”，而成为国际的殖民地。各强国得以勾结各经济区域内的事实上的政府（军阀），以至于新生的大资产阶级，间接实行其统治权；其结果，军阀为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时起战祸，列强亦因互争势力范围而阴谋倾轧、贿赂、威吓，令中国顾东失西，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各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若有异，则其对待中国军阀或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亦就不同。中国的军阀既须有经济上的凭借，每每能令其地方政府渐成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之中心点，所以外国资本之占有此经济区域者，必从而役使之，利用之。同时，若是军阀凭借经济势力的形式太鲁莽，足以障碍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那时外国资本之较强者，能力贯于几省以上，就想除此障碍，而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携手。然帝国主义的性质唯在于：一、投货，二、搜括原料，三、投资，四、开发原料；凡此都是救世界的资本主义于危亡所必须的程序，此中仅因其经济侵略力发展的阶段不同，而异其掠夺的方式，异其所维持之阶级，而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因为中国若是经济上真能独立发展，则帝国主义必受挤而颠覆。所以不论他是辅助军阀，或是辅助财阀资产阶级，他必有一相当程度，辅助至此而止，力求

合于他自己的目的。此地所谓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经济；所谓助国内资产阶级排除障碍，不但此等障碍专是外国经济在此发展的障碍，而且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譬如最近汉口的外国商人，趁京汉工潮^①的失败，役使湖北地方政府专门封闭工会之与外国企业有关系者，足证军阀的制度始终大有利于外国资本；再则如上海镇守使确实是外国资本家的刽子手，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所以不论如何，帝国主义客观上自成为使中国社会退向封建制度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以强力纳入资本主义。一九二二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或者说，谈文化何必论到此等琐琐屑屑的“细事”。然而要知道，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

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伦常纲纪,孝悌礼教”的思想明明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不必多论;“和平好让”更是因宗法社会中经济发展薄弱,虽争亦必不能多得,祖孙、父子、兄弟、伯叔在同一经济单位之中,求分配的相安,除此更无别法。中国的“天下四海观”,尤其是古旧的封建制度崩坏,而经济发展刚到“简单的商品生产制”,不能前进,加上宗法社会的经济组织,所以大家只觉得要“安居乐业”,各人管各人的家事,各人做各人的生意,用不着集权的国家,如何能有国家观念?只当着其他各国,其他各民族也和中国一样呢。若更说玄妙些,讲到东方人的习静、养心、绝欲、诚意的功夫,尤其可笑。请问:在如此恬静的农村生活里,威严的君主政治下,求不到什么“物”,所以只好养“心”,不会满欲,所以只好绝欲,是不是东方文化的优点?要知道罗马时代也有“天下观”,中世纪教会中也有绝欲主义,又是什么奇珍瑰宝!诚然不错,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惰性律”;

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譬如中国经济发展,较之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然而北京总商会仍旧只有送万民伞的本领,这真是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之奴隶性的心理,崇拜君父的滥调。若是此等幼稚的资产阶级能运用现时所有的一些实力,也决不至于如此。虽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真有极大的工厂,几万万的银行资本,他还肯如此俯就么?那时,恐怕此等敬长上、不争夺的“美德”早已烟销云灭了。而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管,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因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御自然界的能。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帝国主义处处阻滞此种可能;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

出境^①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兵士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北京)。此等税关法例、球场规则,原来是中国人新近学来的,也可以说是极粗浅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公约,而中国人却无福气实行。至于科学艺术也受限制,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要捉到巡捕房里去。请问“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在那里?帝国主义不但为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并且扰害殖民地的法治,竭力阻止殖民地人研究真正的科学,唯恐弱小民族因真得科学文明而强盛。

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说亦正是宗法社会破产的先声。至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此种文化过程,在先进“文明国”每每分为两段,因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时尚有相当的余地,所以强国得以从容不迫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非至于旧社会中的新力量勃生、彻底翻腾,演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时,此种“循环论证”不能终

止。至于殖民地上，此种过程，却有不得不双方并进之势：就是民族的解放运动，普通的民主运动，因阨于帝国主义之故，自然当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融合而为一；于思想上即是道德之平民化与科学之社会化两阶段同时并呈，道德与科学本非相消的。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此种恶性，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

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直至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宗法社会的思想代表还正在竭力拥护旧伦理，世界资产阶级也反过来否认新科学。这也难怪，原来他们俩，一在殖民地上，一在强国之中，都已魂游墟墓，看不见前途，所以不得不向后转。世界的资产阶级，既以科学的发明，作为少数人享福之用，他眼看着用了这许多精力，杀人放火的机械制造得如此之精明，始终还是镇不住“乱”，保

不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无能”。这刚刚迎合了宗法社会的心理，于是所谓“东方文化派”大得其意。其实那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应当用敌人所怕的武器，殖民地上的劳动平民也应如此。世界的资产阶级及殖民地上的贵族阶级为他们所依附的经济制度（私产制及自给经济）所限，不能再前进，自己不能克“物”，所以不得不教人“克己”。难道受压迫者便真听了他们“克己”，讲唯心主义么？因此可见，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只是征服天行的方法。在少数人垄断此种方法之结果的社会里，方法愈妙，富人愈富，于是社会中阶级斗争愈剧烈，国际间战祸愈可惨，因此以为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罪恶，其实假设大多数人能应用科学，则虽有斗争亦自能保证将来发达进步之可能，只因此等进步已非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而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所以资产阶级要否认。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

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这一方针固然非常之明确,然而实际运动之时,尤须时时不忘科学的方法、慎密的考察,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相应的方法,以及东方民族内部运动之阶段,都必须是极慎重的研究。

注 释

宗法社会,见本书第8页注。

鲁班,亦称公输般,春秋时鲁国的能工巧匠。后来土、木建筑工匠尊奉他为祖师。

至圣先师,指孔子。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自汉朝以后成为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深远。唐朝以后封建统治者对他多有追谥,如“文宣王”、“至圣文宣王”等,明朝时称“至圣先师”。

文昌帝君,道教神名。道家称此神专司人间功名、禄位事,就成为

古代一些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行会,又称行帮,是封建社会中城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业组织。

阴阳、五行两说原为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国古代思想家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两种相互对立和消长的物质力量,用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等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来附会王朝兴替和社会历史的变动,宣扬唯心主义。

西周、春秋时,周王把全国分封成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的国君称诸侯。诸侯在其封疆内世代执掌统治大权,后来逐渐成为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

这里所谓“改丁归漕”是指摊丁入亩而言。清朝前期改革赋役制度,将丁税摊入地税,成为摊丁入亩。在负担漕粮的地方,地税就是漕粮。

辛亥革命,见本书第8页注。

⑩ 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学者极力宣传中国的封建文化,反对宣传西方文化,反对提倡民主和科学,随后又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这些人被称为东方文化派。

⑪ 京汉工潮,指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⑫ 克门是美国资本家、走私商。一九二三年一月,他和美国领事索克宾偷运银元六万出境,被中国关卡发现后,竟开枪射击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被迫回击,将他击毙,从而引起中美间严重交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帝国主义之投货、投资、 垄断原料及文化侵略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时已经形成世界的经济,渐渐撤毁一切“民族”的藩篱。因机器生产的发达,而各国自为一经济“地位”的状况,遂暴露其不可能的弱点。原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据乃在于商品,他必须有购买者,必须有市场。自国内市场之发展至于国外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力侵入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于是帝国主义出世,地球上遂有所谓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然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合此殖民地于其自己的经济机体,其普遍性质又总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则的强权。自军事的、政治的以至于纯粹经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瞿秋白是这个刊物的主编。一九二七年初,作者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收入本文,个别地方有修改,并加上了小标题。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济的，往往形式上愈缓和，而实际上愈狠毒。

列强先进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商品生产日益扩张，他的国内市场已觉得不能消受；此处不但因国内人口有限买不了这许多商品，而且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惹起的种种社会病象：如经济恐慌、失业增多、民众破产等，所以国内人民即使不少，亦大多数没有购买力足以消受如许之多的商品。同时托拉斯等大生产的方法既减少国内的竞争，又大增商品制造的能量，于是不得不求扩张市场于国外，侵略弱小民族，有时简直公然掠夺。大资本国家相互之间因争夺市场而互斗，各自对于某种实业行关税保护政策，对于某种实业行奖励保护政策；各自借此政治方法而渐以“强权征服”代“自由贸易”于经济之中，于是殖民地更成列强互争“投货”之对象。列强各自既不易侵犯，则侵犯弱小民族，既而于弱小民族之国家里仍旧遇见竞争，则进一步而各谋吞灭此弱小民族，使为自己的领土。

再则，资本主义不但要求“投货”的市场，而且还必须有取得原料之来源；生产愈发达，需要原料愈甚。自己国内原料往往不足供给，或者虽有原料而太贵；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必千方百计谋夺天产丰富而实业尚未开发的地方，或者强行占据，或者划入其势力范围。此等倾向亦为惹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斗的原因。殖民地的占定及势力范围之划出，一则为剥削该地起见，二则为防止其他强国与之竞争；然而“垄断原料”比“争夺市场”所引起之

纠葛尤甚。因为争夺市场与割地占据还不十分密切相关，而“垄断原料”却至少要有势力范围。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既已剥削自国的无产阶级，又掠夺各殖民地的劳动平民，其资本日益增长，而往往有很多的“多余资本”。于是此等多余资本又千方百计输入殖民地，其实是国内生产发达超过自国消费的能量，所有资本不能尽量容纳于生产机关之中，所以侵入殖民地。一则原料就近采取，二则工力价廉，企业容易发达，是为“移植资本”。（此等生产的移植资本，往往对于非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厉行保护政策的亦可以实行，因为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必在当时为较弱，而境内的外货输入甚少，若资本主义较强的国家投资于此处，亦必能得利。）然而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尚有为纯粹不生产的投资，如政治借款、军事借款等，借此可以取得债权者的地位而干涉弱国财政，以至于取得其全国的经济权。各国“财政资本”发展的程度有高低，所以他们对殖民地投资的能力有大小，而所持的投资政策也有不同。财政资本能力大的，可以稍费军事侵略而总握殖民地之经济生活（如美国之于中国）；财政资本能力小的，就不得不常假暴力，或者特别划出较小的范围以便投资（如日本之于南满）。各国投资互相接触于一处时，又必发生冲突，于是大则战争，小则竞相干涉殖民地的政治，总以取得统治者之地位或“代理统治者（军阀）”之内应为目的。

最后，“移植资本”于殖民地，对于资本主义还有一种

利益 :就是殖民地没有资本主义 ,因此亦没有职工联合会的运动 ;行会组织 遇着资本主义立刻崩坏 ,资本主义至少在最初一期必能任意剥削 ,劳动条件、工厂设备都可以任意敷衍 ,工资及工作时间尤其没有阻碍 ,可以自由增减。他们还造作种种“学说”否认阶级斗争。至于借款投资等的进行 ,更因为殖民地人民的“办事技术”远逊资产阶级的社会 ,可以任意欺罔 ;而且殖民地旧治者阶级未受民权运动的损害 ,可以任意利用 ,蒙蔽人民。然而各国资本主义互相竞争 ,玩弄殖民地的民族感情 ,镇压殖民地的劳动运动 ,其方式虽然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 ,然而其自相排斥倾轧亦始终必至于冲突 ,间接即始终必引起殖民地平民之反抗。

帝国主义的步骤 :一、强辟商场 ;二、垄断原料 ;三、移植资本 ;四、文化侵略。各国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 ,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 ;假使以中国所处国际地位而论 ,此种现象非常之明显。尤其是因为中国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 ,及其与欧美接触的时代刚刚不左不右不先不后 ,造成了“国际的殖民地”。于是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 ,列强互相排挤 ,而结果反维持均势 ,中国得以苟延残喘 ,因此经过的时期很长。所以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变迁复杂 ,弄得中国平民眼花缭乱 ,不知是敌是友。实际上中国的所以不亡 ,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 ,无一敢首先发难 ,而又互相牵制罢了。

二、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方式

帝国主义初入中国，实先及于边境各属地，当时承“寻觅印度”之商业资本之后，各国势力尚未甚接触冲突，所以第一期的“投货时期”其侵略方式纯是各行其军事的占据领土及强力开辟商埠。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役之逼开通商口岸；如缅甸、安南、台湾、琉球、香港等地之割让，其时中国对于列强仅是销货的市场。

西欧资本主义既发达至工业资本，需要原料渐急，中国的天然富源又渐渐为列强所发见，所以第二期的“投货时期”，其侵略方式已是列强争相以军力、以外交手段占据“势力范围”。如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大连等之租借军港；长江流域、东三省、云南、两广、福建、山东等处，英、俄、法、日、德势力之划分；铁道、矿山之分配于各国。其时中国对于列强已成原料出产地，运输交通权为各国所必须，矿山为各国所垂涎，尤其是销售货物。势力范围之划定，正是列强分赃的办法。预备瓜分零碎割中国使成分属各国的完全殖民地，可以各在其势力范围内行其对于自国投货的保护政策；然那时国际局面已经复杂，美洲商业资本大膨胀，不利于中国之瓜分而失其广大之市场，于是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因此瓜分局面破坏，反成为犄角之势。

此两期中,因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始终是很公开的掠夺、显而易见的军事行为与外交阴谋,同时又因为受列强余润的官僚资本家经济能力还很薄弱,所以自“平英团”至“义和团”,中国平民排外的运动虽然极蠢,而爱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却表示得非常清楚。而且此两时期中,表面上看来,列强侵略中国,做得穷凶极恶,而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生活始终还能有几分独立;李鸿章的北洋海军、造船厂、兵工厂等足以证明中国始终还有几分反抗列强的可能。中日战争败后,财政上第一次受巨大赔款的打击,军事设备也一蹶不振;外债渗入中国经济生活,中央政府财政上收支不能相抵也从此起。至庚子赔款几已将中国财政完全破坏。况且种种新政费用日增,而国内经济——农业、手工业破产不已,入不敷出,只有乞怜于外债。这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逐步发露的当然的病象。

嗣后日本崛起,能与欧美在中国商业上竞争,世界经济中就起一种变化;欧美先进国资本主义又已发展至财政资本(对内则银行资本渐集中而能掌握托拉斯等大生产的工业,对外则以放债攫取弱小民族之财政权),中国至此正需迎受外资以首先解决财政之困难,适应铁道矿山等事业之需要,所以就开始第一期的“投资时期”。其侵略的方式乃是争相放债以取得抵押品,取得债权,取得监督财政权为条件;如盛宣怀^①经手之一千万元铁道公债之日款,美政府发起之四国币制借款一千万镑,粤汉、川

汉借款六百万镑，民国成立后之六国银行团二千五百万镑大借款^①，……于是关税、盐税等都入外人之手。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移植资本。因为此等投资大都是实际上非生产的外债的性质，对于政府的投资，无论如何必有极浓的政治色彩，因此，列强之间冲突时时暴露，如日本之“满蒙除外”问题等。

财政资本实际上有魄力的，始终要推先进的英美，力能笼罩全中国的经济生活（欧战^②后的美国尤其有此等能力，且不得不注意于中国）。欧战期间，日本的资本在中国有畸重之势，引起中国单调的排日。欧战后，俄国社会革命引起中国的社会运动，中国军阀政治紊乱经济太甚；同时趁欧战的时机中国资产阶级亦始终稍有发展，所以能隐约开始第二期的“投资时期”。其侵略的方式乃是暗助最温和的排日的民众运动，提倡裁兵运动，预备移植资本，自营（或所谓“合办”）实业于中国境内；华府会议^③等类的骗局，整理内外债，整顿税则，增加关税等……以“非政治”的统一借款政策求攫得“共管”中国之权——整个儿的吞下去（美国）。提倡较温和的官僚资本式的民主运动，乃是抑制劳动平民的真正的民主运动之手段。其他“温和”的国际政策，亦无不是手段，目的却在于驯养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平民，令于外资正当输入经营工业时，能俯首听命，是为“文化的侵略”。此一时期尚开始，并未完全实现呢。

此两期中，因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式，渐渐离军事行

动,甚至要“公开外交”,很足以欺骗近视的中国资产阶级。同时又因为中国官僚资本家之私人经济力已有发展,尽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往往无意之中代表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说话,很足以混淆视听。所以辛亥革命^⑭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五四运动虽有伟大的成绩而后来每况愈下,往往只替“国际联盟”^⑮、“国际协会”、“华府会议”做宣传,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日渐隐晦。而且此两时期中虽然表面上看来列强之对于中国:山东问题亦有人替我们伸冤,治外法权都有人肯退还。实际上,中国私人经济愈发展,则其依赖英、美之财政资本也愈甚,国家经济力薄弱至于极点,已离破产不远。即使军阀的兵都裁掉,财政理好,内外债都有保证,然美国处于债权国之地位,又能输入大宗资本于中国实业之中,即“无政权”,而全中国亦已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将来弄得无一工厂无美国资本,无一银行不受美国支配,中国的小工业、小商业必不能与之竞争,势必全中国都成美国之“雇佣的奴隶”。这是假使不颠覆帝国主义所必有之结果。

历史的观察大致如此。与中国接触之资本国家,本不是同一的程度,所以上述四期,不必拘泥,同时同地亦可以有错综互用的现象。如今且说最近几年帝国主义侵略方式之国别的差异。

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经受一次大“危机”:世界市场缩小,生产事业破坏,革命潮流汹涌,只剩得中国还是

一片好市场(军阀虽作乱,而商业尚有畸形的发展;工人农民最受苦痛罢了。这是统计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各参战国家之中,欧洲只有英国受伤较小,然而已经负债不少,失业工人有加无已,经济力稍弱。至于日本、美国却坐收渔翁之利。于是美国以世界第一的资本国家,财政资本发达至于沸点,全世界都是他的债务国。他要恢复欧洲经济,欧洲又太残破,况且决不能象中国这样容易欺侮,所以只得注全力于东亚,以求复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本来幼稚,是个暴发户,外强中干的;欧战之中,偏又在中国占了些便宜,国内经济力暴涨,生活程度加高,极力要想侵略中国。日、美的冲突必不可免,中国是他们一个最大的祸源。他们侵略的方式却各不相同,胜败的形势也就可以逆见。

日本资本主义刚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倾向于帝国主义行侵略政策:一则因为日本地域狭少;二则因为防御欧美资本的东侵(英、法资本主义先进,所以当初能从容发展,日本却一出世就遇强敌)。他战胜中国之后,第一步侵入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幼稚;战胜俄国后虽稍强,而他的经济力始终只能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对中国投货,如南满的经营,到如今还只有商业占势力(矿业、铁道除外)。他的人口又太多,不能不行强力侵占的移植政策,日本的小商人,甚至于工人,充牣于南满、山东;加以他的商货又便宜又恶劣,刚刚宜于中国人的购买力;凡此一切都直接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初步发展相冲突。他第一次勉

强向中国投资（一千万之铁道公债），就是捉襟露肘，向欧美诸国转募来的。他本不能投资，不过因欲与欧美列强竞争，赜蹶争先而已。他的财政资本的能力，本只能应付一隅——满蒙特殊利益，然而趁欧战期间，穷形极相的想垄断全中国，不得不急功近利提出所谓二十一条^⑯；此后继续向中央的投资也是急于见效，专做“政治的投机”，安福借款^⑰等公然贿赂中国政府，凡此一切更显而易见其侵略的阴谋足以做中国民族运动最明显的目标。欧战之后，他既以强力夺取山东而未成，又被英、美（吴佩孚^⑱）赶出中央政府，二十一条差不多只剩一条：续租旅大。他已受国际政策上的许多打击（如华府会议等），至此不能不誓死力争；于是满洲侵略遂成日本最近的目的，甚至于与张作霖^⑲的官僚资本（他以前所利用的）都冲突起来。他已由全体的侵略缩小至于地方的侵略，凡此一切往往极易授列强以口实，尤其为美国宣传的资料，以引起中国仇日亲美之心。可见日本的能力还远不足以为“文化的侵略”呢（虽有日华文化同盟等类东西，丝毫不能得中国人的同情）。

美国却不然。他在战后就跳而为世界第一工业国，本有魄力极伟大的财政资本。他投资之最终目标必在于经营工业于中国境内，运用财政资本于生产，如新银行团^⑳的大计划；他本是就近采取原料，使用价廉的工力，决不带着美国有工会的人来，如美国财团与中国周自齐^㉑、王正廷^㉒、张謇^㉓等组织的大公司，特订契约：“用中国工

人”；他现在所输入中国的货物因成本太大不宜于中国人的购买力，或者所运都是大工业生产（机器、火车、铁轨）等的附件及奢侈品；凡此一切都与中国现时小小的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冲突不甚显著，而又能收买汇集中国的官僚资本。他代英国而起握世界金融的总枢纽，即使不立刻取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权，也已经能置全中国商业资本于掌股之上，很可以从容不迫的看风色放稳债。他的财政资本力能把持全国（英国或者要替他冲突），他不得不要外债统一，关税整理，掌握财政实权，不屑轻于冒险；况且他因此必须打破势力范围，扼制军阀就范，俾得“和平发展”，放“统一后方借债”的谣言，倡导“点名即是裁兵”论调；凡此一切都是暧昧不明的政策，欺罔中国平民，诱惑“大资产阶级”的假民主运动。他能有这么大的“度量”放弃庚子赔款，无意之中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遍处设立教会学校，办他那假惺惺的慈善事业；不但现时他能够控制中央政府做侵略全中国的事，而且还能改制中国人的心肺，贿赂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他能有很大很多的机关报，“洋大人”的舆论每每足以影响中国日常的政治生活；凡此一切都大足以“威临中国之人心”，挟制日本，卸罪于日本，诬蔑赤俄，灭杀中国真民主派的势力。英国今年以来，也渐渐觉悟，替他竞争。英、美帝国主义强盛的趋势，较之日本帝国主义可怕万倍；“文化的侵略”可谓帝国主义最新的形式，比军事的侵略狠毒得多！（可惜！上海三育学

校是美国教会办的,他那师范部主任夏威尔拍桌蹬地骂学生:“既入教会读书,应当断绝国家关系;‘爱国’二字断无存在之余地。”一语道破这种“文化”的黑幕。但是上海总商会为了临城案^{②4}还恨不得要请美国公使代理中华民国大总统呢!——看上海《申报》^{②5}五月十七日。)

中国处于此种任人戏侮欺罔统辖共管的国际地位,若是没有正当的民族民主运动,永世只能做人家的炮灰。门户开放的恶果,祸发既缓,为害更大。国内因帝国主义的影响,内乱不止;国外因互争中国权利而时有第二次大战爆发的危险。日本困兽必利于速斗,日本若胜,美国必不干休;美国若胜,英、美之间又当再起冲突。如此永永不止,或且全世界各国滚入大战,世界经济再经一次大破裂。英国统一党议员柯埃说:“中国之统一和平与真正之自由及繁荣,乃世界之和平、世界贸易之发展、世界资源之增殖所必不可缺。”帝国主义者看得真准!殊不知国际间因帝国主义之存在决不能和平,中国国内因此亦决不得和平;帝国主义的冀望必不能达!帝国主义侵略之种种方式无一不侵害中国之经济发展。每一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只限于一定限度之中,只能做帝国主义之下的不独立的附庸!

只有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实行经济协作;只有自立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共和国,方能达到此一目的。

三、军阀与帝国主义及反帝国主义之运动

普通殖民地因帝国主义的占领,政权完全丧失,领有殖民地的宗主国便能任所欲为,或行保护政策,或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大致必竭力隔离此等殖民地于国际贸易之外。独有中国因列强均势之形成,而得偷生;一部分政治权虽不能入民主派之手,却为暴发的军阀所攘,并未完全归于帝国主义的某国,所以成其为半殖民地。因此,列强关于中国问题,互相猜忌,知道一国不能自私,乃赞成门户开放,这是经济侵略的特别方式,已如上节所述,其势亦必紊乱中国的经济生活。

既如此,则政权并未归定一国(虽有势力范围而为门户开放政策所破),各国利益冲突,各国资本主义的程度不同,其所需要的“代理统治者”亦相异。本来殖民地的上层阶级可以纯粹为宗主国所收买,而中国以半殖民地的地位,宗主国不止一个,“一国三公,无所适从”。因此,帝国主义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纷乱,尤甚于完全的殖民地。况且经过五、六十年长期的帝国主义之发展,每一强国对于中国“治者阶级”的态度亦历有变更,于是纷乱更甚;然而“帝国主义者各为私利替中国择主”之一原则却是不错的,这又是政治侵略上的特别形式。

庚子八国联军入京之前,德皇谕遣发赴华的军队说:

“朕对于处分中国问题，以镇定暴徒、惩罚元凶、恢复秩序、设立足以维持公法之强固政府为目的；其政府以何人组织，则非朕之所敢知。”伦敦《泰晤士报》说：“各国若谋中国问题根本解决，则勿使守旧政府返北京，而另组织新政府。”俄国、日本却争着迎清帝的和议使臣。

辛亥革命，各国看着孙文^{②⑥}、袁世凯^{②⑦}不知谁好，且首先截留关税、盐税，自保债权，使南北不得不议和；孙文不致于“跋扈”，袁世凯不得逞雄心。

二次革命^{②⑧}时，五国银行团之大借款二千五百万镑^{②⑨}，适供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之用（美国不在内），后来日本另施狡狴手段，索性以二十一条与袁皇帝交换承认。

其时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均势还勉强维持，然而能力较大的总有想换一个“代理统治者”的意思，能力较小的则趁此市惠于守旧的“治者阶级”，却已看得出来这种倾向。

欧战起后而日本大施野心，势力膨胀，他独挑着一个“代理统治者”段祺瑞^{③⑩}。欧战终了，英、美回顾东方，不久就挑着一个吴佩孚。从此日帮段，英美就帮直、奉^{③⑪}；日帮奉，英、美就帮直。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反映于中国政治日益明显。

最近一期国民运动随着经济上可怜的发展而兴起，劳动运动亦就乘机涌起。直系吴佩孚已成为最反动的势力，孙文又起而反抗；英、美有经验的政治家、外交家知道军阀统治不但激使中国群众左倾，而且也对于他们不适

用,不如辅助“士绅的资产阶级”稍挫军阀,缓和革命;所以也和着说裁兵、理财、制宪。日本到如今只能用现钱贿赂三、四个卖国贼,英、美却有以支票贿赂整个儿的阶级(果真不错,中国人只闹旅大问题,不管威海卫,不提克门案^{③②})。

临城案发生,益发暴露军阀的不善经纪外国人的财产(中国),英、美又生气要替我们另选一班“代理统治者”:《字林西报》^{③③}说:“吾人共拘拿曹锟^{③④}上将及其二三负责之领袖,迫彼等以自己荷包中付给赔款,然后免其官职永不许再入政界,于彼等未付款之前必须囚之外国狱中……。”(新式的治外法权)美国公使休门更教训上海总商会道:“(一)勿拘‘在商言商’不问政治之恶习,因商业实包含于政治之内。(二)余深信贵国商人,能以实力建设一强有力之政府,不仅是以拯救中国现状,且确能增进中国自古之荣誉。”

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不承认北京政府,要外国人来教训他们建设政府,因为这种政府连国都不会卖了。这是自然的倾向,中国的大商阶级做的都是外国生意,自己没有独立的生产能力,中国的劳动平民、小商人、农民,受帝国主义经济上政治上的恶果,失业破产,一时还没养成伟大的组织力,所以任他们横行。

中国经济发展既为帝国主义所扼,生产权、财政权眼看都到外人手中去了;中国社会发展就为帝国主义所

扰，失业游民遍地，早已成兵匪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方式逐步纷乱，东拉西夺，永世没有清明之日。统治者及国家制度，都得让外国人来替我们定。假使果真能假外力来驱军阀，政权那有不完全落于外人之手，做完完全全的殖民地奴隶！况且列强要有军阀，好来抑遏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之发展，直接向他们买中国；同时列强亦要利用中国商人，好来稍稍恐吓军阀，使他们好好的代理统治；列强决不肯尽力驱军阀，亦决不是真心帮助商人。必须劳动平民尽量发展其“社会力”，颠覆军阀及帝国主义，才有真正的民权主义。自己没有力量，就想依赖“善邻”的美国，避开劳动平民，人家见你无群众的后援，一步一步逼上来，弄到象朝鲜人一样，那时连临城的土匪都不如了。

《东方杂志》^{③⑤}第二十卷第四号上幼雄君说：“他（赤俄）不得不议定‘开发特许’、‘食料特许’的规则，以为诱引外资投入之计；正所谓‘以敌国之粮养我之兵’的一个恶计。”又说：“劳农俄国并不诚心履行那些条约，屡屡取消，可见他的居心实在想把这些利权做一个饵物，引起列强间的抗争罢了。”幼雄君说赤俄不诚心，有恶计，请问中国现在敢不诚心、能怀恶计么？不敢。因为不敢，所以听了威尔逊^{③⑥}的“妇人之仁”的话，不但要想“读《孝经》退黄巾”^{③⑦}，而且还想请“豺狼哺子”。你诚心待人，就恐人家不诚心待你。现时诚心不诚心都由不得我们自主，帝国主义发展到“文化的侵略”，始终还是不脱“强力”的性

质,他能弄得你不进教会学校不成,良心都不自由了。要知道:必定要有了自主之权才讲得到“善恶”;必定要显示权力之后才有公理。赤俄对外条约履行与否,以有利于无产阶级国家为标准。中国现在能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而对外吗?赤俄引起列强间之抗争即从此开始破毁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能吗?中国人民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为所迷惑而单只反对日本。可以醒了!!

只有俄国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奋起,世界无产阶级与各殖民地劳动平民携手;“用一切方法,从最强的着眼”,共同颠覆所有的帝国主义、所有的军阀制度,方能得世界经济的发达,人类文明的再造。

注 释

行会组织,见本书第22页注。

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扩张,它们(特别是英国)首先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贸易不仅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也危及到清朝政府的统治。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严禁鸦片,一八三九年六月,在虎门销毁英美烟商鸦片二万余箱。一八四一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即鸦片战争。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法联军之役,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借口亚罗号船受到攻击,进犯广州,被当地军民击退。次年,英法组成联军,十二月攻陷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口炮台,逼近天津,六月请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一八六一年八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再向大沽口进攻,九月侵入北京,十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沙俄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璦

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一八九九年九月提出的。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租借地及“势力范围”，使其分沾侵略利益，还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外国人享有投资权利。以后，美国一直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排挤其他帝国主义。

平英团指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中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组织，曾给予英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

义和团原是山东、直隶等地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人民的民间秘密结社。原名义和拳，一八九九年改称义和团。一九〇〇年(庚子)春在华北、东北及京津一带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进行了激烈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六月起，英、法、美、日、俄、德、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攻天津、北京。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清政府向帝国主义乞和。一九〇〇年九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起家，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长期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大权，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签订卖国条约。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办军事工业，七十年代开始编练北洋海军，逐步扩大其所谓“求富自强”的洋务活动，是洋务派的首领。

中日战争，指一八九四年即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人可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

庚子赔款，指《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共计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自一九〇九年，美、英、日、法先后“减免”其所得大部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停止对战败的德、奥支付赔款；苏俄于一九二〇年宣布中止对俄赔款。但是，截止到一九三八年，帝国主义已从中国掠夺赔款银六亿五千二百余万两。

① 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字杏荪，江苏常州人。近代买办官僚，先后得到李鸿章、张之洞信任，把持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煤铁厂矿、铁路总公司等实业大权，并多次出卖中国路矿主权。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策划“铁路国有”，酿成“保路风潮”，武昌起义后被革职。

① 一九一一年以后，帝国主义者为了包揽对中国贷款，控制中国财政，曾有四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五国银行团之组织。一九一一年五月，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支持，打败革命党在南方的势力，曾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多次商借借款，未成。一九一二年四月，日本、俄国加入，变成六国银行团。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国退出，又变成五国银行团。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急于筹措战费，与五国银行团交涉，于一九一三年四月达成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二千五百万英镑，四十七年偿清，本息共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多英镑，合银元八亿一千七百余万元。这项借款因以办理“善后”为名，故又称善后大借款。

② 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 华府会议，即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次年二月缔结了《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

④ 辛亥革命，见本书第8页注。

⑤ 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六月宣告解散。

⑥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全文共五号，二十一条。前四号主要内容为：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以及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权。第五号则要求控制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等权。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袁世凯除对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阴谋野心未能得逞。

⑦ 安福借款指段祺瑞政府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的多次借款，达数亿元之多，其中仅由日本侵略分子西原龟三经手的借款就有一亿多元，即所谓西原借款。

⑧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一九二三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一九二六年又联奉攻国民军。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⑨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

阎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讨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围苏俄使馆,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害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与蒋介石作战失败后,乘火车撤回关外,至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死。

⑳ 一九一八年六月,美国向英、日、法等国提议,由四国组织新银行团,承受中国一切经济借款与政治借款。一九二一年九月,美、英、日、法四国新银行团成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的矛盾,新银行团并未发生实际的作用。参见本文注①。

㉑ 周自齐(一八七一——一九二三),山东单县人。曾任袁世凯内阁度支部大臣、山东都督兼民政厅长,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国务总理等职。

㉒ 王正廷(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奉化人。曾任唐绍仪内阁工商次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一九二二年十月任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一九二八年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

㉓ 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甲午战争后,在南通兴办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一九一一年后从事立宪运动,为国内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后任袁世凯政府农林、工商总长。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时辞职。

㉔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山东土匪孙美瑶在津浦路临城劫持火车,掳去中外旅客百余人,被称为临城案。案发后帝国主义乘机要挟,甚至扬言要直接出兵干涉。

㉕ 上海《申报》,一八七二年四月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著名大报。

㉖ 孙文,即孙中山。

㉗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后,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篡夺了总统职位,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称帝,遭全国一致反对。一九一六年六月忧惧而死。

㉘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指使亲信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

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未能及时发动。六月,袁世凯又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派兵南下,发动内战。国民党人被迫于七月起兵讨袁,不到两个月即告失败。

②⑨ 指善后大借款,见本文注①。

③⑩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辛亥革命后,历任袁世凯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死后,把持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〇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直系政权垮台后,被奉系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

③⑪ 直、奉,指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

③⑫ 克门案,见本书第22页注⑬。

③⑬ 《字林西报》是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

③⑭ 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与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三年以五千元一票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次年十月“北京政变”被冯玉祥撵下台。

③⑮ 《东方杂志》,一九〇四年三月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是大型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⑯ 威尔逊(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任美国总统。

③⑰ 见《后汉书》卷八十一《向栩传》。向栩,河内朝歌(今河南安阳)人。在黄巾起义时,他向朝廷上书言事,认为只要在黄河岸上面朝北读《孝经》,黄巾军自然会消灭,颇有讽刺朝臣的味道。中常侍张让攻击向栩不愿令国家派大将出师,怀疑他同黄巾首领张角同谋,想作内应。朝廷遂将向栩逮捕入狱,后将他杀害。

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特征

中国的宗法社会 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 ,而起崩溃 ,方开始有真正的“ 资产阶级的的发展 ”,亦可称“ 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开发、剥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资本主义 ,适以自种世界资本制度彻底崩坏的祸根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本非帝国主义所能容忍 ,然而 ,他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 ,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 ,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 ,割占领土 ,攘夺富源 ,投货投资 ,令中国农业破产 ,农民流离失所 ,变成兵匪 ;然而 ,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 ,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 后备队 ”—— 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 ,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落 ,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第一期 ,署名屈维它。作者自编论文集收入本文 ,个别地方略有修改 ,并加了小标题。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二、五节。

而且亦因外货而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发现“家庭手工业”，如商铺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织袜、帽、手套、线袋等类的制度；更进而成就“工场手工业”，如组织手机的小工场等。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其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引起中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却反因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辛迪加”的雏形。外国资本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销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工场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人，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累”，能力更超过国内商人，更进而能与外国争投资。固然，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径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至今汇丰银行已能掌握全中国的金融，新银行团更想操纵全国的财政、交通。因此中国虽有自己资本发展的形势，造成稚弱的新式银行资本，然而，一则大工业所须过多非其力所能支，二

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大,于是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为营业,又因关、盐大抵押品都在外国人之手,始终跳不过他的范围;然而国内经济生活为帝国主义所拓展,内地旧式的放款(信托)事业始终日有发展。

既如此,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而资产阶级的新手工业、工业、商业、信托事业日益发展。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顺此发展便能敌帝国主义吗?不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非但不能如英国资本,首先开发,侵入其他国家,并且不能如东欧(俄国)资本之方出世即遇劲敌,乃是受强敌之暴力所开拓:一,对外工商业受协定关税之限制;二,工业中所须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中国所无,为大工业国、大农业国所垄断操纵;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四,工业略有进步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即为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本性),原料食粮更受限制;五,农民手工业者破产甚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国内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与中国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商品间之势力悬殊的竞争,还不算在内。有此数因转转相乘,政治的经济的紊乱更迭而起,帝国主义更得乘机扑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

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有无产阶级的形成。因物价昂贵工价低廉在帝国主义之下双方日益增盛,所以无产阶级实行经济斗争;更因列强蛮横卑鄙的政策,军

阔强暴残狠的手段，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已经逼得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界）破产异常之速且烈，虽有流入兵队转成反动势力的工具者，而普遍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连土匪亦在内）。新生的“婴儿”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无不本能的反对外国；至于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最近新起的工业家”等，亦迟早必觉着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于是，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固然而上述之大致趋势，已可明了，然因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自然显露种种驳杂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也就不能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作更细些的研究。

大都社会间的变象，受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的，往往发露得迟缓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响的，必更急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于军事；李鸿章与彼得大帝所行相同，而所得绝异，此中原因暂不能赘叙；唯军事技术的应用则

同由防御外寇而来，在中国又恰与小农破产之过程相遇，于是上则造成军阀，下则造成兵匪。军事技术为武人附虎翼，小农破产为武人增“炮灰”。这是第一层。对于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此外，外交失败，屡次赔款借债，更是增加平民破产的近因。

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这与西欧社会党在资产阶级发达已盛时要求“国有”的性质大异，其结果且不能令资产阶级的政府集中资本及生产（因为并无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更不能以此口号而开社会革命之血路（因为本非劳动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对于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所益有限，而消费却当比拟于先进资本国，因汽机生产成本须大；路则最初亦含有“媚外的”军事性质，虽增加国家收入，而一时并不是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自己需要的。西欧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以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还不知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着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勾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辛亥革命虽闹“民有”铁路，至今中国私人资本家该得起几里铁路！）固然落后的资本国，间或也有这等办法，然实按其当

地经济情形 ,始终比中国此种悬隔状态好几倍。次则 ,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 ,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 ,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 ,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 ,以及少数巨商 ,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 ;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 ,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 ,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当然流毒至于现在 ,不但不能十分组织生产 ,增加生产力 ,并且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这是第二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 ,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 ,以便外货输入 ,原料输出 ;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 ,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 ;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这是第三层。交通部在别国不过是国务机关之一 ,处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 ,全国资本家的经济力笼罩得住这小小官署。在中国他却会变成所谓一“系”——交通系 ;可是这不过举例而说 ,其实这系乃是官僚资本与交通资本的复合幻化 ,且其灵魂还是包办国债制度呢。

这三层是中国资本主义出世时的特异之处 ,大足以定他终身的命运。本来中国旧时的所谓“一统江山” ,并非政治经济程度已到的集权政府。其时 ,各区(省)处处自为风气 ,因为各有各的经济生活 ,所以若有武人占据 ,便可随时互相隔离 ;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内” ,统治全局亦较

容易,不用多养兵力,这亦因为各地方经济力弱,只须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统皇帝勘平“群寇”之后,反当解甲兵、“与民休息”。否则全国生活经济必重行骚乱,“长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⑩,清的绿营驻防^⑪,人数都非常之少:一则恐怕地方将官割据为叛,二则“天下”的财力也实不能担负许多。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今既有湘军、淮军^⑫,在洪、杨^⑬“屠杀”十数省之后,又要加以“新军”^⑭,要用西洋军事技术,如何得了!全国因此雇佣军队的增多征调,各省游民已混流交汇;各省武官渐渐自立门户,其所凭藉之武器军队大非昔比,决不能再低头做“戈什哈”^⑮;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长,他们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军阀割据的祸根早已伏下,他们正在想乘机攫取地方政权。再则,各地方士绅巨商,藉购军械、借外债、办“洋务”^⑯而自肥,渐渐觉着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种畸形发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实力”,使能剜肉补疮支持新增的兵饷;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资产阶级,也学会了借谘议局^⑰或新式督抚和清廷捣乱,其实欲自获“利权”,却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缚。三则,交通事业过量的开发,骤然勾通国内的茅塞,毁坏对外的“长城”,真的资产阶级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触动而开始发展;国外的富商要求国家富强而资助革命党,国内的商人初步发展便很觉着外货的侵占;各省经济生活虽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资产阶级受此交通先时开发的影响而偏向商业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

尚非常之小 ;于是因他们反对专制而久伏的动机骤发 ,既发而力又太小 ,不足管理国家 ,不得不随地“请”个武人“保护安宁秩序”。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 ,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 ,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 ,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 ,当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资产阶级 ,利用此民族主义的国内平民及国外侨商 ,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其结果 ,平民受欺 ,侨商被摈 ;而袁世凯^①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资产阶级 ,遂成军阀统治。当初是反对铁路“官”有 ,反对大借款 ,反对帝国主义 ;其结果 ,铁路及借款运动仍旧失败 ,反而断送关、盐管理权于外人 ,国债增加几十倍 ,帝国主义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辛亥革命” ,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华民国” ,真是历史的必然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 无产阶级的胜利

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 ,即必须有政治的独立 ;如今再一察能争此“独立”的社会力量 ,此等力量亦正养成于资产阶级发展之中。

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 ,扰乱经济 ,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 ,当然不能为中国争独立解

放。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海外侨商则受外国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劳动阶级之中，农民处于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虽然日渐破产，困苦颠连，而自己不见仇敌，始终有郁勃不平的倾向；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始终有一部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此中凡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在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便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

世界帝国主义必然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注 释

宗法社会，见本书第 8 页注。

汇丰银行，一名香港上海银行，英国资本开设。一八六四年设总行于香港，次年设分行于上海，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汇丰银行是英国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控制旧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新银行团，见本书第 42 页注^②。

协定关税，又称协定税率。它是一国根据与他国缔结的条约或贸易协定，对进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所规定的税率。有双边、多边和片面协定关税数种。前两种一般是平等互利的，而后一种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弱小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片面减让税率。鸦片战争后，列强先后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低税。

辛亥革命，见本书第 8 页注。

李鸿章，见本书第 40 页注。

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即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对内曾进行一系列改革，如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等。对外多次发动战争，推行扩张政策。

“民有”铁路，指民间自筹资金修筑铁路。清朝末年，为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一批爱国绅商创办铁路公司，从一九〇三年开始，短短几年间，全国就有十多个省准备自办铁路，并开始集股、勘测、兴修工作。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结果，激起了著名的“保路风潮”。

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清末梁士诒任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把持交通事业，并以交通款项成立交通银行。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在袁世凯政府任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署理财政部次长等职，培植势力，自成系统，被称为“交通系”。

⑩ 府兵是西魏时建立的一种兵役制，军士由各级将领统帅，另立户籍。唐朝也行府兵制，兵士平时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唐玄宗时，因兵士无力自备兵器资粮，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宋朝将强壮士兵留守京师，称禁军，弱者戍守地方，称厢兵，实际已不行府兵制。

⑪ 绿营，指绿营兵，也称绿旗兵。它是清朝政府按明代军队建制建立的常备军。因这些由汉人组成的军队使用绿色军旗，所以称绿营。

⑫ 湘军是曾国藩于一八五二年在其家乡湖南招募、训练的封建军阀武装。淮军是李鸿章于一八六一年将其家乡安徽的地主武装，按照湘军的组织形式加以改编组成的封建军阀武装。这两支封建军阀武装，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⑬ 洪杨，即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杨秀清（约一八二——一八五六），均为太平天国革命领袖。

⑭ 甲午战争中淮军、湘军均告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任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从国外采购新式武器，用“洋法”、“练洋操”。随后在其他地方也开始编练新军。

⑮ 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称为“戈什哈”，简称戈什，满语“防卫”的意思。

⑯ 洋务，指鸦片战争以后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活动。

⑰ 谘议局，一九〇九年清政府伪装预备立宪而在各省设立的地方咨询机关。议员多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按规定谘议局有讨论本省行政兴革和公债、税法等权，但其决议必须取得本省督抚的同意才能生效。督抚有权监督局务，并可奏请皇帝解散。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许多省的谘议局曾策动督抚宣布独立。

⑱ 袁世凯，见本书第42页注⑳。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
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
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
道路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原题为《自自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目录上印作《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署名屈维它。作者自编论文集又将标题改为《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文内个别地方也有修改,并加了小标题。这里按照修订稿排印。

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那一个要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那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第三阶级”诚然不错，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标只限于民权主义，他的力量只能做“无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无血的么？中国的无产阶级，确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他的力量却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然而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便能实现么？天下的革命没有无血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也还不能实现。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应当参加推翻现存统治阶级的运动，使无血的革命变成有血的呢？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否有赖于这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呢？世界的社会革命对于中国的民权革命有何等影响，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究竟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我们请细细的论一论这中国现时很迫切的问题。

一、无产阶级参加民权 革命之天责

先从无产阶级之革命策略的总原则说起。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职任应当依社会进化中之客观的可能和必要而确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所谓“国民经济”之自然的发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欢不喜欢。况且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

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受大工业大都市锻炼集合的普通劳动者,或简直是游民,只能“穷人造反”,而不能革命。没有集中的资本和生产,只能均分(抢掠)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穷人造反的实例很多,而丝毫社会主义亦没有看见,便是明证。要知道: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显然暴露。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出发反对君主封建制度的时候,阶级矛盾不期然而然隐匿掩藏不甚显露。在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然而这种斗争之时,“务必时时刻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矛盾,确实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又以备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之下所发现的新式的社会政治关系,立刻就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曾经希望革命转向社

会主义方面，然而他仍旧认政治斗争、结社自由、普通选举是必要的。他论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一八四八年）的责任说：

“实际上，既然工人独立的出发还没有基础，还没有直接普选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个国家还在分裂德国，这时候除出紧随巴黎运动之后（巴黎运动的胜败对于德国运动有生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除出与小资产阶级共同争政治权利（有这些权利再能行自己的斗争），此外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间断然实行上述的见解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中。他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初期，不到“资产阶级勉强发生只有口硬手软的市侩和绝对还没开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莱因省城科隆——那时是最开通的地方，已受法国革命的冲刷，旧国家的形式破坏，工业亦最发达，而资产阶级受新式社会生活的波动亦最甚。他们不象波尔恩等人（亦是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会员）在这革命时期去专做所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却以全力来办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极左派性质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罗兰霍尔斯特德《论资产阶级革命中之马克思及无产阶级》）。马克思既然以无产阶级的观点考察得社会进化的公律，断定革命的进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权派各阶级的总利益以反对封建君主制度，而暂时不及于无产阶级的特别利益。马克思之所谓无产

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利用时机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即此突现革命运动中之最彻底最热烈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分子。资产阶级本来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当逼迫他实行到底,勿使中途让步。

所以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可是这种赞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马克思以为“在某种程度之内各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等到革命开始进行,却亦就是阶级矛盾暴露的起点,革命进程愈速,阶级矛盾的爆发亦愈激厉。“共同的仇敌刚刚打倒,胜利的军营里,立刻就要分裂成几派,而重起相互的斗争。”(《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所以等到革命的进行既已变动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权派已经不往前进而向后退,那时《新莱茵报》也便变更其策略,马克思等也就退出莱茵区民治委员会。于是开始预备革命行动的组织。结果反革命占胜利,《新莱茵报》被封,而德国革命也就失败了。

再则象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二月革命固然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年来已经大不相同。那两次无产阶级的出发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发展的时候,而这一次却在革命的最初期,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期然而然即占了畸重的形势。六月之役,无产阶级失败,那时“国内的阶级战争”已经非常

明显。然而一八五一年春反革命地位渐稳而国内民权派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及一切中等阶级又重新兴起要想与治者阶级反抗，而围拱“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一民权派的联盟反对那所谓“秩序党”，居然在三月选举时取得胜利。革命有重复前进的形势。可是，这时的封建阶级已经很弱，耐不起战斗，他们宁可让步，于是高等阶级得到让步的利益而退却，革命大受打击。高等阶级不但退却，而且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反对“赤党”。

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乃在于经济的变动。一八四九年欧洲经济渐渐的兴盛起来，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缓和许多；其次，民众的政治知识虽经屡次的革命教育而还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时国王背誓破坏普选而竟没有大反响。现时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⑩尤其给了不少教训。现时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程度，就是从那时参加普通的民权革命，经过长期的锻炼而得来的。可见虽失败而对于无产阶级还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方面固然受此训练，而资产阶级方面却亦有很大的影响。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大致欧陆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体还没推翻的地方，资产阶级亦已恐惧不宁，他们要革命，却又怕革命时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去了。因此连资产阶级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却利于这一革命早些爆发。社会结构进化的原则确要有资产阶级制度（民权主义）的发展，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完全正当发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无产

阶级在此等国家内反成资产阶级革命之组织者指导者。大资产阶级愈弄愈胆小，而同时就是大资产阶级变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形愈过愈明显，那时一切反对旧统治的毒恨都转移到大资产阶级身上，而可以不用大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已经显然的暴露阶级矛盾。所以不论先进或落后的国家里，在封建军阀政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可是愈落后的国家，他的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愈有势力，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也愈多。

马克思说：

“数量多而且集中强大的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又集中有力的资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同时并进的。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进步的一部分，假使还没有取得政权而改组国家制度以应其需要，那时的工人阶级运动无论如何还不能成为独立的，而且不能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只有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后，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才大大的发现，那时已经不能再推动资产阶级前进；那时资产阶级亦不能再拿好话来骗工人，满口答应而不实行；那时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才完全明晰的暴露于全世界”。

“无产阶级曾经参与这一反抗运动(一八四八年)，他本来对于这一类的革命运动没有不参加的，他的希望不外两种：(一)或是这种运动能扫除行向社会革命及无产

政权的道路中之几种障碍；(二)或是这种运动至少使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少的阶级行向更果决更革命的道路。工人拿着武器参加反抗运动的时候，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一次的斗争还不是为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他在这时候唯一正当的策略，却是：假使高出于无产者的任何阶级（如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不能给工人阶级以‘为他自己利益而斗争’的自由战场，那就无论如何不让这种阶级的统治得以稳固；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机，使全国非决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则索性回复旧统治的‘不变状态’，使新革命不能免。两种假设之中，工人阶级都是真正的全国利益的代表，因为欧洲一切旧社会（各国）都应当及早革命，谁也不能想安安稳稳有条有理的发展自己的力量（假设真正如此，欧洲便是梦中事了！——译者注），而工人阶级却是真正诚意的在可能范围内促进革命的阶级。”（《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二、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 领导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对待民权主义运动的态度和参与民权革命的方法，大概在原则上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取现实社会进化中的实例作更详尽的说明。欧洲落后的国家，第一就算俄国。俄国一九一五年革命^①时，离法德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已经百年五十年。俄

国那时已经有二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人的无产阶级（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不算在内——见托洛茨基之一九一五年），而且有社会民主党^⑫，似乎可以直接行无产阶级革命了。何况实际上革命是社会民主党指导的，大多数罢工工人所参与的。然而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的断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列宁之《两个策略》）。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那时的俄国，已经有民权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造之必要。这种改造运动不但还不足以表明是资本主义的崩败，资产阶级统治的崩败；而恰恰相反，正要有这类民权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才能扫清障碍，让俄国的资本主义好好的发展，进于纯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永滞于亚洲式的半自给经济；有这种种改革才能使俄国有完全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俄国社会革命党^⑬，俄国的农民党，自称为最激急的社会党，其实不懂社会主义，当时就不明白这层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什么。他们决不知道：就算农民暴动得了完全的胜利，田地完全均分过，或者干什么“农村立国”^⑭的鬼把戏，始终对于资本主义并无丝毫损伤，反而促动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农民之间自己便要受“阶级的分化”。民权主义的改革必然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很可不必帮助民权革命了。那却不然！

民权革命之社会及经济的内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利益。民

权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几种：也许在这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大资本家及财阀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许在那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却是农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权革命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虽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动，反对上等人，反对资本家或帝国主义。然而这一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他的发展。民权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因此，既有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之下，资产阶级之统治工人阶级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说：民权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然而说民权革命绝对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却是蠢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最早一期曾经有过这种论调，所谓“民粹主义”，他们以为无产阶级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种思想，往往可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⑮，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否认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否认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种思想根本与科学的经济学相冲突：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免的，无论怎样不能禁止资产阶级的生长，要想跨过资产阶级立刻实现乌托邦^⑯是必不可能的事。马克思主义说：凡是一个社会，根据于商品经济而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交易关系，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亦必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当初是如此，中国现在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

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 ;路只有一条 ,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 ,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层意思已经有一大部人类历史 ,如俄国、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 ,足以证明是科学的公律。所以假使有种学说 ,要除出“更加发展资本主义”之手段而另求别法来救济工人 ,这种思想 ,自不免是反动的。列宁说得好 :“象俄国这种国家里的工人阶级 ,受资本主义本身的苦 ,实在比受‘资本主义发展不透’的苦少。”《(两个策略)》工人阶级确利于资本主义有很广泛很自由很快的发展。工人阶级确利于很彻底的破坏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如行会制度^①、艺徒制度、同乡观念、门阀观念等) ,因为旧制度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民权革命就是这种彻底的改革 ,应当扫除一切旧迹和那便于军阀官僚营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很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 ,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开展。只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 ,才听着这一结论诧异呢。因此 ,有的时候由某一方面说来 ,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资产阶级有时候很可以靠旧制度旧习惯来抵制无产阶级(如西欧俄国当时的帝制政府 ,中国的军阀警察等)。资产阶级所以往往利于革命的不彻底 ,所谓 :“不为己甚 ,过犹不及”。向来欧美

革命史里社会党和共产党往往论述到这类的事,习惯上总说:资产阶级自卖,他竟背弃“自由的原则”,或是: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权主义。事实上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宁可使必须的资产民权主义的改革,也慢慢的进行,小心谨慎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很愿意这些改革不促进平民农工等阶级之革命的独立性及建议力;因为假使如此,正象法国人的俗语,平民“掉过枪来”也来得容易,于资产阶级自身先就不利。所谓“掉过枪来”便是:民权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机关及舆论集会的权利等等,都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

至于工人阶级呢,却正利于民权主义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实现,而以革命的手段。因为改良手段是使社会的腐败部分慢慢的烂掉。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正是受这“腐败社会”的苦最厉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割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决的行动和群众的势力有组织有系统的努力扫除一切封建君主时代的遗迹。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若愈无组织系统、愈不集中、愈不彻底,则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组织系统、愈集中、愈彻底,则对于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愈能多保证他们在民权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参与,是教无

产阶级：“不要专守着经济斗争而要参加总的政治斗争，努力去争民权主义，争那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权主义”。

俄国一九一五年革命时，列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之‘资本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可是我们能够竭力去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在这范围之内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争他们生活里迫切的需要，争他们预备将来再战而能彻底胜利的条件。”一九一五年的革命固然结果为反动所摧残，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训——创立苏维埃制度。

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参加民权革命的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关系，甚至于在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的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于是有些“洁身自好的社会改造家”，好一似黄花闺女、《柏舟》孀妇^①，要大叫起来：“这不是要玷污我们无产阶级的‘家声’吗，抛头露面的象个什么样子”！其实大谬不然。现今时代开通，男女社交已经司空见惯，难道社会改造家还做高节的隐士吗？无产阶级的参加民权革命，诚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险，然而却并非不参加便能免祸的。

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权革命运动能否不受资产阶级的恶化，并不在于某人某领袖要想投降资产阶级，亦并不在于党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对于民权运动的“独立”。这种独立派，其实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组织上怎么

独立，而实际上因为政治标语落于实际生活之外：若不问政治便与群众脱离，若问政治往往又只是跟着群众已有的情绪移转，不能尽领导之责。因为若是当时社会只有民权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战场的群众，往往反而容易跟着“自由派”的模糊标语走；保持所谓“独立”的社会党尽着放空炮，实际上反使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最后一着，这种独立派反而为资产阶级所恶化。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各阶级之客观的现实的社會力之消长：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各以实力参加总的革命运动，暂时亦许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胜利，力量小的却仍旧继续着往自己的目标走。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便在于指示劳动群众以一定的合于实际生活的标语，实质上就已经决不会和资产阶级同化了。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标语可以同是一“民权主义”的形式，而他的经济内容却决不会同的。这种“标语的阶级实质”，只要会运用，自然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造成社会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条件。很用不着拼命的直叫：“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会主义，不要民权主义。”

譬如一九一五年的俄国，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只听好听的‘革命’字眼。我们应当考察切实，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那几个社会实力。……只有‘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改革决跳不出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经济关系之范

围,然而这一革命对于俄国及世界之将来的发展实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两个策略》)

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期间。往往可以有两派似是而非的倾向:一、乱叫社会革命;二、只管经济斗争。我们再举俄国的实例: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运动离现在还不十分远呢,并不是什么古代神话(列宁写这篇文章正在一九一五年)。那时示威运动刚刚开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就大叫起‘猛烈攻击’来,发布血色传单(《劳工事业报》,当时少数派的机关),骂那提议创办全俄宣传日报的人(列宁等),说他们是文学迷、学究派。而那所谓‘尾巴主义派’——专门只跟着群众或别的政党后面叫,不是迁就庸众,就是迁就自由派——却又竭力主张:‘经济斗争是政治宣传的最好的手段’。那时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怎样对待他们呢?他两方面都反对,他反对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因为这一派的确是轻躁妄动,——所谓‘猛烈攻击’和群众的公开的出发明明还是将来的事。他亦反对‘尾巴主义’,因为这一派确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欢在小范围内当领袖而实际上没有政治能力。他那时所决然提出的,就是全体平民暴动反抗的标语;可还不是直接号召行动的意思,而仅是宣传的意思,说明客观上必然的结论是要平民反抗。那时宣传和鼓动的是第一等重要的责任,那时全俄的《政治评论周报》还算是很难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不懂得‘文字’(宣传),也

是‘实事’。总观历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开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可能的时代，本来群众的政治运动不是人力可以任意制造的。‘尾巴主义派’却又不懂得当革命时机临头，便不能再死守着旧‘文字’，而应当有直接行向‘实事’的标语”。（《两个策略》）

这两派都是真革命运动的障碍。

再则，还有小资产阶级误解民权主义为放任主义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是民权主义的独裁制。孙中山的“军政时期”^①确与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独裁必定要求社会某一方面的巨大牺牲，所以非有民众的实力后盾不可，不然就变成个人专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正须得此政治机会，以促进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近的目标。或者，如香港《南华晨报》（英文）对于中国各公团（商会、工会、学生会）召集国民会议^②的提议之批评，说这是水与油混合的药方。固然，真可以说：所谓“独裁制”必须有“统一的意志”，而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一驳议其实并无价值，因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来引用“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统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统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统一而别方面不统一的。对于社会主义不能有同

一的意向,而对于民主政权及共和主义却可以有统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记得这一层,那便是不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那便是忘记了民权革命是有全民的意义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统一的意志在。民权主义的要求以外,当然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什么统一意志。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尽可以执此统一意志要求严厉的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独裁制。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分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着全体平民的。封建军阀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滥用“平民”一词,空泛的说平民而掩藏着平民里面的阶级对抗性。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

民权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俄国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地主义”，中国国民党的所谓“民生主义”^②亦是资产阶级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我们应当知道：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平民的革命独裁制。所以无产阶级在这种时代，当有正确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这件事非常之重要，经济斗争的工会运动固然要紧，而尤其要注意民权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做‘平民使者’而不应当仅仅做‘工会书记’。必定要如此，方才能尽无产阶级的天责。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亦就是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健将；他的力量，正在他阶级意识明显，并且有组织有系统的奋起而为政治斗争之时。

“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就是在经济斗争之外，在工人对工厂主的关系之外。此种知识所由来的地方，乃是各阶级对于国家政府的关系，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以对于‘怎样为工人求得政治知识’的问题，决不能象普通的实际运动家（更不用说偏向于‘经济斗争主义’的实际运动家）永久只有一个答复：‘往工人间去’、要予工人以政治知识，社会民主派（共产派）应当往各阶级间去，应当派遣自己军队到各方面去。……试举一个最近几年的社会民主派（共产派）的机关，看一看他的工作。他‘和工人有连络’，就此自以为满足了，只知道发发传

单,专说工厂中的虐待,政府帮资本家,警察的凶横;和工人开会谈话,大致也不过谈这些事,几乎绝对不出此等范围;至于讨论研究革命运动史,俄国内政外交问题,俄国西欧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之状况及现代社会的经济进化等,则可以算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有系统的实行扩充对于各阶级的联络关系,那更梦想也想不到。实际上大多数此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的党员,只想着应当做一个工会书记,而并非一个社会党员——政治的领袖。其实英国的工会书记,亦在时时帮着工人行经济斗争,揭发工厂里的恶弊,解释一切法律规则的不公道,说明此等法律妨碍罢工自由及工人纠察队的职权,说穿罢工调和人的偏心等等。总之,凡是工会书记亦在帮助工人做‘反对东家及政府的’经济斗争。可是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派不应当仅是‘工会书记’而要是‘平民使者’,应当:对于一切压迫和专制,不论他是关于那一阶级的,都加以攻击;汇合一切现象而予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残暴的总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和民权主义要求之正确于人人之前;对于一切人和每个人解释明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世界的历史的意义……

‘往各阶级间去’,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是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是以组织者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谁实际上忘了‘共产主义派赞助一切革命运动’,谁忘了我们应当在全体平民之

前，既不隐藏我们社会主义的见解，又要明白指出民权主义的总责任，那人便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谁实际上忘了自己应当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动并解决一切民权主义的总问题，那人亦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列宁之《怎么办》，一九二二年）

三、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 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应当如此的去实际应用。中国现时的状况究竟在社会进化史上占何等阶段，社会运动的趋势和民权革命的方向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中国十二年前的暴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阶级（财阀政客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以组织生产，他们为数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的军师（政客）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国”，其实还在封建宗法社会时代。

虽然，“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却已经渐出于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②的影响很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资产阶级更大有进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财、制宪，试组织“民治委员会”。可见“中国……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混流并进的现象，这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国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民权与社会两革命间的进程紧凑得多）。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参看瞿秋白之《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前锋》第一期）

虽然，我们考察中国经济政治现状所能下的断语，仅仅是：“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权主义的改革”。至于本国资本主义的程度，是否已经发达到成就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的阶段，那却还待考虑。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实业虽受外国压迫，而五十年来确不能说没有进步。帝国主义当然要变中国成资本主义的而完全破灭中国原来的“半自然经济”。即使帝国主义能行妥协手段

而缓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实业又进一步,或者外资直接经营实业于中国境内,以至于和中国人合办,实际上夺去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实业因此亦有一更大的进步;在中国境内(在此一经济区域内)而有实业发展,则必要求更宽泛的市场,因此中国内地之资本主义化的速度愈增,外资愈侵入,中国资产阶级在此经济体内愈膨胀愈深入;外国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缓和了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缓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经济上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若无限度他便不是帝国主义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无论如何,确在一天紧迫一天。

譬如中国绸缎之输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为四百万余海关两,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涨到二千八百万。中国矿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为二千五百余万两,至最近便已达二万二千八百万,差不多增加十倍。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一发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碍物。军阀制度沿袭皇帝对商人的政策而变本加厉:重征暴敛,就地筹饷;更加以争城夺地,内乱不息。不但如此,更有类似于英法当年的“贵族与市侩”之争:“今之政客、军人失势则办工厂,曰吾将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投机,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传舍。”(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这确是扰乱市场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经济斗争,不可免的军阀官僚之资产阶级化。中国的市侩又

怎么办呢？他们但“愿吾国之工业家专心本业，尤愿吾国军政界之伟人，勤修己职，勿污工业界之干净土。……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简：（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当皆革除；（二）工业组织当大，则资本与人材皆可经济，而得多所制造之益；（三）当多设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资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议。然中国本有煤铁，与其仰人供给，不如退而自造，仅购基本之机械，即可源源供给各业之需要”。（同上）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梦想。理财、制宪、裁兵及民治委员会的尝试又是个什么味儿？哼！美国公使休门尚且教训你们说商人当自组政府。颠覆军阀的民权革命始终是不可免的。

复次，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我们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后吾国之棉织业遂呈空前之活跃，……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穆湘玥之《中国棉织业发达史》）。外国人在中国棉织业中占二分之一的势力。（二）最近几年（一九一八）中国铁的产额约共三五五， 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的产额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吨；简直是全数，至于汉冶萍等的“官办”、“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铁矿（亦大半是外国资本家的），所产有限。（三）最近几年煤的产额约共二 ， ， 吨；而日本之奉

天抚顺及山东淄川、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却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几乎占二分之一。中国自己还打算制造机器，岂不是笑话！中国的资产阶级对这有什么办法？他只知道“今者，关税已有修改之机会，各国对于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将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贸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缓，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继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杨铨）唉！临城案^{②③}时留华美侨已经主张撤销华会^{②④}优待条件；临城案后铁路共管问题已经紧迫万分；等到“中国各要地都驻外兵”（美侨主张），等到“美国派委员会来替中国组织政府”、整理财政（《密勒氏评论》^{②⑤}），那时关税虽增加，于中国还有什么利益？那时难道还有中国？人家筷头子上落下来的骨头，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系上链条的。独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化气力去争。那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实实在在是必须的。

中国的现状约略如此。解决这中国问题的主张，最近几年随欧战而兴的“新文化运动”里约略可以分为三派：一、绅士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

虽然主张的人亦许事过遗忘，而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不管个人。现时明明还是可以看见社会之中隐隐有此三种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两年前张东荪^{②⑥}、梁任公^{②⑦}等人驳社会主义的论调。当时虽是东荪发难，而实是任公

综合这派的见解（一九二一年梁任公《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他的意思：一、“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盖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二、“欲行社会主义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三、“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咀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四、“惟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名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五、所以“第一灌输工人以相当之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益之事入手试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等），亦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任公末后居然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然而他主张对于资本家之“取偿较优亦可姑容”；他主张的社会政策，原是因为“生反动非彼辈（资本家）之福”；他主张不要逼迫中国资本家“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可见他完全站在士绅资产阶级观点上来论社会主义。他的社会政策以至于工会运动无非是喂猪的食料，人要吃猪，当然愿意

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要你们工人容许这‘在奖励生产范围内’一条件；我们资本家当然来行些社会政策，使国内有生产事业，将来可以交给你们（？），现在且慢；至于要国家来办亦可以，只要你们不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暂时让我们多剥削些罢”。而他偏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他实以分配平均为社会主义。不知道谁和他同主义，他的平均分配及社会政策只可以算得“喂猪的社会主义”。梁任公以唤醒资产阶级觉悟自任，与我们劳动者或游民何与？无业的平民只知道自己组织起来，以革命的力量要求应得的权利；劳动没有生产机关，我们就要求他有，没收军阀来办工厂。无所谓奖励生产。我们穷无所之，奖励什么生产。关心奖励生产，自有人在，如梁任公——士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只知道积极为群众的政治经济运动。既然要我们做工，当然你们便该给我们优越的劳动条件，优越了再优越一直到政权交给我们。什么叫妨害中国生产？要赚钱的资本家为什么不看见军阀和帝国主义妨害中国生产？我们只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资本家推覆军阀等等，劳动运动所取于资本家的，资本家当取偿于列强及军阀，不应当反过来请我们姑容！我们无产者怎样有姑容你们大人的资格？罪过罪过了！

总之，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中国资产阶级的觉悟亦要

在这实际运动里才能发生。何况他非受无产阶级的促进不能举步。中国军阀及列强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试办”;资本主义都不能十分容你试办,何况社会主义。革命貌似破坏,而实是彻底廓清旧社会,开新社会建设之门。英、法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奥、匈,一九一五年的俄国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后即开一生产力发展之长时期。现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任公派的猥琐懦怯正足以证实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他的社会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谓对社会主义之让步——对无产阶级的让步,目的仅在于保证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之“社会的下意识”早已觉得:只有唐山矿工、太平洋中国海员、京汉路工、上海纺织工敢于直接行动^②,以及最近长沙之五六万劳动平民的国民外交委员会,能外慑日本且内夺赵恒惕^③之胆;只有真正的劳动平民能行国民革命。

虽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层应当非常之注意的。

现在要说那第二派的心理了。第二派的解决法,大致说中国要社会主义,从完全否认政治运动起到相对非难民权运动止,其中阶段非常之多。然而最主要的就是:(一)以为现在社会主义时髦,是“理论上之极致”。(二)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无产阶级”。假使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精密的社会科学来运用他的策略,竭力参加民权革命并组织一切劳动者及平民,他们就

说：“那就要这些国民党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才行”，或者简直说：“那么，这一党是失节了”。其他种种无政府派的论调，大致相仿佛。那前一种的代表便是《努力》^{③①}（六十六期时）的高一涵^{③②}，后一种的代表可以随手推举《今日》杂志（二卷四号）的初民^{③③}。（虽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张。可是他个人不成问题，中国社会思想中现时确还存在这种心理）。这第二派的两种心里可以并合批评。如高一涵的意见是：国民运动是好的，可是必须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他说“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殊不知，中国现时需要国民运动的真正国民党，正因为没有发生可以公开的社会党；而且必须有民族民权主义的广大联合战线。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浅，当然没有大生产中之纯粹无产阶级（参看《前锋》杂志第一期瞿秋白及我的文章）^{③④}。俄国发生小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五六个人的劳动解放社^{③⑤}，普列汉诺夫^{③⑥}、查苏利奇^{③⑦}女士等的组织，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俄国集中的工业资本已经有五万四千一百万卢布；他们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且还只是参加民权运动，宣传学理和指导工会组织，绝不能称政党。社会主义的政党，必定要能明显的拿着主义的旗帜走入劳动群众，而不为群众所诧异；必定要能对于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法，而不为群众所不了解。而那时俄国并不单因为政府压迫，而因

为资本主义改组社会生活的火候还没到：虽有许多工人，而都是刚从农村来的，或尚未完全失私产，或方失私产而求恢复之心甚殷；他们不怪怪而能了解社会主义的运动之心理的物质基础还没有筑就；所以那时俄国社会运动发展之限度还只到民权主义之最左翼的地位（汪尔洛夫斯基之《俄国马克思主义史略》）。中国现时工业资本仅仅一八,九二,八一—元（一九一八年），约比俄国当年少四万万，仅有其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俄国一八九七至一九一五年间，资本主义发展已大进步，纯粹工人有二百余万，工业资本已达十八万万一千六百万卢布，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已经成立而稳固，那时列宁尚且说：“往各阶级间去……做总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现时真正的社会党（共产党）并非仅仅代表国内六十一万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存在的（这普通工人数是一九一五年的统计，现在至多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假使仅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他的能存在，乃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世界的斗争范围之中，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具最终的共产主义目的，所不同的是斗争方法。先进国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至于劳工独裁制，中国是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以至于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中国一千万人的手工业劳动者，四千二百万户的农民劳动者之

中的一百二三十万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斗争范围中，与普通所谓“平民”同有民权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标。资产阶级是要法律上的平等，无产阶级是要事实上的平等——最彻底的民权主义，所以中国有无产阶级政党自有其独立的政治主张。并非采取了白纸黑字的理论就算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物质基础及实际运动是不能凭空造的。至于国民党尤其不能变成社会党；真社会党在中国尚且只能以世界共产党支部的资格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何况国民党历史上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那时的所谓民生、民权主义都只是“富强”——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看孙文《建国方略》^①便可了然。他说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国国民的功课，原来并非中国平民真要民权，而他代表这种心理来抗争的，乃是因为要“富强”非共和不可。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权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②、同盟会^③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只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观念还是在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已；同时一方面，宣誓“维世界之和平”，这不是对帝国主义的畏怯，便

是对社会主义的让步。可见仍不离一种“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国民革命的真国民党是现时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然在此总运动中,只有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根据立刻实行的政党,才能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及运动方法来促进这一国民运动,或者简直改造国民党,同时这亦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策略。

于是可以说第三派了,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然而现时真正共产派的运动在中国亦不过是“雅各宾”⁽⁴⁾最彻底的最左的民权主义运动。大概而论,要劳工阶级真正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假民权主义的不可信,决不是几本书可以办到,而必须实际普遍的政治经验——小孩子不烫手总是要弄火,而且应当弄一弄火,至少也要远远的试一试火的热性——那时群众意识再能实实在在进而求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劳工群众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雅各宾”的方法加速革命的过程;第二、就

是实际上去感受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不完全反对列强及军阀到底);第三、就是在这运动之中无产阶级能得必须的政治知识及经验,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任职,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上都是绝无疑义的。既然应当促进国民革命,便当有国民革命的中心。列宁说:“我们应当组织反对政府的一切势力成一全民的运动。……这样去实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动。应当有一个政党,能结合一切攻击政府的‘军队’成一统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体平民的名义去斗争。再则,实行那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训练工夫,一方面严格的保存政治独立,并领导劳工阶级的经济斗争;别方面利用一切剥削者与受剥削者之自然冲突(剥削者本来日益替我们“拉拢”新的各种无产阶级分子)。凡是这些工作都要集中于不可分的统一行动。”(《怎么办》)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亦应当如此,并应当由此主干扩大国民运动的中心,那时势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运动的中心,必定要用社会已经有的实力。我们理想一个乌托邦是幻想,理想一个“理想的国民党”亦是幻想。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的确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

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并且十分应当适合现时社会的动象,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实际生活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分子于此党。况且时过境迁,国民党以前的不纯分子,当然要在淘汰之列,不过应当就在集合新分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既要组织政党也可以不象以前那样“儿戏”了,什么罚咒打手印等;我们现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不纯分子的行动如不能与之适合,就立刻请去。于是劳农派在国民运动之中的基础,亦就因此而凝聚起来。换句话说,便是根据于现时实际经济动象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权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那时的国民党方才能做国民运动的中心。

如此的去造成国民运动的中心。正因我们参与其事,我们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趋巩固。在这运动的急速的过程里和社会经济的动象中,“阶级利益”必定渐渐突显。到那个时候,即使仅仅是国民党左翼的分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们所应当走的路。何况无产阶级呢!

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权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指导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那时简直实现对等的联合战线。可是这种群众党的基础,正要筑在国民

运动中。

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

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

所以现时必定要: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陈独秀之《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注 释

新银行团,参见本书第42页注②。

中国的“第三阶级”,指中国资产阶级。第三阶级,通称第三等级,源于法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他们有纳税的义务,而无政治权力,与不纳税、享有封建

特权的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其后,无产阶级被分离出来,称作“第四等级”,第三等级则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

巴黎运动,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

波尔恩(一八二四——一八九八),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欧洲革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脱离工人运动。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工人、学生、市民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次日,革命群众与反革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起义。二十四日,国王路易·菲力普逃往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七月王朝的统治。这次起义称为二月革命。

这里指的是法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一七八九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封建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一八三〇年七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一八一五年复辟的波旁王朝。但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夺取了胜利果实,他们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继承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

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控制了临时政府,他们拒绝工人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开始向工人反攻。六月二十二日,巴黎无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因遭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这次起义称为六月之役。

秩序党是法国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一八四八年由波旁王朝的拥护者正统派和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组成。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秩序党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地位。

三月选举指一八五〇年三月法国立法国民议会补选。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新山岳派在补选的三十一席当选议员中获得了二十席,取得优势。

① 一九一七俄国革命是指这一年在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同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布尔什维克又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政权。

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是指这年十一月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德国工人、水兵举行起义,推翻了君主专政,但由于右翼社会党的叛卖,革命果实落

入资产阶级手中,建立了魏玛共和国。

① 俄国一九一五年革命是指当时反对沙皇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而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

② 社会民主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三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分成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两派。一九一二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五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③ 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一二年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主张在联邦制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反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④ “农村立国”是章士钊提出的改革中国社会的主张。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十九日,章士钊在上海《申报》发表《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一文,鼓吹中国应当以农立国,实行均产主义。瞿秋白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专门批判了这一观点。

⑤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法、留日的一些学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国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

⑥ 乌托邦,见本书第8页注。

⑦ 行会制度,参见本书第22页注。

⑧ 《柏舟》孀妇,见《诗经》《柏舟》篇。卫世子之妻姜宁愿为丈夫守节,也不改嫁,怕败坏了自家的声名。此处是借用来讽刺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造家。

⑨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一面以兵力统一全国,一面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凡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

⑩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

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后来形成反对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

⑲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其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后,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

⑳ 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㉑ 临城案,见本书第42页注⑳。

㉒ 华会即华盛顿会议。见本书第41页注㉑。

㉓ 《密勒氏评论》美国侨民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

㉔ 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是研究系的主要成员。一九二二年底,他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挑起“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还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

㉕ 梁任公即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时的重要活动家,以后曾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反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并组织进步党。该党后改为研究系。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取敌视态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发扬所谓中国所固有的“精神文明”。

㉖ 这里指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几次主要罢工斗争。即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十月开滦煤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三万多工人的联合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一九二二年上海日商第二纱厂、三新纱厂、日华纱厂的几次罢工。

㉗ 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湖南军阀。当时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一九二六年初湖南人民掀起驱赵运动时,被唐生智趁势逐出湖南。

㉘ 《努力》,即《努力周报》。一九二二年五月由胡适、丁文江在北京创办,一九二三年十月停刊。

㉙ 高一涵安徽六合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者之一。

㉚ 初民,即邓初民(一八八九——一九八一),湖北石首人,当时是大学教授。

㉛ 指瞿秋白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的《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和他用屈维它笔名发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等文。《中国资产阶级的

发展》一文已收入本书。

③④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八八三年由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组成,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解散。

③⑤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八七六年参加民粹派的“叛逆者”小组,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脱离了民粹派。一八八二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他撰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在政治上日益右倾,变成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③⑥ 查苏利奇(一八四九——一九一九),俄国著名的女革命家。早期参加民粹主义运动,后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一八八三年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以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变成孟什维克。

③⑦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包括《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社会建设(民权初步)》三部分,分别撰写于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一七年。

③⑧ 哥老会,是清朝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活动于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省。组织形式为家长制,称首领为大哥或大爷,互称“袍哥”。会众多属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也有地主豪绅参杂其间。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

③⑨ 同盟会,全称中国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九〇五年八月在孙中山领导下成立于日本东京,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成立以后,广泛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发动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一九一二年八月与其他几个小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

④⑩ 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该派领导下,一七九三年六月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高潮。一七九四年七月热月政变后被解散。

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

—

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虽然,上海固然天天有机器进口,京沪、汉湘、奉直之间固然天天有火车来往,乡间的纺纱机固然一天一天的少下去,平民人家的豆油灯盏固然一天一天的暗下去;不但二三十年前洋场上的“轧姘头”早已经会审公堂的默认,就是现今清高的士族女儿“跟人逃走”的也算不了什么事。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我愿意来试一试,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且先说明“文明”的本质,暂时不涉及什么东和西。

文明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原始时代的人初向自然进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攻,便制成极粗的工具,如石斧以至于弓箭,那时便是技术的开始,亦就是文明的开始。当时若说不要这种文明,便是愿意葬身虎腹或是活活饿死。可是既有制作工具的技术,便精益求精,技术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顺流而下”是生物求生的趋势,轻易阻遏不得。仍旧要等技术自身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社会里才不期然而然又有转移文明的新活力发现。因为:(一)石斧弓箭的制作方法可以被少数人专利,草昧时代的技术往往是偶然无意之中碰到的,首先发明的人可以垄断“世授”甚至于托之于神话,譬如中国行会里各行的祖师之类,便是这种遗迹;(二)因此,社会里发生了组织的分工,有所谓酋长、巫祝、儒牧等人,那技术文明原本是发展社会进化的,到此反成阻滞社会进化的赘疣。于是受治者与治者之间便各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文明的不同态度。不但如此,技术若受外缘的影响,如地理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接触等,发展得分外快,那时社会经济的激变能令受治者一面受新技术的训练而强盛,一面渐占社会里举足可以轻重的地位,于是突出当时旧社会关系的范围,而创造新文明。此际冲突剧烈,演出革命的现象,若竟毁坏旧文明的小部分,那亦是必然的结果,或者还是创造新文明的必要的条件。

世界的文明,经过儒牧、神甫而达知识阶级,从石斧、弓箭至飞机、潜艇,一般的是技术上的职员,一般的是克服自然的利器,然而人对他们的态度却可以大异而特异。这正是因为上述的种种变化原因。人类有工具而营

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亦就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说来,文明并无末日,受治阶级正要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那不过是治者阶级的末日罢了。法国革命前后,中世纪末,处处都曾经过这种斗争,资产阶级的新文明便代封建制度的旧文明而兴起了;然而并不曾因为贵族曾经住房屋穿衣服,新兴的第三阶级便毁尽了房屋,撕尽了衣服。俄国革命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文明的创造已经开始,亦并不曾因为资产阶级用电灯,便把电灯打破……可见文明仅仅是人对于自然的威权,运用这威权的人不同,文明的内容亦随之而变易;至于文明本身,始终是生物的人类所必需的。只有垂死时的治者阶级,觉得进步可怕,可以危及旧社会关系,所以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其实,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譬如说,现在的自由恋爱运动还可以说是某某人提倡出来的,那早于自由恋爱的“轧姘头运动”却是“洋场”的自然结果;礼教式的文明难道一定要等陈独秀、胡适之的《新青年》才倒?

因此可见,对于现代文明——技术文明,明明是增加人类威权的文明,却有反抗派,而且可以分两派:一,便是古旧的垂死的阶级,吆唱着“向后转”的;二,便是更新的阶级,不能享受文明而想导此文明更进一步的。

—
—

现在且就这技术文明的本质推论。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实际上说来与东方文明毫无区别:中国的舟车宫室与西方的电灯电话只有数量程度上的不同,一般的都是征服自然和增高人类权力的利器。可是,封建制度或宗法制度的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文明相较,却有内容的不同:前者神秘的份数多,后者科学的份数多。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文明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有一特异之点:就是思想上不承认君权、神权、父权、师权——中国的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概扫除;学术已非“祖传”或“神授”,而是理智的逻辑的;技术亦就不专赖熟练或天才,而渐重原理。具体的说,便是:不要《黄帝内经》和《汤头歌诀》^⑩,而要生理学、病理学、药品化学和医术。所以科学文明很有民权主义的性质。人人都有发明真理之权,只要你有这本领,完全是个人的自由。然而,事实上因人与人之间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所以思想上的民权几乎等于纸上谈兵。科学使人享法律上的平等而消失事实上平等的可能,科学文明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划得更清楚。于是人对自然的威权愈大,治者阶级对受治阶级的威权亦愈大,受治阶级就不得不求利用科学文明以打破旧社会制度,使封建社会的神秘性完全扫净,将资产阶级的科学性引导到底,彻底显露那艺术性的文明。

然而这还是后话。如今言归正传,只要说明:对于物质文明,现代的受治阶级——无产阶级亦取反对的态度,不过与贵族阶级大不相同。

物质文明是技术,科学仅仅是从技术里抽象而得的总原理。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然而统此三期的技术文明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且概括而论,单就客观论断。

三

对于技术文明可以有两种绝对不同互相反对的观点。

一种便是以为技术的进步渐渐将人类从残酷的自然威权之下解放出来,使人更强健更能干而且更幸福,无条件的承认是如此。另一种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

中国的老子^①便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显然是反对物质方面的发展的。

基督^②亦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马太》第四章)

罗马的古文学家亦非常之厌恶城市文明,说城市是奢侈纵恣,万恶之渊藪,而歌颂农村生活的简朴。(华龙

Varron)

十八世纪,真正的城市方才开始发展的时候,英国文学思想便有一派反对。然而最急烈的要算卢梭^⑬《论科学之影响于风俗》(一七五一年)。卢梭不但指斥文明的过分和畸态,并且根本的反对文化。“我们的心灵,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而日益堕落,……奢侈、荒嬉、奴性都是我们应受的罪,因为我们只想逃出无知无识的乐园。其实那才是我们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

虽然后来卢梭自己竭力减轻这种论调的词锋,说得温和些,然而从此之后欧洲文学界里便常常有很激烈的论调反对文化。譬如塞勒、拜伦^⑭,十八世纪初的法国文学等;一直到托尔斯泰^⑮。

四

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对于技术文明的两种观点于是得一校正的机会。

虽然,社会主义的制度还没有实现,一切社会运动仅仅是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步骤,并不就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只能预测社会主义之下技术文明的发达是否更加强烈或稍稍减杀。

于是许多所谓社会主义家，理想着将来社会里既有自由的劳动，那技术文明便可以绝无障碍的发达。对于社会主义表同情的文学家，亦有许多人是这么想。譬如王尔德^⑩《一八九一年之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人心》，他说将来一切非知识的可厌的劳动，危险或不洁净的劳动都由机器去做。“机器替我们进煤矿、消毒；机器替我们入轮船底，烧蒸汽锅；机器替我们扫街……做一切无味的工作。”

这种乐观主义，稚气的信仰，差不多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⑪，普通的欧美群众，尤其是知识界，都是如此想法。

然而单就这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论，确实很有可以批评的地方。王德威尔得的意见不能不动摇，而且已经遇见不少驳议。

反对技术文明最急激的托尔斯泰就不赞成。俄国德聂罗莫的《回忆录》上记托尔斯泰的话道：“那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对着现代文化而进行，根据于要求舒服及一切种种文化的精细技巧，实际上自己便在掘那现代文化的根，破灭那现代文化。社会主义家忘记了：假使他们的希望达到，一切机器和工厂完全没收，都变成集合主义的生产组织，那时便可以知道，这种电气文化两三天内便完全破灭了。那些最要紧的工作，本来是文化的根据，现在却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谁也不愿意去掘煤。自由的劳动者，既没有鞭策，又不愁冻饿，何必爬到四五十丈深的矿坑里去受罪，那里又危险又气闷；他们决不愿意去掘煤了。可

是黑黝黝的煤，正是这黑色文化的黑心。”所以托尔斯泰的结论便是：“不是简直不要那文化，便是仍旧要用鞭策。”

托尔斯泰的论调是反对那纯粹技术派的，绝无条件的承认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之劲敌。比中国的东方文化派^⑮的学者，如梁启超^⑰、梁漱溟^⑱、章士钊^⑲、张君勱^⑳先生之流彻底得多，我们且看一看他们所攻击的是什么？

五

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威权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尤其只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上，而不肯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技术的单独发展虽然始终要引导到社会革命后的真文化，而在最初一期确亦不免发生流弊，如托尔斯泰所指摘的。王德威尔得的乐观主义是根据于资本主义式的文明，想象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悲观主义亦就根据于资本主义式的文明，攻击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的技术文明，究竟能否解脱人类之一切痛苦呢？究竟能否战胜自然呢？

野蛮人裸体的生活能受酷寒盛暑而不生疾病；文明人锦绣裹着却还要病痛，若是遇着那般的酷寒盛暑，非死

不可。《三国演义》上说古人动不动就是“身长丈八”，这虽是笑话，然而古时人的体格确比现代人来得粗鲁强悍，这是科学所能证明的。那时的人，就是在欧洲十七世纪亦是如此，从小在书房里必定挨打，几千里的旅行也要步行，打仗的时候是肉搏，往往受伤之后不久便痊愈了。各国的历史，文学诗歌都可以做证据的。所以亦可以说古时人确能不受自然的束缚；现代人享有文明生活，要防御气候的变更，要缩短空间的距离都用技术，体格反而不强健了。

现代的科学大家列赫教授《论人及其来源与进化》说：“人类的脑筋正是文化的黑暗方面，将来这种黑暗一定比现在发露得更厉害。”他的书里引许多统计，证明英国精神病的增加和速度。美国心病学家亦都承认城市里的精神病比乡村里多。譬如美国的黑奴，也和中国人一样，受“西方式”的物质文明影响而精神文明便大大的堕落！请看：

	一八七 年	一八八 年	一八九 年
一百万黑奴			
之精神病者	三六七人	九一二人	九八六人
的数目			

不但如此，黑奴中精神病的增加正在解放之后，那时黑奴加入所谓文明生活也愈深了。

既如此，我们可以断定：单单现代式的技术发展，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之下解放人类”。人要避夏日和冬风，

便造起伟大的建筑房屋,制造和暖的衣服,想出新方法来烤暖住宅,并且还有所谓消毒。然而“自然”却也跟着人走,走进城市和房屋,走进那和暖便利的衣服,居然发见向来所没有的病。或者呢,人自己一天一天的脆弱,以至于灭种,——尤其是中国式的技术文明。

并且也不能说这全是困苦的经济生活所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高等阶级,经济生活是很有保证的;然而最可怕的病症,精神病象以及生殖力的灭杀,刚刚在高等阶级里发现得最多。单调的技术的科学之发展,其结果是如此。当然,此种发展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基礎。

六

可是,王德威尔得还可以说:技术虽然不能完全解放人类于自然威权之下,至少可以减少我们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诚然不错:封建的贵族以至于知识阶级的贵族处于那畸形的分工制度之下,自己不关心物质生活而能从容从事于“文艺或科学”,觉得只要使天下人都能如此,便算是社会主义了。

实际上人类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并不因为技术发达而减少: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转辗推移,永无止境。

最近二十五年来,世界的报纸上往往看见“煤的饥荒”,“纸的饥荒”,“石油的饥荒”,以及其他等等“饥荒”。

不用说以前的欧洲，就是现在的中国，也还没有这类的饥荒。从前“东方文化”下的欧洲人和现在“东方文化”下的中国人并不吃纸、煤、石油等，而只吃五谷；五谷歉收方算是饥荒。然而现代的文明之下，这些纸、煤、石油等的缺乏，竟和缺乏五谷同等的重要。足以致现代社会的死命了。

或者有人说：“这是我们进步了”；其实是“我们脆弱了”。我们脆弱，所以我们格外要关心“物质生活”。不但这样“娇生惯养的”社会决不能做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那时人类也决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的烦恼。可见技术文明未必见得一定能减少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刚刚相反！文明人不但没有从物质生活解放出来，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锁系。以全社会而论，技术文明始终只能解放一部分的人。贵族受这文明的打击：在欧洲危害了他们的政权，在中国至少也危害了他们的师权（儒者），所以决然要求放弃物质文明。无产阶级遇见这一文明而生长发达，当然亦是畸形的，受压迫的，所以要组织起来，彻底研究，并且以实际运动来调节那偏畸的病状。

七

然而无产阶级的调节决不根据于贵族式的思想，想永逸勿劳。劳动若在圆满的社会关系之下，只能引起快感

和美感,决用不着躲避。即使是扫街掘煤等的苦工,假使每日工作时间缩到极少,假使因社会革命而人类行动习于集合的组织,由此而社会的意识发达,亦必定有人去做,何况劳动是社会组织所必需的成分。圆满的社会关系之下,人类对于技术自当精益求精,不过已经可以不单为适应环境或改良物质生活而工作;工作的结果已经无足轻重,而工作的过程反成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人的必需品了。那时可以发生“劳动的饥荒”,闲得没事做,是天下第一件大苦事。

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实在讲起来,托尔斯泰的农村,以至于后时的章士钊之“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一把锄头一把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他的发展不是清心寡欲论所能阻滞的,始终还是发展到资本主义而后止。贵族式的精神“文明”,譬如禅悦或者神悟^②,礼教或者仪式正是封建时代生产方法和技术内容的反映。那时的技术是祖传的或者偶遇的,是师傅秘授的或者纯任“天工”的。庄子以庖丁解牛^③喻养生,列子^④说“人巧与造化同工”,正是这种关系。不愿用理智而愿用直觉,“及其末流”乃有张君勱之“忽而主义”“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以至于“至为玄妙不可测度”的人生观。

且说最极端的否认物质文明派,要求恢复“无为”的

世界。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为最幸福的，亦不能于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他的方法。我这句话的物证便是整部的世界史。单说中国：中国没有进取的思想，没有极端提倡物质文明的学说，只有老庄以及释道的无为，可以称之为“向后转派”；此外便是孔孟^{②③}和程朱^④乃至二十世纪的新宋学^⑤，可以称之为“立定派”。然而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⑥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而且每次发展的结果，如陈项^⑦、赤眉、黄巾、黄巢、李闯、洪秀全等的“屠杀”；“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静、礼教或“宋学”^⑧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最沉滞的中国式的发展尚且不见得有什么精神文明，中国社会史里始终还有一派“动”的实力，——平民，庸俗的市侩乡农，不过不见得是前进的动罢了。宋学的破产遇见这种非前进派的动力尚且彻底暴露，何况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吃酒席，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

至于张君勱先生说：“社会革命家告其同志曰，人事变迁，无所谓因果，视吾人之意志何如”……“一则曰行动，再则曰直接行动”……“在俄法有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有马克思主义学校,在英有劳动学校,皆本此精神而设者也。”实在教人读了不得不笑。社会主义的学校正在教育劳工青年说:“社会现象是有因果的,研究社会科学当以原因论的方法,而不当以目的论的方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的引导到社会主义。……”

八

从根本否认社会现象之有规律起,到相对的承认社会现象之目的论的规律性为止,都是现代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之策略。最巧妙的便是不与真正社会主义的学派辩论,譬如美国人著的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往往不提马克思主义一字,即使提也是几句闲谈便带过去了。殊不知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不但封建制度文明之“玄妙不可测度”的神秘性,应当推翻;就是资产阶级文明之“仅仅限于自然现象”的科学性,也不能不扩充。科学文明假使不限于技术而推广到各方面,既能求得各方面之因果,便有创造各方面谐和的艺术文明之可能。意志应当受知识科学的辅助,而后能锻炼出乐生奋勇的情绪(艺术);那无知识、无因果观念,近于昏睡或狂醉的意志,只能去“老僧入定”或者学李陵^③的“振臂一呼”,而不能办什么“共产青年教育”或“马克思学校”。

其次,单纯的精神文明派的意志既然成不了社会主

义,那么,仅仅技术的科学,或者所谓“科学的技术文明”之发展,是否能直达社会主义呢?

技术文明发达的结果已经说过,并不能解放人类。托尔斯泰说的也并非过分之言。可是应当知道,技术的发达一定影响到社会关系;其必然的结果固然不能使人从自然的威权之下解放出来,然而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一新形式。诚然不错,此种新形式中,大多数劳动平民成为无产阶级,实际上虽享受物质文明而绝对没有所谓幸福;高等社会也习于游惰而百病丛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成经济的阶级制,人对自然也还不能反抗。可是,人曾经因技术的发展而研究自然现象之因果,遂能部分的征服自然;人亦应因社会关系的变易进而研究社会现象——其实亦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之因果,那时便能克服社会现象里的“自然性”,求得各方面谐和的发展,那时才能得真正的对于自然之解放。如此:“返于自然”既为自然律所限,决不可能;而进于艺术生活,却为自然律所必至,于是就有勇猛的“意志”起而斗争。何况无产阶级受工业技术的训练而易于组织团结,习于工会式的集合主义。(社会主义之直接行动乃对妥协行动而言,并非如张君劭意中的孤注一掷。)

所以,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社会现象既在科学的因果律范围之内,我们便可研究到将来社会: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社会的物质”,既受技术影响

而终至于突变；则技术亦将反受其影响而移易其发展之方向，那时当有艺术性的技术文明发现。王德威尔得以己度人，以现在度将来，他所认识的快感和美感，仅仅是美华安适的厅房、钢丝坐垫、电灯、电话、咖啡馆等的资产阶级生活；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只是工场和报酬。所以他以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应当使事事都由机器去做，人人都享游惰的福。

实际上呢，社会革命渐次完成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技术发展的途径便大不同了。第一，那时不用军事技术；第二，那时不用无谓的奢侈品；第三，实用的生产力大增，生产组织完全变更，一切城市文明的积弊，可以用规划经济政策逐步消灭。不但推翻君神父师之权，并且推翻“黄金权”。分配机关和生产机关都能渐成集合制度，世界的各区域内只要有统计调查的互相报告，一切政府法律都可以废止，而节省现代社会所枉费的许多人力。技术的发展当然能成为各方面的，无所偏畸的；精神文明自然也能真正改善，以至于“大同”。人生的体育、智育都可以充分的得科学之助，而尤其是社会的组织，可以时时按科学的原理而变易。或竟如剧院的移易布景，小孩子的搬弄玩意儿，纯粹只要求美感。小孩子或演剧家是很忙的，那股“忙劲”便可以保证社会里做工的人只嫌太多，不嫌太少。

九

社会主义颠覆现代文明的方法于思想上便是充分的发展一切科学，——思想方面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艺术文明是应当由这条路进行的；而且要人类自己的努力。历史或社会学中的有定论是客观的，并非主观的宿命论，他仅仅是努力的向导。物理学家并不因为研究出电力的因果律，便应当让“雷公公和电娘娘”打死，却反而能指使这种“公公和娘娘”，使他们变成人类的奴仆。同样，社会科学中的有定论派亦并不因为发现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律，便应当听天任运的让资本主义照着资本家的心愿去发展，却反而可以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决定更正确的斗争方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

注 释

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法机关。一八六四年首先在上海，其后陆续在汉口、厦门等地的租界内设立。公廨专门审理以中国居民为被告的案件，审判官由外国领事或其委派人员充任，与中国会审官“会同审理”，依照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定案，并实行一审终审

制度。这是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机构。

各行的祖师,参见本书第 21、22 页注 。

酋长,部落首领;巫、祝是古代祭祀时专司以舞降神、诵读祝词的神职人员;儒,知天文、识旱涝的术士;牧,豢养供祭祀用牲畜的神职人员。

神甫,即神父,天主教、东正教的神职人员。

第三阶级,见本书第 88 页注 。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曾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担任党的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来与托派合流,一九三一年五月被托派组织推为书记。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于四川江津。

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鼓吹实验主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著名人物。

《新青年》,见本书第 7 页注 。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总结医学临床经验与论述针灸、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医学原理的一部重要典籍。成书约在战国时期,现分《灵枢》、《素问》两书。

⑩ 《汤头歌诀》,清朝汪昂编著。本书选辑中医常用方剂,用七言诗体编成歌诀二百首。包括方名、组成药物、适应症及加减法等,并附注释,说明制方意义。简明扼要,便于诵读记忆,流传颇广。

⑪ 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立人。此处引文出自他所著的《老子》(又称《道德经》或《德道经》)一书。

⑫ 基督,希腊文 Christos 的音译,意即“救世主”。基督教加于该教创立者耶稣的称号。

⑬ 卢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⑭ 塞勒,今译雪莱(一七九二——一八二二),拜伦(一七八八——一八二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⑮ 即列·尼·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 ,俄国著名作家。

①⑥ 王尔德(一八六六——一九三八),比利时的右翼社会党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历任内阁大臣。

①⑦ 乌托邦社会主义,参见本书第8页注。

①⑧ 东方文化派,见本书第22页注①⑩。

①⑨ 梁启超,见本书第91页注②⑦。

②⑩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生,广西桂林人,当时是鼓吹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②⑪ 章士钊(一八八二——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一九二四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见本书第90页注①④。

②⑫ 张君勱(一八八七——一九六九),江苏宝山人。研究系分子,大学教授。宣传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同时又颂扬孔孟“先圣”和宋明理学,主张内心修养,说什么“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

②⑬ 禅悦,佛家术语。禅,本意为“静虑”;禅悦,指醉心于禅理。神悟,指佛教禅宗所说的由“迷”境界到“悟”境界,由“众生”境界到“佛”境界所需的觉悟。

②⑭ 庄子(约前三六九——前二八六),名周,战国时哲学家,著有《庄子》一书。“庖丁解牛”语出《庄子·养生主》,以厨师熟练地杀牛来比喻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就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②⑮ 列子,即列御寇,战国时人。相传撰有《列子》一书,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

②⑯ 孔孟,即孔子和孟子。孔子,见本书21页注。孟子(约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后人把孔孟的儒家学说称为孔孟之道。

②⑰ 程,指程颢(一三二——一八五)、程颐(一三三——一一七),北宋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他们提出“天下只是一个理”,“理生气也”,认为宇宙万物只是一个绝对不变、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理”所派生的。朱,指朱熹(一一三——一二),程颐的四传弟子,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②⑱ 二十世纪的新宋学,指张君勱所鼓吹的唯心主义玄学。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张君勱声称:“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⑳ 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因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称唐明皇。公元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一骑红尘妃子笑”,出自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唐明皇为博取杨贵妃的欢心,利用驿站从广东飞骑将新鲜荔枝递送到京城长安。

㉑ 陈项,指陈胜和项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㉒ 宋学,主要指宋儒程、朱鼓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和陆九渊一派鼓吹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它们都反对汉儒的考据训诂之学,而把封建的“理”——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所不同的是程朱学派主张“理”在心外,陆九渊学派主张心就是“理”。

㉓ 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西汉人。武帝时为骑射都尉,率兵出击匈奴贵族。他在《重报苏武书》中谈到与匈奴单于最后一战时,曾“振臂一呼”,以鼓舞将士,但终以寡不敌众,战败投降。这里是借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只有单纯的精神文明派的意志是根本不行的,而必须要有能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科学。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可是因为辩论所涉太广,我不愿意直接加入,弄得我的文章变成论战体的,读者反不易懂。我只说:“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所以我试一论“必然”与“自由”的意义。“That is the question!”

一、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之规律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历史。最显著的差异,便是:自然界里只有无意识的盲目的各种力量流动而互相影响,此中共同因果律的表现,亦仅只因为这些力量的互动。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人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类社会的历史里却大不同,这里的行动者是有意识的人,各自秉其愿欲或见解而行,各自有一定的目的。固然,研究各时代或各战役的时候,这一异点,应当特别注意,因为他对于人类历史有很重大的价值;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进程之共同因果律。表面上看来,历史之中,虽然有人所愿望的目的,而实在还是偶然的事居多。所愿望的事能够真正实现的,非常之少。人的目的往往互相冲突反对,或者是根本上不能实行,或者是手段不足以实行。历史之中无数不同的倾向及行动互相冲突,其结果却与无意识的自然界毫无差异。凡行动都有所愿望的目的,然而此等行动之结果却往往并非所愿。即使表面上看来,结果与原定目的相符,而实际上此等结果又能引出非所愿望的事,决不能刚刚是人所愿望的。因此,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科学的职任便在于发见这些公律。

历史的进程大致是:各人自求其目的而有所行动,于是无数人的行动互相牵掣推移而进展,便成历史。各人的目的和意志受愿望与见解的规定。然而直接规定愿望和见解的各种影响,又各不相同。此等影响或来自外物,或出于思想:虚荣心;“爱真理及正义”,各人的毒恨,甚至于一切肉欲。然而一方面,我们已经说明个人的愿望决不能完全实现;所以这些愿望根本上便只有第二等重要的价值。别方面,却发生了新的问题:“究意是什么样的力量

支配着人的意志而能使移易方向？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反映于人的思想里而引起各种愿望？”

旧派的唯物论向来不设这种问题。他们的历史观实在是唯用主义(实验主义)的：可以分历史上的人物为“好人”与“坏人”，各依其所愿望为标准而断，研究的结果大半是好人吃亏而坏人沾光。于是就说历史发展中并无所谓“天道”，这算是唯物论！其实这种学说自己就反对唯物论：他以为思想的动机是历史事实的最后原因，而不去研究那思想动机后所隐匿的动机。这种学说的不一贯，不在于他承认思想动机之存在，而在于他不追究思想动机之后的最后原因。

历史现象的研究应当更深一层。英雄伟人以至于群众的动机，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隐匿难见的，都不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最后原因却是造成这些种种动机的现实力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承认个人的动机是最后原因，然而他承认是哲学思想的流派。他寻求最后的原因不在历史之中，而在历史之外。譬如黑格尔解释希腊史，他不细细考究希腊史实之间的联系原因，而说希腊史是真美个性之创造过程，说是艺术作品的实现。客观的唯心论之谬误，就在于此。

历史中之政治家的动机，不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必定与最后原因相联系。个人的动机无论如何重要，总敌不过群众的动机，或是民族的，或是阶级的；所以研究历史的原因，必须追究群众动机的根源。然而群众动机，还

不仅在于短期的爆发或涌动(如中国之五四运动时之群众心理),而在于能引起历史上之巨大变更的长期运动,所谓时代思潮,或是明显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或者隐藏的无组织无意识的。先细察此等动机,或是直接明了的,或是托之神秘幻想的,只要是能侵入群众及其首领(所谓伟人)的头脑的,都要研究;再进便求此等动机的最后原因;如此,方能发见历史进化里的公律以及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之特别公律。

二、自由与必然

既如此,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决不能因为“不知因果”便说“没有因果”。

或者有人说:“若是承认一切现象,甚至于精神现象都是必然的,那就人的行为都成了盲目的不自由的了!”其实所谓“自由”(绝无因果)仅仅是尚未了解的“必然”。“必然”的所以显著是盲目的,亦仅仅因为暂时不可了解。凡是可以了解的“必然”,就决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却在于能探悉这些公律;因为只有探悉公律之后,方才能利用这些公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而达某种目的。因此所谓“意志自由”,当解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若是否认因果律就算自

由，那真是盲目的真理了！人的意志愈根据于事实，则愈有自由；人的意志若超越因果律，愈不根据于事实，则愈不自由。因为不知因果律，便无从决定行为，只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的侥幸心，而绝无所谓自由意志。“自由”实在是能克制自然及自己，然必以知悉自然的必要为根据；所以“自由”本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最早的人，在草昧时代，各方面都不自由，与禽兽无异；然而每一次的文明进步，都是行近自由的一步。人类历史的初步便是火之发明：发见机械的动及摩擦可以生热及火；到近代的文明，却是变热力成机械的动。人类离自然而独立自由，完全在于探悉自然界的公律。人类历史的发展里，人若欲求得自由，欲求脱离社会现象之“自生自灭性”的压迫，而进于自由处置社会现象的威权，亦必须探悉社会现象里的“必然”的因果律。空言意志自由，甚至于否认因果律以立意志自由，那简直是自相矛盾。

三、历史的必然与有意识的行动

资本主义时代的强有力的生产工具若能变成公共的财产，生产制度若得按照着社会关系而组织，那时，人类方能完全克服自然，才能完全制止自己的盲动。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方才能有意识的制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意志（社会的原因）方才渐渐的能实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为人类所支配而动的社会原

因,方才能渐近其所愿望的目的。“这是从必然世界至自由世界之一跃”。

第一,应当明了“必然”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便说“必然”有种种程度的不同。譬如:必然要吃药,病才会好;必然要呼吸,人才会活;必然要到上海去,才能讨着债。这是所谓“附条件的必然”,——假使要病好,我们便应当吃药;假使要活,我们便应当呼吸。人类经营生活,对外物有所动作,常常遇见这一种的“必然”:假使他要收获,他便必然要先种植;假使他要打野兽,他便必然要射箭;假使他要开动汽机,他便必然要积蓄热力。此种“附条件的必然”里,显然有“服从”的成分在内。人若能不费劳力,而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时他就更自由些;因此,即使人能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服务,那时,人仍旧是服从自然。然而这种对于自然之“服从”却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人若服从自然则对于自然的威权反而增长,人的自由亦就增长。所谓服从自然(必然),是说服从自然律;所谓征服自然,是说征服自然本身。组织有规划的社会生产时,亦是如此。服从技术上及经济上的某几种“必然”,人便能破毁那受自己生产产品所支配的“作茧自缚”的怪现象,人便能得多量的真正自由。他的“服从”正是他的“解放”之源泉。

其次,所谓“必然”还有“障碍力”的意思;就是特别的一种力量,强迫我们不能照着自己的心愿去做,而只能作违心之举。这种“必然”的确是人的自由的对敌。然而应

当知道：外力固然足以使事实与我们的心愿相违异，可是他亦能使事实与我们的心愿相适合。我们的心愿，自己能成为一种外力，只看我们的观点如何。譬如“强迫地主无代价移让土地权于贫农”，这是一件事实，他对于地主，确是很可恨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贫农，却是他的自由意志之表现。至于“以相当报酬赎回土地于地主”，对于地主是自由意志之表现，对于贫农便是可恨的历史的必然。

于是，可见“附条件的必然”和“障碍力的必然”都不是绝对与自由意志不能并立的，却是相反相成的。

再则，最重要最根底的问题，便是“因果的必然”。那“附条件的必然”是主观的行动，“障碍力的必然”是主观的受动。至于“因果的必然”才是客观的解释。或者以为社会发展既有因果的必然，便可以绝不行动，便无从有意识地去助长某种历史的发展。这种学说以为只有两种情形：“或者我认这种现象是必然的，不可免的，那便用不着去助长他；或若我的行动是引起这种现象所必需的，那便这种现象不能叫做必然的。谁又竭力去助长那必然的不可免的太阳之东升呢？”

虽然！太阳之东升与人类社会关系绝无联系，亦不是他的因，亦不是他的果。所以可与社会现象相对待。至于社会现象和历史，对于人类却不同了。历史是人做的；当然，人的意向不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可是，人所做成的历史偏偏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正因为其中

亦有个“必然”在。既有这一“必然”，便有这“必然”的果——人的某种意向。此种意向再回过去做社会发展因素。“意向”并不与“必然”不相并立；不过“意向”亦受“必然”的规定罢了。

每一阶级倾向于求解放，行社会的变革，他的行动亦是这一变革的因。然而他的行动及种种意向又是某种经济发展的果，所以他自己亦受“必然”的规定。

社会学之所以能成科学，全在于它能解释明白人之社会的目的何故发生；社会的目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之必然的果，追寻他最后的原因，却在于经济发展。

既然知道历史的必然，人的行动就更可以“自由些”，更容易达到目的些；我可以看着自己的行动以为是某种必然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之一。我的行动因此更有意识些。所以决不能因为既有历史的必然便不要有意识的行动。只有否认历史的必然时，方才真正否认社会学，否认社会科学，而一切社会运动都成盲目的无意识的侥幸行动。

四、理想与社会的有定论

理想是什么？普通人的答案是：“理想是目的，是我们道德上所不得不立的目的，可是因为太高了，我们不能达到。”所以有所谓“信仰理想”，其实“信仰”与理想绝对不相关涉。只有与现实毫不相关的理想，容得人

家信仰。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说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好极了，可惜不能实行。这种人是最信仰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反而是对社会主义怀疑的人，还想着些现实世界。那种颂扬社会主义的人，比警察可怕万倍。理想与现实之间必须有密切的联系。假使没有联系，那种理想便是幻相。譬如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之类，就是这种东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却密切联系着现实生活。真正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过去的果，亦就是将来的因。现实是流变不居的；既有流变，便有公律，依此现实流变不居的里面公律而后能预见将来的现实；这种将来的现实对于现在便是理想。假使没有这种必然的公律，那里能发生对于将来的理想呢？张君勱先生以为自然界有“相同现象”可以做科学的对象；人类社会间则有英雄豪杰等，不能发见“同相”的人，故不能以科学测度；这是很错的。科学的公律正是流变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统一性。譬如雷雨前的天色实在没有一次是绝对相同的，然而亦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雷雨的公律。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环境形势大相差异，然而并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革命的公律。因有公律可寻，所以才有社会理想。真正的社会理想只有根据于科学公律所求得的“将来之现实”。

既然如此，或者说：“一切英雄豪杰的理想家，所谓‘天才’，所谓‘创造’，似乎都是无用的，都是不足为奇的了。”那却不然！从客观方面说来，现实的社会

生活以至于艺术思想，从旧的变成新的形式，恰好用得着理想家或天才，他们是这种变革里所必需的“历史工具”；然而此等历史工具仍旧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科学的证据不在于孙文^⑩之类似罗伯斯比尔^⑪，而在于孙文之不似罗伯斯比尔。假使中国与法国革命前的经济制度及国际地位等绝不相同，而能生一孙文恰好与罗伯斯比尔相似，那才足以证明社会现象之无因果呢。再则，从主观方面说来，英雄或天才能参加伟大的历史运动，能当得起历史工具，是很荣耀的事；然而他至少要能知道几分社会现象的必然公律。那自然现象的公律，若是没有物质，必不能有；社会现象的公律，若是没有人，亦决不能有。可是决不能据此便说个性可以不顾社会公律。

总之，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

因此“必然论”是社会的有定论，而不是“宿命论”。社会的有定论说明“因果的必然”，只有不知道“因果的必然”的人，方趋于任运的宿命主义，或者行险的侥幸主义。

五、社会与个性

社会的有定论说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在于经济，并不曾否认社会里的心理现象及个性天才，他仅仅解释心

理及天才的原因而已。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里，人生派一让步到仅仅“情感是超科学的”（梁启超），再让步到仅仅“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范寿康^⑫）。请问：戊戌^⑬以前的旧中国“儒者”遇着李贽^⑭、谭嗣同^⑮、梁启超之流，不由得不起一种极厌恶的情感，他们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要请这班“大逆不道”的人上菜市口去砍头；现时的中国知识阶级却对这班“大逆不道”的人表历史上的同情，他们先天的义务意识是要请这班“先知先觉”的人进中国思想史古物陈列馆里去。这样的情感和义务意识是否是超科学的，是否是先天的？当然不是！这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象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

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

社会现象变迁的程序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 一、生产力之状态；
- 二、受此等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
- 三、生长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 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
- 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宇宙观人生观）。

每种社会理想无不根据于当代的社会心理(时代的人生观)。然而社会心理随着经济动向而变,于是在这流变之中可以先发现一二伟大的个性,代表新的社会心理之开始(个性的人生观)。每一期人与自然界的斗争,由于自然的适应而生技术上的变革;于此斗争的过程里,得综合技术的成绩而成系统的知识(科学)。然而技术的变革,必定影响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又渐渐确定新的政治制度,变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阵势。于是政治制度较稳定的时期,大家引用当时所已得及已承认的知识,便有大致相同的对于人生及宇宙的概念,养成当代的社会心理。如此转辗流变,至有新技术、新科学、新斗争之时,便能发生新人生观。这是人生观所以有时代的不同之原因。再则,当新的社会心理创始之期——政治制度受剧变之时,平素隐匿未见的阶级矛盾显然地爆发,伟大的个性能先见此新人生观,立于新阶级的观点而与旧阶级开始思想上之阶级斗争。这是人生观所以有个性的(亦即阶级的)不同之原因。

新阶级的群众对于某一问题,因其对于生产工具之关系相同,大致有同一的态度,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向,亦就不相上下。然而阶级的观点永久与经济环境相关,所以各阶级及阶级内之各“层”的观点必不相同,解决这一问题的趋向也就各自相异。此种群众的动机在阶级内有共同的解决问题的趋向,本来亦是经济原因的必然结果,况且在各阶级之间又有各种趋向的斗争,互相牵

掣而各不能达,于是又落于第二次的客观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的“必然”如此愈演愈复,使各阶级的解决问题的趋向,所谓“意志”,亦愈适应而愈精密,能渐近真正的解决。可是,某一阶级利于有此必然的结果,别一阶级则否。因此,前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日近于真理,而后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便日远于真理。

个性孕育在社会里,他受当代社会心理的暗示,他亦受当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影响。学者能发见当时社会里所已有的问题,虽然大家还视为当然的事,他却能发疑问;然而他不能制造出社会所没有的问题。佛经上的譬喻:若是梦见人头生角,那是因为醒时“此处见头,彼处见角”;人决不能梦见他绝对没有概念或印象的东西。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只是当代所能有的种种手段。即使顶天立地的最伟大的个性亦决不能在孔子时代想着现代的共产主义。当代的社会心理有阶级的分化,个性能“自由”选择某一阶级的观点,“自由”趋向于某一阶级的解决问题法,当然依此个性之环境及性格而定。他却不能跳出当代社会而以他“绝对自己”的观点为立足地。尤其是一切道德善恶及所谓“义务意识”,完全建筑在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绝对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只能存在于无社会的矿物世界里,其实是无己可利。人类往往以利己主义出发而得利他主义的结果,一切利他互助主义都产生于利己斗争的过程里。所以社会里个性的动机在初民时代便是社会的;在现今有阶级的社会

里便是阶级的。伟大的个性能超越阶级而“自由”选择观点,是因为这一斗争的过程显示了必然的因果律,使他不得不转移其观点于新阶级,结果仍旧是阶级的观点。所以个性的动机仅仅是群众动机的先锋,阶级动机的向导。

大致可以说: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中之一因素。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

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适应新变化的个性能自己觉得历史流变之“必然的因果”,那时,他方能超阶级而“自由”选择观点。至于阶级的社会心理亦因对于“必然的因果”之认识日益清晰,而能自化为人类的社会理想。初民个人依利己主义而向自然进攻;人与自然的斗争过程里发见自然现象的公律,能使他不得不结合共产部落而同进于较自由之域,——实在是利他。无产阶级的“阶级个性”依利己主义而向现存制度进攻;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实在亦是利他,个性之于阶级,亦与阶级之于人类的关系相同。

总之,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知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知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可是新科学知识

得之于经济基础里的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里的社会经验。所以个性的先觉仅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如马克思、列宁)。他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他亦是历史发展的一结果。

各个性的努力足以促进历史的进化,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见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譬如人不知道电气的公律时只有信鬼神,知道公律之后便能应用电气;人不知道资本集中律时,只能受他的害,知道之后便能应用此集中律以达无阶级无政府之共产社会。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

一、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应当先求之于社会的最后原因;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当再求此因素之因素。

二、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

三、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然必自知此因果联系,人的意志方能成社会现象之有意识的因。

四、社会的有定论以科学方法断定社会现象里有因果律;然后能据此公律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

五、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

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历史的工具运用“必然”的公律，由个性而阶级而人类，由无意识而有意识，成为群众的实际运动；群众运动的斗争正需要此历史的工具，社会的实质亦已能产生此历史的工具，于是方开始从“必然世界”进于“自由世界”的伟业。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注 释

《努力周报》，见本书第 91 页注^③。

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一九二三年春夏间和胡适一起与张君勱等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实质上是以马赫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张君勱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

胡适之，见本书第 110 页注。

一九二三年二月，张君勱到清华学校讲演所谓“人生观”问题，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什么“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遂挑起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

英语，意思是“问题是在这里！”语出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

唯用主义（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以美国詹姆士、杜威为代表。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是保守的，而其辩证方法本质上是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

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摈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他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又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在美学、教育、医学、生物学、生理学等方面都有贡献。

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见本书第90页注⑭和第111页注⑯。

⑩ 孙文,即孙中山。

⑪ 罗伯斯比尔(一七五八——一七九四),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的实际首脑。对保卫和推动法国革命向前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热月政变时被捕,次日即被处死。

⑫ 范寿康(一八九六——一九八三),浙江上虞人,哲学与教育学研究者。

⑬ 戊戌,指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年六月,清朝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的变法维新主张,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操纵军政大权,坚决反对变法维新,九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变法运动遂告失败。

⑭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一二),号卓吾,福建晋江人,明朝思想家、文学家。主张重视功利,反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公开以“异端”自居。著有《焚书》、《续焚书》。

⑮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甲午战争后,积极从事维新运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一八九八年八月入京,参与新政,失败后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中国革命史之新篇^{*}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中国自有思想革命 以来 ,已经有不少主义 :有无政府主义 、基尔特主义 等等。这许多主义所以发生的原因 ,都是对于旧社会不满意 ,想另外找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补救的。但这些主义都是从外国裨贩而来 ,是理想的和抽象的。究竟在中国能够发生什么影响和关系 ,尚是一个问题。

新思想所以在最近发生的原故 ,并不是五、六年前的人如此呆笨 ,五、六年后忽然聪明起来 ,这完全是由于中国经济变动 ,由此变动而意志 ,便有所谓新主义输入。至于三民主义的发生 ,是完全由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而起的 ,是中国已需要此种主义 ,完全与外来的乌托邦 说不同。三民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等的分别 ,因为一个是中国经济情形本身有此种要求而发生 ,一个是空想的和理论的。三民主义本是一个极简单而毫不费解的主义 ,因为

*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的演讲记录 ,原载同年一月的上海《民国日报》特刊。原题为《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为《中国革命史之新篇》。

有外国的压迫和欺凌，故首先有民族主义。试看中国所有商埠，一切都在外人的掌握，许多政治上的大权都操自外人，所有铁路、矿山完全为外人经营，关税、盐税都由外人监督。在如此情形之下，我们即使有心和帝国主义者讲交情，试问有何方法？所以提倡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并不用何种高深理想。

因外人的侵略而发生种种影响，中国的旧经济与外国的资本主义相接触，使中国的农业、手工业不得不起变化。汉阳铁厂和各处工厂随之而起，引起政治上极大的变动，满清政府不能不放弃政权。因为经济上已有变动，遂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同时国内外亦发生新的经济力量。如华侨、商会、新军，如游民、会党，都是新旧经济力量交替消长之间所生出来的新现象；他们有意或无意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自然而然要反抗满清政府。这种平民反抗专制政府，可说是民权主义发生的原因。

这两主义是很明白的，无论何人对于反对外国、反对满清专制，是没有不赞成的。但是运动中间，有军阀官僚的分子，利用人民的心理来制造自己的地位。平民的意思决不是推倒满清之后便欢迎一般军阀官僚若袁世凯等，他们所要求的是一切事业的发达，生活的安定，及自己权利的保障。因外国之经济压迫，军阀之政治扰乱，无从保障平民的生活，当然要发生民生主义的要求。所以在如此情形之下，发生三民主义，并不是一桩奇怪的事，是很平常的。但是三民主义的意义在十年前却非常

之幼稚，这是因为社会里的革命力还没有十分养成，当时的三民主义仅仅隐约的代表一般平民的政治要求及经济要求；三民主义之明晰的程度当随此革命实力的增长而日益深入，却并不在学说的精湛不精湛。

现在已是民国十三年，在过去十三年之中，因为一天一天的经验，三民主义渐渐明瞭了。在辛亥时候，所谓三民主义只是民族主义，而且所谓民族主义，只知排满，不知排及外国人，其余民生、民权更不用说了。辛亥革命排满主义虽说是达到，然压迫中国的外国人仍在，三民主义可说始终不曾达到。中国平民必须经过这十三年斗争的痛苦经验，才能明白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的意义很简单，是使中国成为独立的、不受外国压迫的。话虽然易说，但事实上却不容易，民生、民权不达到，则民族主义亦不能达到。因为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得到政权，则政权必落在军阀手里，他们必然勾结列强以压人民，故民权主义不达到，民族主义亦不能达到。再则即使所谓人民能得到政权，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全体人民，政权落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试问资本家能代表人民不能？他们有资本有公司与外人贸易，只求其个人有利益，更何惜牺牲多数人幸福，而另套出卖中国。资本家利用金钱及一切手段，甚至于学术机关，以争取政权，自私自利剥削平民，此等政府如何能代表中国民族？所以民生主义不达到，民族主义断乎不能达到的。

如此说来，三民主义是整个的，是浑然一体的，是不

能分开的,必完全达到三民主义,然后可以说革命成功。在三民主义未达到以前只有革命。所以三民主义的定义是很简单的,并不是个乌托邦新社会,是由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要求,才产生这三个革命原则:

民族主义:中国民族的解放独立,世界各民族的平等;

民权主义:中国平民群众的政权,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

民生主义: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工人、农民)的生活之保障,使有真正参政之可能,使得到从事于征取经济权之一切必要条件。

既然不是一种空想的社会,而是现实的革命原则,就不能当他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却要人去实行。这种革命原则,我们可以当他是平民意志的结晶,是平民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农民、工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意志之表示。

既然如此,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一种口号,是从事革命的目标,是平民组织团结力量以达到革命的旗帜。研究三民主义,并不是合理不合理与理想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三民主义达到不达到,完全看我们平民力量与军阀势力之消长如何:平民力量大一份,三民主义也达到一份;反转过来说,军阀势力大一份,三民主义亦少得一份。我们在今日只有努力革命,至于何日可以完全达到,我们暂时可以不必问。更不必说最理想的社会。反正在中国的

现状,总不是什么理想社会;第一步必须先打破现状,而三民主义便是最切近于这现实需要的。三民主义的实现,完全靠我们革命的力量,向反革命派进攻。国民党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代表全中国平民的利益的,所以能组织平民,集中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作战,这是国民党应有的责任,也是平民应有的责任。

革命的力量何在?在于组织。一吨铁若没有造成什么机器,是丝毫没有力量的;若变成一部机器,就是融化锻炼之后,使一部分变成镞钉,一部分变成齿轮,装置起来,虽然仍旧是一吨铁,然而他的力量,却很大的了。农民、工人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若不组织起来,则仍然一盘散沙,没有丝毫实力。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情绪,革命的意志,在平民之间是现成的;必须组织他,集中他,他才能变成一种势力。这种组织的工作是国民党的责任。青年及工人、农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也应加入,以从事于反抗军阀列强的行动,这是平民的责任。平民应当以国民党为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国民党为先锋,领导自己的斗争。加入国民党,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并不是国民党利用我们。平民何必要组织?因为平民的仇敌组织得厉害,帝国主义用赔款买去许多留学生,收买中国教育;军阀养一班政客策士压制我们,试看他们的组织何等精密,他们决不单靠兵力扰乱或侵略;财政上、外交上、交通上、教育上处处都是他们的剥削手段,仇敌已然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平民的力量却还有限。他们有枪炮,有军队,

有警察可以指挥,最后一着便是武力解决。我们如果不将国民党办好,使成为一有力量的团体,去和列强军阀对抗,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达到的。

我们知道以前已有许多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如今我们各方面渐渐集中,革命势力的数量日增,质量也就渐变,我们便有意的来指导组织并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了。有意的与无意的运动有很重要的异点。以往的运动是各自运动,是本能的运动,而且是无意的运动:心上明明反对帝制却说是光复,明明需要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却是说提倡国货以抵制日货,明明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却想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主持人道正义。现在呢?认真组织起来,做全国大规模的各方面、各部分互相关联的有意识的斗争。于是中国革命的新篇开始了。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便是这新篇的第一页,因为他表示很明显的革命原则,做决心改组的意志,这就是开始集中中国革命势力,以从事于有意识的彻底的斗争。大会有这样的责任,可从大会宣言中看出来。大会宣言是以前所没有的,三民主义因此得有良好的界说,是数十万国民党员共同意志的第一次表现。无论何人皆由此同一目的做去,违反宣言的便不是国民党员。其次,宣言里有一般平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国民党对现在政治的政

纲；从前国民党只注意军事，而不注重其他，现在则全中国的国民党员都有一致对于政治经济的要求，用此去运动、宣传平民群众，使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有力的中心。再其次，宣言里明白说出国民党力量在于农民、工人身上。从前国民党的力量，不过少数人的奋斗，其余都不管；以前以为可用兵力征服民敌之后，再来按部就班的照着书上写好的计划办理，现在却已经知道三民主义是平民自己的要求，当将平民实力组织运用，使在斗争的过程里，炼出实行主义的力量来。而革命军呢？仅仅是平民力量中之一特殊形式而已。

注 释

这里说的思想革命，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主张思想解放，对封建主义思想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开始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无政府主义，见本书第90页注⑬。

基尔特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鼓吹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实行“产业民主”或“产业自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引诱工人脱离革命斗争。在五四运动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曾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在中国流传过，张东荪是主要鼓吹者。

乌托邦，见本书第8页注。

袁世凯，见本书第42页注⑳。

安徽学生运动，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因安徽省政府拖欠教育经费而引起的学生罢课风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孙中山主持于广州举行。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通过了宣言，并通过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历史的工具——列宁^{*}

(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

列宁不是英雄，不是伟人，而只是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向来对于历史上的伟人，大家都竭力崇拜，以为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天才，神一般的奇智，能够斡旋天地，变更历史的趋向。其实每一个伟人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里的历史工具。历史的演化有客观的社会关系，做他的原动力，伟人不过在有意无意之间执行一部分的历史使命罢了。我们假使崇拜这种历史使命，我们方崇拜他这个人。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已经进了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英、德、法、美的资产阶级，逼于客观的经济需要，不论他们口里说的是什么人道正义、国际和平，始终免不了互相杀戮，争夺殖民地，却拿无产阶级及农民来做炮灰。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集中于城市，日益脱离私产之束缚，日益感觉阶级斗争之必要，日益了解国际团结阶级组织之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上海《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

急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做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者,来做劳动者对资本家下总攻击的指挥者。整个儿世界帝国主义系统,到欧战之后,已经不能不开始破坏,世界的无产阶级也不能不以强烈的手段攻破这一个铁网而开始自己的建设事业。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资本集中的程度已经到了社会革命的关头,于是无产阶级不期然而然挑着资产阶级最脆弱最愚蠢的俄国,挑着农民阶级最受压迫最想革命的俄国而发难。然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实在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所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都集中于俄国,组成了共产国际,开始远大的革命计划。这种环境遂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列宁,做成世界社会革命的总指挥者、总组织者。不但如此,帝国主义的成立,全赖征服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东方病夫”。帝国主义的崩坏,当然与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的兴起同时实现。所以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的国民革命自然而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列宁的“东方革命政策”更使欧美各国无产阶级与亚非各洲的平民之间,找着了一个联合战线的方法;列宁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挥者,并且是一切平民受压迫者的革命运动之组织者。

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他能明悉社会进化的趋向,振作自己的革命意志,指示出运用客观的环境以达人类的伟大目的之方法。所以他是全世界受压迫的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假使没有列宁,世

界的帝国主义仍旧是在崩坏,国际的无产阶级仍旧要进行社会革命,东方各国的平民仍旧是进行国民运动;不过若是没有列宁,革命的正当方略,在斗争的过程里,或者还要受更多的苦痛,费更多的经验,方才能找着。如今我们有了列宁,全世界的平民便能自觉地、有组织地、有系统地进行革命的伟业。列宁现在死了,在他身后留着伟大的俄国共产党,伟大的共产国际——革命平民的严密组织,照旧地进行他们的事业。他们固然现时感着丧失了一个好工具的痛苦,纪念他,哀悼他,感谢他,然而并不因此而停止他们的革命事业,因为组织已经成立,这列宁的精神并没有死。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列宁不但是历史的工具,而且是革命组织的象征,他是革命组织里的要件。

我们平民曾经用列宁,当他是革命斗争的好工具。我们平民永久崇拜列宁,因为他是革命的象征。

注 释

欧洲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

五七- 五四- 五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

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中国近年来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出发点。二十一条以前，中国所受的侵略侮辱也不止一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丧失关税管理权，允许外人的治外法权，割地抵押等等，早已变成列强的殖民地。何以独有日本的二十一条和侵占青岛便能引起这样的热烈的爱国运动呢？

诚然不错，五四运动以前，从甲午、戊戌、庚子以来，中国对于外国的侵略，也每次都有一些反应。然而那种反应作用，最初只限于满洲朝廷（李鸿章等），他想造军舰、造铁路，挽回他的国运；后来虽然引起更广泛的“士气”，始终还不过限于士大夫之间（康、梁）这种对外反抗的运动。在满族专制之下，对于平民群众却只有一条路：推覆满族统治，所以国民党的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当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出版的《上海大学周刊》第一期。

时国民党主观上虽然有三民主义,而客观上的成功却只在平民群众内的一种民族主义的感觉。在民众的主观上虽然只限于排满的狭义民族主义,而客观上这一排满的民族主义确有反抗列强的精神在内。因此,可见民国落入反动派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之手后,革命的伏流不期然而然预备着更广泛、更伟大的民族运动,到了五四,这种革命的巨潮早已成熟,贸然爆发起来。

五四运动:第一,能综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合普通平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本能感觉(义和团的精神)与第三阶级进步的民主要求为一;第二,能在初开始时便倾向于接近民众(五四及六三时的讲演运动),用雅各宾式^⑩的革命手段为平民奋斗。这两点是以前时运动所没有的。梁启超等妄想以他们的“公车上书”^⑪来比拟,真可以说是脸皮厚到极点。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于学生群众虽然仍是知识阶级,却已不以上书运动自限,而且他们烧曹汝霖^⑫宅,打章宗祥^⑬,破坏现在法制而制造“革命的法庭”,确有几分革命的独裁制的意义。因此,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渐而至五四运动的大反抗,仍旧是从外交而内政,中国群众运动第一次发露要求民权的革命方式,可是以世界的观点看来,中国平民的仇敌,不

但在北京政府的“卖国贼”，甚至于不但在北洋军阀，而在列强的资产阶级，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开滦、海员、安源、京汉的劳工运动^①也是自然的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是当然的同盟军，就是对于全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的友军。中国的仇敌是列强资产阶级，而各国内劳工阶级的五一运动正是反抗这些资产阶级的国际运动。中国的解放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中国平民的民族民权主义，没有国际的民主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上是国际主义。

从五七到五四，从五四到五一——中国的一星期已经尽情显露世界平民的革命阶段了。

注 释

二十一条，见本书第 41 页注^①。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见本书第 39 页注。

五四运动，见本书第 8 页注。

指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李鸿章，见本书第 40 页注。

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名上书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即所谓“公车上书”。其后，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事》，不久又设分会于上海，推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维新。一八九八年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受到光绪召见，促成戊戌变法。九月西太后发动政变，

停止变法，康、梁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梁启超，见本书第 91 页注^{②7}。

义和团的反抗精神，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平民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参见本书第 40 页注。

第三阶级，见本书第 88 页注。

五四及六三时的讲演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期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学生纷纷上街演讲，动员人民群众起来，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等。

①① 雅各宾，见本书第 92 页注^{④1}。

①① 公车上书，参见本文注。

①② 曹汝霖（一八七七—一九六六），上海人。一九一五年任交通总长，在袁世凯授意下，参与“二十一条”谈判，起草有关卖国文件。段祺瑞执政时，又通过日本人西原龟三向日本财团进行大宗借款。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队伍至东单赵家楼，包围并火烧了曹汝霖住宅。

①③ 章宗祥（一八七九—一九六二），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六年任驻日本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多次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五四运动时北京学生游行至曹汝霖住宅，痛打了在那里的章宗祥。

①④ 开滦、海员、京汉的劳工运动，参见本书第 91 页注^{②8}。安源的劳工运动，指一九二三年发生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中，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保障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等要求。经过谈判和斗争，路矿当局被迫签订了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增加工资的协定。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

哲学的思潮往往是时代的人生观变易之际的产物。譬如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启蒙学派，或是欧战前后的复古思潮，都是社会制度根本动摇时的影响。然而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的背景。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这固然是中国“第三阶级”发展时的思想革命。可是实验主义的本身，在欧美思想界里所处的地位是否是革命的呢？这却是一个疑问。

实验主义(唯用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他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八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三期。收入本书时，根据作者自编论文集作了校订。

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至于欧美呢，这却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

诚然不错，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因为实验主义给的答案是“怎样应付现状”。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应付”的方法也就不同：在中国的第二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处于国际竞争之间，当然需要科学的知识，以为应付之用，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及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实验主义的特性就在于否认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他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其是“美国主义”。实验主义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

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

实验主义是什么？

詹姆斯说实验主义的方法最先便是消弭哲学上辩来辩去辩不完的争论问题。宇宙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这是永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宇宙的真实其实可以不用讨论。实验主义只问某种意见在实用上有什么结果。假使某人认甲种意见为真理，认乙种意见为非真理，在实用的结果上，有甚么区别？若是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很不用争辩。真正的争辩，只有实用上两种意见有不同的结果时，方有价值。

实验主义的名称——Pragmatism的语根与欧洲文Practic(实用)一字相同，本为希腊字“行动”之意(故又译为唯用主义)。普通的哲学系统，大致都以“静观”作考察宇宙的观点；从没有问及宇宙的变易之可能与必然的，亦没有注意到现实世界的积极精神的。实验主义却是一种行动的哲学。

“实验主义远避一切抽象的不可几及的东西，一切纸

上的解决,先天的理由,一切硬性的不可变易的原则,一切锁闭的系统以及一切绝对与原理。他只问具体的、切近的东西,只问事实行动及权力。”(詹姆斯之《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这方法可以研究现实生活,并且改革现实生活。他的根本精神就是使一切“思想”都成某种行动的“动机”;他时时刻刻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都是实验主义的优点。

然而实验主义的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论的。

照实验主义说来,一切理论不是解释疑谜的答案,而只是工具罢了。凡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我们对付外界的手段,别方面是一种逻辑的工具,如此而已。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却在于这种知识能否促进我们的某种行动。因此,一切学说的价值,照实验主义的意思说来,只要看他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某种学说假使是有益的,便是真实的;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一切真理都应当合于我们的需要。一切学说的真实与否,完全看他实用上的结果而定。“那一种理论对于我们最有贡献,最能领导我们,最能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各部分的问题,最能综合我们的一切经验,丝毫不爽,这种理论,实验主义方认他是真实的。假使宗教能合乎上述的条件,假使‘上帝’的概念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实验主义又何所根据而反对上帝的存在呢?”(詹姆

斯)只要对于事实有利益,不管他究竟真不真,这种理论总是好的,假使宗教能“安人心”,那么,宗教亦是真理。

实验主义的意思,以为真理自身并无何等价值。每种学说必须与人的实际需要发生关系,方能成为真理。假使宗教能帮助我们经营实际生活,减少我们生活里的苦恼,那么,宗教亦是真实的,而且是必要的。

实际上真理是否能作如此解释呢?不然的。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方能是有益的;思想的积极精神必须反映现实里的积极精神。事实上无所用其“积极”的地方,单是我们主观的努力是无用的。一定要客观世界给我们一个保证:保证客观里的一切发展是依定律的,这些定律可以做我们人的行动的指导的,那时方有积极之可能。如今实验主义只问理论能否做人的行动的动机,那就是承认一切催眠术式的学说亦是真实的。譬如说:中国现在要一个好政府,你们只要承认这一个意见,动手去干就好了,不必细问这一种意见,是否客观上有实行的可能。中国政治的发展,社会里各种力量的形势,依社会变易的定律,是否容许好政府式的救中国,也应当考虑一下。

何以实验主义以为一切理论自身本无何等价值?这是因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建筑在多元论上。“……现实世界若是离了人的思想,就变成很难捉摸的东西。现实世界接触了人的经验之后,还没有定名,便只造成某种观

念；或者呢，现实世界还没有被人认识明白之先，能因经验而与人以某种概念。在这种时候，只有一种模糊的绝对的不可捉摸的意象，——纯粹理想上的一种界说。”（詹姆斯）

如此说来，所谓现实世界只是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这种感觉以外的真实世界，若是不和我们的经验接触，那么，他的存在与否，都不成问题。于是我们便能任意分割经验上得来的感觉，使成种种事物、种种关系及联系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念。感觉固然是受外界的刺激而来，绝不受我们的管束的。可是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凭着这些利益和需要我们来决定：许许多多感觉之中对于那几种感觉我们便注意，对于那几种便不注意。因此，现实世界的内容，可以由我们自己选择。外物自外物，我自我。我凭我的需要，择取外物的观念，我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别人所见的，我现在所见的现实世界，未必便是我将来所见的。于是外物都成了我们任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自己的需要而设想出来的。詹姆斯说：“……就是在感觉方面我们的精神亦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能取此舍彼，这便是感觉方面的界限；注重感觉所得的某几部分，而不注意其余的部分，我们就划出一个先后来了；在这里再整理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方能了解他。总之，我们有的是一块大理石，要自己拿来雕一个形象出来。”在某一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几种目的，便照着这些目的制造出一种观念来，这些目的以

外的现实世界,我们可以不问。因此,对于实验主义,不但没有绝对的现实,并且亦没有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完全是唯心论的宇宙观。他的真理便成了主观的。所以,一切“真实”只是为我们思想的方便而设;一切“正义”亦都是为我们行为的方便而设。

照实验主义的观点看来,假使某种真理,因种种原故而变成无益的,他亦就成了谬见;换句话说,假使原有的目的和需要变了,以前的真理便变成非真理了。人的需要,现实生活的要求,主观的愿望及目的是知识和意见之真否的最高标准。这些目的和需要愈有价值,愈高尚,那么,能以达到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学说也就愈有价值,愈真实。

现实生活里的目的和愿望完全依着我们的利益而定的,所以实验主义的重要观念在于利益;再则,各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所以实验主义便只能承认:有几种利益便有几种真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有人以为这种学说和马克思的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很相近。其实不然。

第一层应当注意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为:“各种观念是由于各种感觉所引起的;感觉乃是人对于外界环境直接起的反应作用;人的行为大致依照着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定,尤其是每一社会阶级的行为是如此。”仅仅承认在心理方面说来,每一社会阶级对于自己有益的真理,对于那种能够做自己阶级斗争的好工具的学说格外接近

些；却并没有承认一切有益的学说都是真理，亦没有承认人的愿望和目的可以做外物的标准、真理的规范，更没有承认知识的内容是主观的。

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我们对于外物的概念确能与外物相符合。因此，我们要利用外物，只能尽他实际上所含有的属性，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客观的现实世界里所没有的东西，不能做我们行动的目标。现实只有一个，真理亦只有一个。我的观念及思想，当然是刻刻变的；然而这是因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在那里刻刻的变。却并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目的在那里变。照互辩律的唯物论的意义，我们亦在时时刻刻变易外界的现实生活，然而只能依着客观的趋向。我们不能要做什么便做什么，现实生活处处时时矫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观念反映客观的现实很正确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便不致于和现实相冲突，不致于“碰钉子”。某种意见是真理，并不因为他对于我们有益；这种意见对于我们有益，却因为他为真理，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客观的现实世界确是变易不息的，我们因此要求科学的真理——确定的真理，求此变易之中“不易”，不能象实验主义那样，只能暂时有益于我们的算真理。我们得了科学的真理、客观世界的定律之后，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不能安于琐屑的应付。

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是真理，他便能暗示

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注 释

百科全书派，是十八世纪法国一些启蒙思想家因编纂《百科全书》而形成的学派。代表人物有狄德罗、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他们在哲学上大致同意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学说，倾向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在政治上主张民主政体或开明专制制度。虽然他们的哲学、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坚决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以及封建制度。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等人曾积极进行民主思想的宣传，鼓吹天赋人权学说，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用意在于启发人们的觉醒，因而被称为启蒙学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法国思想启蒙家们曾给予很高评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有些思想家认为战争的发生和它带来的破坏，是由于“科学发展”的结果，是由唯物论造成的，因而极力宣传唯心论，宣传复古，并颂扬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如法国的普陀罗、柏格森、德国的台里乌司、日本的《东方之光》杂志等。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东方杂志》第十五卷四号、六号的有关文章，对此均有反映。

胡适之，见本书第 110 页注。

第三阶级，见本书第 88 页注。

詹姆斯（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实验主义创始人之一。他否定客观真理，主张概念只是人们为了在行动中取得成功而采用的“作业假设”，认为凡是“方便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还创立所谓“彻底经验论”，否认在“纯粹经验”或主观经验之外有任何实在的东西。

互辩律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

孙中山政治上的成长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从一八六六到一九二五年(从清同治丙寅到民国乙丑),六十年中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远东史。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外债的增加,赔款的勒索,路矿实业权利的攫取,领土、租界、港口的割让,不知道经过多少变更,六十年前的中国与六十年后的中国,在经济上简直是完全两样的国家。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也因此经过巨大的变更,士大夫的“世家”已经完全消灭;买办阶级已经大半变成所谓“中国”的体面商人;小农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之中,已经一部分变成现代的无产阶级。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二号。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增加各节小标题。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五节。

中国国际关系上的变更,日日促进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压迫者已经掉换了十好几次;各帝国主义者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六十年中所变更的只是压迫者和压迫的方法,而中国民众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件事实,是没有变更的;不但没有变更,而且剥削的范围更大了,压迫的程度更深了。因此,这六十年中中国平民的倾向革命、需要革命,也是没有变更的一件事实。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一天天的增加起来,中国平民的革命运动也就一天天的扩大而且深入。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小手工业的经济,遇见了帝国主义者资本主义,都崩溃下去,发生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于是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一个的发现新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的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的生长出来。

总之,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侵略中国的一时期,已经进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受列强经济、政治、文化上种种侵略而要反抗,受资本主义化而发生经济发展的趋势,无论如何,只要求这种发展的成功,便不能不实行革命,而且首先便是民族革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最大障碍，便是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阻碍中国发展还不仅在于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权主义，根本上便与帝国主义势力不相容，更不用说中国大多数平民的生计的改善，中山先生所称为民生主义的了。六十年前的中国早已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在发展经济，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民族加入世界史的最重大的责任；换一方面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必然先引起中国人的这种民族自觉。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孙中山出生直到现在，中国民族的历史职任，一直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孙中山现在死了，这一民族革命离他的成功还遥远得很；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引导之下，已经经过好几个阶段，而得到了他的正当的道路：因为要反抗列强，然后知道非颠覆满清政府不可，非建立共和不可，非为大多数中国平民争生活之改善不可，最后非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被压迫的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和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这一条中国革命运动所已经经过的道路，中国民族自觉的深入和前进，在现时看来是很明瞭的；然而从中山开始自己事业的初年的中国思想，进步到现在的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国平民群众及孙中山不知道经过几多困苦的经验，几多迷误的方法，几多重大的失败，这是一条荆棘的路。“反抗列强”是多么简单的“爱国”主义，四五十年前与中山同时的“政治家”、“士大夫”何尝不知道。然而只有孙中山寻着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的答案——革命。为什么？因为孙

中山感觉上代表中国的平民阶级，认识中国平民阶级的历史职任。所以只有中山能随着革命运动的经验，寻找着中国民族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镇压买办阶级 与联共联俄政策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反动政局，直到现在，根本上并没有变更：满清贵族已推翻了，然而代替他而统治中国的仍旧是反动的军阀阶级和士绅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至今没有成功。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纯粹是反动的。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可是主观上没有政治上的积极能力。至于游民的无产阶级，本来只有破坏的爆发的反抗能力，在革命的过程中，不但不能做指导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的内部崩裂和个人主义，反而成就军阀阶级的反动力量——兵匪的蔓延扰乱，是一切军阀统治的根本。而民族革命的对象——列强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丝毫损丧，反而利用国内军阀的互争和反动，用尽种种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

既然如此，民族革命的职任还没有尽，民族革命的力

量却已经自就崩坏，那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及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的革命运动，便只能利用各派军阀及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互争，做军事上的应付。护法 以来的南北战争，客观上确能削弱北洋军阀和凭藉这种军阀的各国帝国主义之势力；然而这种斗争的社会基础是间接的，大多数民众并不能赞助这种斗争。革命之中而没有革命的阶级做他的社会基础，积极的参加和领导，这种革命当然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在这一时期，只看见革命营垒的内部崩溃，右派的民党，妥协的、投降的、反动的分子随时随处发现，只看见辛亥以前多少有些革命性的社会阶级一天一天的反动。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自己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灭亡，他内部的矛盾不得不爆发；欧洲大战 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在殖民地上大大的削弱，中国这时也能偷着机会稍稍发展自己的工业。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本身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民族自觉的一大进步。随后中国无产阶级——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以及其他工人的罢工运动，组织工会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都大大的开展出来。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所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便能有群众的、广大的范围；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瞭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便明白的感到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大多数的贫苦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所以革命口号是“平均地权”；他在革命过程里，很正确的找着革命中的同盟者——“下等社会”的会党。他的革命主张，经过好几十次的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后右派背叛革命的大失败之后，始终不变。孙中山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族革命的首领，所以虽然在反动潮流很厉害的时期，平民各阶级都不能积极革命，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掉革命。如今革命战线之中新发现了无产阶级，他当然加入民族革命，而且是强有力的生力军；于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便很明显的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民族革命中的联合战线形成，革命的高潮重新兴起，民族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决然改组，容纳中国工人的政党——共产党加入。这便是孙中山对于“谁能执行民族革命谁是中国民族”的问题之事实上的第二次的答案。

同时，反动派方面的情形也已经大大的改变。假使辛亥以前，满洲贵族及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反动派，孙中山要以农民阶级及游民无产阶级的联盟反抗他们，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农工阶级及一切平民的仇敌却是军阀阶级及买办阶级。这十几年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前清时代增加了许多，他们不但利用形式上的中国中央政府，攫取权利，而且直接指使一种买办阶级组织的武装力量，如广州买办陈廉伯的商团，实行反

革命。这种买办阶级到处表现他们的反动性。孙中山指导之下的广州革命政府毅然决然的扑灭这种外国雇佣的“商团”。这便是孙中山第二次对于“民族革命中应当反对的反动势力是谁”的答案。

再则,中国革命运动,虽然根本上是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革命,然而在辛亥以前形式上似乎只是反对满清的革命。一直要等到革命之后,各帝国主义屡次的帮助反动军阀及买办阶级,甚至于要直接以兵力攻打革命政府,经过了几十年的痛苦经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再明白的宣言“今后的革命,目的要在推翻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发见于孙中山政府对外宣言的一句话,实是因为最近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利益,完全与帝国主义相反,他们的要求反映到革命运动上去,使隐藏在革命内的最终目的彻底显露出来。于是,全国民众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便充实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内容。

孙中山的晚年,正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初初开辟新的道路的时候,已经有真正能代表中国民族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彻底革命的阶级,此后足以领导大多数农民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平民——游民无产阶级,积极的实行革命,反对一切士绅阶级、买办阶级的反动势力,扼制资产阶级性的妥协政策,直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军阀阶级。孙中山的伟大,正因为他在这四十年来能随着社会内革命势力的增长而日益进于明显的不妥协的革命政纲。

不但如此,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对象,既是世界的帝

国主义,他能够并且应当在国际范围中找着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往往有共和、民主、人道、正义的口头禅,尤其是可以用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尽着欺罔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因此革命前各国往往有遵守所谓国际公法而保护中国的政治犯的。

当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曾有联日的政策,然而不久便证实帝国主义者即使在辛亥之前优容中国的革命党,也仅仅在于自利自私的见解,想趁革命爆发而未胜利的时候,更进一步的攫取中国权利,等这种局面造成之后,他们便转而力助军阀等的反动势力了。孙中山对于这一点,曾经在《陈英士 致黄克强 书》后附注着说:“……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中国在这最近十年之中方才明切的看见帝国主义之用心,方才明白觉到中国自己所处的国际地位,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上说,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是“众人的奴隶”。这些主人,——“以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的列强”,如何能做中国革命的同盟军!中国人既是“奴隶”,还得找奴隶的朋友。所以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当然是各国无产阶级,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尤其是已经革命胜利的苏联农工阶级。

因此,孙中山——中国革命运动的代表之最后的遗嘱,尚且郑重的声明中国革命运动有与苏联及一切弱小民族联合之必要。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半世纪以来,从模糊的“富国强兵”的口号,进化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会党的军事暴动,进化到劳工农民之联盟;从联日政策,进化到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这一条困苦的道路,正反映在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里啊!

注 释

孙中山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二次革命,见本书第42页注^②。

辛亥革命,见本书第8页注。

护法,即护法运动,又称护法战争。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为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联合当时反段的西南军阀,于八月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九月一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一九一八年五月,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七月取消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被迫赴上海。

欧洲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最先在一九一五年《同盟会宣言》中提出,一九二四年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

陈廉伯,广东南海县人,广州英国汇丰银行买办。一九一六年起充当“粤省商团军”总团长,一九二四年发动商团叛乱。叛乱被平息后逃往香港。

陈英士(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名其美,浙江吴兴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部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逃亡日本。一九一六年在上海被刺死。

黄克强(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名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任会长。同盟会成立后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参与领导多次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领导民军对清军作战。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二次革命时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亡日本。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与工人阶级^{*}

(一九二五年四月)

—

北京政变 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三四个月了。这一政变的内幕 ,显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排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结果。然而北京政变之前 ,国内民族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的镇压商团 ,反抗英国干涉等 ;劳动阶级的斗争 :广东农工运动的兴起 ,上海工人的罢工等 ,都不能不影响到政变后的政局上去。本来中国平民的仇敌 ,是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 ,他们之间的内哄 ,当然使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得着某种发展的机会。这种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倾向自然是要趁着军阀和列强内哄的机会 ,根本铲除军阀制度 ,消灭帝国主义的势力。然而政变后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急进 ,一方面固然使军阀恐惧而让步 ,别方面 ,这种让步 ,却也可以分裂平民的联合战线 :上层阶级 ,因此与军阀妥协 ,而下层阶级重新受着反动的压迫。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四期。

其实军阀的这种让步，完全是欺骗平民的缓兵之计，等到他们镇压住了工人运动，转过身来，连一切民族运动，甚至极普通的稍为进步些的运动，都用高压手段来镇压了。这样转变的将来的政局，应当在我们意料之中。这种反动势力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最勇猛的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应当格外努力自己的自由权，这不但是工人的阶级争斗的职任，这同时就是工人的保障民族革命胜利的职任。

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利益，同样是和中国的一切发展及进步相冲突的。段、张和曹、吴，可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政权，根本性质上是同样压迫一切平民运动的。日本和段、张对于中国平民，难道比英、美和曹、吴对于平民的“感情”好些？决不如此的。段政府现时的政策，所以比曹、吴不同些，不过因为他还没有曹、吴般的实力罢了。段政府对于商界、教育界难道比对于工人、农民格外关切些？他所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最不愿意中国工、商、教育事业能有独立发展的。段政府对于商界、教育界的让步，不过是想借此分裂国民运动，一方面满足些商界的极少部分的要求，别方面便可以下手镇压工人运动罢了。所以不但工人阶级应当独立的努力去争自由，反抗一切反动派压迫的尝试，而且各阶级共同的民族运动，也应当承认工人阶级是他们的主力军，尽力去赞助他，拥护他，方能防

止反动政局的再现,方能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的成功,中国的独立。

二

北京政变后的政局总趋势,大概是如此。我们还可以从最近国民会议运动,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及北京政府的政策三方面来说明。

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便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根本重造民国;一切军阀都应当以政权还之于人民,所以国民会议的组织法等,便应当由人民团体代表组织预备会来制定。这种要求实在是代表全国一切民众的。国民会议产生的革命政府,立刻便要要求列强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取消协定关税,实行极广泛的民权,劳动阶级得有多量的自由去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要镇压一切军阀的反革命行动。这种呼声,这种政纲,当然促起大多数的民众的运动,连各地半官式的商会都声言要求参加国民会议了,甚至于有几处地方,他们直接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

本来曹、吴既倒,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军阀政府已经崩坏,重新建设共和的唯一办法,只有人民组织国民会议。因此,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便普遍了全国,普遍了各阶级。差不多全国人民同声反抗段祺瑞的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是,而赞成国民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

的主张,以及废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这种高潮里,显然看得出民族运动的兴起:各地学生、小商人、工人、农民、妇女都加入这一运动。尤其是各地劳动民众的参加最剧烈:广东几十万农民和工人的通电,汉冶萍工会的主张,以至于其他各地劳动人民的奋起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最广泛的参加政治的运动。同时,北部铁路工人,从一九二三年二七之后到如今,一直处于军阀高压之下,现在也公开的恢复工会,在郑州开全国大会。

工人阶级在政变之后,日益发展他的政治势力,组织团结他的力量,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再加那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倾向于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实在足以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慄慄危惧。

政府方面呢?政变之初,冯玉祥和张作霖的暗斗,双方的冲突是很显然的。张作霖背后的日本势力,当然不能容那接近国民党的国民军势力发展。然而双方的力量,暂时都不利于立即冲突,因此便拥出一个段祺瑞的缓冲,其实段氏和张作霖同属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所以段、张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许多暗斗,而对于国民党和国民军的排挤是一致的。

于是直系军阀^⑩失势以后,政局便成一极复杂的形势。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段祺瑞;别方面是国民党,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中的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妇女等平民团体,其中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组织,海员

工会、铁路总工会等最有实力。介乎这双方互斗的势力，大致可以说是军阀与平民之间的，还有些动摇不定的份子如国民军，各省半官式的所谓人民团体、省议会，一部分的商会、教育会、农会等。这种份子，可以称之为“中间势力”。

当直系军阀初倒的时候，新起的军阀和渐得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全国国民会议呼声很高的当口，当然不敢遽行高压手段。何况那时的中间势力：国民军呢，因为要对抗段、张，实力又不足，自然表示倾向于国民党；大商阶级和所谓名流呢，因为要趁此时机逼迫新兴军阀对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有争开国民会议并表示。段、张这时期的策略，便是敦请国民党首领入京，“共商国是”；段氏并有“待中山北上，始定入京就职与否”的表示。然而段氏看见那些“中间势力”的态度——拥护中山主张的态度，并不坚决，所以不久便不等中山北上，先行入京组织所谓临时执政政府；并且发表善后会议主张，与国民党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抵抗。同时，这就是试一试国民军及所谓“中间势力”的态度。虽然当时全国工人、农民的团体，广东的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以及各地先后继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早就否认军阀官僚专决国是的阴谋——段氏式的善后会议；然而当初倾向于国民党的国民军，对于善后会议以及其他政治问题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于是段政府知道平民的实力有限，一方面预备帮助陈炯明^①在广东方面进攻，方本仁^②

在江西方面镇压 ,别方面决然公布善后会议条例。

善后会议的组织纯然是军阀官僚的成份 ,可是还不敢不请孙中山先生出席。这时候国民军方面已经有软化的形势 ;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员之被邀请者 ,还没有决定参加 ,而国民军代表的参加已经显然有了暗示。这是段氏政策的第一步成功——使“中间势力”的实力派在政治上中立。等到国民党进而要求善后会议里参加人民团体代表 ,工会当然在内 ,实际上是要变段氏式的军民长官会议为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 ;段祺瑞又亟亟聘请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的议长、会长为善后会议之审查委员 ,以为抵制 ,这是段氏政策的第二步——想使“人民”中的上层阶级 ,因此而软化 ,辟开工会及农民团体 ,甘心去做段氏政府会议的谄议。换句话说 ,他想完全吸收所谓“中间势力”。这一步政策能否成功 ,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全国商会、教育会等团体是否因会长个人受聘请而退出平民的联合战线 ,现时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其实 ,北京政府不但不准工人加入会议 ,并且商会的会长也只有审查员的资格 ,并没有参与议决的权。至于真正的平民方面 ,仍旧积极的要求参加善后会议 ,即改善后会议为国民会议预备会 ,代表这种要求的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 ,并且要召集全国联合大会于北京。段氏对于这种民众运动的政策 ,一方面公布什么工厂条例 ,京汉路上加年终的红薪等以市小惠 ,别方面 ,始终否认工会有参加讨论国是的权 ,置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不顾 ;已经显然是蔑

视民众的专制政治。

总之,北京政府从政变到如今,一步一步的想灭杀民众方面的势力:先将国民军勾住,进一步又勾结大商人,再则假意声言实行工厂条例,想以空言缓和工人参与政治的运动。如今大商阶级是否完全受这日本帝国主义的北京政府之指使,虽未可知;然而北京政府新近通令严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反动的政局已经开始了。对工人的政党压迫,必定继之而压迫一切工人群众,收回一切市惠政策;平民方面若不能团结一致反抗这种一步一步紧来的专制政治,那么,等到劳工群众的势力镇压下去之后,连商会、教育会的要求也都可以置之不问,可以消消停停去借所谓善后借款。所谓善后会议,真要完全变成军阀朋分政权的会议了。

三

中国工人阶级处于这种政局之下,应当:(一)负起督促全国各阶级努力奋斗的责任,一致力争人民代表速开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至少也要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那善后会议,使民族运动领袖的国民党及孙中山也能参加,联合平民势力,争回解决国是的主权;(二)努力在全国争职工运动的公开,建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团体,以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后盾;(三)全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参加一切政治运动;(四)在

经济斗争里，全国工人阶级团结极巩固的统一战线，造成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五)暴露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政党附和段氏而不力争农工平民参加国是会议的罪恶——这是造成反动政局的助力，是违反中国民族利益的举动，是妨碍民族解放运动的行为。

中国工人阶级应当知道，只有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里的最彻底的最勇猛的主力军，只有民族革命运动日益急进的过程里，工人阶级争得到日益扩大的自由权，以利于自己的继续斗争，只有勇猛不辍的阶级斗争，能督促民族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守卫民族革命运动，防止军阀阶级、士大夫阶级及大资产阶级的破坏式怠工，尤其是在现时的政局之中。

反动的政局已经有重新开始的朕兆！

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守卫民族革命运动！

注 释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这次政变称为“北京政变”。

商团即广州商团，是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大买办陈廉伯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一九二四年，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商团军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孙中山调集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军及其他军队，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

段、张和曹、吴，指段祺瑞、张作霖和曹锟、吴佩孚。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支持并重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

的主张,并提出在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

段祺瑞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后,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抵制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军阀代表及政客百余人参加的“善后会议”。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善后会议于同年四月瓦解。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所部改为国民军。一九二六年九月在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张作霖,见本书第41页注①。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将所部军队改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段祺瑞,见本书第43页注③。

⑩ 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在一九二二年直皖战争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相继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一九二六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吴佩孚和孙传芳部,被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打垮,次年被消灭。

⑪ 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海丰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一九二二年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被任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妄图谋杀孙中山。次年一月,被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击败,退踞东江一带。一九二五年所部被革命军彻底打垮。

⑫ 方本仁,江西地方军阀,当时任江西军务督办。

《热血日报》发刊辞^{*}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 《热血日报》是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在上海创办的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这个发刊辞是他写的。

注 释

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指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为镇压罢工枪杀工人顾正红。三十日，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上海学生、工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举行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开枪施行血腥屠杀，死伤学生、工人、市民数十人，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五卅外人屠杀之后,全上海人起来奋斗。学生不顾性命的出外演讲,各马路商界联合会首先决定罢市,各厂工人也群起罢工,表示反抗。这次事的起因,原在于日本厂主及租界当局抵死不承认工会,将二月间与内外棉等工会所订条件,完全推翻。因此,工人和内外棉纱厂日本职员屡次理论,结果日人和西捕枪杀顾正红,以致于学生群众不得不以演讲游行唤醒上海市民,要大家注意外人怎样摧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怎样屠杀中国人。于是,触犯了“上海主人”的东西洋强盗,开枪轰击徒手的中国人,英、美、日、意的海军陆战队及万国商团上陆“打猎”。在这个时机,商会经过群众的哀请跪求,方才答应罢市。罢市之后,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总商会始终没有什么表示。一方面,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会及上海总工会,努力的进行,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商议定了应当提出的最小限度的要求

^{*} 本文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热血日报》社论,曾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

条件；别方面，总商会却拒绝加入这一联合会，对于提出的要求绝对没有正式表示。这一期内上海总商会究竟是什么主意？真使人不解！

虞洽卿^⑬和蔡、曾^⑭两特派员陆续到了上海之后，仿佛听见商会里起了一番“革命”，董事会的信用失了，因为他曾经主张站在调人地位，太辱没了“爱国的”商会。于是有五卅委员会的组织。这样一来，似乎总商会对于这次反抗运动想积极参加起来，能够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和市民一致进行。事实上却又不然。总商会的五卅委员会并不加入工商学的联合会，却要独立进行，好象负着一种特别使命似的。总商会在这第二期的态度，也真令人莫名其妙。

究竟总商会要的什么？

总商会代表上海殷实的大商人，是上海市民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因为他们的钱多势大，所以向来被称为社会上的领袖团体，既然如此，上海这次屠杀惨案发生之后，他便应当起来积极领导，提出真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要求。如今事前既不参加实际运动，事后组织了五卅委员会，仍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究竟内中隐藏着什么目的？现时我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时候，应当拿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做根据，大家团结成一集中的团体，分配各方面的财力、人才去进行。可是，总商会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的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难道是因为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太低？那么，他应当赶紧提出自己

的建议。诚然不错，本报也屡次指明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已经是非常低。外国人攫取了上海的统治权，剥夺中国人民的种种自由，又要固守着他们已经得到的“在华特殊权利”，以至于引起这一次的大屠杀。我们应当彻底反抗，我们应当要求：

-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 二、废除租界制度、协定关税等；
- 三、收回海关及税务的管理权；
- 四、收回一切军港、商港；
- 五、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六、禁止外国人在华设立工厂。

必定要这样，中国才是独立国家，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处于现代列强资本竞争之中，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对于外国人的严格限制，决然没有希望。外人在华开设工厂和经营商业，享着现时这样优越的权利，中国人自己的实业是永世不能发达的。所以真正为中国的大商业家、大实业家设想，他们必然要提出上列的六个要求，那是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⑮里所没有的。总商会的 not 加入工商学联合会，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事实上却刚刚相反！

据《时事新报》^⑯及《新闻报》^⑰的登载，商会前天开会，正为着减低条件而有很长久的争执。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虽然出席，据确实消息，对于他们的修改是不曾表示同意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总商会沉默了

这些时候,为什么他不肯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原来这是为着:等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决定了,等二三十万的市民大会里一致通过这些要求了,他自己再出来垄断这一交涉。他特为不先表示态度,要等现在再来当“调人”,即便不是完全的调人,至少也是半个调人。他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不代表中国工商学的利益去提出要求,却来减低最低限度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难怪五卅委员会刚刚组织好,《大陆报》^⑬上马上有一篇社论大赞他们稳重老成守旧,说他们既然起来,急进派便不会得势了;“中国国际地位(半殖民地)不至于有所变更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不至于受打击了。”《大陆报》这样手舞足蹈的高兴,实在告诉我们:总商会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

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之中,所能增进中国国际地位的,本来有限得很。仅仅要求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使中国形式上象个独立国,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总商会却偏偏把这两条删去。其实即使十三条完全达到目的,海关、税务、开办工厂等的特权也还保存着在外人手里,何必总商会替外国人这样着急呢?若说外人决不能答应,可以不必提出;那么,何以不先提出去,再使外国人答复“一定要驻扎海陆军”的理由呢?总商会却先做好人,不等外国人拒绝,自己先拒绝上海市民的要求。

再则,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有一条是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这是这次风潮的根

本原因。本来工人为争结社自由权而牺牲，学生为赞助工会而牺牲，总商会却偏偏删去这一条。并且添上洋务职员薪水须照发不扣的一条时，故意不说及工厂的罢工工人。这样说来，工人究竟何所为而从事于爱国运动呢？这次运动，本是为中国平民的利益而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的运动；结果，中国平民的利益完全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势之下，假使交涉员单根据商会的条件提出，而外人方面答应了，我们中国方面却不能使工人上工——没有理由叫他们上工，那时怎么办呢？难道学外人一样用高压手段？总之，这样的结果，一定使工商学各界之中出现裂痕。总商会应当负这个责任！工会代表工人及工人的同盟罢工，在外国是很平常的事；可是英、日资本家在中国却不许工人有这权利。总商会删去这一条或者是为外国人打算，使外国人不受工人的反抗，多赚钱而能垄断中国市场罢？

上海总商会这样故意和工商学联合会标新立异，独立提出自己的条件，显然告诉我们：总商会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

中国同胞注意！上海总商会的意旨竟是如此！如果让他领导这次交涉，一让再让的结果，中国必定完全失败！中国的民众，赶紧起来要求撤回提出去的条件，改正商会的妥协主张！

注 释

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发动罢市,并参加工商学联合会。

内外棉纱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纱厂,共有十九个厂,其中有十一个厂在上海。除内外棉纱厂外,上海还另有十六个日商纱厂。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并拘捕工人代表,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等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三月一日,工人在厂方被迫同意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四项条件后复工。不久,厂方推翻这些条件,五月间日商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

顾正红(一九〇五——一九二五),上海人,共产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

万国商团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组织的武装,近二千人。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与镇压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上海总商会,一九一二年一月成立,会员以民族工商业者占多数,但领导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五卅运动时,总商会在工人、学生的压力下勉强同意罢市。

上海学生会,即上海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成立;全国学生总会,即全国学生联合会,同年六月十六日于上海成立。五卅运动时,这两个团体在共产党人指导下积极参加反帝斗争。

上海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共产党人李立三任委员长。六月一日,发动和领导了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

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

⑩ 虞洽卿(一八六七——一九四五),浙江镇海人。大买办资本家。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⑪ 蔡,即蔡廷干;曾,即曾宗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派往上海的外交特派员。

⑫ 十三条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与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除了十三项正式条件之外,还有四项先决条件,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爱国群众;惩凶;赔款;道歉;中国人民在租界有言论、集

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并不得虐待和开除工人；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三提案；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外国在上海的军队。

⑬ 《时事新报》，研究系机关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张东荪曾任主编。

⑭ 《新闻报》，美国人福开森在上海办的中文日报。

⑮ 《大陆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它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系密切，五卅运动时是帝国主义的喉舌。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

—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 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 P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

* 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连续发表文章，反对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瞿秋白写这篇文章，对戴季陶的反动观点进行分析批判，曾收入同年九月《向导》周报社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书。

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

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膨胀，实行的

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

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己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

“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⑩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不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遍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

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①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

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部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己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

(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内现在思想不统一，要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 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他不至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⑫，北京的杨德甫^⑬，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

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内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 P 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 P 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地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 P 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内主张阶级利益，就

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 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 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 P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 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 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

第一，他说C P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

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

第二,他说C P 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 P 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份,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是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 P 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

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

第三,他说C P 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 . P 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 P 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①,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的,C . P . 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 P 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 P 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 P 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

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

有实现他们C.P.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P.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P.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戴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戴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C.P.“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P.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P.同志在国民党内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P.的。至于说C.P.及C.Y.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P.和C.Y.;没有阶级觉

悟的人，C . P . 及 C . Y . 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 C . P . ?

第二，他说 C P 在国民党内主张上选举上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 C . P . 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戴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

第三，他说 C P 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戴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

第四，他说，C P 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

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谣。总之,戴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戴季陶说,C.P.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戴季陶已经当C.P.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①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P.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

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⑩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⑪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可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P.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P.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P.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戴季陶挑拨离间C.P.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⑫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戴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

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戴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 P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 P同志几人与廖仲恺^{①9}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戴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戴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戴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C .P .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戴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②0}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戴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 P。)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量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戴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戴季陶却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谈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戴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

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注 释

C P.,英文 the Communist Party 的缩写。当时常用 C P 作为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员的代称。C P 的跨党,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戴季陶鼓吹“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提议确立孙中山“遗教”为国民党之“最高原则”,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企图以此限制和排斥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一九二五年复,沈定一在其浙江萧山衙前家中召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执行委员外,还有宁波、绍兴等市、县代表,特别邀请戴季陶到会指导。会上,就是否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进行讨论,以沈定一、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以宣中华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结果,沈、戴的反共企图未能完全得逞。

戴、沈,指戴季陶和沈定一。沈定一(一八九二——一九二八),号玄庐,浙江萧山人。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脱党,伙同戴季陶等反对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尧、舜、禹是传说中远古部落的首领;汤即商汤,商朝的建立者;周指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成王时摄政;孔即孔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戴季陶写了《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把孙中山学说的基础归结为民生哲学,认为孙中山学说渊源于从尧、舜直至孔子的道统,而其中心则是所谓“仁爱”。

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又名穆湘玥,上海人,工业资本家。曾在上海、郑州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劝工银行。

《商报》,一九二一年一月创办于上海,汤节之等主办。是一家以广

东公所、宁波同乡会商人为经济支柱的资产阶级保守报纸。

⑩ 李征五，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上海光复活动，当时任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高等顾问。

⑪ 德谟克拉西，英文 Democracy 的音译，意为民主。

⑫ 马超俊（一八八六——一九七七），广东台山人。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头子。当时任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

⑬ 杨德甫是京汉铁路的工贼。

⑭ 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一九〇五年成立，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它为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

⑮ 杨希闵，原为滇军将领，曾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六月，和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策动下，乘国民革命军东征之际，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

⑯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书第 139 页注。

⑰ 土耳其国民党，即一九二三年基马尔建立的土耳其人民共和党，曾领导建立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党当政后，禁止工农组织，反对土地革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⑱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一九二〇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⑲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八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②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等职,是国民党右派首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立。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 五卅运动之前途^{*}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

九七纪念，亡国的辛丑条约签字的纪念，使全中国的平民不能不想庚子义和团之役，与八国联军侵略我们中国的痛史。同时，我们现在正在五卅以后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里，更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为什么会发生五卅屠杀，怎样方能推翻辛丑条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何以五卅运动比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

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八期。

大的赔款。

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诚然不错，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都是一种迷信；这种拳术和符咒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抗枪炮。诚然不错，义和团联络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然而何以会有这种义和团运动呢？难道不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么？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时期种种平英团（广东）等类的组织，历次的所谓教案，无不是这种反抗运动的表现。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帝国主义者自己逼迫出这种反抗运动之后，再来“惩罚”中国，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即使真要讲什么“公理”，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前杀中国人、夺中国地方种种罪恶，决非义和团那些小小的“排外”行动所抵得过的。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

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

可是,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解放运动,何以带着那种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呢?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是很多的。他们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戴季陶先生所说国民文化大概和这个不同罢);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他们盲目的“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有极巩固的“互信”,不许有一个怀疑中国符咒的无用和外国科学的有用,不然便算做“二毛子”,立刻驱逐出团体,甚至于处以死刑;他们都盲目的服从所谓“大师父”、“二师父”,只有大师父、二师父能独创,绝对不许普通的徒弟独创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对外的阶级斗争,别方面便应当同时是对内的阶级斗争——反抗满清贵族的平民阶级的斗争。可是,因为义和团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他们只知道一切中国人都要团结来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外国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国的国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们的权利便可以有保障，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当时的一切平民应当同时反抗满清，自己握得政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者的进攻。于是他们真以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平民。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们事实上争自己经济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他们知道反对所谓“二毛子”，他们却不知道，国内真正反对他们的人，是代表大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的地方政府（如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江南总督刘坤一等）。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应当以利于其他阶级的国际的经济要求，去联合一般的商人和比较进步的反抗侵略的份子。可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这或者可以得着“纯正的三民主义者”的赏识，果真是“利他的”、“为国牺牲

的”勇士罢！

这也无怪其然的呵！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那时能有反抗精神的，还只有这种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这种阶级要他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地位，当然是不能胜任；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拚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了！

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便能用很简单的方法，一举而扑灭这种运动。那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远东的侵略，还没有到相互之间剧烈冲突的时候，他们还要合力的先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征服中国。义和团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废；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长扎帝国主义的驻防军；北京使馆界变了外国领土，东交民巷变成中国太上政府的堡垒；规定极大的赔款，以关税、盐税作抵，从此连常关也归外国人主持的税务司管辖，中国的财政几乎完全受外国监督。……这样一来，中国便实际上等于完完全全亡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

可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还不止此。庚子、辛丑之后，帝国主义者丝毫不用费力，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一般

“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法”，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驯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此，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消沉了不少。

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复，而打破这种媚外的、鄙视“下等社会无知愚民”反对压迫的心理，一直经过五四运动到五卅的屠杀之后方才实现。这亦不是偶然的。

中国在这二十六年中，经济上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分已经吸收进了工厂及种种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尤其在欧战之后，得到了一种相当的发展，从前的买办阶级渐渐的脱胎而变成了工业的资产阶级。中国国内日趋于死灭的封建军阀，也已经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

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可是这种运动中最重要原动力，现在却是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差不多完全跟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最早，从一九二一年起，京汉罢工、唐山罢工、安源、水口山矿工罢工、海员罢工、上海浦东烟厂罢工^⑩之后，国内国民革命的运动便有长足的进步。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地有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出现；一九二三年更提出具体的国民革命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再进而主张具体的集中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和发展。此后，上海丝厂及南洋烟厂罢工^⑪（一九二四年），南方农民运动的开始，……一般的劳动民众觉悟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实行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们一天一天多量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反抗直系军阀^⑫；北京政变^⑬之后，更努力的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⑭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之中，各地的工人团体无不是最积极的站在民族斗争的地位。一般民众之间，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而格外普遍的传播起来；而国民党也因此而渐渐深入民众，得着民众的赞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阶级继续这种斗争，于是而有日本纱厂的罢工。帝国主义知道这种新势力和义和团不同，确是非常可怕的，赶紧想以高压的屠杀政策扑灭他。可是纱厂工人顾正红的被杀死，已经激起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愤怒；而五卅的南京路屠杀，遂使逐渐积

聚着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发,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普遍全国各地,并且深入穷乡僻壤。

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他们的要求是很具体的: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租界制度、领事裁判权^⑬、驻防中国的外国海陆军,要求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自由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却不是反对一切“西洋文化”,保存中国的所谓国民文化(仁义道德、五行符咒等)。第二、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他们绝不敢“心目中只有‘国家’、‘民族’的利益”,冒充什么利他的义举;他们绝不肯为保存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内部一致”,而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跟着他们妥协。只看上海罢工工人反对总商会的妥协条件,宣言要求中外资本家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便可以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

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如果抛弃他们自己,抛弃中国大多数劳动民众切身利益,还有什么“民族”利益或需要!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的一般口号: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海陆军以及最近关税自主的要求,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他们竭力的拥护这种利于中国民族的一般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一致,他们不要勉强“中心思想”,而只是建立真正的中心思想于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这种国民革命运动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有力的打击,列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的民族,必至真诚的同情于中国的运动,而且能予以有力的援助。所以他们决不盲目的反对一切外国人,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努力的做国际宣传,联络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瞭: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

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

二十六年后的中国民族力量和二十六年前的民族力量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现时在远东的利益,已经冲突得非常厉害。列强虽然利用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驻华海陆军、租界巡捕权、不受中国限制的外国工厂,能对于中国施行屠杀和剥削。然而中国民族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起来反抗,一开始便给他们一个总打击,提出种种具体的要求。列强之间享受这些特权——关税管理、租界制度等等,并不是相同的;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货物的销场、投资的多寡,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民族反帝国主义既然剧烈,他们中间特权享得少的(如美、法等)便想取巧,声言应当对华让步。于是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绝不可能。再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因有无产阶级的指导与各国无产阶级相联合;同时,俄国革命后,世界的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列强自己国内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比二十六年大得百倍。他们更不能轻易以兵力征服中国,因为他们国内的革命,可以因此而爆发的。况且五卅运动之中,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组织——工会等的力量,也非义和团可比。义和团的暴动的农民,绝无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五卅运动中则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

线,差不多团结工、商、学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所以假使义和团暴动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得以武力进攻而攫取在华的特权,置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那么,五卅运动的结果,至少使帝国主义的列强要表面上表示让步,要提起早已忘了的华盛顿会议的决议^⑩,要召集所谓关税会议^⑪,甚至于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的问题。

不但如此,义和团时候,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帮着帝国主义骂“拳匪”,灭杀民众的反抗精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他们能得到所谓维新派的尊称。五卅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众之间极普遍的发展。现时利用帝国主义者谣言骂五卅运动是“赤化”是“暴徒”的破坏压迫工人、学生团体的所谓“中国人”,亦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五卅运动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我们现在可以常常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这种妥协派的力量,始终要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来压迫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种国家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

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军阀,小之如工贼及暗杀的凶徒,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之大。张作霖派^①的军阀,在奉天、天津、青岛、上海,帮着帝国主义者残杀压迫工人、学生及商人;上海一股工贼打毁总工会^②,伤害工会职员;河南资本家穆藕初^③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南京的买办和军阀屠杀工人;广州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④先生。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发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厂主方面极少极小的让步,规模这样伟大的五卅运动所以只能争到帝国主义者答应开所谓关税会议,完全因为国内种种国贼、军阀、工贼的势力帮着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民众;完全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妥协派、狭隘的民族主义派,帮着军阀、工贼遏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没有统一的真正拥护人民权利的军队。因此,要五卅运动能够再往前发展,必须继续扩大民众的力量。固然,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他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比起义和团来,始终已经有些效果:日本单独来要求解决,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所谓中国政府的工会条例,承认处理屠杀顾正红等的凶手,至少口头允许加工资……。美国亟于赞成关税会议。英国的强硬也不过以为延宕沪、汉等案手段,不敢猛然反攻。然而照现在这样,便能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使中国得着完全的解放吗?那还差得远哩!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所以五卅运动的前途和发展，必须根据下列的方针去进行：

一、力争工会组织的自由，一般民众应赞助工人的组织和斗争；

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工贼，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

三、民众起来要求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

四、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组织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五、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只有这样，五卅运动才能继续发展，实行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注 释

义和团之役失败，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日、德、奥、意、西、荷、比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便将九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庚子义和团之役，参见本书第40页注。

庚子赔款，见本书第40页注。

平英团，见本书第40页注。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在各地兴建教堂，强占民地，欺压群众，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酿成许多事件，这类与教会有关的事件都称作教案。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

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参见本书第199页注。

袁世凯，见本书第42页注^⑦。

刘坤一（一八三——一九二），湖南新宁人。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一八七九年后长期任两江总督，义和团运动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与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运动。

税务司是旧中国各口岸主管海关税务行政的官员。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强迫上海道尹订立海关章程，由三国各派一人组织税务管理委员会。一八五九年，英国为了独揽中国海关大权，强迫清政府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统管全国海关。此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操纵了中国海关管理权。

^⑩ 京汉路罢工、唐山罢工、海员罢工，参见本书第91页注^⑧。安源罢工，见本书第143页注^⑨。

水口山矿工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之前，这年十一月，共产党人蒋先云等领导矿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并向矿务局提出承认俱乐部，保证工人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和增加工资等要求，遭到拒绝。十二月五日，俱乐部领导三千多工人举行大罢工，矿务局被迫接受要求。

上海浦东烟厂罢工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参加罢工的有英美烟厂的九千多工人，他们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等要求，遭到军警镇压。

^⑪ 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海各丝厂资本家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共同决定降低工人工资，取消全部赏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工人起而反抗，云成、裕经、统益等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做了某些让步。

南洋烟厂罢工发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罢工工人要求开除工贼，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取消工厂新订的一切苛章等八条要求。资本家一面勾结租界巡捕房实行暴力镇压，一面指使工贼破坏工会组织，雇用流氓打手强拉工人进厂。罢工未能取得胜利。^⑫ 直系军阀，见本书第170页注^⑩。

^⑬ 北京政变，见本书第169页注。

^⑭ 国民会议运动，见本书第169页注。

⑮ 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

⑯ 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参见本书第41页注⑬。

⑰ 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

⑱ 张作霖,见本书第41页注⑬。

⑲ 总工会,即上海总工会。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些流氓、工贼捣毁上海总工会,随后奉系军阀又将它封闭。

⑳ 穆藕初,见本书第199页注①。

㉑ 廖仲恺,见本书第200页注①。

五卅运动中 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九期。

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他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厉害的，他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他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他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

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譬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等等。

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

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他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

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他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他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战斗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

除去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他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我们就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

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⑩……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⑪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⑫电气处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⑬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

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明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现在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他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他的经济

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

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他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等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道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放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

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 and 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

上海邮差罢工,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华书局罢工,石印工人罢工,河南豫丰纱厂罢工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注 释

顾正红,见本书第 178 页注。

南京路发生屠杀,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南京路游行的爱国工人、学生的屠杀,即“五卅惨案”。

汉口的屠杀,即汉口惨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汉口两千余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船员无故殴打中国工人,遭英租界军警开枪射击,工人死八人,伤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的地方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伤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

李景林(一八八五——一九三二),河北枣强人,北洋军阀奉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驻天津,一九二五年被段祺瑞执政府任为直隶军务督办,残酷镇压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惨案后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织的联合战线性质的团体,是五卅运动中公开的领导机关。

领事裁判权,见本书第 216 页注^⑬。

会审公堂,见本书第 109 页注。

关税会议,见本书第 216 页注^⑰。

①①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因此,中国人民把五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称五七国耻。

①② 戴季陶,见本书第 199 页注 和第 214 页注。

①③ 上海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

①④ 穆藕初,见本书第 199 页注。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爆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然而概括而论,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一面便因棉纱

^{*} 这是《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的第二节,原文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慑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日本资本家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则日本人指使张宗昌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

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之印刷附律、码头捐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

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安东、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

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

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

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

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泸州、青岛、福州、天津、安东……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容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⑩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⑪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是从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有意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运动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

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战斗,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们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

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

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⑫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⑬,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⑭,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⑮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⑯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使军阀统治根本动摇。

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

抹杀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①、丁文江^②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③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戴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以强迫恐吓欺诈种种的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④、法权会议^⑤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

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久又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小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在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逐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②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集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出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

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横被反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这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

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膨胀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

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

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处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

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之第二次起来：如八月十一的罢工，八月中唐山罢工的爆发，南京八月初工人的流血，北京英使馆八月初六的罢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之际，上海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奋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或士绅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②③}（三月二十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②④}（九

月十六),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²⁵(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²⁶(六月二十七),叙利亚革命²⁷(八月六日),波斯政变²⁸,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却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

帝国主义者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产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²⁹、唐继尧³⁰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星期,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³¹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³²妥协(六月十七日)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爆发于广州(六月二十一日罢工,二十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

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日),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于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的总罢工,予香港以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元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③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④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⑤叛谋发觉……随后,段、张^⑥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

本殷^{③⑦}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江北)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努力消灭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将成为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③⑧}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的确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也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

注 释

一九二四年七月，英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颁布侮辱中国人民的“新警律”，规定中国工人出入租界均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可自由出入。七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被迫取消“新警律”。

直系军阀，见本书第 170 页注⑩。

北京政变，见本书第 169 页注。

国民军，见本书第 170 页注。

张宗昌，见本书第 225 页注。

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等四提案。这些提案有损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激起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

国民会议运动，见本书第 169 页注。

张继、谢持、邹鲁，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们参与组织“西山会议”，联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

⑩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见本书第 178 页注。

⑪ 马路商界联合会，见本书第 178 页注。

⑫ 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于是，英、美、日、法、意、比等六国公使团组织所谓“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同赴上海调查五卅真相，只活动了几天，便偃旗息鼓。在五卅运动遭到军阀镇压时，他们又提出所谓“沪案重查”，炮制了一份开枪有理的调查报告。瞿秋白曾写专文进行批判。

⑬ 蔡继贤案，指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美国水兵开枪打死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的事件。事发后，美国领事怕引起反美风潮，即致函北京政府上海交涉员，希望单独解决，勿与五卅惨案连在一起。

⑭ 指当时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支持的段祺瑞北京临时执政府。

⑮ 张作霖，见本书第 41 页注⑩。

⑯ 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国民党西北军“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

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

①⑦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明争暗斗。旧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积极支持段祺瑞,当时被称为研究系,以后研究系分子即在各派军阀之间进行活动。梁启超虽然表示脱离政界,在大学教书,但仍经常发表政见。

①⑧ 丁文江,见本书第 128 页注。

①⑨ 戴季陶,见本书第 199 页注 和第 214 页注。

②⑩ 关税会议,见本书第 216 页注①⑦。

②⑪ 法权会议,指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北洋政府外,还有英、美、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国代表,在当时全国反帝高潮压力下,各国表面上赞成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不作具体规定。

②⑫ 沪案重查,又称五卅重查。参见本文注①⑦。

②⑬ 一九二五年三月,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华夫脱党再次在议会选举获胜,其领袖柴鲁尔出任众议院议长。埃及自一九二三年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后,仍保留英国的种种特权。华夫脱党坚持要求英军撤离埃及,抵制亲英政府的所有措施,因此由该党领导的议会被政府宣布解散。

②⑭ 印度纱厂罢工,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印度孟买纺织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总罢工,有十五万二千工人参加,罢工坚持了将近三个月。

②⑮ 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

②⑯ 摩洛哥战争,指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年摩洛哥里夫部族军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战争。

②⑰ 叙利亚革命,指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叙利亚人民在苏勒坦帕夏领导下举行的反法大起义。

②⑱ 波斯即伊朗。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波斯议会宣布废黜两年前出亡欧洲的国王,拥立反对英国势力的礼萨·汗为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这就是波斯政变。

②⑲ 杨、刘,指在广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他们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发动叛乱。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革命军很快把杨

刘两部歼灭。

③⑩ 唐继尧(一八八二——一九二七),云南会泽人,云南军阀。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唐派代表与驻在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以及英港当局代表密议,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六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被平定,已进占南宁、柳州的唐继尧部亦退回云南。

③⑪ 许崇智(一八八六——一九六五),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粤军总司令。

③⑫ 陈、林,指陈炯明及其所部重要将领林虎。一九二四年冬,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林虎为右翼主力。一九二五年三月,被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击败。十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部全部被歼灭。

③⑬ 廖仲凯,见本书第200页注①⑨。

③⑭ 莫雄、郑润琦,当时均为粤军许崇智部师长。

③⑮ 熊克武(一八八一——一九七),四川井研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起兵讨袁。一九二三年任四川讨贼(曹、吴)军总司令,次年五月兵败后入广东。以谋叛罪被蒋介石囚禁于虎门。释放后,参与反蒋军事活动。

③⑯ 段、张,即段祺瑞、张作霖。

③⑰ 邓本殷,陈炯明部将领,当时盘踞在广东南部。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邓本殷配合进攻。广东国民革命军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对邓本殷的南征。

③⑱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学生、农民等十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造成继“五卅”之后的另一次大惨案,称为“沙基惨案”。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

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这里收录的是其中的第一、二节。文内小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

营、自己应用 ;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期,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期。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落后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

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孙文学说》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

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谈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国家主义派。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①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②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

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⑫、《莽原》杂志^⑬,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⑭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⑮、朱季恂^⑯、甘乃光^⑰、陈公博^⑱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⑲、蒋介石^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烈的,

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二、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 领袖革命之问题

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

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①、孙镜亚^②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③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④,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

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

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

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②⑤}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②⑥},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注 释

指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当时广大群众进行了彻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五四运动,参见本书第8页注。

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都曾发生过工人大罢工,劳动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问题。

《新青年》,见本书第7页注。

《建设》杂志,国民党的机关刊物。由孙中山直接领导,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参加编辑和撰稿,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一九二一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卷十二号。

《星期评论》,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休刊,共出五十三期。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内容之一,又称《心理建设》,写于一九一八年。主要阐述了孙中山的知、行观等的哲学思想。

戴季陶,见本书第199页注。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勾结洋人,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因此被称为“中兴名将”。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派曾、左、李,指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也是力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统治的国家主义派的头目。

⑩ 华盛顿会议,见本书第41页注⑩。

⑪ 领事裁判权,见本书第216页注⑪。

⑫ 《猛进》杂志,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⑬ 《莽原》杂志,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⑭ 《洪水》杂志,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第三十六期停刊。

⑮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⑯ 朱季恂,江苏松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病逝。

⑰ 甘乃光(一八九七——一九五六),广西岑溪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⑱ 陈公博(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五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一九二七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人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

①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叛国，一九四一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

② 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名中正。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起事。一九二三年到苏俄考察。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一九四八年任伪总统。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率部退至台湾省。

③ 邹鲁，参见本书第242页注。

④ 孙镜亚(一八八七——一九五四)，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右派分子。

⑤ 《醒狮》，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创办于上海。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这伙人也被称为醒狮派。

⑥ 《独立青年》杂志，一九二六年一月创刊。它的前身是陶希圣、萨孟武等人主办的《孤军》杂志。它与《醒狮》周报互相配合，共同鼓吹国家主义。灵光是国家主义分子，经常在《醒狮》周报、《孤军》上发表文章。一九二五年五月，灵光在《孤军》上发表《评共产主义者的谬误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因而受到瞿秋白等的批判。

⑦ 冯自由(一八八二——一九五八)，广东南海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有

名的国民党右派。

②③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决议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分别给予纪律制裁。但会议对右派也作了妥协让步。

中国职工运动战士 大追悼周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

白骨枯了,碧血殷了,寡妇孤儿的啼哭遍及全中国了!“二七”屠杀中死的人眼睛还没有闭哩!劳工的汗水还在一天到晚的榨取,平民脂膏还在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锅炉里煎熬……,然而我们活着的人,热血早已沸腾,筋骨都在爆烈,我们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我们不得不拚死一战,努力奋斗,铲除一切压迫剥削的制度。残暴的野兽——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卖国军阀,他们的嘴固然十分的馋,他们的胃口固然十分的好,只想吃我们的血,剥我们的皮。然而,我们是人类的大多数,我们有几千百万万万,杀不尽的!我们的血要浸死他们。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我们工人固然十分“低微”,各个工人在资本家眼里看来,固然是蝼蚁,是猪狗,整千整百被践踏杀戮死,不算什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工人、农民,一般的劳动者,如果团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四十五期。

结起来,有彻底的觉悟和勇猛的精神,便能成为天下第一等伟大的力量,谁也不能战胜我们。我们象冲锋的战士一样,虽然在前线上一批一批的倒下来,可是后阵还一批一批的前进,不到打破敌人的营垒不止。

中国的职工运动在“二七”以前,只是初期的发生,“二七”的死者证明了工人阶级奋斗的力量和决心,工会的需要从此普遍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群众里去。英、美帝国主义者走狗吴佩孚等施行“二七”屠杀,大欲恐吓工人群众,扑灭他们的革命运动。可是实际上,正是“二七”之后,广东、上海、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全中国的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纱厂工人等运动大大的发展起来。他们只能在极短的期间镇压住这种运动。“二七”之后不到几个月,各地工人响应“二七”京汉工人的斗争,提出和“二七”同样的口号和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工会和罢工的自由。这种发展的结果,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罢工运动,才爆发而成伟大的五卅运动。

“二七”以前中国的民族运动虽然开始了已经很久,可是五四以来,这一运动还只在学生群众里,一直到“二七”以前唐山、京汉等大罢工,尤其是“二七”屠杀之后,才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这一残杀的创痛惊醒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使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国民革命的队伍,汇集于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国民党的改组,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不但是国民革命中得着了强有力的新力军,而且找着了自已最勇猛、最坚决奋斗、

最先牺牲的先锋队。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从“二七”开始的。而“二七”以后的继续发展，便使国民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随着最先发难、最先牺牲的“二七”屠杀中之工人——我们的死者，勇猛的向前奋斗，万流汇合地形成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五卅民族解放革命！

“二七”的牺牲者，我亲爱的同志呵，你们的血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也是为中国民族而流的。你们的志愿终有一天会达到的。中国一般平民群众如今已经深切地被你们的勇猛悲壮的精神感动了，尤其是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你们死了，跟着你们死的在这三年以来又有不少了；此后的斗争里，还不知道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要杀戮多少。然而他们杀戮你们的结果，已经造成全国革命化——“赤化”的形势，他们以后的残杀只有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根本铲除，没有别的结果。你们的死是光荣的死！你们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死的呵！

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自从“二七”开刀，虽然这种屠杀不但丝毫效果也没有，反而激起工人阶级和全国民众的愤怒，革命运动的大发展，可是他们的馋吻，便从此时时刻刻大吃工人的血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做了骨干，帝国主义者等便大大恐慌起来，尤其是有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和群众的宣传，他们更加时时刻刻栗栗危惧，知道工人阶级的真正觉悟而实行夺回自己权利的革命，是根本推翻他

们的统治。所以他们首先要摧残中国的工人运动,首先要屠杀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共产党员。帝国主义者经过赵恒惕杀了黄、庞,经过吴、肖杀了林祥谦、施洋(“二七”)和许许多多江岸的工人,从此之后每次职工运动中,工人阶级争自己最低限度的权利——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运动里,他们天天想出新的方法来屠杀。沙面罢工以后,他们假手商团杀死黄驹等烈士;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里,日厂职员亲手打死顾正红;青岛纱厂罢工时,他们当面谕令张宗昌^⑩枪毙李慰农、胡信之^⑪。最近,日本资本家雇用工贼、流氓、包探、打手打杀上海同兴纱厂两个工人;他们更谕令孙传芳^⑫秘密杀害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⑬;他们又命令李景林^⑭杀死正太路工会职员高克谦^⑮,他们的走狗李鸿程^⑯杀死了黄静源^⑰,破坏安源的矿工俱乐部。五卅以来各地的大屠杀更不用说了。这许多死者之中非共产党员固然很多很多,然而就上面随手举到的、有姓名的来说,共产党员已经有六七人。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奋斗的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党,个个共产党员都愿意为工人阶级而死。如今,在全国军阀买办阶级以及他们的“思想家”、“主义家”唾骂诬蔑共产党的时候,说共产党只是利用工人自己享福、“没有流一滴血坐一次牢”的时候,我们不用提起“二七”以来被杀的许多共产党员,不用提起被右派国民党开除的张国焘^⑱等为着京汉罢工事坐了半年多的监狱,单说现在“西牢”、“中牢”里的已经不少了。帝

国主义者等知道他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谁,知道怎样利用政客、“主义家”、工贼、流氓、学棍等于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之后,再来造谣诬蔑他们!

我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劳动平民,正因为如此,更要痛切追忆我们的死者,努力去奋斗,我们要在这一周内——“二七”前后一星期内,趁此我们的运动第一次大流血的纪念日,年年举行极盛大追悼宣传,纪念职工运动中的一切死者。我们的追悼,我们的热泪应当激起大多数民众的悲愤,发誓继续我们的死者往前去!

“工人阶级的自由要用自己的血去换来!”

注 释

赵恒惕,当时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参见本书第 91 页注^②。

黄、庞,指黄爱、庞人铨。曾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

吴、肖,指吴佩孚及其部将肖耀南。肖耀南当时任湖北督军,是直接派兵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

林祥谦(一八八九——一九二三),福建闽侯人,京汉铁路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湖北督军参谋长张厚生将他逮捕,逼他下令复工,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施洋(一八八九——一九二三),字伯高,湖北竹山人,律师。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工人俱乐部等法律顾问,一九二三年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被捕后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月十五日在武昌英勇就义。

沙面罢工,见本书第 244 页注^③。

商团,见本书第 169 页注。

黄驹,广州油业工人。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广州各界人民举行辛亥革命纪念大会,谴责英帝国主义,要求打击商团军。下午三时举行游行示

威,商团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游行群众数十人。黄驹中弹牺牲。

顾正红,见本书第178页注。

⑩ 张宗昌,见本书第225页注。

⑪ 李慰农,青岛工人运动领袖。当时任中共青岛四方铁路工厂支部书记。胡信之,青岛《公民报》进步记者。一九二五年五月青岛惨案发生后,六、七月间,工人继续斗争,山东军阀张宗昌亲到青岛镇压,李慰农、胡信之等数十人被杀害。

⑫ 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后期首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一九二六年镇压上海工人起义,同年冬其主力被北伐军打垮后,投靠奉系军阀。

⑬ 刘华(一八九九——一九二五),又名剑华,四川宜宾人。原为中华书局学徒,一九二三年进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二月,参与领导沪西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五卅运动时,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十一月在上海被捕,十二月十七日被军阀孙传芳杀害。

⑭ 李景林,见本书第225页注。

⑮ 高克谦,中国共产党党员,石家庄铁路工人运动领导人。一九二五年春,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同年九月十二日被捕,二十四日英勇就义。

⑯ 李鸿程,地方军阀,当时任赣西镇守使。一九二五年九月血腥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制造了“九月惨案”。

⑰ 黄静源(一八九七——一九二五),湖南彬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源工人运动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同年九月被捕,十月十六日英勇就义。

⑱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一九二三年二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四年五月被捕,在狱中有变节行为。以后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曾受到党的严肃批判。一九三八年四月叛变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

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我在前次复信中说过：“在阶级斗争中，必要时，利害有相同之点的几个阶级仍然可以暂时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别的阶级。”先生不能确信其必然。先生并未说明所以不能确信其必然的理由，只拿五卅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向工人进攻的事件，证明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其实，这次事件证明出来，不仅没有否定了我在前次复信中所说的话，而且愈加显示在阶级间联合战线之时，阶级斗争仍是必要的。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代表上海中等资产阶级的上海商总会，即与工人学生联合，而代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在商人、工人、学生胁迫之下亦不得不宣布罢市；此时，即五卅运动开始至所谓总商会的“革命”，事实上，上海的民族运动就是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而此联合战线的确能增长上海以至全国的革命潮流。此时，工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资产阶级亦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因为反

^{*} 这是瞿秋白以《向导》周报记者名义所写《对于阶级斗争的讨论——再答明致先生》一文的一部分，原文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一四六期，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

帝国主义运动对于这二阶级同是有利的 ;随后 ,这一联合战线怎样破坏呢 事实指示我们 ,首先是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 ,修改了商人、工人、学生的要求条件 ,而退出了联合战线 ;中等资产阶级——上海商总会继续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解散时才退出 ;而工人、学生的联合战线则继续到现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行为固然是向工人阶级进攻 ,同时亦即是背叛全民族的利益。这个事件前一部分证明 ;“必要时”各阶级间“暂时”可以联合战线 ;后一部分又证明 ,在中国民族运动中 ,资产阶级所为的仅仅是自己阶级的利益 ,所以容易与敌人——帝国主义妥协 ,背叛民族利益 ,破坏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先生说 :“吾人目前工作当以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为先。”但如果在我们的营垒里 ,发现了通敌的内奸 ,则我们必不能专心致志去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 ,我们于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当中 ,必须肃清内奸 ,这样肃清内奸 ,先生如认为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则我可以答复 :这种的阶级斗争不仅适合于“吾国国民革命十分迫切这一刹那” ,而且非此斗争 ,国民革命必不能发展以至于成功。这亦是国民革命中应该努力的。先生主张阶级斗争的程度应该有些分寸 ;但我以为这种劝告 ,先生应该向资产阶级面前去说。

注 释 :

上海商总会 ,即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

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

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

北京屠杀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的战略究竟有几分胜利呢,究竟能不能象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扑灭革命运动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杀之后,第一,立刻看见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内开始分裂;第二,民众革命运动必然更加深入的发展,革命势力更在潜伏的增长,伟大的前途已经使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久便可以来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请愿血”。那革命战场的血,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杀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地想掠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暗联吴佩孚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哄阻挡奉系军阀的

* 本义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二、三部分。

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靳云鹗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段祺瑞在这冲突中间,又想利用机会联奉反吴。亦许英、日帝国主义为镇压革命(赤化)起见,暂时保持张、吴的联合而始终去段,然而就大势看来,张的势力在最近必占优胜,吴派的反张必不能免。而且张、吴内部的小军阀各自争功,冲突异常复杂。固然,吴佩孚的势力比较的扩大,他和孙传芳开始接近,利用邓如琢占江西;他还想利用孙传芳内部的冲突而发展其势力于长江下游。但是吴的湖北、河南,内部亦是非常不稳,湖南唐生智^①驱赵,比较的接近广东政府,又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最近贵州和江西方本仁^①派也派代表到广州。固然,张的势力有称霸中央的趋势,但是张宗昌^②、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现在已经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树一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冲突虽然受“日本监督”的指挥而强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冲突已经又在酝酿之中;况且张作霖^③西有吴佩孚,南有孙传芳,北有国民军,将来局势的发展也难有全胜的希望。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军阀的崩败、分裂、互争,凡此一切,在稍稍战胜国民军之后,便渐渐的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军虽然败退,却因帝国主义工具的内哄,至此还能保持察绥、陕西、甘肃。广州国民政府虽经过反动分子的捣乱^④,稍稍受伤,却仍旧有能力应付西南诸省,待时而动。无论英、日

帝国主义者怎样急急乎要粘合张、吴，巩固反动政权，一致“反赤”，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使万一能成就这一计划，他的基础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则，军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开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固然，中国资产阶级化的士绅阶级，各地商阀这类的大人物——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的士绅政客，他们实际上是城乡贫民的最切近的剥削阶级，他们这少数人的利益不大受军阀的摧残，因此，他们往往以商会等名义代表人民欢迎这些反动军阀，替军阀包税包捐，设法剥削商民，从中取利。然而，士绅阶级内部在这种时期，不免也要互相冲突，而且他们的媚侍军阀到了现时分外的显露，甚至于要激起一般资产阶级群众的反抗。总之，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军阀士绅之间的互相冲突，帝国主义、军阀、士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镇压了民众和战胜了国民军，而不得不急剧的暴露出来。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开始破裂，帝国主义的文武两种大臣，军阀和士绅，已经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们的压迫已经不能不使资产阶级都受着切身的痛苦，于是卖好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动势力方面的形势大概如此，我们再看中间势力

的形势是怎样。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五卅以来的事实都是证明(参看《新青年》第三期^⑬)。这种中间势力,以前在革命斗争中往往可以举足轻重,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动摇,足以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今这一势力是否能满意帝国主义的让步,而完全倒到反动势力的怀抱里去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后,总商会居然办了自己的英文机关报(《中国公论周报》);他还在努力着鼓吹虞洽卿^⑭先生的“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并且说:“凡此情状,非由人民自身推翻军阀政治制度不可,吾谓此言,盖指将来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国家工商于暂时流离颠沛之境,实则最后所得,必能偿此牺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虽爱和平,对于外国压迫仍要反抗。汉口英界的华董已经到手,上海仿佛也有这个可能,可是关税管理尚且没有,更不用说关税自主……,凡此一切都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满意。所以他们还继续着强硬态度,高唱革命。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上面已经说过,在现时的政潮里,双方的斗争只有格外剧烈起来。除天津、河南以外,汉口吴佩孚抽捐勒饷,盐斤加价,上海闸北市自治备受孙传芳的摧残;军阀于战胜革命民众之后,为发展自己,实行封建地

主式的政策起见,有时不得不勾结士绅压迫商民。比较有力的资产阶级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觉悟。譬如奉天军阀失败,忽然提倡省宪,得胜又立刻取消;孙传芳初到江苏,敦请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厅长,民众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进攻,摧残自治。总之,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暂时不能完全变成反动;军阀战胜民众而更加压迫,便使资产阶级与军阀的合作(如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数月之情形)渐不可能。资产阶级之中,在这种时期便会发生较左的派别,不但对帝国主义军阀进一步的要求,“多讨些价”,并且反对买办士绅的政治势力——霸占商会、自治会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暂时的局面之中,资产阶级固然还没有完全反动,帝国主义离间国民运动之诡计,固然还没有完全奏效,然而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还能诚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面来。只能说,这种“中立势力”现在还在徘徊犹豫之中,暂时没有增加反动势力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方面,有这么小小的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亦许会利用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资产阶级再让一步,而诿罪于军阀。那时,或者又成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局面。《中国公论报》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经歌颂汉口、上海、香港帝国主义的让步,自称华人容忍镇静之得策,还说外国人若知中国心理,就“一经尝试便不能舍”。他们已经只要求帝国主

义实行允诺的几件事(会审公廨^①、华董等),赶紧想解决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华董三名已通过于上海国会(西人纳税会),资产阶级虽在力争,可是力争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宪法(《洋泾浜章程》)。“民族立宪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国主义的治权,而不求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对军阀的运动,在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妥协的想头,譬如闸北市自治问题,已经有一派只要求官厅勿干涉闸北,闸北以外的新辟市面,完全可以由官办。他们只求这一些让步,便可以在“华人”之中撇开大多数不能直接纳税的中国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开许多工人劳动者。收回租界的“国家主权”,民众普选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顾了。

那么,假定资产阶级现在再妥协——更妥协一步而加入反动势力,是否还有从前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否因此而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而使国民革命受长期的挫折呢?帝国主义军阀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诳一次,足以及在群众之中打击首先与之妥协的士绅阶级之政治威信一次,资产阶级领袖加入这种“妥协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击一次。如今全国民众,经过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杀,已经增高革命的觉悟不少,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妥协,适足以解放小资产阶级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下。现时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江西的商帮协会,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渐渐的昂起头来,渐渐的站到

革命方面来。何况，一方面，北方及内地士绅土豪阶级把持的商会等，媚侍帝国主义与军阀，上海、汉口等买办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商会等，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实行改良派式的卖国行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因此备受压迫和剥削；别方面，广州劳农平民为主干的国民政府确能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谋幸福，不但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便是广州总商会也与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议封锁粤海关等。两方面的比较，尤其使全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潜移默化的日渐趋向革命，尤其使他们容易觉悟妥协政策之卖国卖民。所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进。

中立势力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妥协而政治威信坠落，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都是无疑的。我们再看革命势力方面怎样。

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去年一年来中国部分的受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和全国军阀战争的扰乱，买办阶级运贱价的原料出洋，甚至于粮食，弄得中国市场上米麦等项都需要再从国外高价的输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隶等处的大荒歉，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价格，都是飞涨，尤其是上海。这种广大普遍的经济紊乱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压迫。帝国主义可以“贿买”少数高等华人，却决不能“贿买”大多数濒于饿死的人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还决不在此。

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了去，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湖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⑩（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

至于工人阶级，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铁路、海员、粤港、湖南、湖北各方面，无论是受压迫不受压迫，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何况经济恐慌和物价高涨使五卅以来所争到的加资，事实上已经等于没有，再加以反动重来所受的政治压迫，尤其是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训练，去和农民携手。这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在这北京屠杀高压重来的时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长。

再则,就是知识阶级和游民阶级,虽则都是游离势力,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数的力量总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固然,知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固然,游民阶级会受买办土豪的雇用,武装起来——如商团、民团、团防、工贼、流氓,来屠杀工人农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团体,也会受人运动,甚至于还有大多数在军阀的军队里,但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训练。这些土匪式首领,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协,如岳维峻^①的军队,一方面容受吴佩孚遗孽扰乱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众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组织他们在革命军里,与以国民革命之政纲策略的正确领导,这极大多数的民众,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为:一则他们本是破产失业的农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强;二则现时的军阀层层崩溃,帝国主义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本领,完全收容雇用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游民。革命方面的实力,却因广州政府的确立而逐渐增加,国民革命的政纲策略愈益鲜明,足以团结组织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杀之后的革命势力,不但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尤其重要的,便是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

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

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略中，反动势力已经又开始崩败分裂；中立势力虽有一部分要妥协而反动，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势力更加扩张集中而且强固起来。帝国主义胜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国民革命之前途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虽然在北京屠杀的时候，得到最胜利的形势，但是，恐怕这就算这次联合战线中最一致的共同胜利——从帝国主义直到国家主义都内外一致的喊杀民众领袖，当然亦就是最后一次的胜利，过此之后，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分裂而冲突了。帝国主义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杀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过吸引买办士绅的资产阶级，可是就此打破他们对于群众的魔力；结果，大多数民众更急剧的革命化，民众联合战线，要更加广大的扩张，不过在帝国主义军事上战胜的局势之下，暂时只是潜流猛进罢了。从此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党，一般民众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要逐渐的打破。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指示出来：虽然在

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使他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但是,因为:一、中国农民占极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二、中国资产阶级大半只能做买办事业,搜刮农民原料,推销外国商品,经营投机的金融事业等等,他绝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三、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
展(机器工业的发展)异常困难,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极重的压迫,别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和过剩劳动的充物;四、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经验里,很早便有了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能力;因为有这些特点,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懦弱、畏惧、妥协、软弱,他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丧失巨万资本,却不敢牺牲几分钱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对工人让步。所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权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的。

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

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所以在现时——北京屠杀后,一切革命势力是迅速的增长凝聚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历史时机:第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等等,暂时特别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斗争,在每一实际问题上指示群众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参加一切民权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全国的、是地方的、是乡村的、是都市的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等,总要力求深入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资产阶级反动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众;第三、努力组织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指导减租、减税、合作互助的运动,使农民群众在反对士绅军阀的斗争里,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巩固的同盟;第四、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的政权。这种革命政纲,才能巩固结合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集中提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于全国;才能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引敌人军队的群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为使命,全国民众对他的响应可以在最短期间颠覆军阀统治,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小小胜利——北京屠杀,开始暴露自己之间的破裂,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移转,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放着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注 释

北京屠杀,即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十六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七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十八日,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领导下,北京广大爱国学生和市民群众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打死打伤学生、群众二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李景林,见本书第 225 页注。

吴佩孚,见本书第 41 页注^⑩。

寇英杰(?——一九二七),河北利津人。曾任湖北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入河南,任河南军务督办。

靳云鹗(一八七九——一九三五),山东邹县人。直系军阀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退踞豫鄂边境,一九二五年拥吴佩孚再起,次年夺取开封,任河南省长。

国民军,见本书第 170 页注。

段祺瑞,见本书第 43 页注^⑪。

孙传芳,见本书第 264 页注^⑫。

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江西赣北镇守使。一九二五年代方本仁任江西军务督办。

^⑩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 ,湖南东安人。一九二三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取代赵恒惕,任湖南代理省长,后响应和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⑪ 方本仁,见本书第 170 页注⑫。

⑫ 张宗昌,见本书第 225 页注。

⑬ 张作霖,见本书第 41 页注⑭。

⑭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分子,在蒋介石指使下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⑮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月刊第三期,其中载有瞿秋白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前文第二节和后文第一、二节均收入本书。

⑯ 虞洽卿,见本书第 178 页注⑰。

⑰ 会审公廨,见本书第 109 页注。

⑱ 红枪会、大刀会,是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民间结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

⑲ 岳维峻(一八八三——一九三二),陕西蒲城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国民军第二军总指挥,一九二五年四月继胡景翼为河南督办。

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扩大而深入,由渐近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一则社会各阶级的相对关系,在革命运动的过程里,已经逐渐明显;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形势,对于一般民众已经彻底明了。帝国主义方面,在中国境内利用军阀士绅买办阶级的政治势力,最近(五卅及北京屠杀之后)也更加公开起来;中国平民方面,在国际联合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策略,也在这个时候更加确定。中国革命战场的阵势已经了如指掌,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平民之搏战。不象三四年前,胡适博士尚且以为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国民党右派尚且以为打倒帝国主义是开罪友邦。再则中国平民方面革命觉悟已经大大的增高,革命力量正在集中积聚,商人、农民政治行动上的积极日益增高,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日益扩大。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团结,已成历史上的伟大动力,以前的消极昏睡状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收入本书的是其中的前后部分。

态已经消灭了不少。三则帝国主义军阀虽然勉强以“反赤”统一自己的战线,然而他们内部的冲突和崩败的过程,正因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日益急剧。中国革命敌人的削弱和自乱,已经使他们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前比较长期的各派均势渐不可能。四则近年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如请愿、示威、抵货、罢工等,已经使民众得到多量的经验;尤其因为现在的社会政治形势,民众不得不利用这些经验,准备从消极的反抗进于积极的反抗。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

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大致总是从消极的反抗运动逐渐发展,逐渐普遍于一般民众,一直到革命中领袖阶级的政治势力形成而巩固,领导民众实行积极的反抗,推翻旧统治。这种发展过程里,革命斗争的方式自然适应之而增加递变进步。中国近年来的经验便足以证明。

革命斗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这些方式,中国民众都已经实行应用。但是,从“五四”、“二七”、“五卅”、“三一八”和广州战争直到现在,革命的波澜旋起旋落地昂然前进。运用这种种斗争方式,已经到了武装直接决战的准备时期,已经到了将近决死战争的时机——中国平民和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一决死生的时机。中国平民正要从消极反抗的方式

进于大规模的积极反抗的方式，帝国主义便努力在中国境内找自己的救兵。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平民的种种革命斗争，往往用屠杀、封锁的方法，往往压迫中国政府代行镇压，勾结军阀用兵作战。如今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他便不得不在军阀之外，另找破坏革命的工具。于是北京屠杀之后，中国社会的舆论里发见种种论调，不敢再说帝国主义是友邦，军阀政府是国家，都是不可侵犯的，却说革命斗争的各种方式不可用或是没有力量，这亦不好，那亦不好，或是禁阻用切近可能的方式而故意唱高调。这些论调之中，尤其是反对革命战争一说鼓吹得最厉害最巧妙。这无异乎说：革命是要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应当打倒的，国权是要争的，国贼是要除的，但是……但是向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都不好，赶紧停止，还是不革命的好！

因为如此，我们以为现在有详细讨论革命斗争的方式之必要，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

* * *

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径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

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

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现在的经验,如豫、鲁的红枪会,苏、皖的大刀会,本是农民失业的暴动反抗,可是他们和政治宣传隔离,和城市工人不能极敏捷的呼应,又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援助,势必至于困守一隅;其结果,当然要化为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至于城市里,我们还没有一次真正暴动的经验,却只看见所谓商团、保卫团的反动。我们设想平民巷战在某一城市胜利之后,如果革命军队不能和他很快的携手,即使中国军队、警察、商团等能够中立,那时对外的战争也很不容易抗御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况且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至今是用指挥军阀间接征服民众的方法,用尽种种手段使中国军阀的军队完全以对内作战为目的;民众可以努力宣传兵士,以求取得多量的武力,却不能希望现时的国内军队大部分加入革命,如辛亥的旧事,或者最近德、俄革命的经过一样。因此,我们在战略上可以于革命初期暂时避免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冲突,却决不能避免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阀大规模的战斗——革命战争。

革命军队既有这样的必要,同时也有充分的可能。一则,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人、小商、知识阶级因帝国主义的

侵略而充满全国,可以编制他们入正式的军队而加以革命的训练;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虽然还不完善,然而正可日益巩固改良),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革命军能做革命战争的主体。再则,帝国主义者虽然力能供给强大的军阀军队,如张作霖、吴佩孚等,可是他们的侵略性自然借此要攫取中国权利,以重价卖军械,以重利借大款,而且必需设法霸持中央政权,于是小军阀便渐渐的没有可能分肥,也没有资格勾结,这些小军阀的困兽之斗,必然使他们反对大军阀,而造成民众宣传这些军队的条件,如岳维峻等简直自愿号称国民军,也是已成的事实。可是这种军队在革命战争里只能做军事上别动队的策应,决非主体。三则,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军阀既可受之于帝国主义,我们有时便也非常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赞助。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既然因为要完成世界革命而以实力赞助殖民地革命,自然不能需索丝毫中国的权利,甚至于军械的价钱。反动派、妥协派不承认革命战争的必要,所以在革命政府向国内商民筹饷时,便说是“压迫人民”,丝毫都不肯担任革命时不可免的牺牲;在革命政府受国外无产阶级的赞助时,又说是“卖国行为”。这简直是要完全解除革命势力的武装,而使人民听凭帝国主义军阀的宰割。所以造成革命军队的必要,我们应当真切的认识;而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我们应当尽量的应用。——自然要认清主体与副手的区别。

至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

任；况且，反奉战争以来，已经证明军阀间的战争，在现时已经有变成人民与军阀战争的趋势。张、吴联合进攻国民军，显然是帝国主义间接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革命的防御战已成必不可免的事实。其他各地小军阀的内哄和压迫人民，都不是空口吁求和平所能避免。这些零星的战争，各派军阀之间的纵横捭阖，愈益证明必需武装平民并利用军阀内争而进展革命运动，使战争变成达到较和平较自由的境域之手段，以为总解决的革命战争之战略上的准备；如最近湖南唐生智^①驱赵，便是一个实例。现时这种局势：北京屠杀、张、吴战胜、民众革命运动深入、准备武装斗争……其势中国平民必需在革命政党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面下手，去建立国民革命伟大的统一战线，实行总解决的革命战争——国民政府的北伐，运用胜利的策略，使敌人武力分散削弱，而革命武力少所牵制，而后能响应或造成革命运动的最高潮：总同盟罢业和城乡各地的武装暴动。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革命战争的胜利，先行扫灭帝国主义的种种爪牙，打倒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召集国民会议^①，而建立真正民权的独立国的政府。那时真正的和平，利于一般平民的和平，才有达到的希望。反动派和短视的士绅资产阶级，只知一味的反对战争；军阀战争时，他们空口哀求和平，结果是为战胜的军阀所利用，以此“和平”抵制战败者的“兴

戒”防御；例如张、吴战胜后的王士珍^①式的和平，只是使北京商民受强迫行使军用票，一般市民、学生、工人都受严重的压迫罢了。革命战争时，他们想必又要大呼“和平”，其实是替受革命平民攻击的军阀说项，保持反革命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

* * *

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然而反动派的宣传，却正以灭杀民众对于革命斗争方式的认识为目标；帝国主义的工具，真正尽力，“桀犬吠尧”^①，各为其主呵！

中国平民的革命政党在这种时机，当然要努力领导民众去从消极反抗进于积极反抗；而民众的客观形势，也必然在这伏流昂进的革命运动里，努力进于猛发突变的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的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这长期间的艰苦斗争，必然在群众自己的实际生活里，锻炼出革命的武器：各种消极、积极的斗争方式和敏捷致胜的斗争策略，以引导中国平民到胜利的道路上去，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携手，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免除国际国

内的一切战争！

注 释

北京屠杀，指一九二六年三月段祺瑞政府在日本政府支持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见本书第 279 页注 。

胡适，见本书第 110 页注 。

广州战争，指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九二五年二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盘踞于惠州的陈炯明；六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的叛乱；九月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十二月南征配合陈炯明进攻广州的邓本殷等。

德、俄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和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最初为六个军，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时，增至八个军。

张作霖，见本书第 41 页注①。

吴佩孚，见本书第 41 页注①。

岳维峻，见本书第 280 页注①。

国民军，见本书第 170 页注 。

① 唐生智，见本书第 279 页注①。

① 国民会议，见本书第 90 页注②。

② 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 ），河北正定人。与冯国璋、段祺瑞同为北洋军骨干。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曾以北洋元老身份调解皖系、直系、奉系的内战。

③ “桀犬吠尧”，语出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的“桀之犬可使吠尧”。桀是夏代暴君，尧是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圣君。这里把中国反动派比作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走狗。

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一、北京屠杀 后，反动潮流随英、日、吴、张之战胜 而日益高涨：京津鲁、奉军 的蹂躏；国民军 之困守南口；吴佩孚 的利用红枪会 夺取河南，压榨湖北人民，进窥长沙（叶开鑫）；孙传芳 之利用傅筱庵，稳定上海买办阶级之统治……；帝国主义的法权会议^①和关税会议停顿；指使颜惠庆内阁^①实行大卖国计划虽未成功（现时杜阁^①内部冲突），然而假仁假义的让步政策已经用不着了。

二、但是，反动势力内部早已开始裂痕，英日之间争夺北京政权的滑稽剧开幕已久；奉系军阀之下张宗昌^③、杨宇霆^④之间的争执也很显露；直系军阀的崩溃尤其明显，孙传芳及所谓新直系^⑤的暗抗吴佩孚，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只有孙传芳的犹豫等待，仿佛是可注意的事。孙传芳想等吴佩孚（叶开鑫）与唐生智^⑥两败俱伤，然后自己可以渔翁得利；而且他深恐张宗昌的暗袭南京，

*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在上海的一次谈话记录，整理后未能发表。本书根据作者自编论文集选录。

所以现时不积极助吴攻粤；再则，赣方方本仁^⑪、唐福生^⑫等对于孙传芳也是靠不住的。然而，仅仅根据反动势力内部的崩溃，来决定革命策略是决不够的。有些革命党人日夜希望田维勤^⑬、叶开鑫、唐福生的倒戈，显然是一种机会主义。如今叶开鑫的反动已完全明了，田维勤又有多大作用！现时对于孙传芳的政策亦是如此。革命党人决不可犹豫等待孙传芳的“左倾”，对于孙传芳应即施以崩败其内部的攻击。

三、五卅以后，中国的政治愈益不是纯粹军事阴谋的时期了。五卅上海屠杀至三一八北京屠杀后，反动势力虽能暂时结合而取胜，然其内部既已开始崩败，而民众间革命潮流之伏流昂进，也非常猛烈，为从来所未有。五卅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了，北京屠杀又压迫下来，民间的回答是：“从此誓不和平请愿，到黄埔^⑭去从军罢。”所以革命战争是五卅以来抵货、罢工、示威……之直接继续。五卅运动中买办阶级之统治动摇，他们“自卫”的方法，是先让几步，而这些让步（连吴佩孚之反奉亦包含在内）实际就是反动进攻的准备。只有一直进攻到扑灭全国革命势力，镇压湘粤，颠覆国民政府而后止，——只有这才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之唯一出路。所以吴佩孚之反对关税会议，反奉战争，继又联奉讨伐国民军，进兵攻略湖南，以覆灭广州国民政府为目的，是一贯的反革命策略。革命方面，也只有反抗北京屠杀以来的反动潮流，号召革命战争，以反守为攻为目的，猛力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攻袭，

为唯一的一贯的革命策略。因此,广州政府的北伐^①,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

四、此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广东以外都还处于反对买办阶级的地位。然而,此等稚弱之中国资产阶级,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他们只顾已得的地方利益,只顾以妥协手段利用工农而限制买办的“王权”。他们的这种黄色的民族改良主义是革命营垒里的敌人。所以可以预料,现时足以牵制孙传芳等军阀的“自治运动”,虽暂时有几分革命作用,不久便可以为反动派如研究系^②等所利用。他们不过暂时不反对革命战争罢了。

况且,在广东国民政府之下,自从经过三月二十日^③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戴季陶主义的威权正甚)。虽然广东新式右派之政权,有许多资产阶级份子也不满意,然而中国稚弱的资产阶级,现在既然还留在革命营垒之中,始终需要军力来代表他。新右派暂时和帝国主义妥协之可能较少,他在既得相当的领袖地位之后,为求巩固此地位起见,不得不向前进取几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杀后在全国范围内之革命联合战线之中,自然还包含着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竟还保持着部分的领导权。于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联合战线反抗买办阶级统治的战争。

五、小资产阶级呢?五卅之后,小资产阶级显然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各地小商人反对买办士绅包办的商会

法团之运动,层出不穷。可是,这种运动大半都还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尤其是北京屠杀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买办资产阶级还处于对抗的地位,妥协之可能还少。不过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很弱,他的阶级利益在这群众革命潮流伏流昂进的时机,不能容许他很稳固的做国民运动的领袖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现在渴望着革命的巨潮,来拯救他们于反动高压之下。他们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需要,虽然他们大半是消极的等待,然而这种革命需要的深切,已经迫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不得不实行革命战争,否则,他所已得领导权,就会立刻丧失,或是简直完全投降买办阶级。总之,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遽,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

六、农民在五卅以后的奋起:如广东农民与地主肉搏的阶级斗争,如湖北、湖南农民协会的发展,如直隶等处农民运动的发物,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陕西、江苏等处红枪会、大刀会、硬肚会、协作社等运动的爆发,不必详说了。北京屠杀后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不但反抗劣绅士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他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

失望——对于北伐的失望,是无足为奇的。这种渴望或“幻想”革命战争的事实,正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罢了。

七、无产阶级呢?自然更不用说了。他是五卅运动的先锋队,他开始了五卅的国民革命,他应当为自己阶级的经济政治权利,而力争民族的解放;他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并且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责任是:“确立自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在革命化的一般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同时即应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中之于国民革命的组织,这样去和一切革命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妥协派的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八、北伐是北京屠杀后,革命之反守为攻的战争。一方面,革命平民利用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内部之自相冲突崩溃,而要推翻买办阶级的独裁制,并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而从事于广义的革命战争。别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却想以北伐的大帽子,抑制平民政治势力之开展,同时却抱着发展自己的军力,以取得将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之资格为目的,而从事于狭义的革命战争,妄想由此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制。

所以革命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之参加、赞助革命战争,其倾向必然与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平

民是要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革命平民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于是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的呼声便发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应当建立各地人民团体的委员会（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以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至于反动政权之下的革命平民，他们从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夺回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积极斗争中，努力赞助北伐的革命战争，不妥协的猛进，当然是无可疑义的。当然亦要指出人民争取政权的目的。

九、北京屠杀后，革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第一个新阶段。革命战争之中，正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统治崩溃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领袖权的紧要关键。以现今的形势及国际的一般关系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权之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责任。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的赞助并主动的参加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燥进”^②？

八月七日倚装改正纪录

注 释

北京屠杀，指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

英、日、吴、张之战胜，指吴佩孚、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打败国民军，完全占据京津等地。

鲁、奉军，指当时任山东军务督办的张宗昌的军队和奉系张作霖的部队。

国民军，见本书第 170 页注。

吴佩孚，见本书第 41 页注^⑩。

红枪会，见本书第 280 页注^⑪。

叶开鑫，依附于直系军阀的湘军将领，当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

孙传芳，见本书第 264 页注^⑫。

傅筱庵（一八七二——一九四），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九二六年七月得到孙传芳的支持，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⑩ 法权会议，参见本书第 243 页注^②。

⑪ 指一九二六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组成的以颜惠庆为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

⑫ 杜阁，指一九二六年六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建立的以杜锡珪为代理国各总理的北洋军阀政府。

⑬ 张宗昌，见本书第 225 页注。

⑭ 杨宇霆（一八八六——一九二九），辽宁法库人，奉系军阀将领，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等职，后被张学良枪毙。

⑮ 新直系，指直系军阀中后起的以孙传芳为首的军阀集团，既与直系吴佩孚相联系，又是独立系统，当时盘踞浙、闽、苏、皖、赣五省。

⑯ 唐生智，见本书第 279 页注^⑩。

⑰ 方本仁，见本书第 170 页注^⑫。

⑱ 唐福生，是当时江西军阀的一个师长。

⑲ 田维勤，陕西蒲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曾任吴佩孚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奉直战争后，任国民军河南第二军第十四混成旅旅长、第二十师师长。

⑳ 黄埔，指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近郊的黄埔港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

㉑ 指一九二六年五月开始的北伐战争。

② 研究系,见本书第 243 页注①。

③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的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④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陈独秀、彭述之曾在《向导》发表文章反对北伐战争,这里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批评。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一九二六年八月)

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

在各地县治或是农村,地主大半是兼为官僚,绅董或乡董要大地主才有资格做,县长面前也只有大地主才有讲话的机会。中国许多官僚,他们做过一任什么官之后,便刮了一层地皮去,回到家乡购置田产,这里证明了地主本来便是官僚。中国旧时的统治阶级就是他们——地主。

中国的农民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农民到不能维持他们生活的时候,只有二个办法:一是借贷,因此受

^{*} 这是瞿秋白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广州的演讲,瞿景白记录,原载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党内刊物《我们的生活》第四期。作者自编论文集选录此文。收入本书时前面讲买办阶级的部分节略。

绅士地主的重利盘剥,往往会因债务的日积月累,结果成为债主的奴隶;二是典当,凡是押铺及当店也都是地主绅士等开的,同样是被地主剥削。在乡村及城市中,讲起某人如何富有(这些富有的人就是地主绅士),终是描写那人有多少田地房屋,几家钱庄,几家当铺,几家糟坊(酱园、酒坊等),几家米店,这些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工具。地主绅士们有了这些权利,便在各处握住了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帝国主义没有侵入中国以前,地主绅士从农民那里剥削得来的钱财,除了供给自己享乐,间或做一些“慈善事业”之外,多余的金钱只能藏在地窖里,吃不了卖不完的米谷屯积在仓库中,很少有作用。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地主们剥削掠夺得来的财富,除供给自己享乐外,并可以拿出来经营商业,以前屯积贮藏起的东西都可以卖给帝国主义者,不论是米、葛、麻、丝、茶叶……帝国主义者是没有一样不要的。譬如在苏常、无锡一带的茧行,从前一共只有二百余家,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千余家了。地主绅士等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他们得到了很多利益,农民却因此更加痛苦,因为地主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中国的农民受的痛苦最深,但他们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如果中国的农民永远受着这样重的压迫,中国的工业一定不会发展,因为大多数的农

民非常的穷苦，没有钱购买货物，工业品无从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社会进化的普通公律：封建社会的崩溃，跟着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现象如何？一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却又日益破产，农民都失业，不堪困苦，集聚到城中来，又没有这许多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这是农民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问题。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必定勾结地主、大商人来大量的销售货物，并且经营工业。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几个资本家，可说是有了一些工业，但究竟太少太衰弱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等地的纱厂等等，以及南洋、旧金山的侨商，可以说是中国工业或是中国的资本家，但是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中国幼稚的工业遂处处受着限制、剥削。以致出品的成本昂贵，这样，如何能与帝国主义者进步的大机器生产，成品低廉又占着协定税则的便宜的货物竞争呢？如何能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呢？帝国主义者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崩坏，建立了“帝国主义市场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无从建立。所以中国社会进化过程，进到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的建立、稍稍有一点工业的时期，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成为特殊的现象：一方面是工农阶级，一方面是封建的余孽地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畸形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掮客——买办阶级。

中国的革命势力——工人、农民、小商人，要推翻地

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必需要明白这一个经济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我们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说要能够知道更具体的打倒他们的办法，要晓得他们如何能在中国生存。抽象的名词，空洞的口号是不能使他们受打击的。所以国民革命必需要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国民革命的工作，打倒军阀，不仅只打倒袁世凯，打倒吴佩孚等几个人，要看清楚了现在军阀在中国所以有政治势力的根源，然后才能给他们以重大的打击。

中国的军队与外国的军队同样是武装的组织，可是他们的作用不尽相同。外国的军事领袖无论他有多大的武力，但他不能有很多的政治作用，不会成为中国式的“军阀”。中国的军事领袖却不然，是握有政治的大权，成为特权阶级——军阀了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政治问题，就必定要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军事领袖是如此，他们代表什么阶级。

中国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在事实上各地或各省都是独立的，因为经济上没有更广大关系的需要，如象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经济关系。因此也用不着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庞大的军备和统一的指挥。所以历代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皇帝，实质上

是并不统一。在太平天国以前，各省的军队不满六千人，只有北京的御林军的人数才有一万以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如此的经济力量，不能养活许多兵，并且是无须乎这样。到现在不同了，因为农业的破产，很多困苦的农民，客观上的革命势力，成为土匪。有了很多土匪，于是必需要有武力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强盛的军队由此就渐渐的发生了。中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政府，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的压制不能强大起来，还不能掌握政权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也不得不乞援于军人，于是政权便落于军人的手中。中国的社会依然是封建的形式，但封建制度却又因为帝国主义的侵入坠落了他的声威，破坏了他的道德，没有什么君臣之礼了，独一无二的军人遂能操纵一切成为军阀。因为军阀是封建社会的余孽，他实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他的力量也必然用以保护地主买办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往往听见军阀士绅也常常乱叫“维持安宁秩序”，这所谓安宁便是帝国主义买办地主的安宁。

在五卅之后，国民军倾向于一般民众（小商人，工农阶级）的一方面来，帝国主义者固然是惊骇相告，要张、吴攻打国民军，买办地主也是同样的明里暗里帮助张、吴打国民军，说是因为国民军赤化了的缘故。实际上他们是向民众进攻，向大多数的农民进攻，保护他们自己（地主阶级，及脱胎于地主的买办阶级）的利益。讨赤战争时期的北方农民的苦痛：无限耕地的荒芜，千百万难民流离

的那种现象,是很明显的例证,证明了这种战争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武力向农民的进攻。这种灾难,地主们是受不到什么损害的,他们可以跑到天津或别地的租界里去,很逍遥自在的过他们的生活;大商人、买办阶级是更积极的帮助张、吴,如北京总商会帮助张宗昌发行军用票。在平时,军阀也是在各处与当地商会领袖、买办阶级,或是教育会领袖、绅士等勾结的。军阀要商会捐款等,并没有要商会的领袖们自己腰包里的钱,都是摊派给各小商人的。大商人与地主虽然不自己掌握着政权,但是军阀掌握着,照样是保护他们的,虽然也有时对他们有些微的威迫,这不过是如同大家庭中的忤仆一样无关紧要的,因为忤仆无论如何的不好,他终是要依靠着主人才能生存,他们——地主与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

我们还有例可以证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买办阶级。许多由官僚告老或其他原故还乡后,他们时常在他们家中私刑拷打农民,没有人能够干涉,在广东或者不同,是用民团来压迫农民。许多小县分中,绅士、商会会长等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民治主义的国家是无论什么人都没有随便逮捕他人的权力,可是中国各处绅士、商会会长的一张名片便可以捉人,农民更是随时随地可由他们逮捕、拷打、囚禁。现在没有什么皇帝或是公侯等爵位,地主、绅士都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买办也同样是帮助地主压迫农民的。在长江南岸有很多沙田,本来农民可以用很

少的代价向官署领到这些土地，现在都被大地主仗着他的威权，以他的金钱侵占了这几千万亩的沙田。这件事证明了政权被地主们掌握着；另一方面表现将渐渐进入大农业生产，慢慢的展开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就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们准备夺取资本主义时候的政权。最明显的例就是南通的张謇，他开办工厂，工厂工人的宿食及宿舍内的市场也完全是他包办；南通的市政、司法、教育一切的行政设施都得受他的节制，就是游艺，都要干涉。他是地主、大资本家、官僚，他是中国统治阶级本身形态的写真。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是地主，完全没有脱离地主的地位，如上海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聂云台等，他们都是兼为大地主的。在各县各村可以看出政治的半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性质，掌握政权的便是地主。在事实上地主阶级是军阀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地主。

在政治上、经济上可以见到帝国主义及军阀在中国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这些反动阶级做他们的经济的政治的命脉，我们的结论因此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必需打倒地主与买办阶级。打倒陈炯明之后的广东农民仍旧感觉许多苦痛，就是因为没有很决断地割断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命脉，严厉地压制地主与买办。现在广东农村中许多问题，也便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乃至完成中国的革命必需要是很决断、很彻底、不稍姑息地解决这一个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军

阀生存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买办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买办之后，即刻建立一个人民的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必要给农民以参加政权的自由。

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 那时候写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 至“流寇”^⑩，最近的是白莲教^⑪、太平天国^⑫、义和团^⑬。从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迟缓，在历史的过程中因为人口增加而发生问题，每一个时期都是如此，而有农民反抗运动的发生，再有新的建立，所以以前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

每次的农民革命成功之后，政权都落到别人手里，农民自己并没有得到成功，这是因为有下列的缺点：

(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

(3)迷信，如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

(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领袖，如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

现在的农民就不尽如此了，其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现在资本主义渐渐的发展，在大城市中间已经有了工人，

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农民可与工人联合奋斗,农民得到这支生力军的辅助,形势当然不同,不象以前那样的原始暴动而为有组织的斗争了。农民也已经知道在革命的行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必需要有团结与组织,并且知道要得胜利必定要与工人联合。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工人、农民、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时大商人也来参加),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各阶级的人们都需要这样的革命,这一个革命工作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战线,是一方面为工、农、小商人,一方面为地主、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在这样形势的战阵中,革命的队伍里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阶级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与工人、农民大不相同。工农及小商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于:群众的团结,一切自由、一切权利的获得,在政府里有各界的代表,他们这些目的是很正确,如能依照这目标去做,国民革命才有真正的胜利可以得到。资产阶级不然,他们恐怕工农的力量大了,他们将因此受害,不能尽其所欲地来剥削工农,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终有些疑惧。买办与大商人更是一种反动的力量,是非常讨厌的东西。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可以表示些倾向改良政策的论调;到反动时机到来时,他立刻会压迫工、农、小商人等革命分子。譬如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也能在势所必然

的强迫之下发出罢市的命令,也能够提出十三条要求,虽然是修改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团体(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到了末后反动局面开始后,上海总商会即刻改变其态度,嗾使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以至于秘密枪决刘华^①。可是从这买办阶级里,在经济上可以稍稍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在政治上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是新右派。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

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资本主义的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并不怕资本主义的强大,资产阶级却在怕工人势力的增强,这是必然的;所以在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工人也参加,但是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同时,这所谓“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国民革命真正胜利之后,他必须加入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盟,即与苏联联合反抗世界的帝国主义。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世界社会革命的时期,是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从事于中国革命的,不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都应为着创立民权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着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所受的剥削减少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用种种方法——减租、免税、改良种子、兴办水利等等达到这个目的,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其收获之百分之八十。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农民然后能

安居乐业,实业才能发展,工业品才能在农村中找到销路。减少农民的剥削就是减少地主的收入。这一层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是很难了解的。他们所以至多只能结合少数富农,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在事实上,谁能代表工农利益,谁能给工、农、小商人以政权,那末,谁就能够解决农民问题。必需要压迫地主使其减租,打倒地主势力,才能获得农民群众,革命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力。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总之,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

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少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的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

最具体的办法是：

(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

明定“耕地农有”的标语。

(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自己的利益。

(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民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

(四)严厉的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注 释

苏常,指江苏省的苏州、常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旧中国华侨资本经营的最大机制卷烟企业。一九一五年创办于香港,以后又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厂,并在河南、安徽、山东设立烤烟厂。后因受英美烟公司压迫,业务衰退。

张、吴,即张作霖、吴佩孚。

张謇,见本书第42页注②。

穆藕初,见本书第199页注。

聂云台(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南衡山人。买办官僚家庭出身。清末继承父业,任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并经营大庄园。一九一七年与黄炎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临时干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筹建吴淞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又与张謇等筹建纺织、贸易公司等多处。一九二一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一九二三年后,聂云台所经营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一九二六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顾问。

陈胜、吴广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

赤眉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

黄巾是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

① “流寇”,指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他们率领的起义军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流动很大,被统治阶级称为“流寇”。

① 白莲教是起源于宋代,而在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的一种秘密教派,因依托佛教的白莲宗而得名。这里主要是指清嘉庆年间及其后爆发的白莲教农民起义。

② 太平天国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农民革命,莫都南京,称太平天国。

③ 义和团是十九世纪末华北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见本书第40页注。

④ 刘华,见本书第264页注⑬。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

* 一九二七年初,瞿秋白将他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主要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为《瞿秋白论文集》,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排出一部分校样,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未能出版。本文是他为文集写的序言,未发表过。本书根据手稿刊印。

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我现在收集四年来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

况且集体的革命工作之意义,正在于其自我批评的发展;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固然,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因为要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做革命”的一部分的成绩之汇集与整理,也就未始无益哩。于是瞿秋白的论文集便出版了。

论文集分八类:(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三)买办阶级之统治;(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八)赤化漫谈。

第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袖权,认定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

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袖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已经因农民问题的要求切实解决而不能久持了，五卅屠杀后之无产阶级，实在已经实际的直接的开始了国民革命。

第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虽然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不是所谓半殖民地的，而是次殖民地，这句话确有鼓动的意义；然而真实的情形，却在“国际殖民地”。所谓国际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说中国没有成为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之直接统治地，而是列强互争的对象。这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虽然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很低，还只有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需要，而且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建设比俄国还要困难好几倍，然而中国国民革命不胜利则已，如果胜利则必定是颠覆世界资本主义而创造社会共产主义的一支流。因此，我们以前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方式及中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策略之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三、买办阶级之统治——这是我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临城案、贿选案^⑩、承认苏俄问题^⑪及广州买办军反革命叛乱等现象,显然表示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稳固的统治全国,并且压迫孙中山政府之时期。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广州商团叛变时;中山北上的第一次北伐,已经提出国民会议之主张(我当时有一篇《论革命战争之北伐》,惜因《向导》不载,已经遗失,未能收入此集),——这时期已经是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胚胎。

第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这是我一九二五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国民会议始成全国革命平民的旗帜,继之以上海小沙渡罢工,五卅屠杀后的伟大革命运动,直到反奉战争中“变军阀战争为平民推翻军阀战争”之呼号与“为国民会议而战”之要求,对抗吴佩孚之法统主张。总之,五卅而后,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有具体的初步表现。这一期的时论,可以《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总其成。

第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这是我一九二六年的时论之总题。北京屠杀后,国民军败退之时,大致都认为是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反赤胜利之反动局面。然而五卅以来农民奋起,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他们不但积极起来反抗买办士绅阶级,并且渐渐脱离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的领导,急切的要求反守为攻,尤其是革命战争的北伐,以直接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革命平民,

尤其是农民已进一步而要求平民政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攫取领导权，而向妥协政策方面去，因为农民及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对于他们自身都发生危险了。列宁说：“俄国资产阶级很恨俄皇政府，但是他是因为俄皇政府的政策会惹起革命。”（列宁引考茨基^⑫语）中国资产阶级在五卅以来真的走上这条路，他们恨帝国主义，正是恨他的惹起革命。所以如果革命平民要求北伐，是为着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权，那么，资产阶级之赞成北伐，却是为着要求买办阶级之小小让步，以便结束革命，制止平民的民权主义之发展。这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经迫近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一时期的时论，可以《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及《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之斗争》二文作为纲领。

第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中国的国民革命发展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里，我们不能不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勇猛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甚至于一般的劳动平民解放的目的，都在于共产主义。所以关于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赤色职工国际、^⑬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之胜利与经济改造事业、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如土耳其），我亦曾竭我的能力译述，以供国人的研究，兹汇集于此。

第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理论、主义的问题，当然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我在上海大学教课的讲义，大半都没有收入此集。固然，集中很有几篇文章关涉

到较深的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大致与中国现时社会思想的阶级斗争是有关系的,如东西文化、科学玄学的争辩等。还有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辩,则已分别归入其他各类。思想的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代“伟人”梁启超^⑭、章行严^⑮、梁漱溟^⑯、张君勱^⑰、戴季陶、胡适之^⑱、《独立青年》^⑲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⑳(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㉑,乃是《醒狮》^㉒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伟人与可笑的人相差原只有一步呵。”

第八、赤化漫谈——这是我文艺杂著等的汇集。自五四运动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崩溃以来,至今还是遗留着;好象恶疮似的,从阴处逐渐腐烂,非常之延缓迟滞,其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甚至于在已经开始斗争的无产阶级之中,还保存许多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旧观念。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高呼“持续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之可宝贵的遗产”!这种可宝贵的遗产,便是无情的彻底的反抗宗法社会及一切舶来的反动妥协的文艺思想。再则,我这些杂著中也还反映些国际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之实际斗争,如二七流血,叙利

亚、摩洛哥的血战,以及《革命运动年表》与《战壕断语》等。因此,我虽自知文艺稚弱,杂著庞乱,也还敝帚自珍,将他们存留在此。

《瞿秋白论文集》之出世,正当革命战争剧烈之际,中国革命大踏步的前进,中国历史的轨道正在将转弯未转弯的时期,亦许,不久便须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论文集很快的变成陈旧的文籍!

注 释

《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曾发表不少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文章。参见本书第7页注。

《星期评论》,见本书第256页注。

陈独秀,见本书第110页注。

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受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河上肇影响较大。一九二一年回国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一九二一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一九二二年脱党。其后,先后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教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军阀杀害于汉口。

戴季陶在五四运动时期曾编辑《星期评论》,发表过某些谈论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劳动问题的文章,但不少地方作了歪曲,表现了改良主义倾向。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过程中,他曾参与活动,但不久就退出了。关于他以后的活动,参见本书第199页注。

胡汉民在五四时期曾在国民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过谈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然而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某些论点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参见本书第201页注^⑩。

朱执信(一八八五——一九二),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一五年参加同盟会,曾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一九一七年护法运动期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的职务。一九一八年,担任《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的

编辑。十月革命后,他称赞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并设想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建立一支有主义的部队。一九二一年秋,在广东虎门被桂军杀害。

佛、老、孔、朱,指佛祖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朱熹。这里指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四种学说,即佛学、老庄学说、孔孟儒学、程朱理学。

临城案,见本书第42页注⑳。

⑩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直系军阀曹錕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大总统”。当时称贿选案。

⑪ 承认苏俄问题,指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两国政府代表经过谈判在北京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⑫ 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和理论家。他的早期著作,对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过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不断发表著作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⑬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成立。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少共国际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成立,赤色职工国际一九二一年成立,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团体和革命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

⑭ 梁启超,见本书第91页注㉑。瞿秋白曾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文中批判过梁启超。

⑮ 章行严,即章士钊,见本书第90页注⑳和第111页注㉑。瞿秋白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度与军阀》一文中专门批判了章士钊。

⑯ 梁漱溟,见本书第111页注㉑。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中批判了梁漱溟。

⑰ 张君勱,见本书第111页注㉑。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及《社会科学概论》中批判了张君勱。

⑱ 胡适之,见本书第110页注。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胡适之与善后会议》等文中批判了胡适。

⑲ 《独立青年》,参见本书第257页注㉑。

⑳ 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指反共反苏反对国民革命的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左舜生、李璜。瞿秋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文中批判了国家主义派。

① 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地主武装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② 《醒狮》,见本书第 257 页注①。

谁能领导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

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因为他根本是农地革命;何况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革中国地主阶级的命,就等于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买办)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然而中国革命的对外关系里,含着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之意义,因此,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关税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权,需要收回租界。不但如此,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要力争革命之领袖权,尤其是最近,从五卅运动经过三月二十日直到现在这一斗争看得非常清楚。民族资产阶级要争这革命领袖权做什么用处呢?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要领袖革命而停止革命,扼制劳动平民的猛烈彻底的革命运

* 为反对陈独秀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以批评彭述之的方式,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在党的“五大”散发,引起代表们的注意。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

动。他停止革命的方法并非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方法一样的，地主买办阶级完全站在帝国主义方面镇压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却要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就可以领导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所谓“剥夺无产阶级包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权”。中国资产阶级想着：如果帝国主义“以平等待我”，则仍不失为“友邦”。此种政策的结果，是将“独立的中国”仍旧送给世界帝国主义控制，那时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本是非常薄弱，不得不仰望“友邦”的恩惠，而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美国，将要换一种“和平的方式”来侵略中国。表面上中国是独立了，关税自主了，租界取消了，实际上，帝国主义可以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实业交通，继续支配中国的一切经济最高权，而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经济，完全在这新式侵略之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那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代替现在的官僚地主阶级“军阀”做帝国主义的“政治买办”，中国革命实际上就要完全失败，世界革命亦要大受打击，因为那时中国将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走上纯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此可以相当的巩固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

所以现在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第二，是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

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合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种种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

第一个前途是否是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何以故呢?第一,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在城乡间的发展,客观上还有上升的趋势,自然能发生并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第二,五卅运动以来,劳动平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巨潮,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形成起来;民族改良主义已经屡次在事实上表现出来,如戴季陶主义的发见,虞和德派的《中国公论报》之“左倾”,都是企图夺取革命领袖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如果革命一直如此发展下去,必然危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要“左倾”,要“积极起来”,要号召“纯粹孙文主义信徒站起来”。第三,帝国主义受革命之攻击,也觉得纯粹凶暴的方法,指使辅助买办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战争的方法,不能消灭中国革命,所以想同时用一种“民族改良政策”——表面上的让步政策,以协助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取得革命领袖权(如五卅以来之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问题,最近之交还租界“自动”放弃特权的通牒,赞助国民党稳健派之外国舆论等)。不但如此,帝国主义还想在经济上生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英国看见武汉国民政府有没收外国人大企业的主张,他就提议将开滦煤矿的股票大部分卖给中国人,用这一点

小略，驱使生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之神圣而战。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国民党新右派，正在竭力夺取国民革命军之指导权，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在他指导之下。中国环境之下，失地的农民所组织的军队，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军事式的政治与农民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运动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行动之辅助，而农民群众又要求武装自卫及政府军队之保护。如果国民革命军在民族资产阶级之手，则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已经有一半的领导权。

这种形势之下，革命领袖权是否象彭述之所说“天然”在工人阶级之手呢？当然不是的。要工人阶级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必须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观上有正确的战术。然而彭述之的战术是怎样的呢？第一，他力说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甚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似有实无的“鬼”。第二，他说现时领导革命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国民党新右派）。第三，他两次说革命前途是比较悲观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参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的会议），北方区委也认为北伐的革命战争将完成国民革命之主张，是“革命燥进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军胜利，买办阶级就混入政府，戴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革命军败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便要消灭”。所以照他们的观点，北伐的胜利仿佛亦天然戴着民族资产阶级假面具的买办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是天然不能胜

利的。第四，所以要等北伐军胜利后，再来（如同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样）实行他的“永续革命”。这四层意思合并起来便成为彭述之式的战术：“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是彭述之自己口头上的修改，三年前他书面上都公开的说‘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但是中国并无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有买办阶级，买办阶级是只能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领导权仍旧客观上已经在工人阶级之手。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只要利用一切‘商民’攻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军政），这就算‘领导国民革命到底’；然而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北伐之胜利，不是革命之胜利，所以另一方面要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那时，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然而然会服从中国工人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观念！这种战术是翻译托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很坏的译稿。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①的一种幻化。这有一件最切近的事实为证。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北伐军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制国民党新右派的军队势力，要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资本家协商定了“民治”主张，去抵制将到上海之北伐军的“军权”。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新右派军人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须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所以应当利用他们之间

的冲突。关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尚且没有说到，至于大多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更没有谈起。这样，可见彭述之主义的实际应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以实行他所谓“引导国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于抛弃工人群众。这种战术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袖权于资产阶级。随后上海革命潮流之中，彭述之虽然形式上已经反对上海中立自治的主张，但是他的战术上之根本原则仍旧存在，仍旧影响党的政策，以至于发生严重的错误。

彭述之战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根本“理论”。他的根本理论是：（一）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势力，因而忽略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既然只有买办阶级，则反对新右派自然亦以反对买办阶级的方法反对之。因为买办阶级根本上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所以彭述之的反对新右派，自然而然只知道痛骂买办阶级，不知道指出虞和德一类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危险。（二）他看着革命高涨时买办分子之加入革命队伍，戴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是无足轻重的，他仿佛认为这就等于买办阶级（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治者阶级）加入了革命队伍，于是他的反对新右派，便不是反对新右派的改良主义（所谓“假面具”），而只是反对他们的买办出身（彭述之在《向导》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①第一九一期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篇文章里，侧重于指出某人某人是买办出身，而并

未指出“右倾”妥协对于革命的危險)。殊不知新右派的危險不在于他的买办出身,而在于他的妥协主义,因为妥协主义确能一时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三)于是彭述之认为北方政府在买办阶级之手,南方政府亦在买办阶级之手。要反对这种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无须乎用很大的力量去吸引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他们“客观上”、“天然”、“绝对”或“很容易”跟着工人阶级走),要反对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只须联络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好了。于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战术便形成了。(四)但是彭述之自己也觉得这种战术不能战胜。“北伐已经成了事实”,买办阶级的军事势力又很大,我们虽然在未成事实之先,应当反对北伐,主张等三万万中国农民中之大多数受了宣传,组织起来,然后再实行“民众的武装暴动”(参看一九二六年八月《向导》第一七期彭述之《我们的北伐观》)。然而北伐既成事实,我们未便再行反对(北方区去年七月论北伐的信)。那么,怎样办呢?“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罢!请问这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

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为在现今革命潮高涨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有确定的妥协主义的倾向，如果无产阶级还不决然准备和他破裂联合战线，那就势必至于不敢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勇猛前进。无产阶级政党自己要走上孟塞维克的道路，失去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得到领导革命之更多的可能！

中国革命中布尔塞维克的战术，不应当是如此的。中国革命之中，照我们上述的许多分析：（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并且企图完全夺取革命之领袖权。买办地主阶级里的分子，如联省自治派^①等，亦会掺入革命队伍，但是他们不得不戴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力量的一个原因。至于官僚买办阶级是决不会来做革命的领袖的。（二）店东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比民族资产阶级要“左”些，但是他是非常动摇的，有时会做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三）工匠小资产阶级及城市贫民，是参加革命的，他们甚至于反对店东小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行会旧习使他们只看见小团体的利益，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行动，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无产阶级之领导。（四）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失地的农民——兵士与土匪客观上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和生计问题之特殊形式的解决。（五）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在

革命战争中与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实际上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他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之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这些革命力量之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革命彻底胜利的，何况这一革命带着些社会主义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只愿意有利于自己的“民族改良”，他只想和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阶级妥协，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等阶级的利益。所以除无产阶级自身而外，只有中国农民（及兵士）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因为只有他们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是可以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结合的。此外，便是工匠小资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到了革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必然要倾向于妥协，甚至于反动。现在，这种倾向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我们看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认为简直是买办阶级的代表，而不惜抛弃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群众，竟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联合，以反抗其右翼，那么，这种战术计划是根本错误的（何况这所谓左、右是很可疑、很不确定的）。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必定不能彻底的反对整个儿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便不能不抑低工人、手工业者的革命行动，以保持“联合战线之天经地义”。而实际上革命现在的职任，非仅反对买办，而是要推翻买办，同时已进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阶段。我们在策略上当然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各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于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但

是策略尤须适应总的战术计划。如果总的战术计划上实际是采取“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以反抗所谓买办阶级的新右派,那么,策略上无论如何运用得好,其结果,终不免于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总之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计划,应当指定“劳动等被压迫阶级之革命民权独裁制”为政治上的目的,其内容便是:

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同时决不可以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店东小资产阶级,而要认清店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中的中立势力,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终究是要妥协改良而出卖革命的。必须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

注 释

三月二十日,指中山舰事件。见本书第 296 页注②。

虞和德,即虞洽卿,见本书第 178 页注⑩。

关税会议,见本书第 216 页注⑦。

法权会议,见本书第 243 页注①。

彭述之(一八九六——一九八三),湖南宝庆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向导》编辑,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推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派分子。

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

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十二人,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就政局与党的任务、国民党问题、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等十一项内容分别作出了决议,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是从各方面准备和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

国际议案,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北方区委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区委员会。

托洛茨基主义是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它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农民、反对工农民主专政;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其它问题上也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列宁、斯大林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⑩ 孟什维克是俄文 *Меньшевик* 的音译,意即少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在一九一二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驱逐出党。以后孟什维克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⑪ 据《六大以来》所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引用的是三月份的材料,显然此文写出后作者又做了修改。

⑫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部份军阀、政客为了保持地方割据,反对民主革命,提出“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主张。最早是一九二一年湖南军阀谭延闿发表通电,主张“自治”,梁启超、熊希龄等进一步主张仿照美国联邦制,成立联省自治政府。胡适也赞成这种主张。接着,其他一些省份的军阀也宣言响应。他们被称为联省自治派。

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

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是在革命状态之中,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着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

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儿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

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便决定开放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说:

*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文中所批评的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是陈独秀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与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的不一致而求得实际的一致!”因此,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是的,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甚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象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托洛茨基,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着怎样使靳云鹗、叶开鑫……倒戈,使阎锡山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着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孟塞维克的独立观。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

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辨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唯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阱”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族。因为自己心上以为工人阶级天然是领导者。孟塞维克反对列宁之加入“临时政府”的主张时,也说恐怕工人阶级加入民权政府要恶化,要晦蔽阶级意识,不能做“清高的”在野党极左派了。

因为自己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为自己天然是指导者,故意与人立异,你只知道军事行动,我却知道宣传组织;随后军事行动“已成事实,不便反对”,那就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

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呵！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呵！

如此，共产党内自己的组织纪律又怎样呢？

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①，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①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

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

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个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着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着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

学系^⑫、联省自治派^⑬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知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身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

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发明，而形成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亦许应当研究研究自己的主义，然后再能明了“实成其为”一种主义。其余的彭述之主义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虽然同取之于一个主义，而可以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彭述之主义，本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敷衍涂砌的实验主义的；他可以今天说：“这人没有，已经成鬼”，明天又说：“这人确有，然仅系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论。既如此，他的害处，比马尔托夫^①公开的孟塞维克主义更大。因为人人于无意之中不自觉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来，仿佛亦是马克思主义，不觉得他可怕。其实合拢在一个线索上，不但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

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注 释

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促进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恩格斯逝世后,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增长,第二国际内部逐渐分化为三派:一是以德国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一是以德国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一是革命的左派,以德国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右派和“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推行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沦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而陷于破产。

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是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孟塞维克主义,见本书第 330 页注^⑩。

托洛茨基,参见本书第 330 页注。

靳云鹗,见本书第 279 页注。

叶开鑫,见本书第 295 页注。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字百川,山西五台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山西省督军兼省长。

戴季陶,见本书第 199 页注。

^⑩ 铁总,即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二年十月筹备,一九二四年二月在北京成立。

^⑪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一六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七年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一九二九年以反党罪名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出党,次年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名被处决。

^⑫ 政学系,即政学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官僚、政客集团。袁世

凯死后,国民党籍议员多数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段祺瑞。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于一九一七年组织政学会,支持段祺瑞,力主对德宣战。段非法解散国会后,张等南下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护法政府,进行护法运动,后又与滇、桂军阀相勾结反对孙中山,被称为政学系。

⑬ 联省自治,见本书第 330 页注⑩。

⑭ 马尔托夫(一八七三——一九二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活动家。在一九一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带头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成为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态度。

关于“三大”党纲^{*}

(一九二七年二月)

第三次大会 的党纲 ,是我起草的 ;但是大会之后 ,独秀 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 ,其中重要之点是 : (一) “此革命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 ,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 ,因为其余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 : “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 ; (二) 原文 “……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 ; (三) 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 ,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 ,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

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 ,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一 ,当时确有一派同志 ,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 ,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二 ,另有一派同志 ,是现在彭述之

^{*} 这是瞿秋白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二章写的附言 ,标题是编者加的。

派的祖,自认为“正统的专政派”,反对一切民权,所以党纲草案上虽然写着“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而实际上大多数同志听都不愿意听“民权”两字,他们正在“准备着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呢。关于“合流直达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更是不肯承认,所以“无产阶级应参加国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于革命领导权”一层意思,完全抹煞,变成废纸;三,我自己的严重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具体的认识农民问题之解决,所以党纲草案原文上虽有“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语,然而农民要求中,只有减租,而没有土地问题。当时谭平山同志与国民党谢英伯“耕地农有”之争,已经过去。我在争论时虽然很赞成“耕地农有”,或广东文法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起草党纲时,我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而平山同志也没有提起。这可见当时大家都在无意之中恐怕认清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会使农民的阶级斗争过于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我不过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曾经特别指明农村自治的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然而我这种“民权主义的倾向”,始终受大家的腹诽,也就无足重轻了。

总之,第三次大会时的党纲草案,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值一笑,很幼稚的;但是,大家应当知道(不但我起草人自己),这党纲草案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切实的、勇敢的解决农地问题。我直到五卅之后的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才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这是因为

我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了。

注 释

第三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委员会一月十二日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独秀,即陈独秀,见本书第 110 页注。

彭述之,见本书第 329 页注。

谭平山,见本书第 200 页注^⑮。

谢英伯(一八八二——一九三九),广东梅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北京十月的扩大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局、京区、粤区、湘区和山东、湖北党组织的报告,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发表了《告农民书》。

《湖南农民革命》序^{*}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的真正老牌国货，便是土匪和官僚。土匪是革命党，官僚便是地主、土豪的代表。当然，这些官僚士大夫原本是土匪头儿的奴才。土匪头儿没有得志的时候，总是和失业破产的平民称兄道弟，等

*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刊载了前半部分，未能刊完。当时瞿秋白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便将全文交我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并为该书写了这篇序言。

到他得志了，他便雇用收买许多士大夫、官僚来压迫平民，他便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如今的世界可大不相同了。西洋外国的世界革命起来了，是把俄国的“土豪头儿”、“巨腹贾”的代表——所谓“察尔”(Tsar)也者，和大资本家，一箍脑儿推翻了。这是谁做成功的事？是工人，所谓无产阶级率领的革命呵！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中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象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己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刑。这些齷齪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难道这些做过分么？当然，湖南农民的解放是得着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但是战场拚命的国民革命军的兵士是谁？也都是贫困的农民呵！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甚至打

官司,交钱粮,减租,阻谷,办学堂,兴水利……都要自己来管。他们自己来管便怎样?要的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活。农民的生活便是土地。农民没有土地,便是如鱼失水。农民要一个国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当然愿意纳税。但是,第一,他们必须自己来创造这个国家。第二,他们的国家不许有土豪劣绅私有田地。他们只知道自己耕田所得,分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国家,其他一概不能管。他们耕田纳税之外,难道还能承认地主劣绅的“不平等条约”。“率土之滨,莫非农土”!中国境内,不要有一个农民纳什么地主的租;农民只能租国家的田,不能承认“不自耕作坐收田租”的人。这就叫做土地国有。农民自己耕三亩田,享用三亩,耕五亩享用五亩,这些田地是只属于国家所有,但是耕种的人自耕自享,不能承认地主。这就叫做耕地农有!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

运动》一样。

瞿 秋 白

一九二七·四·十一夜二时

注 释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广东海丰人,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一月,在海陆丰领导建立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本来已使大多数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军阀的战争和压榨,更使农民的生活陷于极端悲惨的地位。自然农民的收入连养家活口都不够,佃农的数目日益增多,一般农民的窘迫日益厉害,致使任何高的田租,任何重的利率,农民都不得不忍受。农民付纳田租或苛捐杂税之外,所余的数目,不及自己收获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剥削,不但对于乡村中的农民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也有间接的影响:农产品的出售于城市商场,差不多完全要经过地主土豪的手,于是地主土豪一方面以垄断的手段贱价收买或勒索之于农民,别方面亦可以垄断手段高价出售于城市。因此,城市平民的生活程度日高,即贫困的情形便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同时失业破产的农民日益众多,不但使兵匪蔓延,而且使工资低落。这些情形,都使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和剥削得以维持。农民处于如此剥削之下,自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九五期,收入本书时头尾节略。

然首先所感觉的,只是减租减息及减税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农民,尤其一般贫农(自耕农、佃农),是受缺少田地的痛苦。当农民只能享受自己收获之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耕地农有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客观上的结论。所以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农有,地主阶级得以尽量压榨农民,经过买办阶级而供献中国人民的汗血于世界资产阶级。

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必定要农民能够组织自己的政权,拥护劳动平民的权利,筑成平民政权的巩固的基础,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固然不错,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大半还是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的发展),也是巨大的障碍。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之薄弱,一则他是买办性的成份居多,二则他是商业资本里刚刚生长出来的雏儿,他自己是地主土豪阶级的化身,他自己大半还靠经过地主土豪剥削农民以求利(如收买原料),三

则他和封建宗法社会的关联还很密切,一切流氓投机主义及无耻卑劣的恶浊分子,都是他的附庸。因此种种,他虽然要和大买办阶级竞争,虽然要和军阀政治对抗,然而不能和农民联盟,而形成反封建的一种革命势力,却只能和地主土豪的封建分子联盟。况且中国资产阶级,当此世界资本主义衰落的时候,他的政治经济利益根本上和无产阶级是冲突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实行土地革命,也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的责任。

北伐胜利以来的种种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种情形。当北伐军出发之后,蒋介石带着三月二十日的威风,要想借口北伐,不但加重剥削广东的工农,而且要阻遏一般工农运动,以及国民会议的民权运动。蒋介石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实行军事独裁,镇压革命民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再要好也没有的了。资产阶级只要利用工农的民众,造成自己的武装势力,取得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的资格,同时,也便是压迫民众的武器。然而湖南、湖北的农民,以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凡是革命军经过的地方,农民都努力起来参加帮助。各城市的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帮助北伐,难道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吗?革命军的一般将士在战场上牺牲性命,拼死作战,难道也是为着造成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资格吗?当然不是的!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将士努力于革命战争是为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换句话说,是为着要解放中国民族,要实现平民的政权,要改善平民的生活,要三民主

义的实现。但是，等到赵恒惕、吴佩孚、孙传芳的政权倒了，蒋介石派便不肯再革命了。那时，革命的军人兵士，革命的工人、农民，以及一般劳苦的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平民，却都需要巩固这一革命的胜利，事实上便是再深一层而铲除乡村中的豪绅地主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买办军阀等反革命派的田产，而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减租到能使佃农实际享用自己的收获。等到这种时候，蒋介石，以前满口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等，立刻翻过脸来屠杀工农，分裂国民运动。虞洽卿，以前狂叫关税自主、民族独立的虞洽卿等，也立刻手忙脚乱，筹拨一千五百万元给蒋介石，作为屠杀工农的犒赏费。如此看来，中国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叛离革命，完全是因为革命的发达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危害了他们的私利，地主、土豪对于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在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中国资产阶级想造成新式的军阀统治，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包办捐税，中国的资产阶级想保持对于原料收刮的强抢勒索的制度，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继续造成贱价的劳动力。所以革命发展到现今的阶段：湖南、湖北的农民攻打地主、土豪的政权，上海工人领导小资产阶级创造平民的民主政权，革命转入了新的时期，亦可以说是革命进一步的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的时候，蒋介石等便叛离了，反动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宁可去做帝国主义的新式走狗了。所以蒋介石等现在反对武汉国民政府，而自己另外

建立南京政府，摧残国民党革命派的党部，而自己另组织反动派的所谓国民党，凡是这些行动，并非象他们自己所说，仿佛是为着保持纯粹三民主义的政党，肃清共产分子等等。恰好相反，他们的叛变，是表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的初步实行，反对国民革命的进展。

如今蒋介石等从江西赣州屠杀工农领袖起，经过安徽、上海、广州、重庆等处的屠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工人农民的领袖实行其残暴不堪的屠杀，非刑敲打，腰斩，强奸……都是为着要和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保存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制度之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大地主的剥削和豪绅官僚的政权。

但是，革命的怒潮已经将蒋介石等的企图打破了。北伐军赶走了赵恒惕和吴佩孚，农民群众说：“这还是第一步，那些帮助赵恒惕、吴佩孚剥削压迫我们的人怎样？”他们自己积极的起来，遵从国民党的政纲，进一步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湖北、湖南的乡村里，农民已经实行争取自己的政权。他们动摇了土豪乡绅的威权，立刻便觉到：要达到减租减税的目的，必须自己拿住政权，必须造成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感觉到土地的缺乏，他们已经明了，大部分贪官污吏、大地主所掠夺去的租税，不但不能使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实际上都被大地主等所吞没，或者就用他们身上所搜括去的钱，买了杀人的武器，诱骗兵士的群众，组织民团等的武装来压迫屠杀他

们自己。所以农民很明白的提出没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反动军阀及蒋介石等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农民参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领导农民去彻底发展这种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因为农民政权及土地的运动，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巩固自己胜利的最伟大的力量，和劳动法的制定及实施，同样的是国民政府与民众“化合为一”的过程之表现。

现时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仅在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叛离，而使工农小资产阶级之联盟得更自由、更开展的向前进攻，而且还要认清革命扫除了表面的军阀统治于湘、鄂、赣，如果还要继续发展这种胜利于全国（即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必须有坚决的更进一步的铲除军阀统治及买办剥削之经济根基的政策，就是使国民政府的政权之基础实现于更深更广的民众；换句话说：便是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注 释

三月二十日，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的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赵恒惕，见本书第 91 页注②。

吴佩孚，见本书第 41 页注①。

孙传芳，见本书第 264 页注⑫。

虞洽卿，见本书第 178 页注⑩。

这里指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

建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孙中山逝世后,大元帅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改组为国民政府,称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一九二七年一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政府迁武汉,称武汉国民政府,谭延闿、汪精卫曾任主席。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叛变革命,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合流。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并申讨蒋介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同武汉政府相对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国事变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这些事变愤恨欲死，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每一胜利都抱着无限的欢慰。中国劳动者的斗争成为一切注意的中心，是当然的事。中国解放运动之发展的速度，真正是空前的，暴风疾雨似的，但是在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虽得到许多的胜利，而距成功之期，实在还远得很。中国革命不过才发源，它将继续发展下去。但它愈扩大和深入向前发展，则一切困难也随之而加多，这些困难能否解决，实在足以决定革命的结果。本篇将提出威胁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危险问题来讨论之：

主要危险有下列三类：（一）外部的危险，（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的危险，（三）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现在逐条讨论之。

先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不能认

^{*} 本文曾收入《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作为附录二。署名美夫。

为是好的。第一，我们须与全副武装的强有力的敌人争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俄国革命就与中国不同，在俄国没有帝国主义这样直接统治的威胁。我们斗争的结果将改变全世界的局面，我们革命一开始就震撼世界资本的根本利益。很显然的，不经过残酷的斗争，全世界的剥削者是不会放弃他们的优越特权和剥削制度的。第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根本一致反对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就要好些，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恰当主要的帝国主义各国正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互相尽力屠杀，以致没有力量去干涉俄国的事情；这一条件对于俄国革命是有极大影响的。可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就不同了，这就使我们有注意外部危险的必要，这一危险或者使革命在资本的铁蹄之下压迫下去，或者可以使革命运动延长时期。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因这种危险而停止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放下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武器。恰恰相反，我们的党应当在事实上证明它是反帝国主义最坚强最彻底的战士。问题的本身仅仅是我们如何去消灭对于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我们的国际政策。这些问题关系于我们革命的成功或失败。我以为对我们革命的国际政策应按照下列五种方针：

(一)我们应当应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分裂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应当煽动和加紧他们相互间的争斗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我们不当一下子对所有帝国主义者下总攻

击,我们应当对准他们的创口处和在他們最不利的机会中向他们进攻,我们应该避免单个地方的躡等行为(例如禁止所有外人在湖南经商等),当运动还未十分发展,当革命后备军还未移动前进的时候,这种左倾幼稚行动并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结果,而只是使于我们不利的时候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公开直接的战争。

(二)在我们分裂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中,我们不应忘记对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临时妥协或让步,以便易于抵御别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如俄国在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为取得休养和组织自己力量的时期,还甚至于割地议和与德国缔结临时条约(一九一八布列斯特和议条约)。现在谁也明白了,这个让步是临时的,在这个协定中得到的最终胜利的,是革命的俄国。我们不应犯左倾幼稚的毛病,不当为很小的挑拨所诱惑,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策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不过讨论此问题,又免不了有许多新困难。当俄国与德国帝国主义订立协定的时候,俄国已有无产阶级独裁作保障,因此这协定不是向外国资本的投降,我们没有这种保障,因此我们应当十分注意使与外国的协定不超过了革命的要求之外,同时,更毫不客气的和一切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奋斗。

(三)我们应当尽量的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联系,在国际问题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应当是统一的。现在我们仅仅重述孙中山联俄的遗嘱已

经不够了，我们现在已占有国家的地位，现在已有好几省在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下，我们应当用国家的实际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嘱到事实上去。这样就可更加巩固革命的阵地。

(四)我们应更加坚决的继续加紧我们的反对封建制度及军阀的争斗，这样即是动摇和消灭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如果我们以为帝国主义仅是外面的敌人，那就非常错误了，其实外国资本在我们内地有它的地位，如果军阀是外国军事势力扩大的向导者，则其余各种封建的地主、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买办阶级等，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扩张的向导者。外国资本剥削我们的系统，是建筑在这些反动成份的基础上面，所以破坏这个剥削系统，捣毁这部剥削的机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继续北伐战争，消灭一切新旧军阀，就是给帝国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就是破坏它在中国之政治经济的统治。

(五)我们应该与国际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更亲密的结合，我们这种工作应当隔离第二国际，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制度的走狗。我们应使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正确的了解我们斗争的情形，使他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共同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是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不亚于第一

个问题(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之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则将保证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过程中的一切任务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同时,更保证这一革命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假使资产阶级抓住领导权,则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所趋向的胜利,不是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仅是改变这一统治的形式。我们试一看过去各种情形,就可看出中国革命直到现在还表现有两种趋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之趋向。不过就阶级的意识看来,在革命开始发展的时候,其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资产阶级不免的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因为民族革命很快的发展,同时使国内的劳动群众很快的组织起来,这样广大的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发展,造成无产阶级在竞争中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我们的革命一直到现在就在这种互辩的矛盾中间发展,一直到现在这两个趋向(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是共同存在着。现在因为革命势力占据了扬子江流域,占据了主要的经济区域,收回来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无产阶级暴动占领了上海,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余孽,群众运动继续发展,结果必定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这两个趋向已达到不可并存的程度,已达到某一个必须消灭别一个的时候了。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当中,已完全表现出酝酿已久的破绽,就是革命或者坚决的依靠群众与帝国主义斗争,或者从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少许的让步而即与之妥协,并掉

转头来限制、束缚以至于消灭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使它一方面参加民族革命,同时又选择第二条道路走。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好玩的参加革命,所以它们必选择第一个道路。民族革命之统一战线急剧的分裂了。这两个趋向首先是隐潜的准备的形式,到了现在这两个旧同盟军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变节,脱离革命的战线,我们不能认为(有些同志都认为是这样)已把两个趋向竞争问题解决了,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争得革命领导权的危险了。但事实决不是这样简单,资产阶级(这里讲的当然不是那部分纯粹外资走狗的买办阶级,而是那部分曾经握武器打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脱离革命,但是还不是急转直下的完全变成反革命,而加入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在某一定期间内,它还表面上保存自己独立的力量;虽然它是逐渐的走进买办封建军阀的公开结合中去,但它决不一下就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尝试和按照自己目的去解决革命问题的企图。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它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这最后一营垒对于革命的危险决不下于第一个营垒,这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危险,不在它公开的反革命,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它还挂出假革命的招牌。

因此,如果谁以为资产阶级现在已脱离了政治舞台,那是非常之不正确的,资产阶级还正在争取领导权,它还正在寻觅和选择社会各阶级中自己的同盟者,上海与广东的状况便是最好的榜样,那里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利用改良派的工人、民团、手工业者、军队来反对革命的力量,分离一部分工人反对别一部分工人,利用一些农民反对别一些农民,利用民族主义来愚弄和蒙蔽人民的思想与觉悟,特别是利用之以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谁胜的问题——民族改良主义或是真正革命的营垒,带法西斯蒂形式的资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或是无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是还没有解决的。领导权的斗争是继续着,资产阶级有夺取领导权的危险依旧存在。在这个领导权斗争的新环境之中,我们应执行下列的任务:

(一)最主要的任务——隔绝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同时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但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佣、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应付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以为吸引城市小资产

阶级到革命联合战线中来是可能的事，但那部分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且与封建制度对农民剥削有密切关系的当然除外。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

(二)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琛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

(三)我们不应当让民族改良主义统治下的省份之反动政权趋于稳定，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去扰乱它的后防，我们应当揭穿它改良主义假革命的面具，应当扩大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煽起农民运动，我们应当准备力量，不仅由外部并且由内部去消灭这个民族革命背叛者的政权。

(四)在国民政府下的省份,我们应当更扩大深入的去发展群众运动,由原始的变到自觉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应当在政治上巩固和加紧去指导群众运动,我们应当更勇敢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建设民权主义的政权。我们应当达到武装工农,以保障革命的胜利,聚集我们的力量实行社会的改造,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与军阀。

(五)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在最后,但其意义可不是最后的)。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这是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看第三种危险,这里所要讲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拿中国无产阶级在大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数量与集中看来,它足以实现革命领导权作用。但主观的力量如何呢?它的革命意志是否充分发达?在某种政治影响之下它是否不坚强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西欧的工人运动给我们不少的经验,虽然客观上革命的情绪很充足,但因为工人阶级主观力量的缺乏准备,以致革命未能胜利。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轻视的,这问题已不仅是在

理论上成为有兴趣的问题了。我们要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可以发生那些危险,然后才可以与这些危险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有四种形式,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之思想与政策。这四种东西就是改良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孟塞维克主义。中国工人运动中有没有发展这些政治趋向的基础呢?试分别言之:改良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产物,那里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的一部收买少数上层工人,有时更及于很大的一部份工人;如果中国不变成帝国主义的国家,则中国便没有这种改良主义的基础,这种危险可以说没有的。但从别方面看:一、在中国本地有得很高工资的工人;二、这部份工人使改良主义、黄色职工国际与第二国际在中国找到他们帮手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得个结论说,如果中国工会发生改良主义的趋向,则是由于受国外改良派的影响。然而外来的改良主义或者可以抓取一小部份工人,但广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危险不十分可怕。再看第二种——工团主义的危险,这一主义是发生在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比政治组织发展较早的地方,并且因政党的时常变节,使无产阶级对它失掉信仰,以致认为政治斗争是无用的。中国的环境很有些象俄国,经济组织是由政治的组织产生的,我们党指导自己所产生的组织不致发生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错误观念,因为中国在外国资本的统治之下,所以无产阶级一发生经济斗争时

便不能不联贯到政治斗争,也如同在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不能不转变到反对俄皇的斗争一样。这种工团主义的危险在中国比较更少可怕的成份,除非共产党政策犯了极大的错误或者反动派得着胜利,才能够使工团主义得到发展。但是即使反动派得着胜利,他们很长期的压迫工人的政治积极性,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种危险——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本身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这种思想的基础的,它的基础是游民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但因为无产阶级与这些社会成分有关系和受他们思想上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发生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可能。若从这个观点看来,则不能认为中国的情形是好的,因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假如中国没有帝国主义者这样强力的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各种政治运动,则中国工人中或真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薰染的可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又促进了它的敌人的团结,因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但无产阶级本身须有最大强度的组织性,并且须组织全民族中被压迫与破产的各成份,使能共同拥护无产阶级作战的方针。

以上是分析敌视我们的三种机会主义。至于第四种孟塞维克主义则较复杂,孟塞维克主义在俄国曾得到过完全特殊的发展,孟塞维克派不明白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之间的区别,不明白无产阶级之奋起,成为革命主要动

力,有使革命性质变化的可能。这些思想客观上是表示资产阶级要实行它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的尝试。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中国情形很有许多与俄国相像的地方,孟塞维克在中国有发展的基础,当然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因为苏联存在的事实,胜利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经验的指示,对于这种危险成分可以减少,但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着的,并且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某一时期中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来把自己总是看作“在野党”的趋向,不求参加革命政府的趋向,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以致逐渐的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迟钝了它的斗争,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否认这些错误是不赦的罪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所以有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意义,就是在于它用无产阶级的光明态度指出过去的错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最痛苦的结核,当以孟塞维克的染毒为最。因此,我们必须用在俄国战胜孟塞维克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思想,注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以预防孟塞维克的毒素。在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取得胜利!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于武汉

注 释

布列斯特和议条约,又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了这个和约。和约虽然使苏俄丧失部分领土,付出巨额赔款,但却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整顿国家

经济和建立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个和约。

孙中山联俄的遗嘱,指孙中山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病危之际,用英语口语授,由鲍罗廷等笔记,经孙中山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内称:“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同盟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第二国际,见本书第340页注。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遭英国水兵袭击,当场死伤数十人。一月五日,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数十万人的大示威,工人英勇地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一月六日,九江工人也英勇地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二月十九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李济琛(一八八五——一九五九),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代理师长,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不久失败。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爱国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

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字健生,广西桂林人。国民党桂系首领之一。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二七年参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西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认为工会(即工团)是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把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工人阶级无须有自己的政党,只要依靠工会,采取直接行动,如罢工、抵制、示威、怠工等,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胜利;反对政治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

切，因而亦被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主义，见本书第 90 页注^⑬。

孟塞维克主义，参见本书第 330 页注^⑩。

《俄国资产阶级 革命与农民问题》自序^{*}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

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些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但是,总是因为没有时间,或是病,始终不能如愿。去年春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书,所集材料并不多,不过做读者一个引起兴趣的概论罢了。我的计划是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二)俄国无产阶级之斗争与共产党;(三)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四)苏维埃及社会主义之建设。如果客观情形允许我,我必定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心愿。如今出版的是第一部分,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未发生以前革命运动的

^{*} 瞿秋白原计划编写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当时只写成了第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是他为该书写的序言。

记载,从最古的农民暴动起一直到最初的劳动运动,都有较有系统的叙述,其中尤其注意农民问题。俄国十二月党的革命以及后来各种社会主义及民粹主义的运动,无不与农民问题有关涉。历史上断定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

瞿 秋 白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于汉口

注 释

俄国社会民主党,见本书第90页注①。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俄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俄国的贵族革命者穆拉维约夫、彼斯捷尔等乘机在乌克兰和彼得堡发动起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和实行君主立宪。起义不久被镇压,穆拉维约夫等五人被处死,一百余人被流放。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 ,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 ,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 ,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 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国民党反脸的宣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汪之反脸 ,其主因不是罗易给他电报看 ,罗易给电报与汪看自然是错误的 ,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在汪接到冯不反蒋 的电报时 ,非常震怒 ,于是他更加力宣传反蒋 ,唐等于是以反共挟之。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 ,汪表示被人强奸 ,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 ,恰好 ,此时得到了罗易给他的电报 ,得到了新的出路 ,于是将此电报来作为他反脸投降唐等的工具 ,于是公然主张反共。此后 ,汪的主要敌人便是张发奎 部下的共产分子了。张此时亦有点动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负责这次会议的筹备和领导工作 ,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并宣读了有关工人、农民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个报告节录自《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编者作了个别的文字订正 ,并加了标题。

摇,曾有叶 暂时退出 CP 的要求。我们党内当时也有人有此感觉,但结果并未成为事实。同时,孙邓宣言^⑩之发出,所以我们党的宣言比较坚决。这次南昌的行动^⑪,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七月十五日以前,我们参加政府还有由上面来帮助发展下层工作的条件,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叶贺^⑫发动之后,张非常慌张和震怒,于是马上带了几百卫队坐火车去阻挡自己的部队,他自以为所有的旧部仍应归其指挥,结果自己身边的一枝枪都被缴去,这也许是客气了一点。张第二次的讨伐命令是非常软弱的,是相机发展。由此可知,张已无进攻之能力,朱培德^⑬的力量亦很薄弱,两师皆不能作战。今日报载我们军队已离开南昌。从前中央曾有一命令去前委^⑭,不有多久,他们已照此命令进行。现在我们主要的敌军是三十五、三十六两军^⑮。但唐决不肯用此力量来为张出力,而要用来夺取江苏的。第三派势力在此次事变前已有酝酿,由白崇禧^⑯、李宗仁^⑰担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担保武汉,以汪为领袖,并由白、李要蒋下野。第三派与唐有冲突,但现不会马上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产军。

将来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领袖如奉张、宁蒋、吴佩孚^⑱等,以后则分为许多小军阀,进到很紊乱的时期。这证明封建阶级之倒台,资产阶级之软弱,这一堆反革命的冲突非常厉害的,这是革命前途之一优点,因

为他们内部极不稳定。

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①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他们。列宁过去也非常注意打击这种人,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三,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我们对政府有三个阶段:1、不参加政府;2、参加政府,但发生许多错误,失掉了参加政府的作用;3、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民政权。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卫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

因各种要求,常委及国际代表起草了三种决议,提出今天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一,如何做国民党工

作,团结国民党左派,我们已发表了一个告国民党同志书^①,此书应为左派政纲;二、军队中及兵士中工作,现在也很重要,我已与一飞^②商议要作此工作,临时政治局应注意此工作;三、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纲要追认。

注 释

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揭露汪精卫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宣布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并向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

汪,即汪精卫,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在把决议送达中国之前,先将决议的要点,即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等,用电报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给中共中央的同志看,却先送给汪精卫去看。给汪以反共的口实。

冯,即冯玉祥,蒋,即蒋介石。

唐,即唐生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联席会议,指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

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叶,即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一九二六年十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张发奎的政治态度动摇,他要求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叶挺等退出C P.,即退出中国共产党。

^① 孙,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邓即邓演达。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邓演达在此前

发表了《辞职宣言》。他们在声明和宣言中都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反共政策,提出辞去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职务。

① 南昌行动,指南昌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八月五日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九月底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力量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

② 叶、贺,即叶挺、贺龙。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字云卿,湖南桑植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③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人。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统辖第三、九两军。

④ 前委,即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谭平山亦参加前委会议。

⑤ 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均隶唐生智部。

⑥ 白崇禧,见本书第368页注。

⑦ 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字德邻,广西临桂人。国民党桂系首脑。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西征军总指挥,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⑧ 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南京政府蒋介石,直系军阀吴佩孚。

⑨ 张兆丰(一八九——一九三),河北磁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前夕,任国民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属方振武部),驻军鄂豫边境,为我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⑩ 告国民党同志书,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⑪ 一飞,即王一飞(一八九九——一九二八),浙江上虞人。一九二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秋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十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一月在长沙被捕牺牲。

国民革命完了吗？^{*}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旧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

* 这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的第二部分，原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

发展本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到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彻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彻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革命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

注 释

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见本书第 368 页注。

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所以暴动的策略与一般斗争的方式,成了最紧迫严重的问题。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中国的统治政权,现在已经由旧军阀买办阶级手中,大部分移转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豪绅资产阶级在各地都经过国民党而取得政权,力求巩固其统治及其剥削制度,引起工农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最近半年以来,广东农民从四月就有武装暴动,直到贺、叶入粤;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改变之后,就有长沙扑城的暴动,武汉反动之后有鄂南、鄂西的暴动,有醴陵、平

^{*} 这是《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原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

江的暴动；最近江苏宜锡、江阴、海门等处也有农民暴动；直隶京东各县以及山东范县、阳谷，都有如此的暴动；此外，便是豫、鲁各省红枪会、天门会的武装斗争，也带着有农民暴动的性质，虽然他们的领导权往往落于豪绅小地主的手里。这种情形，很显然的表明中国农民普遍的武装斗争的自发的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湖北、湖南、广东的许多次经验之中，很明显的证明：一、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正式军队也好，土匪也好，甚至于工军农军也好）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是群众的，但是，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对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第一，什么是游击战争呢？列宁说：“现在的军事技术，不是十九世纪中期时候的军事技术了。用一大群人去抵抗炮队，用几支手枪去守巷战时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战策略’，这就是游击战争的策略，实行这种策略的组织，便是便于移动的很小的小队伍：十人队，三人队，甚至二人队。”列宁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是指城市中的巷战而言。然而游击战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当暴动初起，革命

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现在中国农村中的暴动，客观上正是形成这一种策略。农民暴动初起的时候，往往事实上只有小队伍袭击敌人军队（团防、民团等）；他们对于没有武装的豪绅地主以及武装并不很大的敌人，固然仍旧是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可是，一般而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采取与反革命军队作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

第二，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游击战争只是暴动的初期现象，而且只是暴动中武装斗争方面的策略。并非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也并非暴动之中除游击战争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方式的斗争，恰好相反。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是群众的斗争，而游击战争不过是这个总暴动中袭击敌人的武装斗争之一方面。整个农民暴动应当包括什么？暴动不是几个武装队袭击敌人便算的，暴动不是群众之外，另外有什么第三者的武力来解放群众的。现在中国各地农村中，所以发生如此之多的暴动，正是因为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不能忍受，而群起反抗，正是因为各县各乡地主豪绅的地方政权，受革命潮流的冲刷而动摇崩溃，因此中国农民群众

起来暴动,起来斗争。斗争的方式,开始可以是很平常的:农民不肯交租或交税、交捐,不肯还债,尤其是乡中苦力贫民穷困到极点而起来反抗,群众的革命情绪普遍的高涨,他们拒绝收租收税的豪绅走狗,他们杀戮这些豪绅走狗,他们群起围攻地主,吃大户,吃排家饭,他们焚毁债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们进而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富豪的财产。这些种种方式的革命斗争的爆发,甚至于有时客观上以改良主义运动为导火线;例如要求减租不遂,要求减免钱粮不成,因而进一步的趋于暴动。因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政府和所谓党部,往往想用这种改良政策来欺骗农民,但是事实上豪绅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这些让步,而且这些政策决不满足农民的要求,国民党及新旧军阀,始终实际上是用强暴手段压榨。总之,农民运动的这些斗争方式,是暴动发动群众后必然的现象,有些斗争方式并且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经验,如吃大户、哄堂等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的做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的群众斗争进展起来。群众感觉武装斗争的必要,自然游击战争便要同时发生,自然群众之中要求有游击战争的组织,有集中指挥的武装队之成立。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的。农村中群众斗争的发动,同时也不能不转入武装斗争而不从事于游击战争。

第三,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反动派如吴稚晖等,往往说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是杀人放火。是的,农民暴动之中是有许多杀人放火的事:被压迫的反抗屠杀,反抗豪绅地主国民党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杀杀人者的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杀戮豪绅地主的运动,是努力赞助而领导的。但是,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所以,即使某地暴动的开始,并非群众的直接斗争,而是少数的武装革命党人或农民先动手杀戮豪绅,袭击敌人武装;那么,这样开始的斗争也应当立刻引起极大的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单纯的武装队的游击与群众斗争不相混一的斗争,必然是军事投机主义。所以即使客观上有万不得已而从武装队的游击开始暴动的事实,这种暴动也必须立刻发动群众起来!

因为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出来的武力,推翻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自己的要求。杀戮豪绅只是斗争的开始,只是肃清敌人势力的一步;要树立革命的群众的势力,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

第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农民群众斗争发动而开始游击战争之后,革命势力必须要继续的进取而又进取,决不能保守的,所以决不能停滞在游击战争的一阶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苏各省以前的农民暴动,正因为不能从游击战争更进一步,而未得着胜利。最近

(十一月初)广东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便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海陆丰的农民,在叶、贺入粤以前便暴动起来,随后叶、贺虽然失败,但是农民暴动却从军事行动(游击战争)进而至于群众的斗争(尤其是海丰),由群众的斗争而创造更大的武力,并且有叶挺残部改编加入农军,增多武装的力量;于是他们努力发动陆丰、碣石、紫金等许多县农民的斗争;而且他们的作战,已经不须采取纯粹游击式的策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

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各省各区的农民暴动,将要运用这种斗争经验之中锻炼出来的策略,使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动摇、削弱,以至于各自推翻当地的反动政权;而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

注 释

叶、贺,即叶挺、贺龙。

许克祥政变,即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驻长沙的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率兵一千余人于五月二十一日晚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等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因二十一日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这一事件又称马日事变,或马夜事变。

宜锡,指宜兴、无锡。

红枪会、天门会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民间结社，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流氓无产者。

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是一投机政客。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法国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一九一八年在法国办里昂中法大学，曾迫害进步学生。一九二四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后，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

悼张太雷同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张太雷同志死于广州暴动 时反革命军阀的乱枪之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理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太雷同志，被反革命军阀的惨杀而死了！广州十二月十日晚上的暴动，负主要的指挥责任的是张太雷同志。当天晚上，革命的兵士进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起来解除广州反革命的炮兵营的武装，占领反革命政府的机关，十一日天明的时候，差不多全广州市已经完全为工人赤卫队所占领，反革命军队大半解除武装，成批的兵士群众，到工人赤卫队来投效。于是当天便开革命群众的代表大会，选举苏维埃政府。张太雷同志在暴动前之三四天，每天晚上亲自到革命兵士的秘密会议去做报告，去组织他们。暴动胜利之后，他便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指定，提出于广州工农兵代表会，一致通过而被委任为军事平民委员长；又因选任的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苏兆征 同志尚在海丰未能赶到，由他暂代。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二期。

他受共产党的指挥而组织广州的暴动，能够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极其艰苦的工作。暴动的前后，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十一日，他便听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广州市赤卫队，极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和革命的群众猛力攻击长堤一带的反革命机关，并且极力要打过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灭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势力。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军舰及反革命的国民党军舰的阻挡，这屡次的攻击始终没有成功。十二日晨，因为开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张太雷同志出席报告。这时候，李福林的军队，已经由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在僻远处渡珠江，绕道广州北部来攻击。广州市内的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大半都开到北部去应战。所以敌人又能乘虚攻袭公安局——暴动后之总指挥机关。等到张太雷同志从群众大会回到总指挥机关的时候，这机关已被敌人占领，敌人使用乱枪向他的车子射击。结果，太雷同志身中三枪，最后一枪中在心窝，胸膛炸裂而死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虽然当时群众和赤卫队又重新将公安局夺回，但是十二日那天晚上，反革命军队已经战胜，革命的工农军不得不退出广州，到花县一带去。而张太雷同志瞑目的时候，广州暴动还没有完全失败呢。

张太雷生于一八九八年，他的家乡在江苏常州。他父亲是一个小商人，很早便死了。他那时还没有十岁。他的母亲一直是借债度日。他在这种困苦的家庭中，勉强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各种

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起云涌的起来。张太雷就参加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后来共产党成立时之最初组织。他加入党之后,便抛弃一切而为党工作。他曾经被派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之第三次大会。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时,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时,被任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春即调往广州,与陈延年同志共同工作,担任《人民周刊》的编辑,同时帮助鲍罗庭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时,他被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紧急会议,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派到广东,担任广东省委员会的书记。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①、王荷波^①……,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

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注 释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

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苏兆征(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长。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广州起义时被任命为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李福林(一八七四——一九五三)，广东番禺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广州起义时，李命令其驻守西江、北江的部队返回广州，镇压起义工人。

共产国际，见本书第139页注。

陈延年(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被捕牺牲。

《人民周刊》，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在广州创刊，张太雷曾任主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停刊，共出版五十期。

鲍罗庭，又译为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苏联人。一九二三年十月来中国，任苏联政府驻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回国。

南昌暴动，见本书第376页注^①。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长期领导党在北方的工作，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就义。

^① 赵世炎(一九一——一九二七)，四川酉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

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在上海被捕牺牲。

① 王荷波(一八八二——一九二七)福建闽侯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四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二五年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同年十一月，在北京被捕牺牲。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

本报(《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篇社论没有经过编辑部主任看过。他的意义，用来解释世界革命中直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苏维埃政权，一般的是对的。但是，论到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独裁制，那便不正确了。广州暴动在事实上组织起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注意研究的。我们认为必须郑重说明中国现时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发表的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是当时在该刊任编辑的郑超麟所写。发表前未经编辑部主任瞿秋白审阅。瞿秋白不同意该文的观点，并写了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该刊第十四期社论栏刊出。

—

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之后,的确进到更高的阶段,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国民革命,而是工农群众的苏维埃革命,这一革命是要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这苏维埃革命就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

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是什么?

苏维埃政府,便是革命的民众自己选举出代表,组织代表会议,做一般群众斗争的指导机关。革命的高潮之中,这种苏维埃组织起来,必然要成为暴动的指导机关;暴动胜利之后他便成革命的政权机关。

广州暴动中的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如此,现在正在奋斗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也是如此。所以苏维埃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中,最主要的意义是“革命群众的斗争指导机关”。但在革命胜利之后,生长而成革命的国家政权,具有一定的特殊的组织方式,与一般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是绝不相同的。

这种政权形式是否必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呢?

苏维埃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如果能组织起来,那就必然要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一,这种国家之中要组织苏维埃必须有下列三个条件:“(甲)一般工人、女

工、兵士及普通劳动人民之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乙)经济政治的危机已经非常之剧烈，使政权开始从旧政府手中滑出来；(丙)而且在极多部分工人之中，首先是共产党之中，开始坚决的有系统有规划的争取政权之决心，已经成熟。”（见共产国际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之《什么时候及怎样的条件之下可以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决案。）二，这些条件之下而有苏维埃的组织，那就必须进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使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否则苏维埃或者是失败而被解散，或者是成为“变种的”苏维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或者有苏维埃，那就要建立起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或者是没有革命形势，那就根本不能组织苏维埃。

可是资本主义前期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上，是否可以组织苏维埃呢？是否这种苏维埃一开始是无产阶级独裁制呢？这一问题对于现在的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说：“一切民族主义的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因为落后的国家中的主要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却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之代表。”列宁又说：“在半封建制度束缚之下的农民亦能很好的接受苏维埃组织的意义，而且在实际上去实行这种组织。一般被压迫的民众，不但受商业资本的剥削，并且受封建诸侯及封建式国家的剥削，能够运用这一工具，运用这种组织于他们自己的环境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如今中国苏维埃的组成于广州，尤其是在海陆丰，很明确的更加证实列宁

所说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既然已经从联合资产阶级的阶段进于反对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的革命可以，并且必须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中国可以建立苏维埃。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条件，在一般农民暴动以及城市暴动中组织苏维埃的条件，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一样，就是必须有群众的革命高潮，必须统治权已经在治者阶级手中动摇起来，必须群众的先锋，群众的先进份子已经有争取政权的决心。所不同的，不过是在中国现时的革命中，所指的群众，除大城市中是工人外，对于一切农村外县，是指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而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或者有苏维埃，那就要建立起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或者是没有直接的暴动形势，那就还不能组织苏维埃。中国的苏维埃也是不能和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和平的并存的。这和纯粹社会主义革命之中，例如英国的苏维埃不能和英国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并存，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必定是政权性质的组织，而不能是普通的群众组织。

—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何以还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制？

中国革命的发展,虽然已经到了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阶段,但是他的客观上的任务还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并不仅是因为他曾经经过国民党的阶段,并不是因为在前一时期工农曾经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可以说:国民革命的时期过去,中国革命便已经变成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肃清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之代表”。现时农民的要求,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给农民,以及一般兵士、贫民的要求,如没收豪富救济贫民(劫富济贫),分配土地给兵士等等,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最彻底的最激进的民权主义的要求。甚至于土地国有的要求,单独的讲起来,也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例如列宁关于一九一五年革命时对于土地问题党纲的解释)。如今中国农民暴动的怒潮之中,很明显的,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

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

中国现时苏维埃政权开始成立的时候,在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地方,很明显的,主要的急切的任务是肃清豪绅地主的权力,没收一切土地,摧毁一切封建式的旧关系,甚至于部分的会开辟些资产阶级式的,就是自由贸易的发展(例如海陆丰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城乡的贸易大兴盛起来)。这种各县各省的工农兵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初步胜利的时候,客观上自然不会一开始便有直接的社会主义任务。所以也就不能说,中国现时的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形式,因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必须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或者极大的范围以内胜利,有着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然后中国革命才从这一苏维埃的工农革命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现时这一革命的完全胜利,将要是民权革命的结束,亦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坚决斗争的开始。……当事实上已经不仅是革命,而且已经是革命之完全胜利,那时,我们便要以‘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独裁’的口号,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权主义独裁’的口号。”(借用列宁所著的《两个策略》上的话)

中国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之模范。亦就是所谓“由民权主义革命生长而成社

会主义革命”的模范。中国现时的革命明确的证明：一般封建制度之下农民和劳苦民众，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却能很简单明了的了解苏维埃之意义，而去实行建设他。苏维埃的红旗，已经成为全中国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不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之旗帜。中国的苏维埃也就将要由这种普通劳动的民权独裁制生长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

注 释

蒋介石，见本书第 257 页注②。

白崇禧，见本书第 368 页注。

张作霖，见本书第 41 页注①。

广州暴动，见本书第 390 页注。

中国共产党与机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四月)

中国革命的过去 ,其实已经说过了。但是 ,革命的事实之中 ,还留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过去没有说。

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 ,是一九二三年夏天的第三次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发端 ,还在一九二 年 ,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 中直接产生出来的。

五四运动 ,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发端。辛亥革命之后的真正第二次革命 ,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革命作用”。同时 ,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也开始了。当时的形势 ,显然是在“革命快发动了”的一般的预觉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双方都在团集准备自己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之形成 ,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团聚的开始。

中国革命果真发动了 ,他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

* 本文选自瞿秋白为党的“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主要是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报告曾油印发给“六大”代表 ,并出版了单行本。

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从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革命事实,表现得很明显的。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在这“民权革命”之中取得领导权,这一革命的前途是什么,是否中国的民权革命将要造成欧美式的民权政治而告一段落,然后再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所谓两次革命的理论),当前这一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内容是什么,革命的斗争方式是如何的运用等等问题,都摆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面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客观上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总答案。但是,主观的策略与总的战术路线,是模糊的笼统的,因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共产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因此,对于上面所列几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策略,客观上是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初期,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初期,这一策略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得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是如何观察呢,第一种意见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是“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苟且偷安”的,他的发展将要使他革命起来。无意之中,这是承认资产阶级应当要领导革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意见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于零,所以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

要由国民党革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共产党且“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说法中间,含着很明显的矛盾,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承认: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方能给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第三种意见是:“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动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导权。……到国民革命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可是,当时虽然有三种意见,第三种意见是并没有传播,甚至等于没有存在,因为第二种意见仿佛是第一、第三两种的综合,即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

第二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为去争革命的领导权呢,还是去到国民党里送领导权给资产阶级。国民党中有资产阶级参加是无疑义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很弱,没有自己的政党。改组的国民党是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方能变成革命的政党,如此,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而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是可能而必要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前途既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对于领导权的问题自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参加国民党是否为争领导权的问题,结果是模糊的。当时对于如何争领导权的问题,也有许多不同系统的意见。一是说: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便可以说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因此说国民党的左派是有的,不过

不对他们有过的奢望，革命口号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领导之权；因此，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与职员，共产党也不可多占，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蹈“包办”之嫌。对新右派也不必抱尽行排除的目的，因为反正国民革命是要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五卅那年十二月间，中央和西山会议的“退伍派”孙科、叶楚傖、邵元冲等的上海谈判，应允国民党中央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等的条件）。二是说：要争领导权，无产阶级的工人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不要用国民党来集合革命势力，因此不必排除国民党的右派，因为反正国民党是各阶级混合的，无产阶级不必去争国民党的领导权，甚至说：“一般小资产阶级已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国民党领导权可以交给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但也不必“梦想国民党成为纯粹左派的政党”。三是说：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既然参加，便应当取得其中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实际是不存在，必须无产阶级实际争取国民党，一直到排除资产阶级的右派至于净尽，这就必须扩大国民党，使广大的群众加入形成左派，尤其是无产阶级要勇敢的领导左派，这最后一派的意见，客观上必然要发展到变国民党为纯左派的政党。这三种意见，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史上，是极端混淆交错的：广东方面，大半是偏于第三种意见，中央是以第一种意见为骨干，而掺杂第二种意见的，因为这两种意见的性质是很相同的。国民革命之中争领

导权与国民党之中争领导权,事实上是很密切的关连着。但是当时的中央政策,虽然时时的提着共产党要独立的积极行动,要批评国民党的左派(这点是上述第三种意见中所不甚明显的缺点),然而实际上这种“独立”,并非积极的去争领导权,却倾向于让开国民党,使“左派”去领导,自己退出对于国民党的领导,做“极左派在野党”,美其名曰国民党外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

第三问题是政权问题,亦就是两次革命的问题。两次革命的意见是:这一次革命由国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产党可以取得政权。中国共产党当时这种意见,当然是跟着革命前途与领导权问题上的答案来的,所以后来的参加武汉政府,事实上便不是去领导革命向前发展,却去帮助国民党“纳革命于正轨”的办法,对于革命的民权独裁之观念的忽视,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最早,对于这一问题就有不同的意见:一,共产党不可参加国民政府,以免国民政府之太赤;二,共产党员不可参加国民政府,因恐党员的腐化;三,共产党应当力争参加国民政府,以发展革命。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客观上必然要进于国民政府内的政权之斗争,因为国民党日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

事实上随后革命的发展,从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进到小资产阶级的党权运动,国民政府的左倾已经是工农群众自发的伟大斗争的结果。湘、鄂、赣各县民众团体,尤

其是农民协会以及工会,以至于国民党党部,日益成为地方政权的权力机关。上海暴动更将政权问题直接提到中央委员会面前。革命发展的前途,早已将政权问题的答案指出来,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党部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的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⑩)。然而中国共产党,更不用说国民党了,对于国民会议、省民会议等的政权问题始终是模糊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必然的将自己团体权力筑成地方政权,亦就是国民会议政权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发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有一个通告(七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第一号通告),决定以“一切政权归民众团体联合会议”的口号,作为北伐中的政权问题的方针,但是这一决定虽然经过党团而通过于十月十五日的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始终是被一般同志所忘却,确切些说,被中央所忘却。于是,自发的群众的革命行动,扩大国民党党权成为民众政权,事实上成为共产党员加入武汉政府之基础的要求与中央的指导离开了。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参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则走到赞成武汉国民党中央限制民众团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第四问题是土地革命问题,亦就是革命主要的社会

内容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中国共产党当初对于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主要的联盟者是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必须是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这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土地革命的党纲。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到五次大会^①。五次大会之前,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有许多:(一)最早有说“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难成功”的;(二)有说“谁能真正打倒军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便跟着谁走”的;(三)有说“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关于土地问题,谁也不曾说起——认真的说起。后来农民运动事实上大大发展,农民政权与土地的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着农民群众走。总之,当时有一个一般的倾向,便是认为农民运动是日益重要起来了。无论中央主观上如何的讲“乡村联合战线”也不能拉得住农民了;无论中央如何认为“不应当空想出地主问题来讲土地问题”,也不能“劝醒”农民或乡村中的“共产主义的实行家”了;于是对于农民运动,不得不认为他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于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反帝国主义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认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农有”直到“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之激进的或妥协的决定中,都没有坚决明显的对于革命内容之认识在内。所以对于以土地问题来决定国民党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终是不赞成的。

第五问题是革命斗争的方式问题,亦就是民众动力与军事动力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以及豪绅地主阶级,以军事战争为自己主要斗争方式,利用兵部已经组织好的军队(破产失业的农民群众),去打北洋军阀。这种斗争已经是早就存在的事实。无产阶级发动极伟大的群众的运动,罢工抵制,示威游行,领率着一般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斗争,工农、学生、妇女甚至小商人的群众团体迅速的发展扩大,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这亦是成了事实。这两股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一是说:军事动力绝对要不得,如果劝国民党不听,让国民党去胡闹好了,我们且“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二是说:军事动力可以用来反帝国主义,国民党会联络,我们也可以帮助他联络,借此民众可以得些自由,同时,民众的武装要有些限制,以免冲突;三是说:革命既然全仗兵力,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些军队,联甲反乙,帮助民众;四是说:无产阶级农民的罢工、减租等斗争方法,必然要转到武装斗争以至于暴动,如此,军事动力与民众动力势必至于由“合作”(初期的“合作”是可能而必要的)而至于冲突,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必须争取军队中的兵士。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实际上第一种意见是归于消灭,或者应用到民众武装斗争,以组织尚未完好为口实而延迟斗争;第四种意见只在上海暴动之中得着部分的表现;一般的情形,都是第二、三两种意见的错综参杂的执行,结果,

虽然极大多数甚至全体的工会、农民协会,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以至大多数的国民党下级党部,都在中国共产党党团影响之下,然而工农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及劳动童子团等并无战斗的准备。武汉政府之下,民众的武装组织之政治的认识,可以无疑义的说:他们估计自己的任务只在反对“徒手的反动派”了,至多只在对付反动派的“秘密武装”了(如所谓蒋介石的奸细,地方上豪绅雇用的打手)。至于“国民革命军”^{①②},这些尚未公开反动的正式军队,就要靠中央去联络,要靠政治部同志去游说,要靠应付得好,可以联甲制乙的牵掣,可以联络整个儿的革命部队去打倒整个儿的反动部队。民众的武装组织,什么自卫军、纠察队是不能和他们打的。兵士——破产失业的农民,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注意的,即使有“兵工联欢”等等运动也只是浮面的,没有提出兵士的切实要求,没有去宣传兵士,没有将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的要求联合,只有对于军长、师长的注意联络,只有注意政治部的点缀工作,政治部是装饰丑恶的师长、军长的反革命鬼脸之脂粉,“政治部是姨太太”。政治部最好的成绩,只是使豪绅性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性的,如果群众之中自发的讨厌这些军阀,那么,往往直接表现于厌恶丘八——十五六年来的“军民恶感”的旧方式。兵士群众也就很容易受军阀的蒙蔽,听他们说工农共产党专是反对军队,“妨害军食”,“捣乱后方”。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主要问题的答案,客观上

是违背革命的路线,其结果,根本上无形之中要走到限制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就是承认中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领导权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创造民权的革命独裁制,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还是要国民党成功的,政权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决不可以参加或掠夺”。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彻底领导民权革命到底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便是反帝国主义的,不是土地革命,因为国民党中有赞成反帝国主义的左派,而没有赞成土地革命的左派”。加入国民党,是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争取革命军队中的兵士群众,并且发动工农的阶级斗争以至于武装的夺取政权或保障政权,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决不可破坏国民党的军队,而只能利用之造成好军队——资产阶级的军队,而使民众得些自由,以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如此当然到了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关键,中央要认为“危险”——危害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了。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既然有如此的模糊而不正确的观点,机会主义就隐约的成为系统的思想,虽然许多负责同志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倾向,然而没有能逃出这个系统的。于是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变成妥协

政策的护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远从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于从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义的根源。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则,就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就是留恋着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直到不可能的时候,还要留恋;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和土地问题、豪绅政权问题之重要,直到农民群众自发的发动伟大的斗争,还要加以阻止;误解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将店东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甚至于“正绅”作为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要“调节”店员、手工工人及农民之阶级斗争。凡此一切,自然只是大概的说来,便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机关的状况。这当然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不幸有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者组织,来做自己的指导机关,中国那时没有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

这种小资产阶级性的机会主义,遇见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剧烈的发展,便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领袖大大的动摇起来。动摇与犹豫是党的政治路线。这是由于畏惧群众。对于中国革命之内容与性质误解的党,如何能不畏惧群众,以至怨恨群众呢!自然,如此的党想出许多法子来“管理”群众或者“帮助”群众了。所以第五次大会期间,革命到了最剧烈的战争期间,机会主义的各种“药方”都显露出来。一种是最旧的中国式的“革命书生”的对党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的党,变成“党的拜物教”的观念,认为一切革命须由治国平天下的党以

命令诰谕来训练并指挥民众才可以成功，如今“不但国民党下级党部不听他中央的命令，甚至共产党的也是如此”，那就糟了，必须以党的议决及命令制止群众的某种行动，才可以保障革命。一种是中国式“革命将军”的观念，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想象成军队式的政变，政变之后，或许可以保护民众的阶级斗争，政变之前，且请民众等一等。一种是“革命的回忆家”，就是回忆到五卅时期的“革命蜜月”，以为阶级斗争发展得太单纯了，如果现在再有“五卅”时的反帝国主义高潮，“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那么，亦许阶级斗争的危险不至于如此之大了。独有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的策略，以组织群众发动工农兵士及一般贫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坚定的领导他们往前进攻，而扩大深入革命，运用这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使革命发展的策略，是没有的。列宁说：“要帮助动摇的人，先要自己不动摇”，而事实上，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后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时不是运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去革命，乃是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所束缚而不革命。

注 释

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了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指一九二一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五四运动，见本书第8页注。

参见本书《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第

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州市长、代广东省主席、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宁汉合流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等职。

叶楚伦(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江苏吴县人。同盟会会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和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邵元冲(一八九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讨袁之役,后随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七年任广州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很猖狂。戴季陶公然反对阶级斗争和中国共产党,西山会议派要开除共产党员出国民党,孙科等也参与活动,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不可分裂为名,要求把军校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告诉他。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给新老右派以打击,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当时在代表中左派占了很大优势,这样做是有保证的。但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等却于十二月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伦、邵元冲进行谈判,请他们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长一个月,对右派完全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结果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的选举中,右派在执监委中都占了多数。

上海暴动,即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见本书第 354 页注

⑩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本书第 375 页注。

⑪ 五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举行。

⑫ 国民革命军,见本书第 288 页注。

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我今天是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第六次大会致开会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自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公开宣布叛变革命以后,先后在沪、粤进行大屠杀,使革命遭受重大的部分的失败。嗣后武汉政府的叛变,革命的队伍由南昌暴动而到广州的暴动,更牺牲了很广大的革命战士,这算是第二次失败了。其次则由广州暴动的失败而转到一个更为严重的状态里,一切反革命力量,无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都是一致的行动,来压迫我们,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这算是第三次失败时期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团

^{*}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主要领导工作。他除致开会词外,并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了《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

结于自己的周围,与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是含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当前中国的革命,进展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中,阶级的冲突,益加显明,因此,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不能不先后叛变革命而变为反革命。国民党更为一切反革命的中心和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在这种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可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的中央不但不能领导群众加紧这种英勇的斗争,解决当时的重大任务,并且自己陷入了机会主义的前途,使革命受莫大的打击。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并不象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⑩等所说的跳过了时代的要求,而是中共中央走了机会主义的道路。好在我们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下和中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情绪高涨中举行了“八七”会议^⑪,得在组织上极力纠正机会主义的根基,在工作上开始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现在到了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到了完全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使本党走上很健全的地步了。

目前敌人虽然还是很强的向我们压迫,可是我们却能从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上,工农密切的关系上,国际正确的指导下,坚决的英勇的与敌人作继续不断的斗争,而期达到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们党不但能够是中国革命的担负者,而且要是一个国际革命

的担负者。所以这次大会的意义，不仅关于中国革命是很重大的，关于世界革命也是很重大的。因此，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的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党，而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点要重复说明的，就是中央在前天会议上，提议向大会要求追认“八七”会议，及在“八七”会议所接受国际的指正案。尤切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固然“八七”以后，已逐渐将机会主义肃清了，但事实上政策上一切主要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之类。这些也是妨碍党的工作的进行的。因此，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使党完全布尔塞维克化。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觉悟者，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定能够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的指导下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

注 释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瞿秋白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等著作中指出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八七”会议后，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又称蒋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分共”，

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

南昌暴动,见本书第 376 页注①。

广州暴动,见本书第 390 页注。

戴季陶,见本书第 199 页注。

胡汉民,见本书第 201 页注②。

汪精卫,见本书第 257 页注③。

顾孟余(一八八九——一九七二),河北宛平(今北京)人。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一九二八年底和汪精卫等人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以后历任国民党政府部长。

陈公博,见本书第 256 页注④。

⑩ 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一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曾任团长。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四一二”政变后,反对蒋介石。蒋汪合流后,邓流亡苏、德等国。一九三一年回国。次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⑪ 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党内过火的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中国革命底性质与动力

中国革命底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 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 ,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这是错误的 ;同样 ,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 不断革命 ” ,也是不对的。因为 ,(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 ,中国并

^{*} 据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这个决议案共分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中国与世界革命”、第四部分“党的任务”中“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以及第五部分有关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问题，这里都从略。

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

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底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

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

中国革命底现在阶段之中，它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底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底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中国革命底动力及其转变 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

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所以 ,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 ,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底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 ,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增长 ,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 ,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 ,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 ,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只有斗争 ,只有力量 ,只有无产阶级贫农底团结力与组织力 ,只有阶级力量底对比能够决定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 ,它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过去斗争底经验

中国革命失败底客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到第六次大会之间 ,中国革命之中 ,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 :北伐底胜利 ,帝国主义势力底削弱 ,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地革命化 ,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 ,土地革命底开始深入……后来中国革命便遭受几次严重的失败 ,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 ,共产党受着摧残 ,群众运动

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底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底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它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底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在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底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底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地反动起来。武汉中央底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底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地与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底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底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底策略错误。南昌武装起义底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武装起义便开始了中国革命底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一)中国革命底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底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底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

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地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赂收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底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底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底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底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三）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底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底军官都是地主豪绅底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封建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底驯服工具。

（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太薄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底舞台，首先受着反动底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

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政权,没收地主底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底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五)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底反动营垒里去。

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底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底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底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底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

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底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底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底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底表现。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底指示,这样,它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 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底党员群众,要求彻底变更党底路线,改变党底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

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八七紧急会议 是根据共产国际底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底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底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可是这种缺点绝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地确定土地问题底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坚决地决定改造党底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起义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①,——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客观上是敌人

底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底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主观上的原因。

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底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但是，秋收武装起义底政策之机械地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底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武装起义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地指出武装起义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武装起义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武装起义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

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底丰富的经验。

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底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底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它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显然是不很够的;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

革命运动底现时形势与 中国共产党底总路线

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工农运动底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底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

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农民底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底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底打击最重。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①,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瓜分政策底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底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既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底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底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底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的。

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底力量大加团结,

加强帝国主义底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底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到来:(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对华的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底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底价格不断地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贫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底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

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革命潮流生长底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可以解除中国革命底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底生长,以及中国底邻近的殖民地民族底革命运动底兴起(印度^⑫)。

第六次大会认为: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自动地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底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底重要成份。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

用底要 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 ,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 ,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 ,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争取群众的任务

将来的新的高潮 ,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起义 ,以至实行武装起义 ,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 ,——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 ,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 ,向群众解释 :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底政权 ,那就绝不能改良群众底生活状况。

现在 ,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 ,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 ,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 ,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 ,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 ,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 ,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 ,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 ,还要加紧地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 ,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 ,兵士与军官在军营中的冲突 ;——无论如何琐细的冲突 ,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 ,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

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都要号召群众武装起义),扩大群众底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旦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底唯一指导者。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起义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的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极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的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底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无往不是武装起义,否认日常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动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底武装起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

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底及城市底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底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底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底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底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底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盲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底一部分,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底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底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底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

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甚至在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合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底异乎寻常地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部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地完全地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底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

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参加。党底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底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必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统一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当工人店员底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方面,而反对剥削者阶级。

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底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底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底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底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再则,阶级斗争剧烈地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底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

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底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党的任务

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底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底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底支部底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地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底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

主要问题 ;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 ,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底纪律 ,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 ,而且损害党底指导机关底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 ,地方主义 ,小团体主义的倾向 ,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内的统一 ,减低党底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 ;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 ,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 ,应当纠正他 ,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 ,他要是能纠正过来 ,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底教育 ,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 ,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底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起义策略底正确观念 ,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底政权的总任务。

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及职工运动方面的任务

(一)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底大多数 ,使他们自己积极地赞助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 ,信仰共产党 ,而且自觉地接受党底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 ,尤其是产业工人 ,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 ,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 ,——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

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地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以及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底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地各方面地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地脱离对国民党的幻想。详细地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底教训及中国共产党底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底过程中去实现,要十二分加紧地领导群众底日常经济斗争。

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一)农民运动底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底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

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络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底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底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底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底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底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底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党在苏区底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地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等等底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底总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底地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地使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底领导权。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一)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底罪恶;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地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

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底存在。无所畏惧地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地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底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起义中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底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注 释

共产国际第七、八、九次全会,分别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月,一九二七年五月,一九二八年二月于莫斯科召开。会上都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汉召开。

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见本书第 386 页注。

南昌武装起义,见本书第 376 页注①。

广州武装起义,见本书第 390 页注。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推倒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共产国际,见本书第 139 页注。

八七会议,参见本书第 416 页注①。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关于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决议案等。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是“无间断的革命”即“不断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断高

涨”，规定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从而形成盲动主义。

⑩ 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秋收起义的大纲》，这四省的党组织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秋收起义，其他某些省的党组织也在一些地方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他有些起义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⑪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为阻止美、英势力向北发展，以保护日侨为名出兵济南，并于五月三日向蒋军大举进攻，蒋下令不准抵抗并令部队撤出。日军遂在济南大肆屠杀，造成五三惨案，中国军民死伤五千余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山东撤兵协定后，日军始撤出济南。

⑫ 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指一九二七年国大党左派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独立运动，一九二八年印度人民反英抗议示威风潮，以及全印工农党和红旗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高潮。

纪念彭湃同志^{*}

(一九二九年九月)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已经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我们还记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在广州发生改组国民党的斗争。第一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口号提出来。照现在看来是很明白的,孙中山是完全拒绝这个口号的。而且,当时有许多同志也讥笑这种提议,总是这样的说:“算了!让他去吧,这种提议自身就犯着幼稚病,因为我们还在政治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呢!”当时的主张都是:无论如何要帮着孙中山去打陈炯明,改组

* 彭湃牺牲以后,瞿秋白在苏联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内容主要包括彭湃的遗著《海丰农民运动》。本文是他为该书写的前言。署名屈维它。

国民党……等等的说法,杜撰理论。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反对。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他来看我,一开口就叫着:“这样子算什么?……如其说这便是社会革命,我便主张要社会革命好了!”他是很愤怒的。在国民党统治着广东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的,一直是非常的愤恨这些妥协的主张。

他恨当时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取着退守的路线。当然的,那时候大家都还薄弱,还算是他的理论强些,他比别的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多些。他并没有能够好好儿的求学。他的家庭,也是个地主豪绅的家族,他的家庭是非常之反对他的“过激的”,他的哥哥曾经为了他做农民运动要杀掉他。他的家乡是在广东东江的海丰县,那里很早就有农民和地主豪绅剧烈的斗争,这对于他的童年时很有影响的。他是广州的一个穷苦的学生,一九一九年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又参加广州第一次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小团体。那些小团体虽也“反对”孙中山主义,可是他们自己也是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的所谓“学说”,彭湃同志是非常的不满这种倾向的。他反对孙中山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反对陈公博、谭平山等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他一开始便欢喜做群众工作。在一九二〇至二一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在广州工人中做了不久的工作,便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从那时候起,他便在海丰农民中活动。陈公博虽然也是广东

共产主义团体的发起人,那时候他可是早就退出去了,广东党的组织是谭平山在那里指导,他对于农民运动是不会帮助的。所以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在那里建立党和农民的组织,省委是从来没有什么指示的。这个样子他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四年。

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在党内提出,要在国民党改组运动中规定出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他告诉我们在海丰工作的情形。在谈话中我们可以认得他是一个很能干的群众运动的人物。他跑到做短工的农民里去活动,和他们在一处开会,讨论关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他去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总是穿得非常破烂,一切生活都和农民一样,受苦受饥都忍着。因为长衫是中国绅士阶级阔老或者是少爷的符号,农民见着就讨厌,如若彭湃同志穿着长衫去,农民是不会信任他的。本来,中国穿长衫的人讲出话来,总是发命令,并不是来商量讨论。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海丰农民运动》里很详细的描写了这一点。他那本著作,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那个时候,广东农民运动受了海陆丰的刺激,到处都发展起来。彭湃同志对于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是极有关系的。广东党的领导人物,这时已经有了变动,是陈延年同志在那里指导广东省委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便在上海被蒋介石枪毙的。党的指导机关已经积极的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去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了。不久,彭湃同志被选到省委

员会工作，指导广东全省的农民运动。

他是第一个主张没收土地，他是时常继续不息的在群众之间去做切实的工作。当武汉时代，他到了汉口，被选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立的土地委员会里，都有同样的一个争论问题。彭湃同志非常之讥笑这种官样的讨论，尤其不赞成去和地主将军们坐在一起去讨论农民的土地问题。专门讨论大地主、小地主的大小分量，他认为都是无意思的。他时常说：“呵！借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仿佛就一定要顾虑着‘小’地主，难道他们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吗？可是农民是‘笨虫’，他不会象罗易先生那样会打算盘，他们只是蠢里蠢气的要求土地和政权。”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政变^①的时候，彭湃同志就说，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已经成为腐烂的死尸了，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他这样的说，当时的中央还大大骂了他一顿呢！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武汉国民政府叛变^①的时候，他跑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带了队伍屯扎在湖南和广东的边界上。后来又带着队伍回到海丰去。那时张太雷同志是南方党部的书记，他遵照太雷同志的指导，准备海陆丰的暴动。有一部分南昌暴动^②的军队，在汕头失败了，向海陆丰方面退却。彭湃同志就组织农民自卫队，联合败退的革命兵士，组织海陆丰工农自卫军。这个队伍，在海陆丰实行暴动的时候有很大的作用。

海陆丰的暴动是得到了胜利的,所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一直保存到一九二八年的四月里。海陆丰苏维埃的成功,自一九二七年末起,到一九二八年初止,对于湖南、江西和广东北部的农民骚动,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海丰的暴动比广州暴动^③早一些,他们便准备许多力量来援助广州。可是广州暴动的日子,从十二月二十号,提早到十一号,所以没有来得及赶上。

彭湃同志曾被广州苏维埃委任做人民土地委员,在海陆丰方面负责。他在海陆丰工作,一直做到苏维埃政权失败的时候为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他做中央委员,后来又选入中央政治局工作。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象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他现在被国民党的强盗一样的专制魔王杀害了。南京的强盗正在冒着险在中东路上玩他的对帝国主义卖笑的掠夺政策,想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巩固自己,镇压中国工农贫苦群众,镇压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所以,同时又用一切手段,来惨杀中国工农的领袖,反对共产党,

救自己的命。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注 释

四位同志，指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他们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兆征，即苏兆征，见本书第 391 页注。

陈炯明，见本书第 170 页注①。

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公博，见本书第 256 页注①。

谭平山在五四运动时曾在《新潮》发表《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等文，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以后倾向社会主义，在陈独秀帮助下，一九二一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参见本书第 200 页注①。

彭湃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他入党的时间还有不同意见，现在一般认为是一九二四年。

陈延年，见本书第 391 页注。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①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
- ①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叛变。
- ②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彭湃是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委员。
- ③ 广州暴动，见本书第 390 页注。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

(一九三 年九月)

两条战线的问题

两条战线的斗争问题 ,我不再说了 ,大家已经说过了。现要指出 :大家说的有一个毛病 ,或者是说一切毛病都由于两条战线斗争不清楚的原故 ,或者是说由于重视打右倾所以有“左倾”的危险 ,或者说是上级“热昏”(是“左”)、下级是“冰冷”(是右)——这样 ,岂不是“小热昏”碰着了“冰桶” ,真正没有办法了吗 !? 这正如陈独秀对武汉时期说政府太右 ,群众太左 ,而要调和一下 ;是不是我们现在上面要右一些 ,下面要左些 ,这个路线就会正确了呢 ? 不是的。第一 ,中央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做过的 ,但是未曾明白指出来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

*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以后 ,瞿秋白留共产国际工作 ,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一九三 年八月回国 ,九月下旬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本文是瞿秋白在会上所作政治讨论的结论的第二、三、五部分的节录。

的经验还没有充分。事实上,不是中央没有反对“左倾”,没有知道两条战线,没有知道“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由于对于形势估计错误,自己犯了些“左倾”的错误,因此也就对“左倾”危险的反对是不充分。第二,要知道“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象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总要好些(我记不得谁昨天说的),所以宁可以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

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势的错误

现在我说到对于中国国内形势的估量问题。中央的路线,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暴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最近几月,中央政治局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有不正确的地方,这是必须指出的——这些是中央政治局已经承认了的。我现在要说这些错误的来源,这个来源是由于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中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可是,对于速度的估量,一定要根据于一个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事实上决不会完全没有目前形势的估量,而只有一个悬空的对于速度的估量的。如果对于目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估计得很正确,如果我们能够很明白的指出:统治阶级是崩溃分裂,使全国的工农极端痛苦,形成全国民众必然要起来推翻他们的前途,可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到绝路呢,如果这样说,自然是不错了。同样的,对革命力量估计也不正确。工

农的斗争发展是走向平衡,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平衡,还极端需要主观上去努力组织革命势力,去争取群众;能有这样的清楚认识,自然不会做出武断的结论,自然不会说现在“在重要城市只要一个伟大的斗争,马上可以引起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前叫做“高潮”;“直接革命形势”)。中央政治局最近三个月来的估计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

苏维埃区域土地政策、 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上,不但要注意现时革命阶段民权主义的任务,而且要注意根本上列宁主义政策的问题,要使全国工农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明白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象托洛茨基的主张一样,认为小农是不堪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用强迫的办法去建立苏维埃国立农场和集体农场(共耕)。这种办法现时民权主义革命之中不能用,就是将来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能用的。我想那些要现在就没收富农全部土地,不许土地买卖,不许租佃(资本主义的),就算是贫富均匀、保证剥削关系消灭净尽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这会场上也许没有了。但是我们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了,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里面,有

十六万以上的农民，还有地方会发生这一类思想而且实行起来：不是投降托洛茨基的反中农的思想，就是投降富农的富农路线。我们在群众中，不仅是领导苏维埃区域的斗争，而是要做给全国民众看：在我们的政府之下是如何的设施；不仅农民问题如是，即经济政策亦如此。这里我们是说右和“左”的倾向都要反对。在执行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自然还是要认清以反右倾为最严重的，是因为党现在主要的危险现象，并且比群众走得太远，却还是落后——落在群众斗争之剧烈和深入的后面。我们在许多斗争中还不能抓紧自己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或是反黄色工会而不加入黄色工会，政治斗争中不注意经济斗争，不深入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在拥护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中，不注意与一切斗争相联贯。这些问题上所以国际决议案上指示要集中火力反右倾的危险。别一方面，“左倾”的危险仍是不可忽视的严重，如对富农问题，对经济政策问题，不再详细说。这种错误不仅是太急进，而且是加强了右倾的立场，使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对的。”在党内是如此，在群众中就是帮助了富农、黄色工会，使群众离开我们。革命进攻和争取群众的任务互相隔离起来，那就是策略上的根本错误。因此，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非常之重要。我们要能够真正胜利的从群众局部的进攻形势，进到总的革命进攻，就应当更加努力去发动领导极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起来，同着他们的先锋队一同斗争，达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注 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托洛茨基,参见本书第 330 页注。

黄色工会,原指为资产阶级所收买、控制的工会。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工人罢工,资本家收买工贼组织了一个假工会,来破坏工人罢工。当时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改用黄纸糊窗。从此,资本家操纵的工会被称为黄色工会。中国的黄色工会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

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三次指示:二月指示的内容是反右倾,认为“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六月指示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十月指示的内容是反对改组派和第三种力量,也都强调了反右倾。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关于李立三错误的决议又强调“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将要自由的文艺,因为这种文艺并不是给吃饱了的姑娘小姐去服务的,并不是给胖得烦闷苦恼的几万高等人去服务的,而是给几百万几千万劳动者去服务的,这些劳动者才是国家的精华,力量和将来呢。

——《列宁文集》初版第七卷上册第二十五页

中国普洛大众文艺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空谈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难道还只当做亭子间里“茶余饭后”谈天的资料么?苏联十月革命之前,许多革命的文学家,后来的普洛文学家,曾经埋没在小报馆的校对、访员等类的地位五六年七八年,当时的高等读者社会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他们在谋生的困苦工作之外,仍旧能够很多的写作小本小说,价钱只有三四分大洋一本,销到工人贫

*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王明等的打击排挤,被撤掉党内的领导职务。此后,他主要在上海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写了大量有关文化和文艺理论的作品。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出版的《文学》上,署名史铁儿。

民中间去。这些作家之中,只有一个绥拉菲摩维支是在当时就成了名的(高尔基不算在内);其余的都这么埋没着,甚至于革命后也没有“出名”的。但是,当时的工人读者知道他们,爱他们。他们的作品,未必都是第一流的,未必都流传下来。但是在当时,这些作品至少能够供给一般贫民的文艺生活,起了革命的作用。可以说,那还不是普洛文艺,然而那是最真实的普洛文艺的胚胎。现在的中国呢?普洛文艺的胚胎还没有,只有普洛文艺的理论和所谓前辈。只有普洛文艺的“母亲”,她应当怀胎,但是还没有怀胎。

普洛文艺的“母亲”为什么还没有怀胎,因为她“节制生育”。她还是摩登姑娘,学到了巴黎式的时髦。她思慕着奢华淫滥的生活和交际明星的声望。她只在想一脚跨进摩登化的贵族厅堂——在所谓“纱笼”里去和当代名流“较一日之短长”。她于是乎把腰束束紧,于是乎用些“史班通”之类的药来避孕。总之,虚荣和声望,嫉妒和贪欲,使有些人只在想“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这个天下显然只是“纱笼”的天下,而不是贫民窟的天下!

而普洛文艺“要是自由的文艺,因为调动新的力量和更新的力量到这种文艺的队伍里来的,并非贪欲和声望,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对劳动者的同情。”(《列宁文集》,同上)

现在中国文艺生活的现象是个神奇古怪的怪现象。因为封建余孽的统治,所以文艺界之中也是不但有阶级

的对立,并且还有等级的对立。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个等级,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第一个等级是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第二个等级是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现在,请平心静气的回答一个问题:直到今天为止,普洛文艺的作品是属于那一个等级?!

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但是还并没有变呢。因此,劈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变?这个问题不能决,一切都无从说起。因此,也就会发生我这篇文章的怪题目:“普洛大众文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甚至于有人说: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这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现在的作家,难道配讲要群众去高攀他吗?老实说是不配。

这样,“向群众去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总之,假定意识是正确的作品,可是仅只能够给欧化青年去“服务”的,当然不是大众文艺。这种文艺,只能够做普洛革命文学的次要工作,为的是在敌人营垒里去捣乱后防。这种“欧化文艺”尚且要努力大众化,扩大自己的读者社会。同时必须打进大众的文艺生活之中去——跳过那一堵万里长城,跑到群众

里面去。这就必须创造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现在大众所“享受”的文艺生活是什么？那些章回体的小说，群众尚且不能够完全看得懂。他们所“享受”的是：连环图画，最低级的故事演义小说（《七侠五义》、《说唐》、《征东传》、《岳传》等），时事小调唱本，以至于《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影戏，木头人戏，西洋镜，说书，滩簧，宣卷等等。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现在的主要工作，因此应当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可以造成新的群众的言语，新的群众的文艺，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水平线。所谓“非大众的普洛文艺”和“普洛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将要在这一条道路上逐渐的消灭净尽。

文艺问题里面，同样要“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准备着，团结着群众的力量，以便“立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这是艰苦的伟大的长期的战斗！

普洛大众文艺应当立刻实行，应当认真的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第一，用什么话写。第二，写什么东西。第三，为着什么而写。第四，怎么样去写。第五，要干些什么。

第一 用什么话写？

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认定反对鞑鞑民族等改用罗马字母的人,事实上等于出卖阶级(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上提到的正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作者注)。现在,我们对于中国文的罗马化问题,暂时不说。可是,至少要注意到这个“罗马化”的基础,就是创造一种真正现代大多数人用的文字——言语。固然,书面上的话(文字)和口头上的话(言语)之间,在欧美先进各国,也都有相当的区别,然而那分别都只是比较紧凑和散漫罢了;欧美先进各国的“书面上的话”,都只是紧凑些的“口头上的话”,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中国的情形可不同,书面上的“白话”——五四式的白话和文言一样,读出来是不能够懂得的,非看着汉字不可。这种话要用罗马字母拼音,当然就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的“言”和“文”之间的区别为什么如此之大?就因为封建余孽作祟。“五四”以前士大夫用的文言,据说是“周朝话”,其实只是周朝话的极模糊极省略的纪录,因为用以纪录的工具是象形文字,所以就不能够不模糊省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要想推行所谓“白话文”,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自然不是狭义的文学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也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样,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

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现在新式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同的言语”。革命党里的“学生先生”和欧化的绅商用的书面上的话是一种,而市侩小百姓用的书面上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两种话的区别,简直等于两个民族的言语之间的区别。俄国在十七八世纪时候,欧化贵族只读斯拉夫文的典籍和法文的小说,而平民读俄文。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象俄国洛孟洛莎夫到普希金时代的那种文字革命。不然呢: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没有共同的言语,反而是商店作坊的老板和伙计学徒之间有共同的言语。这个文字革命任务,现在同样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不需要再彻底的文字革命,而且还在反对这个革命。

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语写一切文章。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做“俗语文学革命运动”。固然,最近一年来——一九三一年——有极少数的新进的作家,例如穆时英、张天翼等,以及以前的一些老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注意到俗语的运用,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积极主张俗语的革命运动,不但自己这样写,并且还要号召一切人应当这样写,还要攻击不这样写的人,总之,要有象五四时期一样的战斗精神。要剧烈的反对和抵制许许多多现在的“林琴

南”！自然，单单会运用俗语并不就是普洛文学，因为用俗语一样可以写封建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东西；但是用非驴非马的白话写的东西，绝对不能成为普洛文艺。难道现在俄国普洛文学可以用斯拉夫、拉丁文混合的言语来写作品？难道英美普洛文学能够用古代英文来写作品？绝对的不能够。因为这使它不能够给大众服务！因此，可以说：不注意普洛文艺和一切文章用什么话来写的问题，这事实上是投降资产阶级，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这个俗语革命的任务，是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一切革命的文化组织应当担负起来，而尤其是文学的革命组织。

因此，对于“用什么话写”的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

第一，当然不是用“周朝话”来写，就是绝对的不是用文言来写。

第二，也不能够用五四式的白话写。五四式的白话，表现的形式是很复杂的：有些只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换了几个虚字眼，不用“之乎者也”，而用“的吗了呢”，这些文章，叫士大夫看起来是很通顺的。有些是所谓“直译式”的文章，这里所容纳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而是囫囵吞枣的。这两大类的所谓白话，都是不能够使群众采用的，因为读出来一样的不能够懂。原因在于：制造新的字眼，创造新的文法，都不是以口头上的俗语做来源的主体，——再去运用汉文的，欧美、日本文的字眼，使他们尽量地容纳而消化；而是以文言做来源的主体，——甚至

于完全不消化的生硬的填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结果,这种白话变成了一种新式文言:《说文》和《康熙字典》,东文术语词汇和英文句法分析练习簿,——就是这种新式文言的来源的主体。这叫做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写的人自己也不能讲这种话。固然,成熟的作家自己做的东西(翻译的不在其内),大半不至于如此“骡子气”;然而,新式白话的作品和翻译,科学政治论文和文艺等等一切出版物,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用这种骡子话写的。如果普洛大众文艺也仍将用这种话来写,那么,简直是没有人可以听得懂的,这就绝对不能够达到群众里去。

第三,也并不是用章回体的白话来写。这种白话,最好的象《水浒》、《红楼梦》,也只是明朝话或者清朝话;而且同样是省略的记录,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当时人口头上的话的。姑且把考据功夫搁起,假定的叫他“明朝话”罢,这种话显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话。只要看这一类小说里的对话,里面的虚字眼有许多是现代人不讲的了,例如“把”写做“将”,“就”写做“便”等等。而且这种话的全部的腔调,可以证明这仍旧是士大夫迁就平民的一种言语,或者是平民高攀士大夫的一种话。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凡是比较复杂的说理,描写,叙述……实际上仍旧是文言的腔调,至多只是京戏里说白的腔调。你想想:现代人嘴里会不会说出“不知老兄意下如何”?或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至于比《水浒》、《红楼》“等而下之”的许多演义小说,现在礼拜六派的小说,直到连环图画式

的小说，那简直是文言白话混合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到现在，显然仍旧是以文言为主体的一种话。如果简单的采用这种“明朝话”，那就无所谓文字革命。固然，采取这种话可以使群众勉强懂得，但是这就完全忽略了革命的任务。这也是投降主义！

总之，不但普洛大众文艺，就是“非大众的普洛文艺”，都不能够用“周朝话”写，都要反对用“骡子话”来写，而且也并非要用“明朝话”来写。而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这必然的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所谓“官话”的软化。统一言语的任务也落到无产阶级身上。让绅商去维持满洲贵族旗人的十分道地的上等京话做“国语”罢，让他们去讥笑蓝青官话^⑩罢。无产阶级自己的话，将要领导和接受一般知识分子现在口头上的俗语——从最普通的日常谈话到政治演讲，——使它形成现代的中国普通话。自然，照中国的现状，还会很久的保存着小城市和农村的各地方的土话，这在特殊必要的时候，也要用它来写的。总之，普通俗话的发展，必须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来领导，就是要把这种言语做主体，用它来写一切文章，尤其是文艺，尤其是大众文艺。要为着这个新的文字革命而斗争。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把自己嘴里的话写出来。这种俗语同样的可以有深浅，有书面的和口头的分别，——自然并非一切文章都等于速记的纪录。

而普洛大众文艺的特点,就在于暂时这科文艺所用的话,应当是更浅近的普通俗话,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这样就可以开辟一条道路,使工农群众在文艺生活之中逐渐提高组织自己言语的能力,根据于“联想”的公律采用必须的汉文的以及欧化的字眼、文法。无产阶级在这里有一个坚定的自信力:他们口头上所讲的话,一定可以用来写文章,而且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可以日益进步而创造出“可爱的中国话”,并用不着去学士大夫的骡子话(可以看而不可以听的话),并用不着去学戏台上的明朝人的说白。而现在的章回体小说,却正使群众觉着一定要用那种“半文不白”的腔调,才能够说故事,才能够写文章。中国现在还没有“可爱的屠格涅夫^①的言语”(列宁说的),中国的普洛文学应当担负创造这种言语的责任。

总之,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余的努力大半要枉费的。

第二 写什么东西?

普洛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回答写什么东西的问题。应当用现代人的白话写的并不仅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其他文章在言语上的区别,仅仅

只在于深浅。可是,讲到写什么东西的问题,就是作品的体裁问题,那就不同了。这里的区别比较的是很大的。

现在新式白话作品的体裁,大半已经是很欧化的了。

老实说,是很摩登化的了。因为,中古世纪的欧洲作品,甚至于文艺复兴^⑫初期的作品,体裁也和近代的摩登主义大不相同。意大利的《十日谈》,西班牙的《董吉诃德传》,法国大仲马^⑬的《三剑客》(《侠隐记》)和《二十年后再》,在体裁上就和中国的《今古奇观》、《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等,有好些相象的地方。这种情形足以证明欧洲封建的上层建筑的崩溃,和经济基础的变更,互相适应着。欧洲当时的民众从中世纪式的武侠小说进一步来读《董吉诃德传》的时候,不感觉到体裁上突然的绝对的不同。而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买办而来。手工工厂的发展突然的跳到最新式的百货公司和电气动力的工厂;表面上尤其急速转变的,是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银行资本,城市的地皮投机事业……于是欧化士大夫的“文艺享受”同样的可以从诗古文词一跳就跳到摩登主义的“神奇古怪”的体裁。吃租阶级的摩登贵族,有这么的“福气”。但是对于民众,这种体裁是神奇古怪的,没有头没有脑的。关于人物,没有说明“小生姓甚名谁,表字某某,什么省什么县人氏”;关于风景,并不是清清楚楚的说“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而是象征主义的描写,山水花草都会变成活人似的忧愁或者欢喜,皱眉头或者亲嘴;关于对话,并不说明“某某道”、“某某大怒道……”;句

法是倒装的,章法是“零乱的”。这些,在欧美的工人早已不成多大的问题(以发展史最短的俄国文学来看,从斯拉夫文的作品,经过最早的俄文通俗作品,经过普希金到高尔基,逐渐摩登化的过程也有了一百五十年)。但是,中国民众还觉得非常之看不惯。普洛文艺至今用全部力量去做摩登主义的体裁的东西,这样自然发生的结果是:上中下三等的礼拜六派倒会很巧妙的运用着旧式大众文艺的体裁,慢慢的渐渐的“特别改良”一下,在这种形式里面灌进维新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内容,写成《火烧红莲寺》等的“大众文艺”;而革命的普洛的文艺因为这些体裁上形式上的障碍,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这也同样是不了解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任务的错误。

所以普洛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因为识字人数的极端稀少,还应当运用连环图画的形式;还应当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我们要写的是体裁朴素的东西——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

可是,也要预防一种投降主义,就是盲目的去模仿旧式体裁。这里,我们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关于第一点,一切故事、小说、小唱、说书、剧本、连环图画,都可以逐渐的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关于第二点,举几个例来讲:可以创造新的短篇说书话

本,不必要开头是“却说”,末了是“且听下回分解”,而是俗话的短篇小说;可以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又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俗话诗,不一定要谱才可以唱,而是可以朗诵,可以宣读的,在声调、节奏、韵脚里面能够很动人很有趣的;可以模仿文明戏而加入群众自己的参加演戏;可以创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等凑合的歌剧,穿插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因为话剧(文明戏)没有音乐,对于群众的兴趣是比较的少的。这些,都还只是没有实行经验的设想,有了经验之后,还可以想到无数的新的形式,群众来听小调来看戏的人,可以教我们的还多得很呢。

这样,就是在文艺的形式上,普洛大众文艺也要同着群众一块儿提高艺术的程度。

第三 为着什么而写？

普洛大众文艺的题材——艺术内容上的目的是什么？普洛大众文艺要为着什么而写？

这里,在所谓“非大众的普洛文艺”和“普洛大众文艺”之间,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有的话,那只是相对的。譬如说,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所以“非大众的文艺”大半要是捣乱敌人后防的,而“大众的”大半要是组织自己的队伍的。这是文艺,所以这尤其要在情绪上去统一

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

(一)是鼓动作品,所谓“Agitka”。这当然多少不免要有标语口号的气味,当然在艺术上的价值也许很低。但是,这是斗争紧张的现在所急需的,所谓“急就章”是不能够避免的。

可是,同时也应当尽可能的叫他艺术化,这是学习的机会。这些作品如果做得好,一样的可以避免“标语口号主义”,而使标语口号艺术化,而取得艺术品的资格;——因为这里主要的将是为着时事,为着大事变而写的东西,而大事变往往可以产生意义伟大的作品。这必然要认做一种在一定的事变之中的反对一切种种反革命的武断宣传的斗争。

(二)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这是说一般的阶级斗争,经常的一切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里,当然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罢工,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当然是主要的题材。同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绅土地主阶级的一切丑恶,一切残酷狡猾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一切没有出路的状态,一切崩溃腐化的现象,也应当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他们,去暴露他们。讽刺的笔锋和刻毒的描写,对于敌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宽恕的。这是冲锋的捣乱后防的游击队。这是要打破群众对于敌人,对于动摇的“同盟者”的迷信。这里,当前的斗争

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⑭，反对民族主义^⑮。因为现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之中，闹得乌烟瘴气的正是武侠剑仙的迷梦，岳飞复活的幻想。我们的大众文艺，应当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进攻苏联，为着土地革命，为着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权独裁，为着中国的真正解放，而努力的一贯的去贯彻反对武侠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宣传苏维埃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为着这种目的而写的作品，可以是“阶级经验的小说”（例如现在的革命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五四”、“五卅”、广州公社^⑯、武汉时代等等）；可以是片断的或者想象的斗争和生活，例如中国的《董吉诃德传》，短篇的这类的故事；可以是古代传说（关公、岳飞、薛仁贵等）和现时大众小说（《火烧红莲寺》等）的改作；可以是欧美“阶级经验小说”以及其他名著的改译（《九十三年》、《铁流》等等）。

（三）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所谓“人生”，难道只有“高尚的”知识分子才了解，难道只能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去了解？不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也需要了解，需要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了解，需要清楚的发现现实生活的意义。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大半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束缚之下。工人、农民、一切贫苦的民众，他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受着宗法社会和封建观念的束缚，他们也有恋爱，他们也有家庭，他们要求生活，他

们要求解放。但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正在供给他们以各种各式的毒药迷魂汤。他们有许多本来就是小资产阶级（例如农民、兵士），他们之中的工人，也有许多刚刚离开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不久。摆脱宗法社会联系还很少。绅商豢养的文丐，就首先用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去羁縻他们。工农的人生是和斗争不可分离的。绅商就特别努力的想把他们的人生和斗争分割开来。一切宣卷、说书、小唱……没有一本不是变相的所谓“善书”，宣传那些最恶劣最卑鄙最下贱的中国礼教和果报观念。单是一句“变牛变马来还债”的话，单是一句“淫人妻女，自己的妻女也被人淫”的话，单是一句“乐善好施金玉满堂”的话，就可以使人知道：现在市面上的大众文艺是多么努力的在宣传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充其量是鼓吹一些梁启超式的维新道德，暗示民众说：只要自己勤苦，总可以成家立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安分守己”甘心做奴隶的主义，是非政治主义的情绪。总之，这里充满着伪善、卑鄙、等待、迷信……一切种种恶化的毒药，甚至于淫书都标题着“警世之书”，把男女关系写成禽兽不如的把戏，把残杀所谓“淫妇”当做英雄豪侠的信条，摧残民众中的每一丝每一毫的光明，把对于人生、恋爱、家庭、劳动的了解，都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在反对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文艺里，就要一贯的贯彻反对宗法主义和市侩主义的斗争。为着这种目的而写的作品，可以是劳动民众的私人生活的故事，恋爱的故事，

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幻想的破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主义)的解说。

总之,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①的斗争。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这就是反对青天白日主义。青天白日所谓青天大老爷的主义。武侠和剑仙是一个青天大老爷,所谓祖国民族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宗法主义是这样,市侩主义也是这样,一切反革命的武断宣传都是这样:“最高最完美的理想”只是——地上要有青天大老爷,天上也要有青天大老爷,于是乎小百姓有冤有处诉,有仇有人报,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安分守己的过活,耕田经商做工,挣得一点家财,生个好儿子,中状元,做大官,或者上天报应,大发洋财,可以荒淫纵欲大享艳福;为着答报青天大老爷,岳飞、包公、彭公^②等等的这样恩典起见,就要爱国。……如果这些福气享不到,那么,就来一些劫富济贫的空谈,把强盗来当青天大老爷,反对这种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反封建宗法的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苏维埃的革命文艺运动。

第四 怎么样去写？

怎么样去写普洛大众文艺？这并不是大众文艺的特殊问题。这是普洛文艺的一般创作方法的问题。谁要以那些说书式的小说可以随随便便的写，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

普洛作家要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如果仅仅把几句抽象的理论，用说书的体裁来写出来，就可以当做文艺作品，那就根本用不着普洛文学运动，因为这只是通俗的论文。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

但是，现在革命的作家之中，许多还保存着那种浮萍式的男女青年的“气派”。浮萍式的——因为他们在社会里是没有根蒂的，他们不但不知道工人贫民的生活，而且不知道一切有职业的人的生活。这大半是离开母亲和学校的怀抱之后，就立刻成为“欧化的”无业游民。这还不要紧。文学也可以做职业，革命也可以做职业。他们大半连从旁边去观察一下也不愿意的。他们是在等灵感的天才

的神来之笔。他们所有的只是“天才”，只是“理论”，他们已经得到的是些归纳的结论，将要得到的还是些归纳的笼统的结论。用不着去观察，用不着去体验！现在我们固然正在克服这种主观主义，可是他的遗产还是会作祟的。

因此，很可能的是用一种轻率的态度来对大众文艺，——而这种轻率态度就可以使许多恶劣的资产阶级影响复活起来。这是不能够不预防的。当然，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最大概的，也许是最粗鲁的说法：

（一）感情主义。从“五四”以来，所谓“民众”文学曾经在各种形式里表现过。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大约就是这十几年的成绩了。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于工人、农民，这也会冒充革命文学。这种创作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洛文艺所不需要的。文艺复兴初期的感情主义居然和世纪末的颓废主义碰了头，混合在一起作为“革命文学”，甚至于“普洛文学”的先锋。普洛文学要克服这种倾向，在普洛大众文艺里，尤其要防止这种感情主义的诉苦、怜惜、悲天悯人的名士气。

（二）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个人忽然象“飞将军从天而降”，落到苦恼的人间，于是乎演说，于是乎开会，于是乎革命，于是乎成功，——这种个人主义，“个人的英雄决定一切”的公式，根本就是诸葛亮式的革命。这样，甚至于党都可以变做诸葛亮、剑仙、青天大老爷！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必须完全克服这种倾向。必须真切的理解群众的

转变,群众的行动,群众的伟大的作用。个人只有在集体之中,作为集体的一分子,然后他的英勇,他的热心,他自己对于自己的个人主义的斗争,群众的克服他的个人主义……。对于这些斗争的过程的理解,才能够把一切种种的变相剑仙和变相武侠肃清,而正确的显露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的领导作用。

(三)团圆主义。才子中状元,佳人嫁大官,好人得好报,恶人得恶报……固然是团圆主义。可是,一切一相情愿的关于群众斗争的描写,也是一种团圆主义。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这种写法,这种做法,也是一种团圆主义。这里,还会发生更加简单的公式主义:工人痛苦,革命党宣传,工人觉悟、斗争、胜利,有困难一定解决,有错误一定改正,一些百分之百的“好人”打倒了一些百分之百的“坏人”。无产阶级难道需要自己骗自己?更加要注意的是农民和兵士。这里,难道没有一点儿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幻想、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无产阶级不需要欺骗自己,更不需要投降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左”右机会主义!工人需要学习,在错误之中学习,主要的是在现实生活和斗争里学习。这才能增长斗争的力量、经验。

(四)脸谱主义。京戏里面奸臣画白脸,忠臣画红脸,小丑画小花脸……同样,可以把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一个个的规定出脸谱来。这不但可以,而且的确有人这样写!甚至于可以详细的说:布尔塞维克、

孟塞维克、盲动主义者等等,都可以有脸谱。反革命的一定是只野兽,只要升官发财,只要吃鸦片讨小老婆;而革命的一定是圣贤,刻苦、坚决等等……这种简单化的艺术,会发生很坏的影响。生活不这么简单!工人、劳动群众所碰见的敌人、友人、同盟者、动摇的“学生先生”,也不是这样纸剪成的死花样,而是活人。工人农民自己也是活人!反革命的人,一样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假定在文艺之中尚且给群众一些公式化的笼统概念,那就不是帮助他们思想上武装起来,而是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简单化的概念之下,他们遇见巧妙一些的欺骗,立刻就会被迷惑,遇见复杂一些的现象,立刻就不会分析。他们将永世不能够了解: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岳飞会是他们的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关于工农自己,也是同样的,这里,应当表现真正的生活、分化、转变、团结的过程,方才能够给布尔塞维克的教育。

埃及古代艺术上有一种所谓条件主义,——团圆主义和脸谱主义,就是这么一类的东西,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了,用来自己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其实也是骗人和骗自己的浪漫谛克。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最先进的阶级,他不需要虚伪,不需要任何理想化,不需要任何的自欺欺人的幻想。“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终胜利的道路。无产阶级需要认识现实,为着要去改变现实。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

切实的了解现实,而在行动斗争之中去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勇的情绪,去为着光明而斗争。因此,普洛大众文艺,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这需要开始一个运动,一个为着普洛现实主义而斗争的运动。不然,那些资产阶级的影响将要使我们投降豪绅资产阶级的大众文艺。

第五 要干些什么？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要开始实行普洛大众文艺运动,应当干些什么事？

这个问题,由上文所说的一切,已经可以给自然的结论：

(一)开始白话文学革命运动——这是要完成白话文学运动的任务,要打倒胡适之主义,象现在要打倒青天白日主义一样。胡适之的白话定义是：“说白之白,清白之白,黑白之白。”这理论已经种下了文言本位的改良主义,虽然适之自己做的文章倒还通顺。这所谓“白”仅仅是和戏台上的曲文对待的“说白”,是和模糊对待的“清白”,是和“堆砌涂饰”对待的“黑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白话本位的文学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普洛大众文艺就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和群众共同的言语。这固然不是限于文艺范围的运动,但是普洛革命文学运动应当负起发动这个新的革命运动的责任,而和一切革命的文化组织共

同的起来斗争。具体的办法是要争取完完全全的公开路线——要有一个一般的文化问题的杂志，尤其是学生读物的杂志，这种杂志应当分一部分的篇幅开始这个运动，来详细的研究中国俗话的文法、句法，批评一切所谓白话文章的绅士性质，批评反动的大众文艺的言语的死文字性质，从新的观点上来重新讨论翻译问题等等，发展这种讨论和研究到群众的文艺团体里去。

(二)街头文学运动——开始做体裁朴素的接近口头文学的作品：说书式的小说、唱本、剧本等等。这需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即使不能够自己去做工人、农民……至少要去做“工农所豢养的文丐”。不是群众应该给文学家服务，而是文学家应当给群众服务。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去向群众唱一出“莲花落”讨几个铜板来生活，受受群众的教训。首先就要组织革命的“文学青年”——劳动青年，鼓动他们来实行这种街头文学运动。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茶馆里，空场上……工厂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是大众文艺作品产生的地方。“不跳下水去，是学不会游水的”。这里，将要有真正的机会去观察、了解、经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

阶级一样的去感觉。这些“文学青年”也许不肯去,也许很少肯去,也许去了会有许多“临阵脱逃”,但是,文学青年不一定是贵公子,也有贫苦的;而且这个运动开始之后,工人青年之中,将要发现很多意料之外的天才,渐渐的他们会变成主体。

(三)工农通讯运动——要开始经过大众文艺来实行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就必须立刻切实的实行工农通讯运动。举个例来说一说工人通信员的运动罢:工人通讯员固然并不限于文艺,而且主要的还是政治通讯,但是这是普洛文学的一个来源。文艺的通讯,应当在一般的工农通讯员运动里去发展。在中国现在城市之中的条件之下,可以创办一种俗话报去吸收。这种定期刊物要公开的专销贫民区域。这可以在形式上并非报纸,而是一本连环图画,或者一集连环图画、时事唱本、时事短篇小说,批评当时的反动的大众文艺(影戏,新出的连环图画等等)。工农通讯员将要是一种新的群众的文艺团体的骨干。这可以是很多种的小团体,在这种团体里面才能够得到现实生活的材料,反映真正群众的情绪,很确切的很具体的批评到武侠主义、民族主义、宗法主义、市侩主义的要点。工人和农民自己在这里将要学习到运用自己的言语的能力。而一般“文学青年”才能够学习到大众文艺所需要的知识。普洛文学将要在这种集体工作之中产生出自己的成熟的作品。

(四)自我批评的运动——为着普洛现实主义的斗

争,必须实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对于过去错误的认识不诚恳、不深刻,实际上是不能够纠正错误的,甚至于要掩盖错误。缺乏革命者的认识错误的勇气,将要使我们在大众文艺方面仍旧重复旧的错误。那些非辩证法的,非唯物论的观点和倾向就不能够肃清。这里,具体的步骤,就是要在文学报上开始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开始关于一般创作方法的讨论。只有斗争,和一切不正确倾向斗争,才能够锻炼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发展革命的普洛的文学运动。

普洛大众文艺的运动是一个艰苦的伟大的斗争,必须这样从各方面去努力,必须这样郑重的认真的刻苦的开始工作,克服一切可能的失败和错误,必须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才能够胜利的进行。而没有大众的普洛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象一朵没有根的花朵。

注 释

普洛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普洛是英语 Proletariat 的音译:普洛列塔利亚的缩写,即无产阶级。

绥拉菲摩维支(一八六三——一九四九),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苏联作家。著有《海燕》、《母亲》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洛孟洛沙夫,今译罗蒙诺索夫(一七一——一七六五),俄国学者、诗人、科学家。对历史和语言学也很有研究。

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俄国大诗人。瞿秋白曾译过他的

长诗《茨冈》。

穆时英(一九一〇——一九三九),浙江鄞县人,现代作家。

张天翼(一九〇六——一九八五),湖南湘乡人,现代作家。

林琴南(一八五二——一九二四),名林纾,福州人,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

曾用文言翻译过一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在五四运动时期,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最坚决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礼拜六派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以出版《礼拜六》期刊而得名。他们大量发表描写才子佳人的小说,故又称为鸳鸯蝴蝶派。

⑩ 蓝青官话,夹杂别地口音的不纯的北京话。

⑪ 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俄国著名作家,著有《父与子》等作品。

⑫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五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化思想运动。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权的要求。最初始于意大利,逐渐扩及德、法、英、荷各国。在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恩格斯称之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⑬ 大仲马(一八一二——一八七〇),法国作家,著有《基督山恩仇记》等许多作品。

⑭ 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之类,多带有公案情节,写“侠客”、“义士”协助“清官”破案,把人民群众反抗恶势力迫害的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侠客”、“义士”身上。这种“武侠主义”或“青天大老爷”思想,对人民群众有极大的毒害,起着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

⑮ 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联合一批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并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胡说“阶级意识在中国,可以说是陷民族于灭亡的陷阱”,标榜“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所谓“民族主义”。这种思想一出现就受到鲁迅和“左联”的痛击。

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也称广州公社。

⑰ 这里是指以国民党反动政权为“正统”的思想。“青天白日”,是国民党党旗、党徽的标志。

⑱ 包公、彭公,指流行的公案、武侠小说《包公案》、《彭公案》等书中的包拯、彭鹏,都是长期流传民间,多出附会臆造的“青天大老爷”。

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

工厂小报是宣传最广泛的群众工具。虽然这一定只是一个工厂的报纸，而且现在还大半只能够用墙报的形式，可是，这是最能够接近到最广泛的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的报纸。所以工厂小报实是党和工会的很重要的工作。

第一，工厂小报用什么话来写呢？用群众日常口头上讲的普通话来写呢，还是用知识分子的新式“白话”——不成其为白话的白话来写呢？答案是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一般同志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简直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工人之中有很多是不识字的，识字的也很不容易懂得那种封建余孽的半文不白的白话。而且，他们大半不能够懂得比较复杂的真正白话的句头和字眼。因此，如果用那种新式白话写工厂小报，那就等于用英文写了工厂小报去贴在法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三十一期，署名范亢。

国巴黎的工厂里的。必须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的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等等……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第一个问题,是先决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厂小报的内容即使好到万分,仍旧和极广大的群众不相干。

第二,工厂小报必须着重在具体的、切实的、绝对不夸大不吹牛的消息。工厂小报首先要能够领导起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因此,单有口号的宣传,尤其是一般口号的宣传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一工厂里的“新闻”,关于每个工人的“事件”,例如扣工钱,罚金,挨打,挨骂……关于工厂的消息,例如减少工钱,增加夜班时间,扣除工房的房钱,……总之工厂管理处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正确的迅速的记载到工厂小报上去。不但如此,关于政治的消息,也要简明清楚的叙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工厂小报要提出关于本工厂最切身的政治问题。直到现在,我们在工厂里常常只宣传一些关于全国的政治问题,这是不够的,要经过工厂小报,领导群众去注意当地的市政问题(例如上海的市政府,租界的西董、华董,纳税会等等),去注意这一区域的政治问题(例如上海浦东的什么保卫团,什么自来水,什么房捐等等……)。这里,有许多直接关涉到读者本身的日常生活的。这里,应当准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认识和力量。将来的区苏维埃,市苏维埃的政权机

关，假使没有这种准备，是不能够切实组织起来的。总之，工厂小报要会经过正确的记载客观的具体事实，去鼓动群众起来斗争。

第三，工厂小报要根据党的政策，运用这些具体的事实，去动员群众。这就是要登载简单明了的论文。有了具体的事实记载之后，这些论文的力量将要增加十倍二十倍。这些论文应当是最通俗的，根据工厂里工人读者所知道的事实，去解释党的口号，具体的指出这一工厂的工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实行这些口号，所有这些，都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里面所必须的宣传方法。而且工厂小报要想能够执行自己的组织群众的责任，还必须迅速的反映这一工厂的每一件事变。这是要支部干事会负责的，不能够等待区委、省委，而自己消极的做旁观者。譬如说，昨天晚上某一个工人或者女工受着了打骂或者侮辱，那么，今天就要有这个消息揭露，今天就要有评论的文章，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指示全厂工人应当干些什么，应当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去动员群众的斗争。

第四，工厂小报必须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工厂小报要组织自己的访员，自己的通信员。最好要在工厂的每一个部门（例如细纱间、粗纱间），在这一工厂的工人住宅的每一个区域（例如一个街堂，一个胡同），都有自己的访员，要他们能够按时的报告当地的“新闻”。工厂里的通信员就要能够学习着自己写消息，写简短的文章。工厂小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在自己的访员、通信员之中做有系

统的教育工作，逐渐的扩大他们的组织。工厂小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吸收非党的工人参加，要讨论而共同决定对于每次事变的态度和政策，而写成功指导群众的社论。然后指导自己的访员和通信员根据这篇社论，到工厂的各部门去，到工人住宅的各区域去，发展群众之中的讨论，反映群众的意见，对于群众的意见，要会正确的批评，给他们相当的教育。单纯的咒骂落后群众的“消极”，甚至于“工贼”等等，是不容许的。对于工贼走狗的暴露和攻击，也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必须要使最落后的群众也看得见工贼的真面目。

第五，讲到群众的报纸。上面所说的话都可以应用到一般的群众报纸，只要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以至于全国。暂时，全国性质的群众报纸是很难发行。群众报纸是甚么？不是上海流行的小报，而要是真正劳动群众读得懂，听得懂的报纸。暂时，这种报纸在白色恐怖之下，要求公开的存在，必须有一种所谓“灰色性质”。但是，这应当遮盖住我们的政治立场。固然公开发行的铅印的群众报纸，比工厂小报更加要留心警察的检查和注意。而实际上这种报纸发行的可能决不是没有的。可惜的是：九一八以来许多革命的公开发行的刊物（杂志或者小报），都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我们必须来创办给群众看的报纸，至少，首先在上海要开始这个工作。不久以前，有一种革命报纸，准备给群众看的，而且是每天出版的“号外”，可是，这个报上，居然会发现“某某借途灭虢”的标题。这种

《左传》 古典 ,现在连年轻的一辈知识分子都不懂得的了 ,但是 ,出现在群众的报纸上——这不客气的说 ,实在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罪恶。这里 ,可见文字问题的重要。群众报纸关于政治、经济、革命运动、国际新闻等等都要有确切的事实 ,完全用白话简单明了的“翻译”出来 ;然后群众报纸的论文 ,指导性质的社论 ,方才能够有力量去通俗的解释和传播正确的行动口号。这种群众报纸 ,还可以吸收大众文艺的作品 ,使现在大半还只有读武侠等类的旧式白话小说习惯的劳动民众 ,能够更加容易的迎受革命的宣传 ,经过革命的大众文艺(演义式的小说、短篇纪事 ,以及唱本、小调等等)而肃清他们人生观宇宙观之中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毒汁。

第六 ,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需要发展工人通信员运动。这种工作 ,应当是党的、工会的一种重要工作。这不能够交给无产作家联盟或者革命文化运动总联盟之类的机关去做的。这些团体有自己的特殊任务 ,而对于这种任务顾然是不能够胜任的。必须党经过赤色工会去大规模的发动这个运动 ,而且必须有公开的真正群众的报纸的存在。这些通信员应当是赤色工会在每个工厂小报的周围去组织 ,使他们逐渐的和公开的群众发生直接的公开的联系。

第七 ,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应当组织读者的读报会。这种组织应当和报纸发生密切的联系。报纸的访员 ,尤其是通信员是开始组织读报会的最方便的枢纽。随后 ,

应当领导群众自己发展下去。中国识字的劳动者这样少，读报会的作用更加大。而且，这些组织都是党和工会的外围，他们可以把党的口号政策广泛的传播到不识字的劳动群众之中去。

总之，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的，甚至于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一般同志都要切实的注意这个问题。

注 释

原文为假途灭虢，见《左传·僖公五年（前六五五）》。晋国向虞国（今山西平陆东北）借路伐虢国（北虢，在平陆县）。大夫宫之奇劝告虞君拒绝晋国要求，说虢是虞的屏藩，“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虞君不听，结果晋灭虢后，回师灭虞。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依据《春秋》记述当时各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四六四），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

大众文艺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五日)

一 问题在那里？

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戏剧……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不论是书面的口头的，都有几百年的根底，不知不觉的深入到群众里去，和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着。劳动民众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差不多极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得来的。这些反动的大众文艺自然充分的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这里，吃人的礼教仍旧是在张牙舞爪，阎王地狱的恐吓，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以及通俗化了的所谓东方文化主义的宣传，恶劣的淫滥的残忍的对于妇女的态度，……仍旧是在笼罩着一切，无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六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一期，署名宋阳。

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最近，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之中，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怎样利用这些工具来阻止民众的革命化更表现的明白了。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封建残余——等级制度的统治，特别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以前，绅士用文言，绅士有书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话，平民简直没有文字，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绅士之中有一部分欧化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旧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言语。既然如此，那么，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言语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此差不多对于民众没有影响。反对孔教等等……在民众之中还只是实际革命斗争的教训，还并没有文艺斗争里的辅助的力量。

因此，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

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固然有时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是在现在的阶段上，这显然还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任务。（这是要无产阶级来领导肃清封建意识的文化斗争，彻底执行这个民权主义的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对这种文化革命的力量，他们反而在竭力维持封建意识，维持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借此更加加重他们的剥削，散布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这个文化革命的斗争，同时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而且准备着革命转变之中的伟大的文化改革——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进行。——作者注）问题是在这里！

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斗争，直到现在，还只限于反对欧化的知识青年之中的种种反动派的影响；而在劳动群众之中去反对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斗争，差不多还没有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要去争取劳动民众，要去打击和肃清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文艺上就必须开展一个新的文化革命的剧烈的斗争。这就必须去研究大众现在读着的是些什么，大众现在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大众现在读得懂的并且读惯的是什么东西，大众在社会斗争之中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总之，是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言语，针对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里所需要答覆的一切问题，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完成劳动民众的文学革命，造成劳动民众的文学的言语。

总之，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是在于发动无产阶级领

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忽视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正是以前革命的文学界空谈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而没有切实斗争的最大原因。

二 用什么话写?

“五四”之后,从“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这是前进的斗争。但是,几乎是在革命文学的营垒里,特别的忽视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完成。于是乎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固然,有些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自己写的作品,宽泛些讲起来,是能够写出真正的白话的。但是,自从一九二五年之后,谁也没有再特别注意的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一切“新文艺”方面的作品和论文,尤其是翻译,都在随意的写着那种新式的文言(所谓白话),一点儿也没有受着什么惩罚。革命文学方面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方面当然更不必说了。反动派只会利用这种革命队伍之中的弱点,来打击革命文学的发展。这和革命领导机关的政治上的错误是一样的,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的势力,而使自己和广大的群众隔离起来。

因此,大众文艺的问题首先要从继续完成文学革命这一方面去开始。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

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譬如说：英国工人不能够读中世纪的英文和拉丁文杂凑起来写的小说，中国工人也不能够读中国古文和欧化文法杂凑起来写的作品。

现在中国文字的情形是：同时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电报 等等)；(二)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四)是旧小说式的白话。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再加上这样复杂的，互相之间显然有分别的许多种文法，这叫三万万几千万的汉族民众怎么能够真正识字读书！？这差不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要懂得一张《申报》，起码要读五年书！而这种现状，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竭力维持着的。言语文字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任务；然而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完成这种任务，而且已经在反对这种彻底的文学革命。他们趁着“五四”所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不是有意的），造成了一种所谓白话的新文言，他们把这种新文言赏给自己的欧化子弟，给他们玩耍玩耍，至于劳动民众仍旧只能应用一下绅商文字的渣滓，——那种测字先生的调文腔调的旧小说的白话。

然而旧小说式的白话，和五四式的新文言比较起来，却有许多优点。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而旧小说式的白

话，却是古代的白话，比较有规律的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这是明朝人说过的话，虽然读出来也并不是现代中国人口头上说的话，而只是旧戏里的说白，然而始终还是读得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旧小说的白话比较的接近群众，而且是群众读惯的，——这种白话比较起其余几种的所谓中国文来，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只有它是从民众的口头文学(宋元平话等等)发展出来的。反动的大众文艺就利用这一点，而更加根深蒂固的盘据在劳动民众的文艺生活里面。革命文艺如果没有战胜它这种优点的工具，那就是奉送群众给它。

所以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继续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且要严重的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旧小说式白话真正是死的言语。反对这种死的言语就要一切都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话来写。无产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同时，这和知识分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许多新的字眼，抄袭欧洲日本的文法，仅仅只根据于书本上的文言文法的习惯，甚至于违反中国文法的一切习惯。而无产阶级普通话的发展，生长和接受外国字眼以至于外国句法，

……却是根据于中国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的。总之，一切写的东西，都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要是活人的话。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开始。这在最初，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模仿旧小说式的白话。但是，这决不应当是投降政策。这是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领导着一般劳动民众去创造新的丰富的现代中国文。有必要的时候，还应当用某些地方的土话来写，将来也许要建立特殊的广东文福建文等等。

三 写什么东西？

革命大众文艺应当写什么东西？这问题应当分两方面来说：

第一是形式方面。首先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而自己单独去成就什么“英雄的高尚的事业”。笼统的说什么新的内容必须用新的形式，什么只应当提高群众的程度来鉴赏艺术，而不应当降低艺术的程度去迁就群众——这一类的话是“大文学家”的妄自尊大！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

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说书式的小说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群众,这对于革命文艺是很重要的。有头有脑的叙述,不象新文艺那样的“颠颠倒倒无头无脑的”写法,也是现在的群众最容易了解的。

因此,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自然,应当随时创造群众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例如,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功记事的小说;利用纯粹的白话,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利用演义的体裁创造短篇小说的新形式。……至于戏剧,那就新的办法更多了。这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后,经验还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方法,群众自己会创造许多新的形式。完全盲目的模仿旧的形式,那就要走到投降的道路上去。

第二是内容方面。革命的大众文艺和一般的普洛文学运动一样,现在,创作的中心口号,应当是:“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可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明瞭真正大众之中的革命敌人的意识上的影响在什么地方。这是文艺战线上革命斗争的重要任务。不能够估计敌人的力量,自然也就不能够作战。革命文艺的初期,正因为不会估计现实的形势,所以只有些标语口号的叫喊。这不是向敌人进攻,不是向反动意识去攻击,而只是叫喊。革命军队的枪炮不对着敌人瞄准,而只在战场上眼睛向着天摇旗呐喊,——这虽然很“勇敢”,而事实上的确没有打仗,因为这个缘故,甚至于有人反对暴露敌人的

假面具，甚至于有人反对描写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现在，必须深刻的了解革命文艺的任务，是要看清了当前的每一次事变之中敌人用什么来迷惑群众，要看清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经常的受着什么样的反动意识的束缚，而去揭穿这些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去看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不但表现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现群众的英雄，这里也要揭穿反动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犹豫，揭穿这些意识对于群众斗争的影响，要这样去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和发展。

革命的大众文艺因此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题材。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大众文艺式的报告文学，这种作品也许没有艺术价值，也许只是一种新式的大众化的新闻性质的文章。可是这是在鼓励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可以是旧的题材的改作，例如《新岳传》、《新水浒》等等。可以是革命斗争的“演义”，例如《洪杨革命》、《广州公社》、《朱毛大下井冈山》等等。可以是国际革命文艺的改译。可以是暴露列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作品，可以是“社会新闻”的改编，譬如反动的大众文艺会利用什么阎瑞生案，黄陆恋爱，洙泾杀子案等等，革命的大众文艺也应当去描写劳动民众的家庭生活，恋爱问题，去描写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给大众看。这最后一点，值得特别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直到如今，革命文艺还是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这个文艺斗争的特殊任务。

四 前途是什么？

革命的大众文艺发展的前途，应当成为反动的大众文艺的巨大的强有力的敌人，应当成为“非大众的革命文艺”的真正的承继者。

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艰难的长期的斗争，应当要和极广泛的劳动民众联系着，应当争取广大的公开的可能，应当造成劳动者的文艺运动的干部（主要是要工人来领导），——开始可以是口头文学的干部，随后一定能够进到书面文学的干部。这都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切实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工作。

现在的事实是：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同时存在着。这是因为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文化关系上，还维持着统治的地位：绅士等级和平民等级没有共同的言语。谁要否认这个事实，他就不能够有正确的斗争路线，结果，不是放弃新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就是幻想完全依赖欧化的知识青年去做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训”民众的文化运动。

现在是要非大众的革命文艺大众化，同时继续在知识青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而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就是消灭那种新文言的非大众的

文艺，而建立“现代中国文”的艺术程度很高而又是大众能够运用的文艺。

注 释

满洲事变 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沈阳，侵略我国东北。上海事变 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略上海。

普洛文学 见本书第 480 页注。

近代人拍电报 有采用四六文体的 称作四六电报。四六文是骈文的一体。骈文形成于南朝，盛行于唐、宋，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称四六文。

《电报》，一八七二年四月创办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著名大报。

洪杨革命 即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权，又称广州公社。

朱、毛大下井冈山 指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阎瑞生案 指一九二二年发生在上海的洋行买办阎瑞生图财勒毙妓女王莲英案件。当时曾被编成文明新戏和拍成电影上演。

黄陆恋爱 指一九二八年发生在苏州的黄慧如、陆根荣主仆恋爱的社会新闻。当时上海报纸曾大肆渲染。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一九三二年七月)

一 “万华撩乱”的胡秋原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艺术家,演剧家的自由,只是戴着假面具(或者伪善的假面具),去接受钱口袋的支配,去受人家的收买,受人家的豢养。我们,社会主义者,暴露这种伪善,揭穿这种虚伪的招牌,——并不是为着要弄出什么无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里方才可能),而是为着要把真正自由的公开和无产阶级联系着的文学,去和伪善的自由的而事实上联系着资产阶级的文学对立起来。

——《列宁全集》第七卷上册

最近,文艺理论的研究似乎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胡秋原先生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说起文化运动,而尤其是文艺问题(见《文化评论》和《读书杂志》);而苏汶先生也就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的《现代》第一卷第六期,署名易嘉。

三期)。胡秋原先生,据说是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出发的文艺理论家;而苏汶先生自己说是死抱着文学不肯放手的文学家。他们两方面都是文艺的护法金刚,他们都在替文艺争取自由。可是,究竟这些自由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让我们来插几句嘴罢。

先说胡秋原先生。

胡秋原先生是谁?他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的立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

胡先生对于文艺的意见固然并不限于这一点,但是,这是他的根本立场。他说他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罢?——他的文章之中很渊博的引证了许多“唯物史观”的艺术理论:有时候说“艺术是用形象去思索”,有时候说“艺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有时候又说“艺术的最高目的,就在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以至于说“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没有高尚情思的文艺,根本伤于思想之虚伪的文艺,是很少存在的价值的,我永远这样相信”。

这究竟算是什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中国的新兴文艺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到现在还不上三年,这里所发生的错误,而且有些是极端严重的错

误,实在是多得很。新兴阶级的斗争,就是在文艺战线上也要勇敢的克服一切困难,排斥一切错误,锻炼自己的力量。象钱杏村那样的批评家,自然是做出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正在集体的批评和斗争之中纠正过来。如果胡秋原先生真正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真正能够正确的指出钱杏村等等的错误,那么,即使胡秋原先生自己仍旧是个“自由人”,他也许能够相当的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钱杏村的理论基础混杂,说钱杏村把波格唐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未来派……东扯扯,西拉拉的混缠在一起。然而他自己呢?他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钱杏村那样的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东扯一些,西拉一些,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上表现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不了解。可是——我并不丝毫减轻钱杏村的错误,——钱杏村比起胡秋原先生来,却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总还是一个竭力要想替新兴阶级服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东扯西拉之中,至少还有一些寻找阶级的真理的态度。而胡秋原呢?他却申明永远只相信“高尚情思”的文艺,而“文艺的最高目的就在消灭人类间一切阶级的隔阂”。他已经肯定的认为“艺术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钱杏村虽然没有找着运用艺术来帮助政治斗

争的正确方法，可是，他还在寻找，他还有寻找的意志。而胡秋原是立定主意反对一切“利用”艺术的政治手段。这是胡秋原先生和钱杏村不同的地方。

胡秋原先生的艺术理论其实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他说赞成纯艺术和反对纯艺术的争论是“徒劳的”。为什么？因为赞成纯艺术的有反动的文学家，也有革命的文学家；而反对纯艺术的也是这样。这还只是他的表面上的诡辩。他的根本立场，还在于他认为艺术只应当有高尚的情思，而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因此，他就认为艺术是独立的，艺术有尊严，有宫殿，有人格。他劝告一些政治派别说：“勿侵略文艺。”他一再的宣言：艺术决不是至下的东西。胡秋原先生如果不承认自己是艺术至上论派，那么，至少他的理论可以叫做艺术高尚论。他所拥护的，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而是这个似乎是独立的高尚的文艺。

胡秋原先生的理论，据他说，是从普列汉诺夫出发的。他引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说艺术是用形象去思索。他还说：“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可是，这几句话是不够的。这里，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这所谓高下又用什么标准去定呢？用贵族阶级的标准，用资产阶级的标准，还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对于这一点，他是没有说明的。大概是用所谓“自由人”的立场做标准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

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⑩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他事实上是否认艺术的积极作用，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而一切阶级的文艺却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他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

可是，照胡秋原先生的理论，艺术却只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而且只是从“自由人”的立场上去认识和批评。以前钱杏村的批评，要求文学家无条件的把政治论文抄进文艺作品里去，这固然是他不了解文艺的特殊任务在于“用形象去思索”。钱杏村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现在胡秋原先生发见了“用形象去思索”的文艺任务，就走到了另一极端，要求文艺只去表现生活，而不要去影响生活。再则，进一层说，以前钱杏村受着波格唐诺夫、未来派等等的的影响，认为艺术能够组织生活，甚至于能够创造生活，这固然是错误。可是这个错误也并不在于他要求文艺和生活联系起来，却在于他认

错了这里的特殊的联系方式。这种波格唐诺夫主义的错误,是唯心论的错误,它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社会生活,意识可以组织实质,于是乎只要有一种上好的文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可是,胡秋原先生的反对这种理论,却也反对到了牛角尖里去了。他因此就认为文艺只是消极的反映生活,没有影响生活的可能,而且这是“褻渎文艺的尊严”的。

胡秋原先生虽然很勇敢的痛骂反动的文艺派别,可是,他只骂他们“利用”文艺;“污损文学家的人格”。他固然也指出这些派别代表着什么什么阶级,可是,他正是要求他们“勿侵略文艺”。他并不去暴露这些反动阶级的文艺怎么样企图捣乱群众的队伍,怎么样散布着蒙蔽群众的烟幕弹,怎么样鼓励着反动阶级的杀伐精神,把剥削和压迫制度神圣化起来。他提出来的口号只是安得列耶夫的人道主义的口号:“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

胡秋原先生的文艺理论,其实是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

固然,胡秋原先生指出钱杏村的错误的时候,他会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而旧的地主及小有产阶级在日益崩溃的过程中(这里缺少了一个资产阶级——嘉注),在这社会蜕变时期,各阶级、层、集团,都有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固然,胡秋原先生还会反过来问:“我在一切讲文艺的文字中否认过阶级性没有?”然而胡先生的确说过了“文学的最高目的是在于消灭人类间的

一切阶级隔阂”；而且胡先生的确没有一次肯定文艺的阶级性，而只申明永远相信“文艺的高尚情思”。以前钱杏村的错误是只看见所谓时代文艺，而不看见阶级文艺。而现在胡秋原是看见了阶级文艺而认为这算不了文艺，而只是“政治的留声机”，这是“艺术的叛徒”。

不但如此，胡秋原先生即使分析中国现在有些什么什么阶级的文艺，他也要赶紧声明：“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洛文艺。……无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普洛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这是多么宽大的自由人的自由主义，这是“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那句话的详细注解。

本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之中，已经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分，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这种理论到了胡秋原先生手里，就搀杂了安得列耶夫的“学说”，和胡秋原先生自己的“学说”，结果，竟变成了百分之一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是替文学要求“自由”，让各种各样的文学发生出来，给他“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研究研究，批评批评，发挥发挥他这个“自由人”的“无党无派”的对于艺术的“高尚情思”的评价，——这倒怪有趣味的。这是他替文学要求自由的目的了罢？

可是，还不止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而事实上，作家

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所以胡秋原先生再不能够正确的批评钱杏村的错误。胡秋原先生说钱杏村“生吞伊里支^①的话谈大众文学”;“机械的应用伊里支的大众文学”的原则。而胡秋原先生自己,根本就没有提起大众;甚至于别人特别指出大众问题来和他讨论的时候(《文艺新闻》),他竟会在答复的三五千字的长文章里面,一个字也没有提起大众。这不是偶然的。钱杏村以前的错误,正在于他根本就没有应用“伊里支的大众文学”的原则,所以也说不上机械的应用。艺术高尚派的胡秋原先生,自然是蔑视大众的,他不屑得做大众的“留声机”。

这样,胡秋原先生背向着群众,脸对着艺术之宫,双手拈着各种各样的文艺,说:“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才有万华撩乱之趣,”我是反对“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的。新兴阶级在现在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所谓“把持文坛”的可能;而地主资产阶级听见胡秋原的主张,也许象罗隆基^②一样,会感觉到:与其象沙皇那样专制而始终被推翻,不如象英皇那样宽大而能够保持皇位到如今。胡秋原先生是替现在的“黑暗世界”想出了一个发展“文化与艺术”的方法,“不是危机而正是光明”的

道路,这就是抛弃“中心意识”的独裁政策,而放任“各种意识的互相竞争”。黑暗世界对于胡秋原先生虽然未必见得感谢和赏识,可是,事实上胡先生的心是算尽到的了。可惜的是:这个黑暗世界已经没有能力再开辟什么光明的道路,除非是光明起来把它根本的推翻。胡秋原先生的艺术高尚论的自由主义,要枉费心机了。

二 “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子之遭兮不自由
子之遇兮多烦忧
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
思古人兮俾无尤^⑬

——曹雪芹的林黛玉

再说苏汶先生。

苏汶先生自己说是死抓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而“每一个死抓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都应该欢迎胡秋原先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这所谓“死抓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是谁呢?苏汶先生说是“作者之群”。我想作者虽然不是羊子,暂时叫他们是一群也还不妨。不过,是不是这一“群”都欢迎胡秋原先生的理论——那还是个问题。至少总有几个人不赞成的。所以还是说苏汶先生自己罢。

苏汶先生是个作家,他那篇文章就是一篇很美丽的

散文——是一件艺术品，的确有“艺术的价值”。这就是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巧妙，很能够感动人，至少是那一群。因此，也就有政治的价值，因为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武器当然是越锐利越好，艺术品是越能够感动人越好。

因为苏先生文章写得好的缘故，所以苏先生没有胡先生那么“愚蠢”。苏先生说的话，是委婉的转弯抹角的，——真所谓“哀而不怨，乐而不淫”^⑭。可是，且慢些批评。他固然很想“哀而不怨”，然而怨恨的情调还是流露出来了。

苏先生已经说了：胡秋原先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应该是受作者的欢迎的”。苏先生，至少是苏先生所说的作者之群，应该欢迎胡先生的理论。然而苏先生骂胡先生是书呆子，是愚蠢；苏先生说：“在目前这情形下，愚盲是幸福的，而沉默是聪明的。”这就是说——虽然心上欢迎胡先生的理论，可是嘴里最好是不说出来，更好些是口头上还要“骂”几句胡先生。

然而这所谓“骂”并不是真骂。而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而胡秋原先生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胡秋原先生是书呆子。苏先生说：“左翼文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没有工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便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终于，文学不再是

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煽动家之类。”而胡秋原先生还要和左翼文坛去谈什么艺术的理论,文艺的价值……等等,真所谓“不识时务”,所以是书呆子了。这里,话是可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革命要紧,所以革命者一定不会再要文学,因此,革命者不配谈什么文学,象胡秋原先生是在对牛弹琴。这是太粗鲁的说法,苏先生是不说的。二是说——革命要紧,革命者的文学就只有行动,本来不是什么文学,你胡秋原先生既然不讲行动,又要和左翼文坛去谈文学,自然是隔靴搔痒,可以不用说了罢。这是客气的说法,苏先生是说了。然而说法虽然是两种,意思还是一样。

这意思是:真理和文学是与革命不能并存的;苏先生说胡秋原和左翼文坛的讨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⑬,所以他那篇文章又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其实这是一篇“革命与文学不能并存论”。他所以劝告左翼文坛说:你们有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不需要”。

假定真这么样“干脆”,那么,那个“某种政治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可惜,革命的发展不这么样干脆。革命是在“侵略文艺”。

第一,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还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新兴阶级建立起来的。只有这个阶级,在革命的行动之中,才真正能够建立,能够发展科学的文艺理论。中国的新兴阶级以及日本的,英国的等等,自然,现在还在几

万重的压迫之下。尤其是中国的新兴阶级，受着封建残余的文化上的束缚特别厉害。他们不能够希望统治阶级去“提高”什么民众文化，他们极艰难的向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学习，尤其是向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不怕统治阶级讥笑什么“向俄国去批发”理论。他们努力的在行动之中学习着，研究着，应用着理论。他们决不肯说“行动就是理论”，因此，“只要行动不要真理”。他们更不能够说：先要理论，然后再要行动。他们不会感觉到理论和行动是分离的，不能并存的。

第二，新兴阶级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为着解放劳动者的广大群众而斗争；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自己——改造广大的群众。他们要肃清统治阶级的思想上的影响，肃清统治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现在剥削制度之下的一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然而群众之中的一些守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不是群众自己所“固有”的，而是统治阶级用了种种方法和工具所灌输进去的。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固然，并不是个个“前进的战士”都来做文艺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既然“真是前进的战士……便不会再要文艺了”呢？为什么“除非是自己愿意解除武装之中的一种。自愿缴械的“战士”决不是前进的战士。你可以说：“你们还没有拿着这种武

器,所以无所谓缴械。”但是,正因为这个,所以要努力去取得这种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

第三,新兴阶级站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立场上,所以能够真正估定艺术的价值,能够运用贵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遗产。他们决不是什么“目前主义的功利论者”。他们在文艺战线上,一样是为着创造整个的新社会制度——整个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斗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他们都要批判,都要分析。这些文艺的内容,往往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会是简单的“好得利害”,或者“坏的利害”;也不会是“革命时候没有用”,“建设时期又有用”。而照苏先生说起来,仿佛是托尔斯泰“被不要于万方多难之秋,而旋又被原谅于国泰民安之日”,这算是“变卦”,而“变卦就是辩证法”苏先生是说的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托尔斯泰的两次不同的批评,他没有说起卢那察尔斯基所批评的是那一方面的问题,而我们又没有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在手边。固然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和文艺理论上有许多唯心论的倾向,他的两次批评之中都包含着某种错误的见解也是可能的。然而我们现在没有方法来检查。我们只说一说,在苏先生所谓“万方多难之秋”的一九一一年,列宁就说过:

托尔斯泰死了,而革命以前的俄国过去了,那革

命以前的俄国的弱点和没有能力,都表现在这个天才的艺术家的哲学里面,都描写在这个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里面。然而,他的遗产之中也有并不曾过去的而是属于将来的东西。……他会用极大的力量表现那些受着现代制度的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写他们的状况,表示他们的自发的抗议和忿恨的情感……托尔斯泰描写着俄国历史生活的这一个时期,他会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提出那么许多伟大的问题,会提高艺术的力量到那么样高的程度,以致于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之中占着第一等位置之中的一个。^⑯

然而……

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别方面是痴呆的不抵抗主义的说教……宣传世界上所有一切混蛋东西之中的最混蛋的东西——宗教……^⑰

这里,的确象苏先生所说的“非议得利害”,而又“恭维得利害”。不过这是同在一个“万方多难之秋”。无所谓“变卦”!

至于中国的托尔斯泰在那里,出了娘肚皮没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和中国现在有没有自己的高尔基^⑱一样的问题。这里不谈了罢。

第四,新兴阶级固然运用文艺,来做煽动的一种工具,可是,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作者。文艺

——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总之，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不过有些阶级不肯公开的承认，而要假托什么“文化”、“文明”、“国家”、“民族”、“自由”、“风雅”等等的名义，而新兴阶级用不着这些假面具。新兴阶级不但要普通的煽动，而且要文艺的煽动。一九〇五年前后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之前，象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①的作品，——我想就是苏先生也得承认是文艺，——是的的确确有艺术上的价值的。但是，这些东西同时就是煽动品。做了煽动家未必见得就不能够仍旧是一个作者——文学家。高尔基等等虽然没有中国的“作者之群”那么死抓住了文学不肯放手，然而不见得就比中国的文学家低微到了什么地方去。同时，高尔基等等的确是些伟大的宣传家。新兴阶级自己也批评一些煽动的作品没有文艺的价值，这并不是要取消文艺的煽动性，而是要煽动作品之中的一部分加强自己的文艺性。而且文艺的反映生活，并不是机械的照字面来讲的留声机和照相机。庸俗的留声机主义和照相机主义，无非是想削弱文艺的武器。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艺术和煽动并不是不能并存的。自然，一定要说：凡是煽

动就不是文学，——这也可以，这句话也有“用处”。对于谁有用处呢？对于那些不肯承认自己是在利用文艺来煽动的阶级！

苏汶先生很大量，他说左翼文坛“为革命，为阶级”，“讨论着，决定着又执行着”的都对，甚至于“霸占”文学也对。这是太恭维了。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因此就不保护文学的自由，就不反对革命的“侵略文艺”。不是的。他这样说话正是出力的保护文学，比胡秋原先生更加巧妙的保护文学的自由。他是说：左翼文坛所做的只是煽动，只是革命的手段，只是革命的行动，所以就不是文学，既然没有所谓文艺的真理，也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这样，左翼文坛里没有文学，文学界里也没有左翼文坛。于是乎文学脱离了左翼而自由了。左翼虽然要霸占，也就无从霸占起，因为它所霸占的只是些非文学、非真理、无艺术价值的煽动品，——这是与文学不相干的，让他去罢。

苏汶先生的议论其实是很明显的。不过，他写完了四千字之后，还谦虚一句说：“作者有其道而不敢言。”

为什么“不敢言”呢？为什么这样可怜，这样怨苦呢？

因为他自己以为是“第三种人”。他说：“文学这卖淫妇似乎还长得不错，于是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于是文学便只能打算从良。从良以后呢？作者便从此萧郎是路人^②。”这些作者——“斤斤乎艺术的价值”的——就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的爱人——那“卖

淫妇的文学”被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夺了去了！

可是,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不止一个,文学也不会被任何一个阶级夺去的。文学是附属於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企图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它只是在思想战线、文艺战线上和反动势力斗争。

作者呢,也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鬟,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最吃苦的只是自以为是“第三种人”的时候。既然不愿意“变为煽动家之类”,又不好意思公开的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听着一些批评家谈论新兴的文艺理论,实在觉得讨厌。想着:我是多么不自由呢,写一些东西,就有人来指摘:这是资产阶级的意识,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还要加上法西斯蒂的头衔……唉,我的命运是太苦了。何

不生“古时候”，没有这一类的批评家的时候呢？那时，象袁随园^⑲，或者李太白^⑳等等的时代，“一举成名天下知”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谁也不来管这是“纱笼”的贵族厅堂的天下，还是贫民窟的天下（因为苏先生引了史铁儿先生的话，所以我也引一引）。

因为自己感觉得这样苦的时候，作者就“搁笔”了。但是，并不是个个“搁笔”的作者，都是由于这个原因。苏先生说：“大大小小的作者搁起了笔”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句话并不合乎事实，却可以做苏先生的“作者之群”的注解。苏先生是把“作者之群”和文艺理论对立起来说：——你们这些作者为什么不能够写作品呢，都是那些文艺理论害了你们。有点儿 Provocation^㉓的意味。

苏汶先生没有功夫顾到“劳动者之群”，那是当然的，因为他一只手“死抓住了文学”，别一只手招请着“作者之群”，请他们欢迎胡秋原先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而和苏先生共同起来反对大众文艺的“连环图画和唱本”，——自然再也没有功夫了。

他说：“这样低级的形式还产生得出好的作品么？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佛罗培尔^㉔的！”然而，第一，德国的版画式的连环图画（并不都是普洛的），虽然还没有产生托尔斯泰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可是已经的确成了一种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第二，假使用那副吃奶气力——死死的抱住所谓文学的那副气力，去研究和创作中国的线画式的连环图画、唱本等等，

未必见得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何况所说的不限于连环图画。而写一部《马占山^②演义》，要真能够写得象《水浒》那样好，并不见得比写一些意象派^③的诗来得容易，而且一定比意象派的诗有更高的艺术价值。真正的中国（并非绅士的中国）的文艺，一定要从革命的大众文艺里产生出来。

总之，这些话多说也没有趣味了。蔑视群众既然是自己认为是“第三种人”的立场，那么，一切都已经自然明白的了。因此，苏汶先生还嫌胡秋原的自由主义不彻底，他主张把一切群众的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一概归到“非文学”之中去，让文学脱离新兴阶级和群众而自由。

苏汶先生还叹着气说：“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其实，何必这样呢？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作家，只有欢迎正确的文艺理论。努力去了解一切错误，要求日益进步的批评。至于把艺术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作家，尽管放胆的去做作家好了。真有“爱好艺术”的勇敢的，真正能够死抱住所谓文学的人，什么也不应当怕的。有一点怕，就算不得死抱住了。你看看：这世界上有的是那种死爱漂亮的女人，她们宁可为着这个缘故而出卖自己的。漂亮是美，“艺术的价值”也是美——抽象的美，无所附丽的美。为着“美”牺牲一切——是“第三种人”的唯一出路！

注 释

胡秋原，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黄陂人。三十年代初，自称是无党派的

“自由人”，在《文化评论》上发表文章，鼓吹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苏汶(一九一六——一九六四)，原名戴克崇，另一笔名杜衡，浙江杭州人。三十年代初期，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两个阵营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脱离政治，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文艺理论家。

弗里契(一八七〇——一九二九)，苏联早期文艺评论家。

钱杏村(一九〇一——一九七七)，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

波格唐诺夫，今译波格丹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

卢那察尔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三三)，苏联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剧作家。

未来派，二十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要求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激烈运动，追求怪诞离奇的形式，鼓吹创造一种“未来”的艺术。

安得列耶夫，今译安德烈夫(一八七一——一九一九)，俄国作家。早期作品有民主倾向，以后成为象征主义者。

⑩ 孟塞维克主义，见本书第 330 页注⑩。

⑪ 伊里支，今译伊里奇，指列宁。

⑫ 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大学教授，当时是新月派成员。以后赞成抗日，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民主同盟。

⑬ 见《红楼梦》第八十七回林黛玉所吟琴曲。原词是：“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⑭ 见《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⑮ 见《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⑯ 见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引文的每段顺序前后有颠倒。

⑰ 见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⑱ 高尔基，见本书第 480 页注。

⑲ 绥拉菲摩维支，见本书第 480 页注。

⑳ 见崔郊《赠去婢》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里的

萧郎,泛指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② 袁随园,即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浙江钱塘人,清代诗人。他曾任江宁等地知县,后建随园于江宁小仓山,时人称他为袁随园。

③ 李太白(七 一——七六二),唐代大诗人。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

④ 英语,“挑拨”的意思。

⑤ 弗罗培尔,今译福楼拜(一八二一——一八八) ,法国作家。

⑥ 马占山(一八八七——一九五) ,吉林怀德人,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事变后,曾在黑龙江抗击日本侵略军。

⑦ 意象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在西方诗歌里出现的一种颓废主义文学流派。

非政治主义^{*}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

自然,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他们认为必须叫“读者社会”有点儿特殊的消遣,使得他们的心思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覆。——这可以用“为艺术的艺术”的假招牌,也可以是虚伪的旁观主义。这难道不是

^{*} 本文是作者遗著,当时未发表。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曾收入此文。

政治？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有些艺术家是有意的去做这种手段的工具，有些却是无意的。

无意之中做政治手段的工具，做维持剥削制度的工具，这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是常有的事。我们揭穿这种事实，无非是要他们自己清醒一下，谨慎一些，认真的挑选自己的道路：究竟同着群众走，还是同着统治阶级走。他们之中有些回头过来，有些一直往死路上走，这是他们的自由，谁也干涉不了。

至于反动阶级的艺术家，口头上否认着政治，实际上正在实行着自己的政策，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方便些，更巧妙些，更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以为那些公开的叫喊着“祖国，民族”的反动的文艺政策的人，未免太蠢笨了些。这两种反动政策的互相竞争，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纠纷，——中国最近三四年来这种纠纷是在表演着，然而他们两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新月派 之类和民族派 之类的“争论”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表面上是“非政治主义派”占了上风：谁都要学着说几句风凉话，其实是战术更加精密了。

无论什么阶级都在拥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并不是个个阶级都利于公开的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于需要自己欺骗自己。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冲突的阶级，总在竭力找寻一些假面具。而艺术对于他们往往是很有用的武器，他们正需要能够掩蔽自己的政治手段的艺术。这就是那

种“精密的战术”了。

十八世纪时代的西欧资产阶级，总之，那些还在反对封建的旧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往往喜欢自命为劳动群众的先锋，所以他们的艺术还是公开的主张战斗的。那时候，艺术家的理想是要号召“维新”、“改革”、“启蒙”，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充满着这些号召是光荣的。后来，情形自然不同了。资产阶级开始想尽各种方法，来束缚群众，阻碍群众的前进，维持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奴隶制度。反革命之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着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文化上束缚政策。这年头，已经早就不是“五四时代”了！他们至少也要说艺术应当是非政治的。

而现代的人类的领袖阶级——无产阶级，国际的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是绝对不同的，他们的目的不能够不是完全消灭剥削制度，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是党派性的。他们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现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作家，惯于偷偷摸摸的灌输资产阶级的“目的意识”，而表面上戴着雪白的“纯艺术”的假面具；他们冷笑着指摘无产阶级的作家，说：“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呵！你的艺术是目的意识的！”

自然,有些艺术家主观上甚至于是革命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了解这种理论和倾向的内容。他们也许只看见文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许相信定命主义的社会发展。他们以为只要客观的描写出社会的现象,艺术家的任务就完结了。至于社会的发展,那自然而然的是光明的势力将要占优胜的,艺术家何必有什么“目的意识”呢!自然,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要有艺术的力量。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如果宇宙观和社会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就将要间接的替现存制度服务。同样,那种替“纯艺术”辩护的态度,恰好被反动阶级所利用。

注 释

新月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和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一九二三年,他们在北京组织新月社,以后又在上海出版《新月》月刊,在文学上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民族派,指反对“阶级意识”,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国民党反动文人。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实际上是散布不抵抗主义。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 :《坟》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 :“政治家 ,政治家 ,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 !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 !”对于这种嘲笑 ,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 ?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 ,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 ?

——卢那察尔斯基 :《高尔基 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 ,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 ,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 ,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 ,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 ,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

* 这篇文章是作者为自己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写的序言 ,署名何凝。该书一九三三年七月由青光书局印行。

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了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而现在，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象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久的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憎恶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够不轻蔑那虚伪的自欺的纸糊罗马城，这样一直到他回到“故乡”的荒野，在这里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这不是什么可笑的猥琐的城墙，而是伟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

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俄国的贵族地主之间，也发展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这是英雄的队伍，他们象罗谟鲁斯和莱谟斯似的，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这是些勇将，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他们是活泼的战士，自觉地走上明显的灭亡的道路，为的要惊醒下一辈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为的要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赫尔岑）

辛亥革命前的这些勇将们，现在还剩得几个？说近一些，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又剩得几个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鲁迅：《自选集序言》）

鲁迅说“又经历了一回”他对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现在已经不敢说，也真的不忍说了。那时候的“纯钢打成的”人物，现在不但变成了烂铁，而且……真金不怕火烧，到现在，才知道真正的纯钢是谁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维新主义的老新党，革命主义的英雄，富国强兵的幻想家。他们之中，客观上领导了民权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人，也并不是没有，而且，似乎也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不过别人都有点儿惭愧

自己是失节的公主的亲属。本来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变，谁还能够否认？这种强奸的结果，中国的旧社会急速的崩溃解体，这样，出现了华侨式的商业资本，候补的国货实业家，出现了市侩化的绅董，也产生了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虽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文明商人和维新绅董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绅董希望满清的第二次中兴，用康、梁去继承曾、左、李的事业，而商人的意识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条出路：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叫四万万阿斗做名义上的主人。在这种根本倾向之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想恢复什么“固有文化”。独有现代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萌芽，能够用对于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来反对这种复古和反动的预兆。鲁迅和当时的早期革命家，同样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过自然科学和当时科学上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他从绅士阶级出来，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丑恶和虚伪。他不惭愧自

己是私生子,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

现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说过:“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种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知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一七年的时候,除出富国强兵和立宪民治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呢?不是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够跳过“时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纳和接受外国的学说,也要有些容纳和接受的能力。而鲁迅在一九一七年说:

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若夫后二,可无论已……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坟》:《文化偏至论》)

这在现在看来,几乎全是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经

过了短期间的革命,而现在,那些一九一七年时候的青年,热心于提倡而实行“制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预备亡国,而且更进一步,积极的巧妙的卖国了。至于千万无赖之尤的假民权,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宪招牌。自然,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①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映,他们要用超人的名义,最“先进”的英雄和贤哲的名义,去抵制新兴阶级的群众的集体的进取和改革,说一切群众其实都是守旧的,阻碍进步的“庸众”。可是,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固然,这种个性主义,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只要看鲁迅当时的《摩罗诗力说》,他是要“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摩罗是梵文,欧洲人说“撒但”,意思是天魔。鲁迅的叙说这些天魔诗人(裴伦^①等等),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

在那时候——一九一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

全沉浸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散了。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回答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群众这样落后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革命思想界里有一个现成的答复,就是说,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等编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后也还不能够给民众自由,而要好好的教训他们几年。而鲁迅所给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说,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觉的声音”,使它“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这虽然也不是正确的立场,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总有点儿不同罢。问题是在于当时中国“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警自解,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论“胜利”,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

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他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说俄国文学家科罗连珂^①的《末光》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书,书上有黄莺,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听说这黄莺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就只能侧着头想象那黄莺叫的声音。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

呵。“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坟》：《摩罗诗力说》)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⑬“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⑭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斯先生^⑮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知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时候就开始的。我们说他的“参加”开始，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

辛亥之后，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并

不是个个人都觉得到继续统治的是谁。鲁迅说,这是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而杀“现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尸。那时候,还是完全的僵尸统治呵。

这些僵尸,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自然要竭力维持一切种种的国故:宗法社会的旧道德,忠孝节义和腐烂发臭的古文化。他们——好比“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做了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坟》:《我之节烈观》)这些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节,一定要称赞烈女。而且为着保持自己的统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为活人总要想前进,青年总想活动,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子,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凝注)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般精神,然而鲁迅在这时代已经表现了他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

“革命军马前卒”^⑮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举一个例说罢。白话运动初起的时候,钱玄同^⑯之流不久就开倒车,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言语”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不可以过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说明文章的好坏不在于文言白话的分别,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话好还应该懂古文。这样,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在运用“天才”创造新白话文的模范。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坟》:《写在坟后面》)“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⑰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他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写在坟后面》)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

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五四”前后，《新青年》的领导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张白话文学，——“理想”的浪潮又激动起来，革命的知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时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反动，——横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问题，是理想没有用处，革命的乱闹就是由于一味理想。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胡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理会不到，那么，革命党本来就不要民众理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①，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

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二六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①、章士钊^②的走狗现代评论派^③，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奥妙。而鲁迅当时的《语丝》^④，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对着这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⑤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

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亚^⑲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约瑟夫^⑳)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要想稳定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只

会运用一些“六君子”^{②①}之类“开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问题是在于要统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规则（看《坟》：《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规则，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来。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够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钊时代、五卅时代的陈西滢们，就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长了若干年，而他们现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经象生殖力最强的猪猡和臭虫似的，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子徒孙。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他们的努力，例如剿杀“学匪”，或者请出西哲勒本霍尔^{②②}来痛打女师大的“毛丫头”之类，总算不是枉费的。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无主义者”（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

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该被打而不做声(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能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文学家的最深刻的“搆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争的同时开展,这又是新的阶段的更加严重的问题。而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卅”之后的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革命是在进到新的阶段,“死者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

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动物 就不再是请愿 ,不只是“和平宣传” ,不是合法主义 ,而是……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 (《华盖集续编》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此后的“血债”是越拖越多了。

泪揩了 ,血消了 ;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 ,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题辞)

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 ,这个转变完成之后不善于做戏的僵尸虽然退了位 ,而会变戏法的僵尸就更加猖獗起来。活人和死人的斗争 ,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 ,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鲁迅说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离开广东的 ,那些吞吞吐吐 ,没有胆子直说的话 ,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 ——三一) ,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 可是 ,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 ,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 ,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 ,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 ,那么 ,现在他就更清

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是的，以前“父与子”的辈份斗争只是前一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外套；现在——封建宗法残余的统治掺杂了一些流氓资本的魔术，——不但更明显的露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战斗，而且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也不再是纯粹的“父与子”斗争的形式。同时，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

这样，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知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学运动——五四式的新文学分

化之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不能够不首先反对摩登化的遗老遗少，反对重新摆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这种筵宴旁边的鼓乐队。蹂躏革命“战士的精神和血肉……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这些流氓式的戏子，扶着几乎断送“死尸的生命”的僵尸，“稳定了”他们的新的统治。于是乎他们的鼓乐队里，就掺和了一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的吴稚晖^②”等等，而偏偏还要说这是革命文学！这其实是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低能儿（《而已集》：《革命文学》），这其实是段政府之下的陈西滢们的徒子徒孙。据说是段祺瑞、张学良^③等投降了“革命”，陈西滢们“转变了”方向；然而就社会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谁投降了谁，谁转变了方向，是大成问题的。这时候的新鲜戏法，只在于：“‘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丝杂感》）

“独木小桥”始终只是独木小桥。那些“扑通！扑通”掉下去的却学会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艺思想正在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的发展。在这新阶段上，革命文艺思想经过内部的斗争而逐渐的形成新的阵营。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已经不是父与子的问题，也不仅是暴露指挥刀后的屠伯们的问题。这是关于革命队

伍的战略的争论。

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这不但在日本、美国、德国，甚至于在苏联，也经过波格唐诺夫^③式的幼稚病。关于这种幼稚病，德国的皮哈曾经说过：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务。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④的出现，只在这方面讲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

然而革命军进行的时候，“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周围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一座万里长城隔着。何况小资产阶级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呢。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之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几千百年的痛苦经验之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

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③。”(《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然而,宽泛些说,这种文艺当然也是革命的文学,因为它至少还能够反映社会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应当注意的方向。而同时,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

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这种典型最会轻蔑地点着鼻子说：‘我不是那种唱些有机的工作、实际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赞美歌的人。’这种典型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者，他受着战争的恐怖，突然的破产，空前的饥荒和破坏的打击而发疯了，他歇斯底里地乱撞，寻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无产阶级而赞助它，别方面又绝望地狂跳，在这两方面之间动摇着。”（乌梁诺夫^{③1}）这种人在文艺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而很早“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们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暂时失败了，他们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极，有些叛变，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 + 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于是“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

《三闲集》以及其他杂感集之中所保留着的鲁迅批评创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后中国文艺界之中这两种态度、两种倾向的争论。自然，鲁迅杂感的特点，在那时特别显露那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然而创造社等类的文学家，单说真有革命志愿的（象叶灵凤^{③2}之流的投机分子，我们不屑去说到了），也大半扭缠着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酒量的问题。至少，这里都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

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

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

这是已经过去的问题了,也应当是过去的了。

鲁迅现在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关于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我们不用多说,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来:“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

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而现在，这句话里的“青年”两个字上面已经加上了新的形容词，甚至于完全换了几个字，——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动手瓜分，英、美、国联^{③⑥}进行着共管，而中国的绅商统治阶级耍着各种各样的戏法零彗发卖中国的时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义文学者”^{③⑦}说：“他们（老年的和青年的——凝注）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s）对于我们是非常

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知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象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③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

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五六页^③)“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种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拚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斯底里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委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挺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象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象许褚^④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

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混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象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篇》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纪录了。“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不过偏要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作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

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一九三三,四,八,北平^④。

注 释

卢那察尔斯基,见本书第 518 页注。

高尔基,见本书第 480 页注。

“阜利通”,英语 Feuilleton 的音译,意即报纸文艺作品、小品文。

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指俄国十二月党人。

赫尔岑,(一八一二——一八七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著有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

康、梁,即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见本书第 91 页注^⑦和第 142 页注。

曾、左、李,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见本书第 319 页注^②。

三国时蜀汉幼主刘禅的小名叫阿斗。刘备死后,丞相诸葛亮当权,阿斗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这里把全国人民称作四万万阿斗,意思是说,那些商人的意识代表、士大夫们,只把人民当做阿斗那样的名义上的主人,而不把他们当做真正的主人。

当代最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指列宁。

^⑩ 尼采(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德国哲学家。鼓吹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否定客观规律性,认为意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宣称“权力意志”是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过程的动力。

^⑪ 裴伦,今译拜伦(一七八八——一八二四),英国诗人。

⑫ 科罗连珂,今译柯罗连科(一八五三——一九二一),俄国作家、政论家。

⑬ 总理,指孙中山,他曾担任中国国民党的总理。

⑭ 《新青年》,见本书第7页注。

⑮ 德谟克拉西,英语 Democracy 的音译,意即民主;赛因斯,英语 Science 的音译,意即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称为德、赛二先生。

⑯ 清末革命者邹容著《革命军》一书,自署“革命军中马前卒”。这里是借用。

⑰ 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激烈主张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但以后思想趋向保守。

⑱ 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组织。开始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一九二五年后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闭。

⑲ 实际主义,即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瞿秋白曾写专文批判。参见本书《实验主义和革命哲学》一文。

⑳ 段祺瑞,当时任北京军阀政府——北京临时执政府的执政。

㉑ 章士钊,当时任北京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㉒ 现代评论派,指以《现代评论》周刊(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为舆论阵地的一批资产阶级学者、文人。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陈西滢、王世杰、梁实秋等。他们经常发表拥护北洋军阀政府和反对革新运动的言论。

㉓ 《语丝》,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办的综合性周刊。鲁迅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曾以《语丝》为主要阵地。

㉔ 陈西滢,即陈源(一八九六——一九七),江苏无锡人。先后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㉕ 指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的资产阶级大学。

㉖ 约瑟夫是斯大林的名字。

㉗ 指筹安会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胡瑛、李燮和六人。一九一五年由杨度出面拉拢其它五人组织筹安会,向袁世凯“劝进”称

帝,因此被称作筹安会六君子,也称洪宪六君子。

⑳ 勳本霍尔,今译叔本华(一七八八——一八六),德国厌世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极端轻视女性。

㉑ 唐南遮,今译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意大利作家。在政治上拥护法西斯主义;在创作中宣扬唯美主义、色情和尼采的超人哲学,鼓吹帝国主义战争。

霍普德曼(一八六二——一九四六),德国剧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伊本纳兹,即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八六七——一九二八),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领导人。因反对王党,曾两次被政府监禁,后被驱逐,侨居法国。

吴稚晖,国民党反动文人。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广州的日报发表过鼓吹以上列“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的文章,曾受到鲁迅的抨击。(见《而已集》:《革命文学》)

㉒ 张学良,见本书第242页注①。

㉓ 波格唐诺夫,今译波格丹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经验一元论”的创立者。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他的哲学观点。

㉔ 太阳社是由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洪灵菲等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在革命文学的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一年“左联”成立时,即自动解散。

㉕ 乌托邦,见本书第8页注。

㉖ 乌梁诺夫,今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㉗ 叶灵凤(一九一四——一九七五),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创造社。

㉘ 国联,见本书第41页注⑬。

㉙ 民族主义文学,见本书第523页注。

㉚ 一九二五年一月《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期发表张定璜写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曾说:“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㉛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④ 许褚是三国时曹操的武将。《三国志·魏书》说他“勇力绝人”，“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关于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④ 这里署“北平”，是为了减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实际上当时作者在上海。

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政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华北停战协定之后,不久就向美帝国主义借到了五千万美金(二万万)的大借款。美国方面拿出来的并非现金,而是四分之三的棉花和四分之一的小麦。这些美国市场上“多余的,没地方安顿的棉花和小麦”,要由中国民众拿出钱来去买,而买出来的钱暂时供给国民党的浪费,将来,仍旧要在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出钱来,去偿还这一笔大借款的本利。

而且这大借款的用途,又显然是大部分是用来进攻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总之,中国民众在国民党这些借款的手段和戏法里面,将要自己出钱去供给国民党来屠杀自己,镇压自己的解放运动。同时,当然也是出了利钱给帝国主义,而替帝国主义维持他们对于我们的统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油印)第四十五、四十六期合刊,署名狄康。本文和瞿秋白以同一笔名在《斗争》上发表的主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多篇文章,曾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治，对于我们的剥削。

国民党大借款的目的，首先是在进攻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是能够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唯一力量，是能够赶出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军队的唯一力量，国民党政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因此，在“严厉取缔杂牌义勇军”签字于“绝对禁止一切抗日运动”的密约，勒令北方一切抗日士兵“不得向日挑衅”之后，赶紧动员着更多的力量，实行八省“围剿”红军的计划。最近还有调动以前在北方“抗日”的宋哲元部队，来江西“剿共”的消息。二万万的大借款，主要的就要用在屠杀工农民众的“剿匪事业”上！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实在暴露到极点了。正因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的进展，正因为国民党三四年来“围剿”没有一次不是大大的失败，所以这次他们这样露骨的一面更公开的投降日本而奉送热河和河北的“不驻兵区域”，一面就奉行大借款，动员地主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屠杀民众的红军苏维埃运动。他们亟亟乎的要实行这所谓“安内”政策的原因是极明显的：中国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正在觉醒起来，围绕着苏维埃的旗帜，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这种斗争的胜利的前途是要消灭中国的地主封建剥削制度，剥夺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那时候，一切反动派，一切地主资本家不能够再来“自由的”剥削民众；那时候，帝国主义的势力，不

论那一国的，都要被驱逐出去。因此，帝国主义的列强要一致的指挥着国民党“安内”，供给这样的大借款给他们，而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也早就决定做各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他们知道无论日本占据满洲、内蒙，以至整个蒙古和中国的北部，无论美国或是英国再进一步的支配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无论国民党所谓“次等殖民地”的中国，都像现在东北四省一样，升任了“头等殖民地”，他们——当做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来看，仍旧可以“安宁的”剥削中国的工农民众。

但是，这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不但苏维埃运动一天天的进展，红军打破“围剿”的胜利，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掩盖不住，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巨大武力直接镇压之下的大城市里，革命运动、反帝斗争、罢工、怠工、反对停闭工厂和减少工资的斗争，也在扩大起来，团结着新的队伍，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一天天的发展。因此，国民党政府更加加紧的向工人进攻。他们从帝国主义主人方面讨来的借款，也就是要用来增加警察，增多那些最无耻的奸细制度的秘密侦探，大批的暗杀，捣毁一切革命团体……他们企图用收买政策，制造革命队伍之中的叛徒，他们企图雇用一些化装侦探坐守在每一个工厂，或是每一个工人区域。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消灭革命，这样就可以用民众身上括来的钱来完全镇压民众的解放运动。然而要知道，以前袁世凯对于当时的革命团体，也同样的用过“征讨”、“围剿”、“收买”、“暗杀”、“坐探”等……

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虽然在无耻的程度上，他还比现在的国民党差得多，然而这些手段和方法，都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老戏法。这些手段决不能够镇压革命！何况现在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坚强的先锋队，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工人、农民群众，有了明确的清楚的革命目标——苏维埃政权，真正民众政权的建立！

中国民众早已不是袁世凯时代的民众。他们的大多数很快就会知道，怎样来“偿还”这二万万的借款！他们都要用枪炮，用梭标来“偿还”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次的借款，是用棉花和小麦借进来的。而我们知道，现在正在闹着全中国的纱厂减工的风潮，有成千成万的男工、女工和童工，因为减工而失业，而挨饿，而变成十足的叫化子。美国棉花的大批进口，必然要使得棉花的价钱大跌特跌，纱厂的生产更加要“过剩”，中外资本家会因此而更加加重对于工人的剥削，制造更广大的失业。最近，中国棉业和面粉厂的资本家联合会，也已经承认了：大批原料的借贷，虽然可以暂时活动一下生产，然而，人民购买力的绝对低落过程，必然要使更多的生产过剩，引起巨大的恐慌。同时，棉花，还有小麦的大批进口，要引起中国农村里更大的恐慌。棉麦市场上，骤然增加这大批的货物，棉麦的价钱跌落下来，可以使得大批的农民群众，不能够不用最低价格出卖自己的棉花和小麦，为的要去做偿还高利贷的利钱，去交纳苛捐和田赋，去付田租。甚至于因

为这个缘故，国内的资本家根本就不需要收买一部分中国农民的产品，他们节省着运费，用更便宜的价钱可以买到政府所借来的棉麦。这样，农民群众就只能“三钱不值两文”的把自己的产品去向地主、债主抵偿租钱，抵偿债务。他们将要弄得吃树皮草叶的日子都没有得过。而另一方面，这些小麦，这些棉花的代价，仍旧是从民众身上搜括去的，吃面粉的，买粗布的小百姓，是负担这等费用的主要部分。一般的说来，棉麦借款的影响，将要使得中国的长期经济恐慌，尤其是根本上的无可救药的农业恐慌，更加深入，更加迅速的走到“天崩地陷”的绝路。工人、农民以及一般民众的生活，要因此更加恶化，他们在国民党的屠杀和搜括政策之下，要成千成万的死亡、流离……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自己的队伍，起来坚决的革命，为着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政府要人现在申明这借款只用来“从事生产事业”，或者说，要用借来的小麦“赈济灾民”。这是无耻的谎骗！“赈济灾民”在这三四年来的经验已经太丰富了，每一次的结果，只是一部分投机的商人借此发财，一些名为赈济的绅士借此填满自己的腰包。像去年，在所谓“谷贱伤农”的情形之下，一方面许多民众活活的饿死，他们连最贱的米麦也买不起，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商人把谷价压低到最低限度，去收买粮食屯积起来，使得还有谷子可以出卖的农民，比荒年的收入还要减少，而城市的民众却并不

能吃到十分便宜的米麦,商人的行会和大资本家的联合仍旧尽可能的抬高着零卖的价格。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耻的国民党报纸,得意洋洋的宣传着:“匪区米价高涨,饿殍载道!”至于“生产事业”,则更是笑话。最近五六年以来,国民党的十二万万公债何曾有百分之三、四是用于所谓“生产事业”的?“九一八”之后,宋子文吹着牛皮,说一年半载没有再发公债,政府收支相抵。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借二万万的大借款?!这种借款,不是实际上直接或间接的用来做“剿匪”的军政费,又用来做什么?!

此外,美国借款的秘密条件,例如抵押品之类,是没有宣布的。这里,一定有“惊人的”内容。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已经揭穿这种内幕的一角,它说:中国借新债而把旧债搁着不付利息,甚至事实上还把旧债的抵押品移转到这笔新债底下。英帝国主义因此提议要清查京沪铁路等项的旧债。这里,可见南京政府的出卖中国正在“惊人的”秘密进行。而同时,这次大借款,使得英、日、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暗斗更加深入,更加剧烈。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在“北平议和”的时候,就预言“北方的对日和平,将为中国内部战争重新发动的开始”。而美国大借款成立之后,西南方面胡汉民等就通电责问,说是“抗日战争既停,政军费收支又适相抵,则此借款之用途显有从事内争之可能”。这些都暗示着列强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各种走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开展。无论国内的军阀混战会不会又爆发起来,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都

是要更加加重对于民众的压迫、剥削、搜括的。何况他们在镇压民众，进攻苏维埃革命，屠杀反抗的工农……维持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这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正在比赛着谁的杀人本领——反革命手段高强些。

美国大借款的事实只是更加说明了：中国民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等，和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国民党之间没有丝毫妥协调和的可能！容忍国民党的统治一天，我们就要一天受着更大的剥削、压迫，我们就要在死亡、屠杀、饥饿之中成千成万的灭亡，我们就只会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一天天走到奴隶和“亡国奴”的地位上去，从所谓“次殖民地”升到“全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军阀的枪炮炸弹之下做炮灰！所以中国民众必须坚决的团结，发动一切种种的抗议反对国民党的大借款，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民众——“围剿共匪”，拥护苏维埃运动和红军。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必定代表几万万工农民众的意志，绝对的否认美国大借款的负担，我们中国的工农民众要一致的起来斗争，要发动反对一切种种剥削压迫的斗争，要赞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赞助红军的发展，取得我们的最后胜利，而取消国民党的一切卖国的、屠杀民众的借款！

注 释

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当地驻军二十九军等曾进行抵抗。五月三十一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域，使绥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北（今属河北省）、冀东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借款五千万美元的合同，购买美国的棉、麦，即美国向中国推销大宗剩余农产品的棉麦“借款”。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山东乐陵人。冯玉祥部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率部在长城抗击过日军的进攻。后被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

袁世凯，见本书第 42 页注^①。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

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八月)

《红色中华》报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业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的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

第一,《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油印)第五十期,署名狄康。

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都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自我批评”在这报上也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通信，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这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

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瞭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以为消息和新闻的编辑方法是应当改良的。

第四，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以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作有力的解释。再则，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我们以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第一是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这可以用报馆特派记者到各个重要战线，各个重要的区域，但是这还不是工

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第二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第六 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因为没有可能细致的研究这许多期的《红色中华》报，所以我只能写出这一些感想，希望这对于《红色中华》能够有点帮助。

注 释

《红色中华》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一九三四年的一段时间，曾任该报主编。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曾出油印版。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名《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五次战役 中敌人以持久战来围困我们 ,企图以长期的战争与封锁来枯竭我们的资源供给。这是他们的梦想 ! 为要粉碎敌人的围困与封锁 ,节省一切给予战争 ,特别是节省粮食的任务 ,已经尖锐地提到我们前面了。

节省粮食 ,保障红军给养 ,保障广大群众在今年青黄交接时粮食的供给 ,预防今年的粮食困难 ,这一工作 ,对于我们战争的胜利 ,对于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一运动的胜利不但可以保障红军给养 ,而且到青黄不接的时期 ,一般贫苦民众都可以不受奸商、富农的挟制。

应该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动员每个苏维埃公民来进行节省粮食运动。尽可能用麦子、豌豆、蕃薯等杂食代替粮食 ,停止制造米粉、米糕、米糖、米饼、米酒 ,

^{*} 一九三四年初 ,瞿秋白由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苏维埃大学校长等。本文原载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一八六期 ,署名维嘉。

节制饲养家畜方面的粮食消耗，节省出大批粮食集中到苏维埃或合作社来，以防备今年的春荒，加紧春耕，使我们能够得到超过去年的收获，这些都是我们节省粮食中主要的方向。

因为遭受了去年粮食困难的教训，许多地方在今年特别增加了种植面积，提早了春耕，我们的粮食合作社也在这一教训中吸收了数十万社员，解决了群众的粮食困难，今年二月开始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节省粮食运动正在各地开展（例如兴国上社区及瑞金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等）。每个革命的工人农民，都要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这些优越的条件，都保证我们能够防止或最后战胜粮食困难，胜利是我们的。

但我们必需慎重的估计到，我们有这些优越条件，同时也存在某些部分的弱点，在我们中央苏区，因为各县米谷的生产量、消费量的不平衡，粮食问题严重的程度也就有些差异，有些产量丰富的县份，应该把多余的谷子运到缺乏粮食的县份来，这里就需要我们克服过去运输工作的薄弱。我们的粮食合作社，大部分的工作还没有活跃起来，有些粮食合作社完全没有工作（如瑞金个别乡的粮食合作社），在节省粮食运动中，应该切实整理各地区乡的粮食合作社，使他成为抵制奸商、富农操纵粮食的战斗的阵地。

隐藏在苏区的地主、富农、奸商们，正在响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他们用着一切阴谋来破坏苏维埃的每

一设施，破坏群众的每一动员工作。在节省粮食运动中，必须以最大的警觉防止他们私藏粮食，操纵米价，毁坏公谷，偷运粮食出口，破坏粮食合作运动等等阴谋。在必要时，我们可以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进行对地主、富农、奸商的查谷运动，极大地开展阶级斗争来解决我们的粮食困难。

只有我们对阶级敌人的胜利，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困难。战斗地起来啊！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们，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注 释

五次战役，指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

中国能否抗日？^{*}

（一九三四年六月）

任何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任何一个不愿做忘国奴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于国民党有丝毫“抗日”的幻想。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们，早已赤裸裸的在群众当中撕破了他自己的假面，暴露了他无耻的投降出卖的走狗的真相。全中国的反日民众，从国民党血腥的屠杀中，从“抗日者杀”的无耻的禁令中，从“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欺骗中，深深的感到中国法西斯蒂国民党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深深的体验到，要争取中国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首先就要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粉碎走狗们一切掩护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无耻的宣传。¹²

我们不用列举，两年来东北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镇压下长期的浴血斗争，“一二八”上海事变中无产阶级与十九路兵士英勇的抗战，以及台湾雾社番人和非

* 本文原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七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第二 六——二 九、二一一期，署名维嘉。

洲里夫民族顽强的武装反帝行动，这些英勇斗争，已经是每个革命工人和农民所不能忘记的史迹。我们且正确的来计中国抗日动员的力量，揭发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欺骗。

国民党对于他的“中国无力抗日”曾下了这样注解：（一）中国军队力量不能抗日，（二）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三）中国人无组织力量不能抗日，因此中国现在要“充实国力”、“集中国力”，而不是抗日。当然在国民党是没有什么能抗日不能抗日，国民党所有的只是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但是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不愿意领受死亡与奴役的命运，要求中国民族的生存，要求打倒帝国主义，要求抗日，要求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自己的解放。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胜利，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首先我们来检阅中国动员抗日的武装力量。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有两百多万陆军。非正规的武装，如散在各省的保卫团等更超过正式军队的数目。湖南的保卫团枪枝在十万以上，广西也有巨大的数目。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收缴了民众三百一十多万枪支，到现在满洲还在普遍爆发着反日的血战，可以想见中国武器散在民众中的有着惊人的数量。国民党政府连年的支出，百分之五十用在军事扩充，几次进行的巨大借款，都是为着扩充军备，购买飞机、新式武器及建立军事工业（这是为着进攻苏区与红军）。这些都是中国

的武装，应当从走狗国民党手中夺取出来，而成为“抗日”的力量的。

国民党军阀，除了统制着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以外，还在继续训练新的法西斯蒂的兵团，但是却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把华北数十万军队调到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来进攻唯一领导抗日的苏维埃红军，企图消灭工农群众反帝的革命力量，为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清除道路，尽他走狗的作用。在五次“围剿”战役中，国民党这种走狗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民党这些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已经激动了全中国劳苦群众的强烈的反对，就在用法西斯蒂血腥“纪律”统治着的白色军队中，士兵群众的革命要求也一天天生长着，特别是进攻苏区接近红军的部队，士兵群众革命化的过程更加急速，许多实际战斗，使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武断宣传更加失掉了欺骗的作用。国民党从“长期抵抗”、“不抵抗”、“抗日必先剿共”到“抗日者杀”、“中国无力抗日”，这些无耻的宣传只有使士兵群众增长着不满、愤怒与反抗，他们要求抗日，他们反对国民党阻碍红军抗日。许多地方的兵士挣脱法西斯蒂“纪律”的束缚而哗变、暴动，加入红军，参加反日本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在国民党的后方，许多都会的守备队伍中，兵士群众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日斗争的影响，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加深了愤恨。在全中国二百万人的白军军

队中，除了极少数法西斯蒂的俘虏以外，抗日是兵士群众共同要求。这些武装，无疑的将在革命战争的开展中，迅速脱离国民党的统制，而成为反日战线上一种伟大的力量。

但在国民党掌握底下的时候，这些武装却是阻碍抗日的力量。夺取这些武装，打倒国民党，是抗日的先决问题。

唯一领导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工农红军，在生长壮大的过程中，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一、二、三、四次“围剿”，成为中国反日反帝的基础的力量。在目前，争取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的战争中，将吸收更广大的反日群众到自己周围，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也就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阴谋，团聚一切抗日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事情是很明显的，只要把镇压反日斗争的国民党汉奸走狗的统治推翻，更巨大的抗日力量会在群众中组织起来，三四十万人的东北义勇军，继续不断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屠杀完全失了作用，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们中央苏区今年红五月的扩大红军运动，曾经动员了三万多新战士到前方去，照人口比例，全中国的抗日动员应该有五百万军队，这一伟大的群众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可以保证我们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苏联的工农群众，曾经打

败过帝国主义十四国联合的武装干涉,这一光荣的先例应该更加巩固我们胜利的信心,我们要记着列宁的教训:“群众力量将战胜全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国际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

根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材料,日本有正规陆军二十五万人。这二十五万军队,除了一部分留在本国,以支持帝国主义的统治,镇压革命运动外,都分布在各殖民地,台湾军、朝鲜军各达二万余人,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原有二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三万多人。为了要镇压国内的以及殖民地的“叛乱”,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战争时,至多能出动二十万军队,上海战争时,日军调来中国的只有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等师团,而这些师团在上海工人和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使他们认识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的力量。

根据这些材料,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中国有十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这是很明显的。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巨大的海军,但是这些海军要防卫太平洋上的霸权,不能作为进攻中国的主力,这又是很明显的(在上海战争中,日本海军完全失利)。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强迫的义务军役制,有着一百五十万的“预备军”,但是这些“预备军”同常备军一样,他们现在正在穷困、饥饿,生活恶化的环境中增加了对统治者的仇恨,他们决不能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又是很明显的。

而我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从武装力量上来考察,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

我们再来考察我们的经济力量,看中国能不能抗日?能不能支持我们保卫生存的战争?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历年来受着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榨取,国民经济走到了总崩溃的悲惨的境地。而日本却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国富总额约有我们三倍(中国国富计三八,二八九, , 元,日本则为一二,三四二, , 元)。一九三一年度的岁入,国民党政府从群众身上拚命剥削的计达七八,三五二,八六五元(公债不在内)。而日本的岁入却为一,四八九, , 日元,超过中国一倍以上。国民党曾用这些数字来证明“中国不能抗日”,证明“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甘心每年支付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数量的外

债本息,而不肯拿一个铜元去帮助民众的反日斗争。一方面大借外债,购置军器来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而加上好听的名目,什么“建设”、“复兴中国”、“充实国力”,这就是国民党“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的实质。

每个革命的工农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日本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日本资本主义,主要的是依靠中国市场,依靠榨取中国劳苦大众,而得到兴旺与繁荣。积集在东京、横滨等处银行里的资本,多半是中国劳动群众的血汗。我们看几十年来日本对中国贸易的扩张,更可明白日本是怎样“富”起来的。

日本对华贸易扩张统计表：

1866年总额 3,674,000 海关两

1876	4,853,831	1916	273,412,978
------	-----------	------	-------------

1886	6,913,525	1917	548,650,230
------	-----------	------	-------------

1896	28,768,977	1918	756,813,000
------	------------	------	-------------

1906	94,357,287		
------	------------	--	--

这个表上的数目字,说明日本资本主义,是依靠着中国市场而存在。特别是目前澳洲、非洲、美洲各地开展着排斥日货运动,中国的市场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更为重要,失去了中国市场,日本资本主义就要更加迅速的死亡。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交,是我们对于日本的经济封锁,而不是日本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因为中国与日本绝交,日本失去了宝贵的原料与市场,而我们所失去的却是帝国

主义给我们的剥削与榨取。

帝国主义者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凶恶地联合封锁苏联,然而其封锁的结果,使帝国主义自己感觉到停止了与苏联的贸易关系,等于封锁了自己,不能不取消封锁的政策,而逐渐与苏联恢复正式的通商。这一事件,在帝国主义者,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训(虽然对于这个教训的认识,各有不同)。

当然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封锁,于我们没有丝毫损害,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有时会造成我们在物质上的部分的困难,但要是和帝国主义所受的损害比较起来,却是很微小的。

我们曾经受过国民党残酷的长期封锁,但我们并不因封锁而削弱了战斗的力量,这是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能够了解的。

我们来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根据一九三一年的材料,日本在中国所投的资本有如下的数目:

银行资本	490,620,000 元
事业投资	1,500,000,000 元
借 款	450,000,000 元
中国赔款	350,000,000 元
合 计	2,890,620,000 元

表上统计,日本在华资本总数达二十八万万九千余万日元,这个数目,国民党正在按年支付利息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用费。

如果我们没收了这些日本资本，应该是一笔最大的抗日报费，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上一个致命的打击。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对于群众的剥削（一切税捐田赋）每年计达十万万，这又应该是一笔巨大的抗日报费。

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榨取和地主资产阶级剥削的原故，只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尽有着抗日的经济力量以及一切力量。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日五大纲领中，指出我们必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对日绝交，组织广大的抵制日货行动，这些都是绝对正确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实现，使我们能得到极雄厚的经济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从经济力量上来考察，我们更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其次，地主资产阶级咒骂群众没有组织力量，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没有可能去抵抗“有组织”的日本帝国主义，应该跟随着国民党卖国贼跪伏在日本帝国主义前面，领受亡国奴的命运。

但铁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走狗们的欺骗与咒骂，显示了中国的工农群众有着强大的组织。在白区里面，无论国民党怎样的解散抗日团体，封闭抗日刊物，取缔抗日宣传，镇压抗日运动，逮捕和屠杀抗日领袖，但反日斗

争并不因此而低落，相反的，一天天走向普遍武装冲突的更高的阶段。

我们苏维埃区域里面，工人农民中不断的产生组织家宣传家，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周围，像一个人一样，为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斗。这些都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无法否认的事实。

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而国民党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阻碍抗日力量，破坏抗日力量，解散抗日力量，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无阻碍的伸到全中国来，扼死中国民众。

国民党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的五次“围剿”，正是为了要完成它这种走狗的使命，为了把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苏维埃领土，重新放到帝国主义的血手底下去。

保卫苏维埃领土，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抗日的先决条件。

我们要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

注 释

指一九三一年台湾台中县雾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五以来摩洛哥里夫部族人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

自卫军等抗日武装，一九三二年发展到三十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三年春，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一小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指占据台湾的日本侵略军。

指占据朝鲜的日本侵略军。

指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一九一九年日本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至抗日战争时期，关东军总数约百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 and 战略总预备队。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和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下，关东军被消灭。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作为当前奋斗纲领。其内容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号召全国民众自己组织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财产，并以国民党全部军费，作为反日战费。五、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开展反对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活动。